

當
碰
上
公
衛

愛滋防治的解放政治

黃道明 編

當
慾望
碰
上
公衛

愛滋防治的解放政治

When Desire Meets Public Health:
HIV Preven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iberation

黃道明 編

当欲望碰上公卫：爱滋防治的解放政治

When Desire Meets Public Health: HIV

Preven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iberation

主编 黄道明
执行编辑 沈慧婷
封面设计 杜慧珍
美术编辑 宋柏霖
校对 沈慧婷
出版者 国立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地址 320 桃园市中坜区中大路 300 号
电话 886-3-4262926
传真 886-3-4262927
E-mail sexenter@cc.ncu.edu.tw
网址 <http://sex.ncu.edu.tw>
ISBN 978-986-05-1037-9
出版日期 2016 年 12 月初版一刷

版权所有 · 请勿翻印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或倒装，请寄回更换

国家图书馆出版品预行编目 (CIP) 资料

当欲望碰上公卫：爱滋防治的解放政治 / 黄道明编. --
初版. -- 桃园市：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2016.12
232面； 21x14.8 公分

ISBN 978-986-05-1037-9(平装)

1. 爱滋病防治 2. 文集

412.454

105022947

性／别研究丛书

编辑评审委员会

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丁乃非 教授

广州中山大学妇女与社会研究中心
艾晓明 教授

北京社会科学院家庭与性别研究室
李银河 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两性与社会研究室
刘人鹏 教授

北京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潘绥铭 教授

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性别教育研究所
谢卧龙 教授

性／别研究丛书序

何春蕤

「性／别」研究在台湾的特殊语境中有着相当不同于「性别研究」或「妇女研究」的意含。

「性／别研究」虽然也重视性别权力关系，但是并不在知识与政治上将「性别」凌驾于其他权力关系之上。相反的，性／别研究会平等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权力关系与社会差异，例如性、年龄、阶级、种族、身体等等。换句话说，性／别研究很认真地对待「别」（差异）。

在各种不同的权力关系与社会差异中，有些不平等权力关系（例如阶级）已经被长期的论述所关注，有些不平等权力关系（例如性别或妇女）则已经取得某种社会正当性——虽然上述这些权力关系在全面的指标上并未达到相当程度的平等。不过还有一些不平等关系，特别是边缘的性差异与年龄，连最起码的平等地位都谈不上，甚至在批判理论的圈子中（也就是宣称进步的女性主义、左翼团体或公民权利团体中）也没有得到被认可的共识，甚至还被视为「异己它者」，以种种的理由排斥在外。

性／别研究因此无可回避地会探究边缘的权力关系与被污名的社会差异，也同时会暴露出主流批判思维的不足与压迫性质，更会进一步地反思「批判共识」、「公共领域」、「公民社会」、「文明开化」、「公／私之分」的系谱与排它的权力效应。同时，也因为这样的学术位置，性／别研究对于惯常的一些权力假设与政治策略——例如权力是从上而下（国家法律与政治乃是权力中心与改革焦点）——也采取怀疑的态度。

《性／别研究丛书》除了企图承载上述性／别研究的意义之外，此时此刻之所以有此学术丛书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台湾的性／

别解放运动在本地特有的社会形态和历史脉络中的发展，带给性／别相关主题的学术研究者非常丰富的现实要求，使得台湾的性／别研究循着不同于其他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的学术轨迹发展出特殊的论述形态。另外，部份因为现实运动路线的争议与多样，部份也为了解决实践问题，本土激发出来许多原创和新奇的观念和语汇开始重新改写传统或主流的性与性别研究论述，这些新发展也将会对国际性／别研究有所激荡。

《性／别研究丛书》的前身乃是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发行的《性／别研究》期刊（1998年创刊）。出版期刊原本是为了灵活介入理论与政治，而这份期刊当时也确实发挥了这样的功能；然而由于我们显然不由自主地偏向厚重沈实的学术呈现，使得《性／别研究》总是以厚厚的合刊本出现，在实质上也是一本本厚实的专题书籍，之后也有一段时间与巨流出版社合作发行成为《性／别桃学》丛书。于今再度出发，我们仍不改初衷，为性／别研究的学术深化发展尽力。

面对欲望、面对知识、面对实践（代序）

黃道明（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今年（2016）8月，一名爱滋感染者学生（化名阿立）被国防大学退学处置的侵权事件在卫生当局出面开罚下浮出台面。在各界一片讨伐、声援中，一篇题为〈一位爱滋感染者的伴侣告白〉的读者投书引起了我的注意。作者是国内一名法律研究所的江姓研究生，他现身说法，教育大众在妥当的防护措施下（包括感染者服药压制病毒量、避免「过多的体液交换」）和感染者共活、进行亲密关系，是不会有感染疑虑的。除了肯定卫生当局捍卫感染者就学权的作法，呼吁大众不要在无谓的恐惧中一味排斥感染者：他认为不友善的社会氛围使得感染者不愿坦承感染身分，这不但让旁人无从采取必要防护、协助感染者维持健康，也无助于「疾病控管」¹。

值得注意的是江文所采取的公卫视角。我相信这并非他的本意，因为他曾在别处分享过与他伴侣的生活点滴、企图让同志社群更了解爱滋污名的排斥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江生确实援用一种普遍于现下主流爱滋倡议及关怀教育的言说模式，而这不禁让人想起，90年代初期同志主体浮出地表之际，也有一种名之为「谁来关怀同性恋」的相似情感结构和语法：那时，开明的异性恋者说，社会应该要接纳、包容同性恋者，这样「他们」才会愿意卸下面具与你共舞（潜台词是：这样「他们」才有勇气走出来做筛检、接受治疗，否则会躲在黑暗中到处散播爱滋、威胁正常人的健康）。

有意思的是，江生特别标明他是和台湾近3万名列管人口一起生活的亲友，而这些人绝大多数没被感染就是破除爱滋恐惧的最佳证明，

¹ 江蕴生，〈一位爱滋感染者的伴侣告白〉，《苹果日报》，2016年9月2日。

虽然他忘了，1990年颁布的爱滋防治条例一开始也是把和感染者一同生活的人列为公卫追踪对象；他也忘了提，感染者的性接触到现在依然是被追踪的对象。不过江生确实丢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感染者周遭的亲朋好友（可以把同志游行的人数算进去吗？）究竟是怎么看待座落于他们社交／亲属网络里的人，此人因血清状态而被国家以人口行政隔离并终身列管？蔡英文总统出面挺阿立时曾说「不但不能歧视，还更要珍惜」，我们不禁要问，蔡总统是在怎样一个抽空的历史脉络下做此廉价的温情喊话？政府、社会若真出于呵护之情因应爱滋，台湾又怎还会有列管及强制筛检？军方今天还会以「形迹不检」（该生做了不道德的事而感染了不道德的病）为口实处置阿立吗？江生和总统的发言无宁映出了一个冷酷的现实，那就是，感染者身分至今仍足以让（家）人蒙羞，而绝大部分的感染者至今仍无法与家人、亲友自在相处（就看什么程度的蒙混），正因爱滋污名与「忌性反毒」的主流道德价值紧密相连，更在新公卫（New Public Health）健康自我的管理责任框架下强化²。

在后SARS时期，风险个体取代了高危险群，主流防治——即便强调欢愉——召唤的莫不是个审慎避险、懂得「全程带套」的理性防治主体。冒险的概念本身就蕴含了责怪，尤其是自2004年的农安轰趴事件以来，忘我的性爱用药者更被广视为败德染病者。近百名同志聚众淫乱，其中还惊见列管在案的感染者，卫生当局于是决心加强列管，在照护体系植入了爱滋个案管理制度，以个别化的谘商辅导责成自我照护及「阳性预防」，另方面则修法，不但直接从个管师掌控个案病情，更扩大自身专断行政权，让疾管署(CDC)得以「防治需求」为由，泄漏病患隐私给警政司法单位。在CDC一把抓下，爱滋医疗的列管化与温情监护因而在后鸡尾酒疗法时期形成了一套结合官、医、民三方的协同治理，成了形塑「帕斯堤」感染者主体及正向人生的主要技术：个管师教、养、卫的知识—权力操作成了引导感染者做自己、打造自己、导正自我欲望的主力，而民间团体（如从事「社区预防照

² 新公卫的个人健康责任框架在本地的大幅运用首见于80年代以降的烟害防治宣导，公卫因应新兴跨国高传染疾病的模式在2002-3的SARS风暴中急速融入日常生活、成为自律的肌理。

顾」的露德协会）更与之唱合，倡导感染者培力、「当自己的个管师」。

过去十年来，本地爱滋列管产业的大幅扩张造就了新兴爱滋专业阶层的出现，同时爱滋防治也在性别平等政策的推波助澜下迅速主流化。眼下的爱滋教育与同志健康友善文化看似开明进步，却不脱长久以来之「忌性反毒」防治格局：一方面爱滋筛检道德化，形成检验私德的工具，而「全程带套」则成为狭隘的「安全性行为」律令，用以归咎「性」交谊情境中的冒险探索而无视各式情境中可能采行的避险策略。另方面，医疗本位的减害思维则持续将主体的用药实践偏差化。以2011年的冯姓教师案为例，它激起的媒体回应不但是台湾社会忌性反毒价值的缩影，更是爱滋医疗列管化的产物：个管「忌性反毒」的正规自我照护知识在此案起了关键作用，不但成了举世无双的交叉感染罪刑化，更让此案成了防治条例颁布以来判刑最重的案例³。值得注意的是，感染者就医要签CDC 制作的「领取全国医疗服务卡权利与义务告知书」。签了而不去做官方认为应该做的自我照护与减害（像是不能与感染者无套性交，但这在国际上是被认定安全的），国家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来惩罚你，爱滋照护于是丧失了本该以病人为中心的伦理⁴。令人深思的是，现在虽然民众大都有爱滋传染的基本知识，然不可讳言，在情感面上，无论官、民防治宣导怎么在「『爱』滋」上做文章，台湾社会的爱滋恐惧依然根深蒂固。我们要问，爱滋教育在内容及落实上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爱滋工作者该如何看待自身所操专业知识与此现实间的巨大落差？爱滋全面医疗化与爱滋运动之间存在何种张力和矛盾？感染者又该如何看待自身处境？

本书是中央性／别研究室出版的第三本爱滋专书。它延续了前两本的解放政治观点和历史眼界，邀请读者一同来探究爱滋防治里的欲望、知识与实践。它集结了过去三年多来中央性／别研究室邀请来台的爱滋学者／运动者包括荷安珀（Amber Hollibaugh）、裴新（Cindy

³ 详细分析请参见黄道明，2016，〈「性」病毒的保安政略〉，收于何春蕤、甯应斌（编），《性／别二十》，中坜：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页153-184。

⁴ 台湾爱滋病学会的脸书贴文指出，疾管署已规划取消目前病患加入个管的同意权，预备将感染者全面纳入个管。显然，这套照护制度的美意好到病患都不能拒绝。

Patton）、肯恩·瑞斯（Kane Race）、莎拉·舒蔓（Sarah Schulman）的讲稿与文章，也记录了她／他们和本地酷儿公众一同打造爱滋边缘公领域的轨迹。

本书以美国资深左翼酷儿、爱滋组织者荷安珀在「第八届性／别政治超薄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小心公民社会」的主题演讲及四篇深度对话拉开序幕。在她抗拒认同疆界的自身实践、追求酷儿经济正义的政治历程中，我们看到早年北美爱滋运动里的感染者如何透过自学、共学让庶民变成专家、扭转医病关系，也看到酷儿保卫社群价值的精神如何体现于职场文化与集体照护（而后者更是与同志老化议题的思考一脉相通）。荷安珀阐述环绕于性、性工作和用药的道德主义是如何驱动惩罚性的爱滋政策，以及爱滋污名如何透过种族、性别、阶级、年龄运作，直指至今仍不见于主流爱滋论述的欲望。她要求激进政治必须将「性」与「情欲」等等传统上被视为是「私领域」的经验跟需求纳入讨论与关切的范围；而同时又要求去看见「性」当中的阶级。对她来说，欲望的危险在于，人们因禁忌而无法面对、言说自身的欲求但却又会忍不住去做，而如何让人有能力处理自身欲望的意义，则是爱滋防治的核心。正如她说的，「感染者运动固然不用去为这恐性文化的修复负责，可是假如我们不扛起这责任的话，实在不知如何能让人放心谈性！」无论是她那撼动人心的肉搏式爱滋教育，或是那套由社群照顾伦理长出的减害模式，荷安珀的政治实践和愿景，都深深提醒了此刻爱滋运动在爱滋专业化下所面临的多重挑战。

本书的另一主轴人物是世界知名爱滋社会科学家裴新（Cindy Patton）教授。继2011年来台后发表批判「治疗即预防」趋势的重要论文（收于《爱滋治理与在地行动》），2014年秋季她再度访台进行「生命伦理学纵观」讲座教授系列演讲。本书收录的文章呈现了裴新检视爱滋历史形构的两个切入点。首先，借由70年代同志性健康史的追溯，她勾勒了彼时提倡性病防治的社群意识与作为，以及左翼同性恋运动如何以梅毒研究抗议警察以性病管控为名惩戒娼妓及男同性恋者。而虽然同志公卫专业在建制化过程中逐渐远离性解放理念，但80年代初期男同志所创发出的安全性实践(safe sex)仍体现了解放政治的

精神。在公卫持续用不可靠的统计数据将男同志操作为高危险群的情况下，她认为回归早年解放意识下生成的自我关照，才是最实在的防治策略。

裴新的第二个切入点是新公卫的个人责任防治框架。在〈与Tina谈谈：梦幻成真之际〉里，她分析了2000年中期的爱滋「超级病毒」媒体报导。2005年，美国纽约公卫发布消息指出一种凶猛新型抗药性爱滋病毒株的出现与男同性爱使用甲基安非他命（俗称Tina、冰或冰毒、烟）有关，引发媒体关切。虽然这「超级病毒」说的科学根据旋即被医界否定，但裴新指出，「同志—爱滋—冰毒」的连结依然在反毒战争与「同志=爱滋」的意识形态双重作用下运作。记者新闻专业素养不足、没能力辨识爱滋及用药社会科学研究的良窳，因而以科学的外衣包裹其偏见，并透过不同的报导手法（大肆宣染问题严重性后再冷却处理以巩固威权现状、人道医疗报导用以强化十二步戒治疗法的正当性）及修辞（新自由主义有条件的同志友善、把复杂的用药社会问题简化为个人心理问题），而持续在媒体扩散形成强大的社会规训作用。对作者而言，冰毒和同志的因果关连之建立取决于既定的社会逻辑运作和知识操演（这当然包括某些裴新所称「炼金术」般的劣质社科研究）。她揭示了一个被否定的科学事实所含的文化成见，是如何经由传媒中的专家知识而再被强化。她深刻提醒读者，在责任个体化的主流爱滋及毒品防治框架下，同婚成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性隔离手段，而同运则沦为戒治团体。值得一提的是，裴新的文章不但帮助读者理解公卫统计数字是怎么操作的，也介绍了社科研究方法及社会流行病学的后设分析，可说是公卫、媒体批判识读的极佳教材。

2015年二度访台的知名酷儿用药／爱滋学者瑞斯教授（其文章见《爱滋防治、法律与愉悦的政治》）接着带领读者一探雪梨男同志性爱用药的场景。和主流公卫病理化的取径不同的是，瑞斯把眼下盛行的网路约嗨视为一套由「性交遇的新兴基础建设」中介的文化实践，并审视这物质基础建设构成元素间交互作用生成的特定情境（不管多暂时）及风险。这包括仔细探究各式软、硬体搭成的线上虚拟及实体空间中的人际互动，也就是合法（如抗爱滋病毒药物）、非法用药、

欲望及A片在「玩」这样的社交模式下所衍生、实验出来的友谊及亲密关系。瑞斯提醒我们，有效的爱滋防治不仅必须摘去医疗道德的有色眼镜，也不能预设情欲主体在参与情境中的全然主控能力（欲望并不理性，而忘我、出神也不是只有在性爱用药下才会产生的状态），而是必须去关注约嗨、约玩的动态过程中的危机与转机，并尊重主体追求愉悦、亲密关系且自愿承担风险的决定。

令人深思的是，在爱滋罪刑化下，未感染的人被鼓励不用为自己的爱欲后果负责。今年来台演讲同志国族主义与帝国粉饰、爱滋运动的酷儿学者／小说家莎拉·舒蔓（Sarah Schulman）在本书中指出，在加拿大，强加感染者告知义务的法律（无论有无进行安全性行为，也不管有无造成感染）把未进行告知视为重伤害罪，这不但把人际关系中因差异而起的可能冲突（舒蔓认为如何了解进而化解冲突是生而为人的责任）夸大为伤害，更制造了纯然的「受害者」位置；在爱滋罪刑化下，占此位置的非感染者被国家赋予举报权，因而把不愿处理的自身焦虑投射为感染它者对自己的迫害（爱滋刑事案在加国有种族化的面向）。此外，舒蔓也介绍了加国感染者运动如何以海报艺术介入、抗拒统治者以举报文化分化人民的手段，呼吁人们以平常心看待爱滋感染及无套性交，并劝民众在告发时要三思。

在这过程中，我们也特别邀请了本地早年爱滋运动者倪家珍以及爱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理事长吕昶贤一同参与对话。在荷安珀执导、探讨爱滋与女人纪录片的 *The Heart of the Matter*（1994年出品）在台首映座谈中，倪家珍回顾了她如何在90年代妇运忌性的氛围里开拓爱滋边缘议题、挑战公卫禁欲的性道德，并借由翻译裴新教授所着的《爱要怎么做：爱滋年代的女性爱指指南》手册，教导女人在生活及关系中开拓情欲。座谈所呈现的90年代爱滋运动的解放政治眼界（例如呼吁废除强制筛检政策）是值得眼下爱滋专业及倡议者省思的。另方面，吕昶贤在「爱滋防治的解放政治」座谈中，则针对「治疗即预防」的终结爱滋梦做出了精辟的批判。他忧心指出，此防治方针是如何以牺牲感染者为代价；「你有没有吃药？」的公卫温馨提示掩盖了感染者医疗自主权被严重限缩的现实，因为「许一个没爱滋的未来」

面对欲望、面对知识、面对实践（代序）

不间断长年吃药对每个不同身体造成的沉重负担（抗病毒药物毒性甚强），另外他也提醒，此刻爱滋运动因规避处理性和用药污名而有沦为「爱滋医药福利服务运动」的危险。他特别向本地爱滋运动的先驱者田启元致敬，以他的剧场实践及自主精神（这被本地爱滋纪录片《我会幸福的》之温情关怀手法所严重扭曲）向感染者及周遭的管理者示范，贴近主观感知、联系「身体、同心、同社会」的生活实践如何可以转化人际互动惯性、翻转污名。而正如黄道明在本书中的田启元纪念文所显示，田启元的剧场实践不仅冲撞体制，更有着左翼视野的社会关怀；他以一贯的诚实态度做戏，直剖欲望、面对污名及自身历史处境。他寻找「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之历程，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酷儿精神资源。

一如以往，这本书得以问世要感谢性／别的几位助理合作规划和执行，感谢助理和翻译者的辛劳。另外，何春蕤在校阅、润稿上提供了许多援助，特别向她致谢。本书的制作由科技部性别与科技人才培育计画和中央大学「迈向顶尖大学计画」提供主要经费，中央大学英文系、台联大文化研究国际中心、台联大亚际文化研究学位学程、台联大文化研究跨校学程等等单位和计画提供部分经费和支援，在此一并致谢。

目录

性／别研究丛书序

- iii 面对欲望、面对知识、面对实践（代序）
 黄道明（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 1 欲求变革：建构一个激进的性政治
 荷安珀（Amber Hollibaugh）着，何春蕤译
- 21 与荷安珀对谈爱滋政治
 荷安珀（Amber Hollibaugh）、黄道明等；颜维毅、梁俊文译；
 黄道明校订
- 45 爱滋运动的社群照顾与欲望对话之必要：荷安珀访谈
 梁俊文、黄道明译；黄道明校订
- 61 妇女·爱滋·家庭？：纪录片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在台首映座谈会
 王革（台湾性别人权协会）
 荷安珀（本片导演／监制、美国资深爱滋运动组织者）
 倪家珍（《爱要怎么做：爱滋年代里的女性性指南》编者）
 丁乃非、黄道明（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 79 性、劳动与新工运主义：荷安珀与辛尼帕尔一席谈
 杨雅婷译；何春蕤校订
- 101 爱滋防治的解放政治：当欲望碰上公卫
 黄道明（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裴新（Cindy Patton，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
 吕昶贤（爱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理事长）

荷安珀（Amber Hollibaugh，纽约酷儿经济正义组织）

129 男同志持续高危险？：一个性解放的历史、政治观点

Cindy Patton着；颜维毅译；黄道明校订

151 跟Tina谈谈：梦幻成真之际

Cindy Patton着；张骏呈译；黄道明校订

175 约嗨：Party and Play

Kane Race 着；梁俊文译；黄道明校订

197 冲突不等于伤害：加拿大HIV入罪与焦虑效应

Sarah Schulman着；刘以庆译；何春蕤校订

205 爱滋与海报创作：嘲讽HIV入罪化的艺术行动

莎拉·舒蔓着；黄杰译；何春蕤校订

欲求变革

建构一个激进的性政治

荷安珀（Amber Hollibaugh），何春蕤翻译

丁乃非（主持）

我们非常非常高兴，等了很多年才等到了今天的主题演讲者来台。作为荷安珀（Amber Hollibaugh）长期的读者和粉丝，我很荣幸今天能在「小心公民社会」这个会议上介绍她。荷安珀是作家，拍过纪录片，更是前辈的运动份子，有40年以上的社运经历，她曾经连结的不同团体和协助建立的早期组织不计其数，包括了早期的1978年「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历史工作坊」，她也是妇女运动、女同性恋、男同性恋以及后来酷儿运动的先行者，参与了在全球都非常有影响力的美国「性辩论」，那是女性主义在美国分裂的起始点。荷安珀在HIV/AIDS的运动中也组织并工作了30年以上，更和工会运动有着长期的联系和合作，她的运动经验和作品早已经实践了也写出了现在女性主义不断提醒大家做的所谓「交织各种权力轴线」的思想和运动工作，她其实早就在力行。在那个年代，她开创了酷儿女性主义、性工作女性主义、妖婆女性主义的运动和论述，是这些领域的先锋，也是现在和未来女性主义的先行者。台湾的女性主义迟滞了这么多年才让她的声音能够跨海产生一些联系，我们非常非常荣幸，很期待她的演讲。现在让我们一起欢迎她开讲〈欲求变革〉。

Amber Hollibaugh

首先，我非常荣幸也非常感谢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邀请我来台湾。我虽然住在美国，却一直关注性／别研究室的发展，因为在这个

世界上很少有团体像性／别研究室一样能同时关注「性」和「社会正义」这两个议题。而且性／别研究室在知识生产和运动实践上的齐头并进特别让我感觉气息相连，也从她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太爱性／别研究室了，收到邀请时感觉真是不可思议，又兴奋又荣幸。

今天早上我想用我个人的生命故事来框架我想讲的主题：「平等与解放」。我想要讲我的生命历史如何形塑了今日的讲题，也就是我的成长经验如何形塑了我谈同志婚姻议题的角度、我谈性平等和主流化的立场、我谈国家管理爱滋的措施、当然也包括感染者身分与监控的问题。最后我也想从性工作作为劳动、以及性作为欲望的角度来谈性工作和个人欲望的问题。

对我而言，理解自己知识历程的开端是很关键的，这个开端就是我贫困绝望的人生。我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饥饿是常有的事，常常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也不知道明天或下个月要怎么过，家里每个人都倾力工作却仍然没有什么前景。我来自这样的家庭，但是我很幸运，在1970、198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以及全球激进政治和激进主义里找到了投入的热情。在运动里，你不需要博士学位就可以读那些很有意思的书籍，也可以加入很有意义的行动，激进的社会运动反映了我自己的愤怒绝望以及改变现实的希望，而参加激进运动就像上大学一样，给了我充满知识的生活，也给了我文化，给了我诗文，让我可以不必受困于我的出身。

在激进政治的脉络里，我也加入并促成了同志解放运动的诞生。过去我的同性恋身分常常使我在参与激进政治的其他运动里遭遇困难，因为不同的激进运动例如工运、左翼运动、甚至女性主义运动往往都是恐惧同性恋的，我很难公开用自己女同性恋的身分加入她们。因此我很骄傲自己后来是开创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一份子，有了这个运动，我们从此可以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分，公开而毫不羞耻的宣告「性认同」是我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早期同性恋解放运动里虽然有时也出现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倾向，但是那至少还是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是我所坚信的、有女同性恋概念的女性主义，我也相信那个激进的同性恋运动表达了我最深刻的价值观，而且为我、为与我类似的女

人、以及为世上所有的人提供了一个属于我们的愿景。

可惜，当时的同志运动认为T／婆只是复制异性恋，认为她们背叛了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对平等和非权力关系的基本信念。当时运动就是这样看T／婆关系的：如果你是个和石头T黏在一起的婆运动份子，那就很麻烦了，在运动内部常常会被当成箭靶。要是你带着伴侣去参加行动或者聚会或者做组织工作，你们多半会被人非议，别人会说你们分裂了运动，伤害了运动的进程。她们认为你是危险份子，政治不正确，意识也错误。她们会数落你做的错事，期待你重新做人，幡然悔悟你错误的情色欲望。对于这一切指控，我都很严肃的看待，因为这是我所归属的运动，也是我促成创建的运动，它代表了我的价值和最深切的梦想。我在运动里挣扎了两三年，一直希望能够处理我的情欲和我的政治，我希望能厘清我的情欲对象、我自己的认同、和我作为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的政治身分。有一年，我受邀在同志游行里演讲，但是演讲后却因为我的婆身分、因为我和T的关系而受到很大的责难，我当时非常非常难过，跑到旅馆房间里企图自杀。

我告诉各位这个故事，是因为相较于传统的政治选择和政治愿景，「性」太常被当成一件不重要的琐碎事，而当你在一个你所热烈拥抱的运动里对这个现象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这个运动却反过来批判你的情欲身分，那当然会让你感到沮丧。那时我就是彻底绝望，最终甚至想要自杀，那是我人生唯一一次想到自杀，因为我真的感觉到，活出自己想要的情欲生活就是背叛自己的运动，而我完全不能接受这样。

度过了这个自杀的难关以后，我很清楚知道，不管我参与什么样的运动，我不会再让任何人陷入这种必须深刻分裂自我情欲身分和政治身分的状态。激进运动决不可以逼迫人们以谎言来掩盖自己的性身分，决不可以强迫人们背叛自己的性以便拥抱政治愿景。我们必须让所有激进的政治愿景同时存在。

那次的自杀未遂在我的人生里是个很戏剧而恐怖的时刻，但是让我觉悟到自己竟然落在运动核心价值之外的经验倒不是只有这一次。事实上，我经常感觉到，要留在自己所属的运动里是个令人紧张的事

情，倒不是因为我不相信这些运动，而是因为我在运动里总是异类，总是不符合这些运动原来所预想的成员性质。在以中产为主的女性主义运动里，我是唯一一个有着贫穷历史而愿意谈贫穷问题的人；在白人为主的运动里，我是唯一一个混血的杂种；在一屋子异性恋里，我是唯一的女同性恋；在一个不愿意面对HIV爱滋问题的社会里，我却长期从事HIV的组织工作。

我做过妓女和艳舞者的生涯就是这些矛盾之一。在运动里，人们通常不太问你做什么工作维生，你如果说，别人也不会问，这就跟美国总统柯林顿的军队同性恋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另一种形式的「「不问就不说」」。可是对我而言，参与社会运动追求彻底的改变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因为它可以彻底打破来自我家族所命定的贫穷绝望。我不想我的人生就和家里前辈的女人一样，我不要我的人生被局限在那样渺小、永远无望的框框里，而参加左翼的激进运动，就是我争取向上攀升的机会，我可以打破恶性循环，逃离贫困的生活。很重要的是，性工作让我得以成为积极的运动份子：任何城镇都有性工作，我可以早上参加抗议游行，晚上照样上班，而且在任何城市都可以跳艳舞，没人会问你有没有学位，只要有可看的胴体，只要你知道怎么跳，就可以上班了。

悲哀的是，我加入妇女运动和同性恋运动的时候才发现，在批判女性生活的时候，女性主义对性工作的批判也采用了同一个基本信念，就是认为性工作体现了女人所承受的所有压迫，而性工作就是男人压榨女人，压迫女人，掠夺女人，掌握女人的身体，把女人变成受害者。所以，做性工作是不可能让主体上升的，「你是在没有选择之下被迫入行的，任何有点脑筋的女人都不可能自愿去做性工作。」

我的工作和我的运动之间的矛盾逼得我快发疯了，可是女性主义圈里还是不断用性工作来证明女人受压迫的情况有多糟。我不知道要怎么回应才好，性工作绝对不是我一生中做过最糟的工作，其实，不管是哪种工作，关键在于我怎么操作它、我在什么样的场域做、以及我在工作上有多少自主性——这些才决定了这个工作是好还是坏。我做过的大部分工作都很糟，都不是一般人会主动选择的工作，因为老

实说，贫穷就意味着你只有一组很糟的选择，这就是贫穷逼你走的路，你就只有那些很糟的选择，你只能在其中选一个，然后努力存活。

可是我突然发现自己身处的女性主义运动很坚定的把卖淫当成一件可怕的事。这也就是说，我在参与运动时就必须闭上嘴，别讲自己的卖淫史，要讲就要讲自己如何受害，只能讲「天哪！那个工作太可怕了，那是我一生中做过最糟的工作！你想像不到那有多糟！天哪！感谢上帝让我遇到了女性主义，我才得救了。」（众笑）但是那不是事实，因为卖淫并不是我曾干过的最糟的工作，可是大部分人根本不想听我讲我在性工作里的真实状况。我逐渐觉悟，作为一个运动份子，我需要建立一个可以让人诚实诉说自我生命而不必谎言粉饰的运动，我需要能够真实呈现我作为女性主义者、作为婆、作为性工作者、作为混血杂种女人、作为一个贫穷女人的全部生命历史。

但是我后来也觉悟到，我应该为自己曾经深入参与的运动负责。站在外面批判别人当然容易，但是我也是这些运动的成员，而这些运动却犯了我现在批判的这些错误。我觉悟到，运动本身往往有着没有被检视和反省的成见，在形成运动目标和进程的时候往往对阶级、性别、性特权都有一些无意识的理解或现实，而这些预设也深深的嵌入了后来的决策以及运动可能吸引的群众。我所参与的这些运动从来不会想要邀请性工作者、T婆、以及各式各样变态的、跨性别的、性欲异类的人加入；这些运动对于把穷人、底层工人放在运动进程的核心来设计目标完全没兴趣，也不愿意考虑那些可能有用药历史、可能入过监牢、可能曾被生命撕裂而正在努力重建人生的人；这些运动也不想要非法移民，不想要那些有着讲不清楚的复杂人生故事的人。结果，运动的目标、进程、方向都不会考量其他这些生命迫切需要的目标，不会考量不同的人所提出的不同问题。

我们可以来看看同志婚姻的议题。同志婚姻可以提供住房给我们吗？同志婚姻能不能改变我们的经济处境让我们和所爱之人好好活下去？同志婚姻会不会鼓励我们做我们各自美丽的、狂野的、怪异的、无法被挑战的自我？或者，同志婚姻只是把我们削足适履地融入既有

的异性恋关系模式，只不过让我们维持同志身分而已？现在美国的同志婚姻议题展示的是无数完美形象的同志，穿着完美的衣着拍照，他们有完美的工作，完美的子女，完美的住家和花园。如果媒体质疑「你是个恶心的变态」，他们就会回应：「不，我上教堂，我有正职，我是很好的邻居」等等。在这里被呈现的完全是模范的同志，表率的同志，而每个同志都必须把自己放进那个模式才可以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而同志运动根本就不想挑战这个模式。

主流化从来不会追求任何激进的改变，它只想要国家提供保障让我们可以把自己调整到可以塞进现状。主流化不挑战任何东西，只问我们能不能融入现状，而且基本上往往都会同意国家监控各式各样的性。我想讲一个完美而可怕的例子来说明「性」的监控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在美国，除了内华达州，性工作是全面非法的，所以你要干这行就无法得到任何来自国家的保障或保护。再加上女性主义一向对性工作抱持非常敌视的态度，想要全面禁娼，要不然就是希望禁制更多，惩罚更严，女性主义也主张惩罚嫖客，这些都使得性工作的环境更为严峻。4年前贫穷的观光城纽奥良市经历了卡翠娜飓风，经济上百废待举，飓风之后，纽奥良市成立了一个新的行政规范，规定任何因卖淫被捕定罪的人都必须被记录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所谓「性偏差名录」上，一旦你被抓到卖淫，那么你所有的证件，从驾驶执照到出生证明到社会保险卡，都会盖上「性偏差」的章。你申请工作的时候必须出示身分证件，证件上就盖着「性偏差」，那你还想找到工作吗？这个措施也把「性偏差」从原始所包含的恋童范畴，扩大包含得更宽更多范畴，后来竟然还决定不但要包括所有因卖淫而被捕的人，还要包括任何因犯行被捕而被发现是HIV 感染者，这种人不但会被起诉，还要加上这个额外的注记。更糟的是，这些被捕的妓女或HIV阳性的人都竟然在整个纽奥良市都找不到律师帮忙为他们辩护，就连在劳工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同志运动里都没有人愿意碰这些人，更不要说为这些在性偏差名录上列名的人打司法的仗。后来我们一小群人听说了这件事就开始组织，纽奥良有个组织叫做「愿景女人」（Women with Vision），成员大部分是贫穷的有色女人或是HIV阳性的男同性恋，

我们就一起工作，一起发声，集体讨论，打造了一个非常强的案子，去挑战路易斯安那州的性偏差名录。你可能觉得社运团体应该会自动来加入我们帮忙推动，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团体来帮忙，所以这场战争是由穷女人、有色女人、HIV阳性男同性恋、和另外一些像我们这样斗志旺盛的人主打的。我们一直打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最高法院，打得非常棒，最后打赢了，现在路易斯安那州不能再因为你卖淫或HIV阳性就把你登录在性偏差名录里。虽然是一场胜利的战争，可是代价却非常高，因为在这个胜利到来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因为名字被放上性偏差名录而自杀，有些人家庭破碎，有些人失去了住屋，失去了小孩的监护权，这些伤害都是没有办法回复的。这个例子清楚的显示，虽然官司打赢了，国家监控的可怕以及它可能造成的恶果却是非常严重的。

最后，我想谈谈「平等」和「解放」之间的张力。我刚才和各位分享的故事都呈现了一种很不一样的酷儿状态，和一个很不一样的政治愿景。我在纽约经营的组织叫做「酷儿经济正义」（Queers for Economic Justice），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一些让其他酷儿感到紧张的人，因为他们穿着不对、讲话不对、看起来也不对，他们的人生故事不是一般LGBT运动里听到的故事，他们不是在大学宿舍里骄傲出柜的，他们是在监狱里、在寄养家庭里、在街头无家可归时出柜的。在他们的生活里，性工作是个好的选择，药瘾则是非常强烈、需要不断抗拒才能存活的，他们永远都在面对贫穷，租不起房子，没有住处，常常要想办法在收容所过夜，他们工作的地点是人们找便宜货才来但是决不会考虑在此工作的店，而在店里做的工作也是人家不要的工作。对于运动而言，这些人太酷儿了，太怪胎了，他们走进纽约市那个宽广的同志中心时，人们会请他们离开，担心他们弄脏了大厅，因为他们总是在大厅里逗留，停留很久，而且使用洗手间洗浴，讲话又大声，从来没钱买同志中心卖的书或食物，所以工作人员很希望他们别来，因为他们的出现总是让人焦虑。但是这些人是恣意张扬的，聪明绝顶的，然而他们也是不断受伤害的，这些人才是我认同的酷儿，然而我所参与的运动却永远也不会真诚的邀请这种酷儿加入。

我想要的努力的是一个彻底改变了的世界，在那里，出自这种背景的人会坐在餐桌的正中央大位上，而不是挂在餐桌边缘等着看看有没有人要邀请他们入席。我不要那种惟利是图、草菅人命的世界，我要的世界决不会让人挨饿受冻，劳动会被尊重而不是当成道德教训的素材。人们可以依着自己的专长就业，可以决定自己要什么、需要什么。在那个世界里，酷儿根本不会想要正常化，不会想要做正常人，而是活出酷儿、同志、和各种各样歪曲不直的人的绚丽和差异，并且挑战异性恋的强制性和它在许多人的人生中所造成的伤害。我所期待的社会运动，不会要求「平权」，而会严肃的看待性、欲望、情色的议题；这样的世界会让人学习如何做爱而不必担心惩罚、怀孕、或爱滋。在这里，我们要求的愿景是激烈的改变世界，但是我们也同时策略性的一步一步努力积累，朝向我们要去的地方。不管如何，我们的运动会坚定的向着我们的梦想世界前进。尽管我们总是被放逐的，被排挤的，我们坚持要创造一个真心诚意爱我们、拥抱我们这些怪异酷儿的世界。

讨论

丁乃非：我们这场还有两分钟，可以问问题。有没有人有急切想讲的话？

黄道明：我刚刚听 Amber 讲到美国的 sex offender registry，其实那跟台湾爱滋列管的意思是一样的。

Amber Hollibaugh：谢谢黄道明。我刚才之所以要讲性偏差名录的故事，就是因为这些监控管制的制度是很相似的，而这种国家干预的监控措施背后通常都有一股强大的道德动力，这是我们需要注意和分析的。

听众 A：我想请问一下 Amber，你在美国过去这 40 年这么长的运动经验当中，遭遇每一次的挫折，从自己想要自杀到在纽约积极帮这些所谓的怪异酷儿发声，这是一条孤单寂寞的路，而你不只是为自己，还有为跨性别或者其他族群努力。你的动力

到底是从哪里来？很敬佩你，谢谢。

Amber Hollibaugh：首先，我觉得我大概本性就是如此，好像从小就很难顺从外力的控制，这个本性也让我在原生家庭的各种困境中存活了下来。我本来是活不下来的，我也不希望别人经历我所经历过的事情，但是我在其中得到的宝贵教训却是终生受教的。即使我有这样坚韧的本性，我还是必须说，那个濒临自杀的经验对我而言并不是无所感的，想起来的时候还是令我心碎的，创伤也是深植心中的。我在运动里常常感到内心的拉扯，因为我相信我所加入的运动代表了一些重要的价值，我相信运动所做的事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我也全力投入那些努力。然而我却发现，我没法赞同运动的某些部分——不是全部，但是那些非常关键的部分让我觉得必须站出来来说些什么话。今天我在这里讲这些事情也很讽刺，因为当年我提出反对意见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我在自己的运动里被放逐了，没工作了，不能再参加研讨会了，不会再被妇女运动邀请去座谈了，代价非常高。但是同时我也发现——而这也是我坚持走这条路的原因——我并不是为反对而反对的，我不是想讲什么动人的故事，我只知道，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听，我这种故事是很普遍的，只是没人说而已。这些故事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太多人干过性工作，太多人贫困一生，太多人被自己所热爱的组织放逐，像我这样遭遇的人可多了。但是当运动把我们当成攻击对象，排拒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只好离开运动。

早年我主持女同性恋爱滋计画的时候，人们还认为女同性恋不会感染爱滋，因为真正的女同性恋只会和女人做爱而女人不会传染病毒；这当然是错误观念，但是人们还是坚信如此。我觉得问题在于他们不知道要怎么面对贫穷的女同性恋酷儿。一开始，我的女同性恋爱滋计画里收集到 12 个感染 HIV 的女同性恋，两年后变成 400 人，四年后变成 1200 人，都是 HIV 阳性的女同性恋酷儿，然而不管是爱滋运动、女性

主义运动、女同性恋运动，没有一个运动愿意邀请她们加入，没人要这些女人。这并不是说你不识趣的硬要去加入，而是看得很清楚，你去，她们根本就不鸟你，你当然就只能离开了。但是我一开办女同性恋爱滋计画，这些女人就都出来了，而且很公开的现身，于是我雇用了一些人去找其他感染爱滋的女同性恋，突然间，成千上百的女人出现了。面对继续保持沉默或者动手做点什么事，我的选择是很清楚的。

我在纽约经营的「酷儿经济正义」团体也是一样，专门接触那些不被看见的人，我们去游民收留所找那些没有地方住的人，我们专门找那些在主流的同志运动中无法容身的人，天底下像这样的人多得是，但是主流的运动就是不愿意听他们的故事，主流运动的核心政治愿景也不会包含到这些人的需求。因此，你问是什么力量使我一直在运动当中努力，在边缘的议题上耕耘？答案很简单，因为有太多人跟我有共通的命运和历史，我们如果不打破沉默，说出我们的故事，我们就会永远被遗留在政治愿景的边界之外。（鼓掌）

丁乃非：我们非常非常感谢荷安珀，再次大力感谢她的分享（鼓掌），还有何老师的翻译（鼓掌）。请把握今天的时间跟她们相处对话。谢谢！

（逐字稿人员：张竣昱）

本文来自 2013 年 10 月 6 日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主办之「第八届性／别政治超薄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小心公民社会」之主题演讲。原题为 "DESIRING CHANGE: Constructing A Radical Vision for Sexual Politics"

Amber Hollibaugh 是纽约追求酷儿经济正义的组织 Queers for Economic Justice (QEJ) 的领导人，之前也在美国芝加哥 Howard Brown Health

Center 担任服务老年 LBTI 女性的组织领导人。再之前则是美国全国男女同志工作小组 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force 的资深策略员，也是全美 GLBT 老年服务倡议小组 National Initiatives at SAGE--Services and Advocacy for GLBT Elders 的领导人，并曾担任其教育倡议社群打造小组的召集人。她有 7 年时间先后担任 Gay Men's Health Crisis (GMHC) 女同志爱滋计画的召集人以及女性服务小组召集人，也曾担任纽约市爱滋人权委员会 New York City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的 AIDS 教育小组召集人。

Hollibaugh 是知名的运动组织者、纪录片工作者、艺术家、公共知识份子、以及社群组织者。她是酷儿经济正义组织 Queers for Economic Justice 的创始成员，目前也担任同性恋研究组织 CLAGS (the Center for Lesbian & Gay Studies) 的董事。她在学术上也甚有威望，是着名学术刊物 *GLQ, The Journal of Lesbian & Gay Studies* 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也是纽约市女同志爱滋计画 Lesbian AIDS Project (LAP) 和男同志健康危机小组 Gay Men's Health Crises (GMHC) 的创始成员。

她曾因对女性健康议题的卓越贡献而获颁 Dr. Susan B. Love award 奖，其个人回忆录专书 *MY DANGEROUS DESIRES – A Queer Girl Dreaming Her Way Home* 广受好评，已经是女性主义经典。她曾制作并导演女性情欲和爱滋的纪录片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爱知核心)，获得 1994 年日舞影展 Sundance Film Festival 自由表达奖，在全美公共电视放映。她强调要从不同的角度和眼光来看事物，特别是种族、阶级、性别、和性的交织纠葛复杂关连。

附录一

穷酷儿到处都是，就是没人愿意正视他们的存在

Amber Hollibaugh, 2001-6-19 (何春蕤翻译)

有调查显示，同性恋收入都蛮高的，教育程度也高，身上好几张信用卡，所以同性恋不是穷人，也不是住在陆桥下的遊民。

——保守的基督教领袖 Lou Sheldon 牧师

我一岁那年住在祖母家房式拖车后面经过改造的养鸡房里，这个养鸡房仅够我193公分高的父亲和175公分高的母亲直立而已。我父亲是个木匠，他把收集鸡蛋的台子拆掉，重新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可以放一张床，一张桌，两张椅，一个洗脸台兼厨房水槽（虽然并没自来水），一个包含电炉的橱柜架，和一个小五斗柜。爸妈就用外面院子里的洒水管洗澡，然后从祖母的房式拖车里拉了一条延长线来点电灯和暖炉。那时我的床其实就是五斗柜的抽屉，白天放在桌上，晚上则放在爸妈旁边睡。

我一岁时一整年都在生病，我妈也是，因为她剖腹生我之后恢复很慢，还有一些其他的医疗危机。我们母女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才出院，爸妈有限的存款都用光了，还欠了债。我出生前，他们就很拮据，我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也很潦倒，但是这个下坠的趋势还没走到终点。

我满一岁时，我们一家终于从养鸡房搬到一间拖车里住。爸爸一天赶三个工作，睡眠的时间很少，妈妈什么工作都干：缝补、洗涤、烫衣都干过，但是我们还是赤贫如洗，怎么努力都翻不了身。我成长的岁月都是穷岁月，更糟的是，我还是女同性恋。

这就是我的酷儿身分：我是一个魅婆、混血、白种垃圾女同性

恋。即使现在已经在中产同志社群中活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常常觉得自己跟别人谈背景或家庭的时候蛮格格卡卡的。现在大家热衷讲「我们的」酷儿故事，你听了就知道，像我这样的出身可算是异数，因为人家说（而我们也告诉自己）：同性恋不可能是穷光蛋。

然而这个表面上的异数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它代表的是成千上万贫穷出身、现在还是赤贫、而且非常非常酷儿的我们。

其实你如果用酷儿的人口比例（据说是百分之4到10）来看美国370万的贫困人口，那就很明显了：至少应该有14到37万贫穷的同性恋。但是美国早期针对同性恋经济地位所作的调查却描绘出一副不一样的图像：同性恋比异性恋收入多，生活富裕，都是顶客族（双薪无子）。经济学家Lee Badgett在新书《金钱、迷思、改变：同性恋的经济生活》中就说：「我的书开宗明义的批判这些早年的调查，因为它们是为了满足同志出版和行销公司的需求而做的。那些调查根本就有问题。」

Badgett注意到，「人们反对同性恋，往往是因为觉得同性恋比较富裕、又爱要求特权，这都会助长怨忿。」Badgett的研究则首度显示了同性恋的经济现实：

- 同性恋和双性恋并不比异性恋收入多，家里也不富裕。
- 照这个研究的数据来看，如果能力和教育相等，同男比异男的收入要少13到32个百分比。
- 虽然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女人的收入与异性恋女人不相上下，但是因为整体上女人的收入比男人少百分之21，因此女同性恋伴侣的收入比异性恋伴侣要少得多。

然而，想要在媒体上看到贫穷阶层的同性恋、双性恋，还真的很难。走红的女同志电视剧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劳动阶级的角色，媒体上很难看到广大劳工人口中的同性恋，也找不到同性恋移民、一天赶三班工作的女同志妈妈、长途开车疲累到打盹的双性恋卡车司机、排在失业队伍里的男同性恋等等故事，更看不到已经走到绝境或者彻底崩溃的酷儿们。

有关「同志都很富裕」的神话深入人心，甚至连同性恋自己都相

信。可是我们总是局限在白种人口里想像着物质丰裕的幻象以避免面对社群里存在着经济差异的事实。这也是此刻我们向大众呈现自我的关键问题：由于我们把彼此之间的阶级差异和贫富差距当成秘密般藏起来，否认它，排斥它，结果经济上的困窘被排除在酷儿欲望趋力之外，是与我们酷儿生涯无关的事情。

Badgett也注意到，越是高举酷儿富裕的神话，就越引来像前面那位牧师说的同性恋形象。可是事实上，酷儿的现实是多样的，也是需要同理心的：我们真的到处都在，但是我们都很不一样。

为什么承认这个现实会这么难呢？为什么贫穷被酷儿视为秘密？为什么它会生产一种特别的同性恋羞耻？请耐心听我说，想像一些你从来不愿意正视的事情。

当年我在「男同志健康危机组织」里主持「女同志爱滋计画」的时候，好几百个HIV阳性的女同志参与计画，讲她们的故事。她们几乎从未参与酷儿政治，也没去过纽约市的任何酷儿组织，少数去过的女同志很快就离开了，没被看见也没感觉到受欢迎。有位年轻的黑人同志组织者在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人中经营运动多年，他把上述现象称为「隐而不见的酷儿人口」，其中主要包括贫穷的女同志、男同志，以及跨性别、爱滋感染者和发病者，年轻的、老的都有，人数很多。

「纽约都会社群教会」基本上是同志教会，他们的慈善厨房注意到1996年美国改革福利政策之后进来寻求食物的人增加了一倍。「同性恋社群服务中心」也说从那时开始，加入戒瘾计画的游民增加了三倍。服务少年同志的Hetrick-Martin 学院估计，纽约青少年游民大约百分之五十都是同性恋。

「酷儿经济正义网络」的召集人Joseph De Filippis说：「我们正在进入经济走下坡的年代，这跟1990年代不一样，那时经济还好，雇主还比较愿意为员工提供伴侣福利，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会被失业和经济危机冲击，再加上福利改革2002年失效，很快，后果就会落到我们身上。干！总是先冲击我们。」

「全国同性恋专案组织」的「种族经济正义小组」组长Ingrid

Rivera经历过这些：「我过去就是靠福利补助度日。当时我还是游民，我以为只要把高中读完就会改运，可是我是黑种女人，有小孩，又是同性恋，一直都在贫穷中工作生活。然而我加入的同志组织主要是白人，所以我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而这两个角度是断裂的。在大部分白人的同志世界里，种族和经济正义好像不被当成同性恋议题。就是因为这个断裂，大家才以为同性恋都是白人。」

谁都可能贫穷潦倒，但是你越酷儿，就越少安全网可以承接你或帮你东山再起。同性恋身分会强化贫穷的效应，大幅增加你和社会服务体系互动时的困难。即使在有同志法律保障的都市里，你的梦魇包括：

- 要是想享受政府提供的收容所，你就必须和伴侣分开。然而异性恋伴侣因为符合家庭体系的定义，仍然可以彼此作伴。
- 你可能被迫接受恐同的戒毒戒酒治疗，但是人家要治的不是你的瘾，而是你的同性恋酷儿认同。要是你退出治疗，就会失去其他福利（包括健保）。
- 你没法以家庭的形式申请公共住宅。
- 结果你和伴侣只能去住低廉的养老院，而且必须分开，不能同住一间。

Barbara Cassis来自纽约长岛一个富裕的家庭，然而一旦她觉悟并承认自己是跨性别，父母就把他赶出家门，年纪轻轻的他变成了游民，一文不名。她回顾过去时说：「感谢那些扮装皇后们！有一位看到我在时代广场哭泣就把我带回家，她跟我谈我的经历，又收留我住在她的公寓里，教我自立谋生，教我如何钓恩客，也教我在进行性别转换时如何在酒吧里钓人。后来她得爱滋去世，我又无家可归了。」

对Barbara这样的男变女而言，游民收容所是最糟的地方，有时住在街头还好些。如果你无家可归又还没有足够钱转换性别，就只好按着原生性别住进收容所，在那里遇到暴力和危险的机率很高，因为收容所又挤，人手又不足，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跨性别和同性恋，所以你要是跨性别，就连淋浴都是很冒险的事。

Barbara现在是「阳性健康计画」的行政助理，她说：「我奋斗了

好多年才能养活自己，才有能力处理自己是HIV阳性的事实，才能接受训练和教育，以便争取到一个像样的工作。和家人的和解也搞了好多年。要不是那些被同志社群蔑视排挤的人照顾我，我根本不可能有今天。」

我妈曾说过，穷醉鬼和富醉鬼之间的区别就是哪个能隐藏他的醉鬼身分。穷人的羞耻是公开而尖锐的，根本没法隐藏，而酷儿同志——那种使得性别差异和边缘性欲清晰可见的酷儿——也会引发同样的社会敌意。

在美国，穷人和同志的境遇都很糟；要是又穷又是同志，那就更糟好几倍，也更尖锐，使得我们无力躲避、无法掩盖，找不到任何安全之处，逼我们不得不永远流离失所。

最糟的是，酷儿总是美国人的眼中钉。我们代表了美国文化对情欲的着魔：我们的形象就是总是在搞或总是想搞，因此我们代表了危险。我们的性总是被描写成狂暴的、露骨的、饥渴的、掠夺的，所以我们也很容易就会被当成性罪犯。

穷人也一样，总是被人当成也被人怨怪太笨或太不努力。大家假设正常的欲望就是那些舒服坐拥财富的人才有的欲望；财富（不管是怎么来的）可以满足的欲望和需求才是好的。那么，那些复杂的欲望呢？那些和阶级种族衔接的欲望呢？那些偏离情欲正轨的欲望和需求呢？它们就不被接受而且总是要被谴责的。

难怪同志运动看不见自己社群中的贫穷而总是渴望且拥抱富裕的形象。大家都把有钱当成同志的优点，如果有人质疑我们的公民身分，好像我们唯一拿得出来的同志特色就是我们的富裕。从爱滋危机一开始，我们动用自己的财富来做政府不愿意做的事情时，这一点就很清楚了。我们建构了完整的体系来照顾并保护自己人，这是一个很震撼的例子，因为我们爱护了自己人，我们拥抱了主流文化所蔑视的。现在，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爱护照顾穷酷儿们。

同志游民连线的女同志Jay Toole说：「如果社群主动投入贫穷酷儿的议题，那就好像社群开口说，我在这里，拉住我的手，你可以活得更好，因为我在这里。」

Toole快要毕业了，她决心做戒瘾谘询师，回到收容所里去把同志们带回社群，「这样他们就不用像我过去那样孤独。我被带出收容所，回到社群的时候，终于有了回家的感觉。」

附录二

有了婚姻权以后呢？

Amber Hollibaugh (何春蕤翻译) 刊于 2013.6.27 *The Nation*

同志婚姻的大势已定。不管美国高等法院如何裁示，剩下的问题只是还有几个障碍、还要多少时间才能让同志婚姻在美国得到全面认可。

我不是要说这个裁示的影响不重要，也不是要说恐同歧视没关系——当然有关系。但是我们过去15年的努力已经改变了美国对同性恋的认知，最高法院的裁示也无法改变这个大局势。

然而我却仍然充满不安，就像过去这些年同志婚姻权战役进行的时候一样不安。我仍然在问：同志婚姻真的代表了我们的身分和需要吗？

如果得到婚姻权，这个胜利对我们的冲击会和我们承受的压迫一样深刻吗？婚姻权能给我们平等吗？能让我们「正常」吗？我们真的希望「正常」吗？婚姻权就是我们的愿景吗？婚姻权是LGBTQ运动争取正义和接纳时应该优先考量的议题吗？

对我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不。

我每日都在努力让酷儿的贫穷和经济不平等明显可见，把LGBTQ的经济困境摊在大家眼前，让我们的同志身分——以及我们在阶级种族性别上的复杂性——清楚可见。社会迷思认为我们都是男性、大多数富裕、大多数是白人，可是我们并不都是这样，而我的努力就是要翻转这个苦涩的迷思。我的奋斗目标不是要变成正常，我也不想在这个利欲薰心、制造全球灾难的世界里肖想创造一个追求平等的运动。

我们真正需要努力的是建造一个激进的酷儿社会正义运动，这个运动会聚焦于我们这些又穷又同志又劳动阶级又有色人种的LGBTQ如何活出各自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上的差异。这个运动相信我们大多数

都是这样的人，而这个身分和处境也就决定了我们的政治进程。

我要的LGBTQ运动应该会去挑战充满剥削的零售工作、性工作、和游民收容所，它会全神贯注在同志的经济生存上，它会关注当同志们努力谋求生存时资本主义是如何形塑了我们的生命，扭曲了我们的情欲表达和欲望。

这些议题属于我生命中参与的大多数同志社群，然而这个大多数却很少进入人们的眼帘，更不被接纳加入任何运动的大家庭。

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就需要重新建立运动的进程，这个进程不是现实挂帅的，而是有愿景的，有眼界的。

愿景本来就不是现实的，愿景是被我们的梦想和期望所推动的，是那些愿景所催动的急迫和热情扎实了我们每天为正义而战的步履。愿景是那个目前还不可行的念头，是心灵和智慧在面对未知前程时勇敢的挺身一跃。我们梦想可以活在一个让人不必为自己和所爱之人付上可怕代价面对惩罚而能安居的世界，愿景就是坚持不放弃这个希望。

我们如何回答前面那些问题反映了我们的愿景有何内容，因为这些答案会显示我们是否只是在一个狭隘的角落设置了一个狭隘的计画，只想打一场有限而谨慎的小战争以达成一个极为有限的目标，或是——我们已经决定不计代价，全力以赴！我个人努力的就是那样一个孤注一掷的运动。

或许，我们现在就决定，谁都不要只追求社经利益或达成短期的司法目标。或许我们开始真正的说酷儿、做酷儿，超越既有的认同范畴…

或许我们决定建立并引导我们的运动去改变国家，让美国做世界的伙伴而非霸主…

或许我们开始帮助彼此壮大希望，或许我们开始告诉每个人，我们的同志运动接下来要做的是：

我们要挑战基本生活工资、低廉平价的健保、跨性别正义、老了也要酷、全面开放移民、爱滋运动、停止拘捕、容许危险的性欲。

我们创造的运动必须能说：加入我们吧！和我们一起梦想！一起
勇于尝试！孤注一掷！改变世界。

或许那就是我们接下来应该追求的酷儿愿景。

与荷安珀对谈爱滋政治¹

荷安珀（Amber Hollibaugh）、黃道明等；顏維毅、梁俊文译；
黃道明校订

黃道明：能否请你谈谈美国 70 年代的女性主义健康倡议运动对早期爱滋运动的影响。

荷安珀：在早期爱滋运动里，男同志借重了早期女性主义结盟、倡权的概念来训练自己。你得透过自学才能应付当时的状况。例如，当医院里的护士拒绝帮你的感染者朋友洗澡、或是拒绝喂他们吃东西的时候，你就必须学会去问个明白，到底什么可能有风险、什么没有，这样自己或朋友就医遭遇不好对待时，才懂得向医生提出抗议。当时爱滋污名深植人心，明显可以感受人们的憎恨与惧怕。那时人们真的相信蚊子叮咬会传染爱滋！那时候常常得跟这种被爱滋恐惧附身的人们展开艰难而痛苦的对话，而对话之所以艰困正因为那是污名和歧视的转译：认定爱滋会经由飞蚊传染的人，同样深信与感染者共用马桶和餐具会有危险，因为他们认为已被爱滋病毒污染了的感染者是污染源，只要他们摸过、碰过的东西都会被污染。假如你有这种恐惧、害怕与无知的话，你真的需要朋友来开导你一下（笑）！

我认为当时爱滋运动的发展借用了很多早期女性主义的信念，像是传递「你并不孤单」、「你的朋友都在你身边」之类的讯息，同志开始自学或教导其他人如何面对那些霸道

¹ 【编按】2013年10月，荷安珀应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邀请来台担任「第八届性／别政治超薄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演讲，在2号清晨自纽约飞抵台湾后，旋即前往黃道明副教授于英文系开设的「爱滋的文化政治」研究所课程，进行一个半小时的客座讲谈。以下文字为当天课堂的纪实，讲谈以问答方式进行，由黃道明及修课同学提问，而何春蕤教授在过程中也参与了这场珍贵的对话。

且不容质疑的医疗机构。早期女性主义主张，只有女人才最了解自己的身体，在处理自己身体这件事上，人人都是专家；不了解那些专业医疗术语没关系，因为终究是你自己要去搞清状况、了解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早期爱滋脉络就是这么回事。要知道，疫情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爱滋是什么，真的，没人知道，彼时的医疗也完全不如此刻发达。（【编注】HIV 做为引发后天不全免疫症候群的病媒一直到 1985 年才被国际医界指认出来）。后来发现，那时肯为爱滋病患看诊的医生是那种会把病人当伙伴的医生，他们不会采高姿态来对待病人。他们着实地倾听感染者，因为当时人们都试着厘清事实，好为这个未知的疾病做些什么。

爱滋疫情爆发时，女性主义经验的启发在于如何组织社群，好对抗那些锁定弱势者、使之更为脆弱的错误讯息，从而建立起以社群为基底的框架来因应爱滋，而这跟以往人们就医单独面对医生的状况很不一样。以前医生叫你做啥你就做啥。早年的情况是，要是你只仰赖别人、而不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的话，那你只会死得更快。所以，你需要有自身的专家知识以及社群成员们的专家（而非专业）意见，如此才有办法去解读一个已经夺走很多人性命、但又没有人知道如何处理的疾病。当时你如果被诊断出爱滋，状况是很糟的，支持感染者的社群，日子也好不到哪去，因为她们很多朋友可能就在确诊后三周内死去——你就这样失去了无数的朋友，事情就是这么无法预测。

自从 80 年代初期做了第一份爱滋相关工作以来，我就一直待在爱滋领域里。我在旧金山待过，然后搬到纽约，这两个地方都是早年被爱滋蹂躏的城市。那时很少人会想做爱滋相关的工作，因为这工作经历若出现在履历表上是很污名的事情。假如你在找工作时说你待过爱滋领域，不论做的是什么，一定会碰壁。我当时去应征纽约市政府人权委员会的爱滋部门工作，这单位方成立不久，除了专门处理违反人权相

关的案件，也发行爱滋歧视事件的刊物。去面试的途中，我在纽约地铁上就读起了那份刊物。我旁边坐着一个男的，他一看到刊物封面写着「纽约市的爱滋歧视」，就立即在挤满人的地铁车厢里跳起来大喊：「她有爱滋！她有爱滋！」他这一喊把整个车厢的人都吓得半死，地铁靠站后马上飞奔逃出去，然后那个声称我有爱滋的那个男子就开始打我——就只因为我手上拿的那份刊物。在应征爱滋去歧视的工作的途中被路人打，够惨吧！（众笑）但这就是当时的氛围以及问题所在，真实地在日常中发生。

记得我有一次在做反爱滋歧视的工作时，必须面对一群抗拒做嘴对嘴人工呼吸的消防员，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是否感染爱滋，认为那样会染病啊！当时我心里就想：这可是消防局耶！我无法相信他们对爱滋的恐惧与仇恨的程度竟是那么高，而且还把这些情感视为理所当然。另外，立场本该中立的消防局，竟因为一通来自同志区的火灾通报电话而不去救灾，就因为那边可能有男同志，所以没有任何消防员愿意去，结果那个地方就眼睁睁被烧毁。这就是当时缺乏知识的程度，也是我每天要处理的事。

早期女性主义成形的时候，女人开始理解如何去处理各种无知且不尊重女人的机构。这也就是早期女性主义在爱滋疫情开始时的启发。当人们想搞懂可以做什么但却没啥希望的时候，这些思想就成了根基。早期的政府并没承诺要以不歧视的方式介入爱滋。说穿了，你全得靠自己。

黄道明：我很好奇，你当时并没有告诉同样也在做爱滋运动朋友们，说你是一位性工作者。（安珀：对。）我想知道你同时在从事人权组织工作以及性工作时，所体认到的爱滋防治原则与观点？

荷安珀：喔，那时我做性工作者已经很多年了。我才跟何春蕤老师聊到，我不是只做几天试试水温然后决定喜不喜欢这份工作。

我来自一个赤贫、混种族的家庭，性工作是我人生中做过最棒的工作。好多年来，女性主义思想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我很清楚，当时女性主义运动的氛围并不肯认性工作者，而你也不该正向积极地去谈性工作，更不能说性工作对你的思考有任何启发。性工作者社群是我当时工作单位锁定的防治对象，是污名最深的群体之一，当局者甚至认为，如果要控制疫情，那就把所有从事性工作的人通通抓起来。当时在美国还有个污名群体就是海地人。

我自己曾经是个性工作者，很清楚做什么有风险、做什么没有，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性工作者在跟客户互动时，要那些男人戴上保险套是件极其复杂的事情，必须要不断协商，真的超级难！想要求谁可以准备保险套给客人用是不可能的。早年，性工作者、男同志、用药者都被责难、被要求要为疫情负责。当局认为，只要控制好这些人，就能控制疫情。但我认为，爱滋防治锁定这些群体的围堵思维其实回避了许多现实，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很多界线常常被踩、被跨越。没人想去谈性消费者、也不会讨论用药议题，没人想去问到底是谁会去买春，也没人会说他们是否有婚外性行为、会想同性性爱跟异性恋身分认同有啥关系，没有人要谈论用药的意义（若他们又是穷人的话）。以上直指的是，假如你责怪某个群体又声称他们是问题所在，那么你只需要把性工作、男同志、用药者全部抓起来，然后把他们隔离在某处，那我们就不用再担心爱滋了（因而也完全不需要做任何改变）。这个无知、充满偏见的文化责难这些弱势族群，认为他们威胁到其他正常人：一般人是不会做那些坏事的，所以只要惩罚这些人，那「我们」就不会有感染爱滋的风险。这种污名化的过程不断上演。

一碰上爱滋，女人就难为了。污名化的概念就是在暗示，假如你是正常的乖女人，那就不会有任何风险，如果不是，那就管她去死（众笑）。当时女人在用药和搞性生活方面

的实践虽然非常复杂，不过当个像样的女人是不能有感染爱滋风险的。例如，你知道丈夫也跟别人搞，但你俩选择不谈这件事，噢，那你麻烦可大了！又例如，你跟伴侣选择开放关系，两人决议你出外搞不说、他也不说，啊，这麻烦可大了！又或者双方都有很长的用药史，虽然现在都戒了，但是因为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在某个时间点被感染，却又不想去做筛检，因为要是阳性结果，两人都会被污名化。事情就这样不断循环下去。假如你是个男同志、或你从事男男间性行为，由于深刻的污名会挑战你的阳刚气概或异性恋，所以男人不会坦言他们过去做了什么。防疫经验告诉我们，你的身分认同无法保护你，重点在于你做什么来保护自己。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女同性恋不是保险套》来回应女同志不会感染爱滋的迷思：女人是不会传染病毒的，而「真正的」女同性恋只会跟女人做爱，所以女同性恋是不会感染HIV的。那时我主持「纽约女同性恋爱滋方案」，光纽约市就有4,000多个女人参加。这个方案关切的是她们「如何过生活」而非她们的身分认同。若想理解疫情核心，你就必须认清：人们到底干了什么她们永远不想说的事情？爱滋做为流行病是由两个因素激化出来的：「无知」及「秘密」。正是这两个因素使人们变得脆弱，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适当保护自己，或者他们害怕自己所做的事沾染了污名，所以干脆什么都不说，结果就是迅速爆发的疫情，然后每个人就开始指责性工作者、男同志、海地人、用药者、穷人，说都是他们的错…。

黄道明：在我读到的一篇访谈中²，你提到在纽约市政府人权委员会做爱滋教育工作时，如何尝试克服人们抗拒谈论用药、性、以及死亡的态度。这感觉是非常沉重且困难的工作！在实际层面，你的工作目标是去转变大众的态度。你也说过，让人

² Amber Hollibaugh, Mitchell Karp, Katy Taylor and Douglas Crimp, "The Second Epidemic", October Vol. 43 (Winter, 1987), pp. 127-142.

们能公开谈论他们的恐惧跟抗拒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给我们一些例子吗，尤其是牵涉到非法用药的时候？一方面药物是愉悦的来源，但另一方面，当情况失控的时候，对某些人来说用药就会变成问题，而戒毒治疗论述本身也是需要被质疑的，因此我想知道你如何克服人们的抗拒心态。我会这么问，是因为娱乐用药在本地男同志圈还蛮流行的，而且普遍被视为问题。本地的爱滋民间组织或爱滋个案管理制度都在谈减害，他们假装不批判用药，但是事实上他们并不会正面看待药物使用做为一种次文化实践。能不能谈谈过去你在纽约的工作？

荷安珀：对我来说，做爱滋相关工作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我们无法避谈深刻镶嵌在文化中对欲望及成瘾的恐惧，而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挣扎。每个人都有欲望，都有他们在生命中无法抗拒的一些事物，像是合法的香烟和酒精就是很好的例子。酒精成瘾就是个值得探究的课题，因为当人们谈论上瘾，那就不是物质合不合法的问题，而是真实的物质在人们体内如何产生作用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无论他们脑中在想什么，无论他们会否考虑「不想喝太多」，他们喝了第一杯之后就是无法打住而不断再追加下去，这才是成瘾。所以性与成瘾的问题打从爱滋流行一开始就一直存在，只是压根儿没人好好谈这两件事情。稍早我跟何春蕤在聊天的时候就提到，保守势力能成功，有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个文化对于自己的身体、性、还各种欲望的可能性充满了无知，所以恐惧跟无知就在大众文化中不断滋生、蔓延。你不用是个保守大右派就可以让人们无法控制的激情跟欲望感到害怕！你的性总是被恣意地扭曲，而且你一旦对欲望有所关注，你就会不自觉感到抗拒！话讲白一点吧，人们除了他们自己害怕的东西以外，连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怕，这当然包含了性爱。那些有能力使用各种药物达到各种愉悦且有幸躲过牢狱之灾的人，都在跟他们的生活搏斗、都在挣扎该如何过

性生活、以及如何认真看待他们已经上瘾的事实。这是很常见的问题，但很少人能真的看到这一点。

我们在爱滋疫情初期做介入工作时，并没有多痛恨那些我们尝试要对话的人，我们甚至跟他们可以谈他们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我真真切切地相信，如果你认为讨厌同性恋、痛恨用药者的人都很蠢，如果你遇到个讨厌有色人种的人或一个从未跟有色人种打过交道的白人就觉得他脑袋有洞，那么，你绝对不会是一个好的教育者，坦白说，用这种态度介入，没有人会想听你说话。

我认为 HIV 给了我机会，让我去层层剥开镶嵌于文化中的恐惧，和人们展开她们平常规避的对话，也让我能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去谈论成瘾、看待其普遍性，因为要从成瘾状态夺回控制权是极其困难的。一旦当你觉得恐惧、觉得失态、或者知道你家人无法苟同而不敢告诉任何人你脑子里的性幻想和欲望，例如男人之间或女人之间的同性身体实验，或者你突然觉得性虐待、皮革竟能挑逗你的情欲，或是幻想当零号……很不幸，这些性欲的出现通常会被恐惧抹得一干二净。

对我来说，做爱滋工作让我有机会去跟人们谈论从来不被讨论的事物，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且必须做的工作。此外，这份工作也给了我难得的机会去接触劳工阶级社群，跟他们谈性与用药。就让我从去爱滋部门上工的第一天讲起吧。前面提到我去面试的途中被路人海扁，然后我得到了那份工作，他们雇用我当爱滋教育主任。上工第一天踏进办公室，我心想等会要来整理我的桌子，要好好从前辈们身上学些什么，结果发现我的同事每位看起来都超爆笑。每位看起来都资历很深，大部分都是有色人种、怪胎酷儿、也有人吃过牢狱饭、或有很长的用药历史。这些就是当时爱滋工作环境的样貌，因为我们都是一群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没什么包袱，所以能放手去从事爱滋工作。

那天，我们接到一通来自纽约最大的建筑工会的电话，

然后一个救人任务就这样开始了。曼哈顿中区有一个大型工地，那边现场大概有三百个工人，某个工人不知怎么地被传出有 HIV，然后就有工人开始攻击他，后来有些工会的人把这人暂时监禁在工地中的一台拖车里，因为怕那些爆怒的工人会把他活活打死。于是，致电的人希望我们爱滋单位可以派人去把这人救出带走。这下可好了，办公室有男同志、有身型魁梧的扮装皇后、还有一些其他怪胎……我们面面相觑，一眼望去没适合人选被派出去救人（笑）。我的父亲是个木匠，我大部分的人生都待在工地，所以那天虽然是我到职第一天，我就这样被派去处理了（大笑）！总之，我到了现场，那里真有三百个气冲冲的工人想要把那拖车给烧了。然后我开始跟他们对话，向他们解释 HIV 传染途径（我那时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这方面的知识，反正我就讲了），只花了四分钟就跟他们解释病毒是如何传染的，我告诉他们这一点都不神秘，HIV 不是那么容易感染的。好了，四分钟讲完，那三百人盯着我看，对我使脸色：「宝贝，滚开！我们要杀了他！」我心想，惨了，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所以我就说，好吧，你们想要真的解决他吗？那现在就来好好谈，你们到底为什么想要杀了他？我猜，你们想杀他的理由就是你们无法在生活中处理的东西！想知道关于 HIV 传染的真相吗？那我们来谈上瘾啊！来谈谈你们以前在越南打越战时施打吗啡那段历史，吗啡在那边取得容易，可是你们回国之后进了戒治所，出来后却什么都不敢跟别人说了，好，我们就从这里谈起！那时，我打开了这个阶级的男人从未谈论过的话题，那时我别无选择，只能用这种方式跟他们谈。后来我在那边整整待了八个小时，跟那三百人畅聊，而且没有任何人离开现场。最后，这群工人陪我走到拖车旁，把门打开将那个人请出来，并向他道歉。这就是我所谓的对话，因为你真正开始处理那些群众的歇斯底里。站在你面前的那个可怜家伙，除了伤口在流血，他可是什么事都没有做耶，就

只因为有人造谣他有爱滋。这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为何需要好好把握这些对话的挑战跟机会。

老实说，尽管普遍的无知变少了，但我并不认为这些年来的爱滋局势有多大的改变，因为驱使这些议题的害怕、恐惧、疑虑都还尚未被处理、讨论。没错，大家现在都知道了HIV 传染途径、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事实上，像是上瘾及减害的议题就没被开诚布公地讨论过。减害的原初逻辑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想法：人们不应该因为生活中做了自己本来就很难控制的事情而被惩罚。而减害的工作就是尝试从这个地方出发，与对象一起合作，去处理那个他们自己也觉得很不满意的状态。真的，这就是减害。你朋友可能对你说，「我从来没有用药」，可是你知道他昨晚有用，接下来你俩就可能会有两种非常不一样的对话。你可能指控他滥用药物，然后他就永远不会再跟你说话了。或者，你也可以选择跟他对话，因为你认为他生活中有非常复杂的事情在发生，敞开拓话题来看他到底在挣扎什么，然后有什么是你可以帮上什么忙的。这时，你就会是跟他站在同一阵线上的盟友，而不是满口仁义道德的外人，把他看做人格有缺憾的成瘾者。如果你只叫成瘾者拿出坚强意志力控制自己、叫他们认清自己是那种伤害自己身体的人，如果你真的这样跟他们对话，那他们只会更痛恨自己过往的所作所为，这就是为何成瘾者时常被困住的原因。反过来说，如果你的态度是，「我会在这边陪你，我知道你在挣扎，万一你失败了，我也还是会在这里，不会离你而去」，那你就选择了一条我认为减害真正能成功的道路。真正的减害在于你不会放弃人们、不会要求他们第一次就跨越藩篱、也不会认为上瘾很容易处理。相反地，你会说人们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努力，而你在他们的挣扎过程中扮演着同伴的角色，一直到他们对自己有真正的改变而感到开心，这种做法会为一场对话划下还不错句点。减害不是要人们顺从你认为他们该怎样做，或是要他们立誓从此再

也不碰药。减害是与特定人共同建立一个可以支持他们的策略，且他们真心相信那是他们需要的，而不是「你」认为他们需要的。这是很难的对话，因为大部分的人压根不会说实话，尤其是当他们屡遭失败的时候，更会对真相视而不见。

黄道明：你讲的减害模式，听起来非常不同于那种专业化观点的减害策略。

荷安珀：是的。

何春蕤：专业减害模式常被用来做为道德化的手段，就是要让成瘾者认为他们应该改变他们的生活。

荷安珀：它确实是以道德化的方式进行没错，事实上跟新自由主义很相似，跟它散发着同样的气息。[安珀接着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其运作逻辑] 我是个好人，我不想对你做道德评断。那..... 我来帮你如何（众笑）？就只是纯粹来帮你呀！好，我们能怎么帮你呢？当然啦，假如你没去做那些你同意做的事，我们是不会帮你的，而既然你也说了你同意那些事，那么现在我们就可名正言顺地来惩罚你，因为你同意被惩罚。

啧，这种助人方式还真讨人喜欢哩！（众笑）

何春蕤：你演活了本地的爱滋政策。

荷安珀：真的吗？（笑）相信我，美国也差不多 我也想跟你们聊聊台湾的爱滋政策。话说回来，大抵而言，不管有没有明说，爱滋政策倚靠的就是那种动员群众恐慌的道德主义，要创造出与之对抗的对策不容易，但针具交换计画就是个明智之举。假如你想要停止疫情、不想要人们死掉，同时你也知道上瘾非常难处理，那么你就会展开一个不会惩罚人们的康复计画。因此假如他们有需要的话，就能真正依靠这计画来处理自己的上瘾问题。当你做针具交换计画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因为没有选择而必须反复共用针头来施打非法药物。我认为这作法一点都不复杂，针具交换就像我们在问「为什么

要用保险套」，是一样的逻辑，两者都是减少 HIV 传染风险最直接的策略。如果彻底减少人们感染 HIV 的风险是我们的价值所在，那我们就会去做针具交换计画、发放保险套，并且在性的领域中，教育每一个人如何保护、照顾自己。我们不会道德说教，而会说：「你要去仔细想想你做的事，不这样的话你就会有感染风险，而我的工作是要帮助你降低风险。」假如以这样的伦理为出发点，那就会导出非常不同的爱滋政策。但假若你试图改变人们行为的出发点是因为你一开始便认定他们做的事情是不对的，那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立法借口，借法律来惩罚你无法认同的做为（如性或嗑药）。

何春蕤：如果是自己选择的风险行为，例如无套肛交（bareback）呢？

荷安珀：坦白说，我认为人们有权利去冒这些风险，我真的是这样想，但这样说并不表示我对此毫无疑虑。但我认为「有意识地进行风险行为」，比起「真的风险」来说是低很多的。男同志会感染爱滋并不是因为他们没告知彼此，那不是为何 HIV 在社群内迅速传开的原因，也不是让他们身处高风险之处。最有风险的，是你不敢告诉别人你真的想要什么的真相，包括不想戴套。人们要求感染者有告知义务、要他们单方面去承担我们生活所无法容忍的事，但这就像我们要女人为自己怀孕负责一样，彷彿只有一人需要担起所有事。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男人难道不需为怀孕负起一些责任吗？我知道要在无套肛交的情境里去谈告知，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也知道在没告知感染状态下做爱的情况也会发生，而我也不认为那样是妥当的。但坦白讲，我认为欲望是危险的，而人们必须讨论这些危险，而不是又想要又躲闪。最高风险的事就是人们无法明说自己的欲望但是实际上又会去执行，那就是真的冒大风险、说大谎的时刻了。假如有两个男人想要做爱，其中一个是感染者，也做了告知的动作，然后他们共同决定要做爱，对我而言，那是他俩间的私事、他人无权干涉。

而我认为如果我们能给人们多些不会因为其欲望而被批判的真实机会，那他们会更认真地看待他们的欲望、有什么欲望、以及如何跟别人谈论这些。

有位女同志感染者曾跟我说，她说她相信 safer sex，也知道这很重要。但她说，为了要实践 safer sex，她就得打开天窗说亮话、谈她想做啥、想要啥，也得问对方想做啥、想要啥，然后两人得开始谈论各自的性史。她说，她压根儿就没准备好要谈这些事，因为她实在无法想像怎么跟一夜情的炮友谈这些，而如果是发生在一段关系中的话，她才不想说哩，因为要是说了，对方就会离开她，因此她更不可能坦白自身的欲望。如果要做 safer sex 就得把过去的历史摊开来给别人看、交代曾经做了什么、说清楚现在想怎么干，她真的不知要从何说起。这是我认为最危险的状态，因为人们不知道怎么说这些事，这方面的话语是极度匮乏的，而要是说了，就会倒楣、受罚，这种情况当然会鼓励人们说谎或者否认过往，结果大部分人就会从内心就否认自己真正欲望的事物。

性恐惧对我来说最有趣的是，举凡跟性有关的事情都可以被创伤化。例如，自慰对我来说是件很稀松平常的事，但是对某些从小就因触摸自己而被严惩的人来说，他们最怕的不是我们想像中最狂野的性，而是单单让自己兴奋、自慰的念头。这就是为何我很认真看待性惧怕、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轻忽人们的惧怕情感，因为那深层的恐惧控制了他们的行为，他们无法处理，也无法对人诉说。我记得有次去中学做爱滋教育，跟学生谈性，虽然那不是我分内之事，但我还是谈了。下课后有个大约 13 岁的男孩跑过来跟我说：「我真的好害怕，我有自慰，我想我可能感染我自己。」这并不是个愚蠢的故事。他不了解爱滋传染途径，也没人跟他讲自慰是怎回事。在他的认知里，打手枪就表示他是个有性的人，而有性就有感染爱滋的风险。人们常觉得狂野的性会造成麻烦

而避谈，不过我倒认为，像是自慰、和你的麻吉上床而背叛了你的伴侣、用药但是不愿意谈论上瘾等，这些事都很直接，但人们反倒非常害怕这些事情会造成的后果跟代价。

何春蕤：我可以就风险的论述提出些观察吗？我觉得爱滋的风险论述其实是把任何跟性相关的活动都「特殊化」，好像这些活动就是「危险」。其实我们生活中有无数风险，吃麦当劳、喝软性饮料、还有种种日常生活中的风险，可是大家讲到危险时从来不谈这些已经正常化、例行化的资本主义消费行为。

荷安珀：我完全同意何老师说的，「高风险」是一个高度有问题的分类，我认为它并没有告诉你任何实质的东西，而也确实不会阻止你去麦当劳消费或会让你戴上保险套（笑），非常荒谬。**我认为它完全未能让人们如何去理解某些事会有后果产生，以及试着用自己生活的方式去处理后果会对他们有何意义，并明白那是可能发生的。**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去谈风险就会导出很不同的对话。性就是在在一个高风险场域中操作的，例如，怀孕、染上性病、HIV 感染，举凡跟性有所勾连的场域就是高风险的，而这就是高风险所持续生产的论述。假如你做爱的时候没有好好戴套、假如你不是异性恋、假如你不遵守单一性伴侣原则、或是没用那种你从小被教导的方式做爱的话，那你便是把自己暴露在更多的风险中。这种说法尤其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完全是在责怪受害者。因为你没在听话，要怪就怪你自己，对吧？这种说法在爱滋防治中仍非常常见，所以感染者不断被责备。举例来说，你是感染者但竟然没告诉你的炮友或性对象，你这样是在把别人暴露在风险中，所以你应该被抓去关——普遍的对话常常就是长这样子。

我做了爱滋工作将近三十多年了，我曾拍了一部女人与爱滋的影片叫做《爱知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³。这部电影里，每个跟我合作的女人都很清楚她们处于一个

³ 参见本书收录之「爱知核心」在台首映座谈会纪实。

HIV 感染人数众多的社群，而且也都知道她们伴侣的性历史。她们知道风险确实存在。电影中有个主要的受访者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知道我丈夫有 HIV，但我不敢叫他戴套，原因是她可能会觉得被羞辱或是被鄙视，因为 HIV 无法让他做真男人，而真男人是不戴套的！尽管我知道他是感染者，但我还是妥协了。不过如果你问我，我现在会认为我该妥协吗？不，我现在不这么想，我应该告诉他：『你是货真价实的真男人，但是我不想暴露在风险中。』可是，我身边其实没有人可以跟我谈论这件事情，难道是我丈夫骗我吗？但，事情真相是怎样我们都一清二楚，只是我们那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我还是被感染了。」另一位受访者的说法就非常不同：「我是个无辜的女人，我只跟好男人睡。然后有个坏男人上了我后害我感染，他没有告诉我真相，我是受害者。天哪！我要得到我应有的权益，其他那些感染者最好都给我下地狱！」这就是道德主义所驱动的对话，而不是透过性别建构、有关风险的复杂对话。道德主义所激化的是恐同和憎恨，它不会管你自身的性别认同有没有可能对同性的人有欲望，而且这种恐惧和憎恨会一发不可收拾，因为这不仅仅攸关我和他们的关系，而是「我们」的关系。当你真正开始谈论有关欲望的真相，你就是在逾越那条界线，无论你的身分认同是什么。道德主义的危险之处就在于无辜的受害者会不断责怪对方。道德主义绕过不谈欲望真正运作的方式以及其复杂性。

黃道明：能否请你谈一下有关于你主导的「酷儿经济正义」组织里关于爱滋的计画项目吗？这个计划所提供的服务跟主流爱滋团体有什么不同？

荷安珀：「酷儿经济正义」组织网页上的那个爱滋计划目前停摆了，因为负责该计画的推手于一年前过世，他是个有色人种、公开出柜的男同志感染者，也一直以这个身分经营计画，现在

只好暂停。不过即便没有持续发展下去，我们仍把这件事描述成网页上的那样。我认为「酷儿经济正义」真正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个计画 12 年来一直都在处理贫穷社区的 HIV 议题，而不是着力于资源丰沛的主流中产 LGBT 社群。在纽约市，除了「酷儿经济正义」外，几乎没有其他同志或酷儿组织是在替无家可归的人倡议。我们的工作方式跟处理贫穷是类似的，而且有一些很棒的有色人种组织也有做和我们类似的服务。但在贫穷运动中，酷儿经济正义是唯一处理性／别议题的。我们不谈性的安全（sexual safety），而直接谈欲望和 HIV。我们也谈如何看待庇护所里发生的性爱、以及保险套使用。会这么谈套子是因为当前纽约市的警察临检是把保险套当作从事性工作的证据。主流倡议的安全性行为，就像发给你本手册，里头告诉你一些不能、不该做的事情。但我们的工作就是直截了当地谈欲望的复杂机制，谈贫穷、种族歧视如何与 HIV 交互作用，以及酷儿群众如何是那个交互作用的一部分。

有色人种酷儿除了很穷外，也有成瘾问题，而且处在风险中的时候常常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纽约的庇护所某程度上是很性别化的，你是不能跟同性别的人睡在一起的。假如你在女人的庇护所，你就不准跟任何人发生性关系，在男人的庇护所，也是一样。至于跨性别，目前只有「酷儿经济正义组织」买了一栋公寓来提供服务，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想要待的地方，而不是依照身分证上的性别决定。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让跨性别者能待在庇护系统里而不被骚扰。欲望也许是一样的，但贫穷因素底下的欲望实践，其面貌就完全不同。好比说，无家可归的人在公园里打炮跟你在自住公寓里打炮所面对的危险是截然不同的，而这就是阶级与种族，这就是为何阶级、种族、性、性别互相交织的作用会如此深刻。并不是说欲望感觉起来有多不同，而是你能否付得起、公开活出欲望实践而且还能存活下来，因为你可能在楼

梯间打炮时突然有人或有警察来了、然后决定把你海扁一顿。而身为一个待在庇护所的同志感染者又是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因为你没有一个固定的医生帮你看诊，你只能一直待在急诊室处理你的疾病症状。就算你相信要戴套，然而你求温饱都有问题时，哪里有选择余地。酷儿政治并没有讨论无家可归的人要如何在求温饱和买保险套之间做选择，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也不谈这。所以这就是我们做爱滋工作特别的地方。我们谈性，因为性在各方面来说都是很给力而且充满可能性的事，绝不能因为风险和羞辱而让渡了性的眼界。然后也得谈是不是你无法控制你所体验的欲望方式，还是你没有能力改变那些拘束你的框架？若你住不起公寓、没有医疗照护、或是连吃饱都有问题，那保险套其实是很奢侈的。这不代表你是个坏人，因为你一个月就只有 30 多块美金可以用，不太可能有太多选择。我们的爱滋工作就是去做大多数人不想做的工作，多数人对酷儿游民是不屑一顾的。例如，纽约有个规模很大的 LGBT 社群中心，「酷儿经济正义」庇护所的经理 J 是个铁 T (stone butch)，她过去曾流浪 25 年，以前她会去睡在那个中心的门前，觉得那里安全一点。但每天早上警卫都会赶他走，因为他们认为游民并非社群中心的服务对象，也不希望开放浴室给游民洗澡、或是让跨性别在那边换衣服。但对穷人来说，那正是他们的最基本需要，社群中心的人应该容纳他们，让这些人使用设施时不受到羞辱。他们连一个能够坐下来与朋友聊天的安全地方都没有，还不断被驱离。如果主流同志政治认为无家可归的性边缘者不该出现在公共浴室，那你要问自己为什么一开始要有浴室呢？

Jill：我有些关于性工作者的问题。人们都认为娼妓是「爱滋带原者」，我之前参与日春公娼座谈的时候，有位前公娼提到，人们总认为性工作者一定很容易得 HIV，但事实上之前公娼制度还存在的时候，全台湾只有一位公娼得过 HIV，我想知道要如何对抗这种错误的刻板印象。

荷安珀：这非常困难，有一些对性工作者有成见的人可能会问：到底是怎样的女人会去做性工作？她们为什么要当性工作者，然后把自己暴露在风险中？这些问题都有强大的道德基底，但事实上，性工作者生存下来了，因为他们真的知道要如何处理 HIV 之类的事情，相信我。没有人问过性工作者是怎么感染的？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又不是圣母奇迹受孕，一定是有客人干了她，或是她经共用针头而感染。性工作者其实非常了解风险，因为他们的生存正是建立在此。老实说，感染客人对生意不好，你让他们感染，他们就不会再来找你了。所以，性工作者都会发展出一套极为谨慎的工作模式、她们懂得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这很重要。可是却从来没人想要支持、保护她们、给她们保险套、教导她们在性交易时的避险策略。我们必须把她们最具风险的工作环境提出来讨论，例如，用尽各种方式上街卖淫来喂养药瘾。在成瘾的情况下，保护自己便成了次要目标。假使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境的话，我们必须看清楚什么情况使得性工作者变得脆弱。不幸的是，若我们持续不把性工作当作工作来看，我们永远不会谈论到她们的处境。

我稍早跟何春蕤在聊，性工作是份工作！性工作就是份工作！然后，你有欲望嘛。你可能不会时时感到有欲望，但我的性工作就是去满足想做爱而且愿意付钱给我的人，这就是我的工作内容！我需要的是一个我可以自我掌握的工作环境。如此一来，我可以判定谁危不危险，我要不要接客。如果有人对我暴力相向，我就去找警察，然而我可能碰到的情况是，警察认为我这个妓女整天做爱所以我根本不可能被强暴。性道德不承认性做为劳动型式而惩罚、拒绝保护性工作者，认定一个女人不可能是个性工作者而又同时是个有骨气的人。这种矛盾使人们认为他们没有必要相信性工作者需要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劳动状态、使自己免于感染爱滋。在卖淫和用药都非法的情况下，性工作者往往就只能坐以待毙，

成为当局扫荡的对象。

Wayne：在这周的阅读里，我们看到美国当地的培力机构，为社群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同样的，台湾的同志机构「同志谘询热线」，也出版类似像《性爱达人》这样的册子。我想问的是：当人们看册子里的内容，而开始认知到自己的欲望。你怎么看待这个「身分认同」的过程？

荷安珀：这是个很棒的问题，关于性身分如何发展的。你可以去问问异性恋他们是如何变成异性恋的。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们一定做了什么，只是他们不相信他们认为异性恋是异常的，是吧？当然，他们以为异性恋是天生的，想都不用想。你以为你从小被教养到大的身分以及性是正常的，可是有趣的是，那些能够挑战到这些身分跟性的问题，就是我们检视的开始。一开始时不一定是个身分问题，但是你开始注意到被某人吸引，而你应不应该被那个人吸引就成了问题，或是你开始做梦，开始意识到自身的欲望有些不一样、开始觉得异常而成为问题。事情不是像手册列了一大堆活动那样，然后你去看了后想说，我是个男同志，对吧？这其实是个较长期的奋斗过程，你尝试想找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怎么看你自己，有时候它可能是个激进的启示，是吧？我指的是，你从来没想过你是男同志，结果有个男的突然过去吻你，而且你也不讨厌。这可以透过很多种方式发生，例如，做老年工作以及 LGBT 老年工作就很有趣，因为我有机会跟那些在六、七十岁才出柜的人聊聊。他们以前常常不认为自己是男同性恋，但是当他们老的时候某些事情发生了，然后他们发现他们以前从未想过的欲望；有时候是他们有这欲望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只是他们一直压抑，最后到了七十几岁的时候才说：「靠，在我死前我要感受一下我的欲望。」

另外，我也认为探索性身分认同的道路也与性别紧密相关。

性别大幅且不同地形塑了你如何看待你做一个有性的人。顺性别女人（cisgender women）就不被假设为是有性的、只是被动地接受性，是有性的男人的伴侣，是吧？而如果你是顺性别男人（cisgender men），那你就被假定是个有性的人，而且文化也允许你去探索性，对吧？但这情况在顺性别女人上恰好相反，你可能喜欢性、甚至想要性，但你不会认为你「应该」要有性，尤其是你才只有十一岁时，然而对同年纪的男孩来说，他们则被假定为性活跃，至少在美国情况是这样。所以我认为这些事情都形塑了我们理解欲望的方式。就算是今天，我不认为发现酷儿身分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知道这个世界跟我当时出柜的年代已经很不一样了。但我看到很多人仍然在与自己的性感觉做挣扎，不管最后是否真的接纳。尤其是，当你的第一母语不是英语、又没有身分证明，社群支持就对你的生存就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跟你一样穷、知道你在奋斗努力什么。但假如你活在一个对跨性别或男同志都有敌意的社群，那情况就非常困难，因为你还要想着如何在你需要的社群里安然地生存下去。所以，比起通过反歧视法令，或是名人在电视上出柜，酷儿怎么安然活下去是非常困难而且需要更多时间处理的议题。

Ivan：我的问题是，Safer Sex 一开始在北美被男同志社群创发出来，是要以集体的方式面对爱滋危机，但是现在在男同志社群里，保险套的使用变成是强制性的。假如我们做爱不用保险套的话，我们会感到道德上有问题以及罪恶感。人们通常会劝导男同志肛交要戴套，疾病管制署以及民间团体也将防疫重点放在肛交上。我们看到男同志是没有被允许有协商性愉悦以及风险的权力，而异性恋则是可以免除这种强制性与责任。我认为 Safer Sex 的意义从 80 年代的爱滋危机那时到现在有了很大的转变。就你的观察，这是什么样的社会与文化力量驱使这样的转变呢？

荷安珀：你说的对，Safer Sex 就像减害一样，在被专业化之前一开始是一个很基进的概念，假如我们尝试要说有个社群永远在的话，我们做的就是能力所及的互相照护。要记得，爱滋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清楚 AIDS 是怎么散布的。我们认为可能是借由性而散布，可是我们并不确切知道是透过血液跟精液。当时我们对这疾病有许多困惑，早期过世的人很多是偷虐恋社群的成员，这社群常常一大群人一起做爱，因为很难有安全的地方去实践 SM，所以都是在私下派对里群交。当时 SM 圈里很多男同志和女同志因爱滋去世，人们不知道到底是肛交还是拳交造成的，人们在没外援的情况下试着搞懂性实践的什么成份和爱滋感染有关连，这就是 Safer sex 一开始讨论时的脉络，根本没在谈保险套之类的。即使那时候没有关于降低风险的绝对知识，我们也在思考到底是什么东西危害到我们，如果找到真正的原因，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降低风险而不放弃性。要记得，在爱滋疫情一开始时的主流道德价值就是，男同志应该停止做爱，他们的性很恶心的，应该要立即停止，因为你们全部都感染了，而我们却要帮你们负担——这就是人们那时会说的话。所以 Safer Sex 一开始是个社群内部对话过程，在不知道我们所做的假设正确与否的情况下，尝试思考要如何照护彼此。后来政府在做所谓「风险介入」时，Safer sex 被公卫所挪用而变成一种标准，结果它迅速变成一种道德对话，因为若你不做 Safer Sex，你就是有问题，尤其男同志的性更是这样：其他人在做爱上都多少有一些自主的空间，可是男同志就是没有。

有件我一直觉得很有意思的事，那就是我知道有很多从事爱滋教育者的男同志后来自己都感染了爱滋。他们并非不知道爱滋传染途径，但 Safer Sex 的标准显然没能处理到他们欲求的情欲生活：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风险在哪，但就是做不到。这不是说他们刻意要被感染，而是人们想要过的性生活与他们所能实践欲望的方式起了冲突，最后他们必须要

在欲望以及 HIV 感染状态两者间做选择。搞到后来，Safer Sex 的最终意义变成：你就只能做个永远会带套的好同性恋，而要是感染了的话，那就怪罪保险套，因为套子破了，有谁能怪你呢？一讲到风险，你总会找个归罪的对象，而非去正视欲望本身就是有风险。亦即，我对欲望做出了决定，而且已作好准备接受了它的事实。爱滋工作者感染爱滋在爱滋组织里是件矛盾的事。他们开始投入教育工作时都知道自己没感染，然而后来却感染了，之后他们往往离职：即使在爱滋组织里这些工作者也无法承认自己感染了，因为这无异是自我打脸，证明组织所宣导的防治讯息根本没起作用。你是个教育者，不断地宣称只要做这个、做那个就不会感染，然而你自己的状态却彻底背反了爱滋产业所推动的宣导。在这种时候，你就看到爱滋产业是如何提倡着某些性价值，却不去认真对待人类复杂的欲望、去理解人们如何处理风险。他们会说，没办法啦，我们无法有那样的对话，因为实在是太难了……。

Angel：在 "The Second Epidemic" 这篇文章中，我看到你有制作一些影片来教育人们，我很好奇你如何带看待新兴社交媒体像是 YouTube、Twitter、Facebook，如何将之用于爱滋运动当中？

荷安珀：我会很想知道如何运用社交媒体。在网路还没出现前，我就在做媒体工作了，在这些新兴社交媒体出现之前，人们就可以找到非常多爱滋的相关资讯，然而再也没有一种是像 ACT UP（北美爱滋行动联盟）那样的团体在利用媒体做爱滋运动了，能像他们那样搞是很棒的事。我认为关于爱滋的对话真的在广泛的大众文化中消失了，而且变成一个与 LGBT 社群分离的议题。所以男同志社群不想再谈爱滋了，因为那已不再是迫切的议题了。现下我们没有成气候的爱滋运动来驱动、创发媒体，好好地利用科技来生产有用的知识。前面提过那部我拍关于 HIV 跟女人的影片，除了爱滋药物治疗介

入延长了病患生命外，我认为那部片子所呈现的故事基调跟今日的状况依然相差不远。那部片子获得 1994 年美国日舞影展「自由表达奖」，然而这么多年来却再也没人拍过一部关于女人和爱滋的电影。我认为现下社会并不愿正视爱滋议题，爱滋在社交媒体中必须被呈现为持续在发生的流行病而非历史记忆，因为感染人数依然众多。现下，爱滋在北美的可见度主要呈现于阶级和种族的面向上，有色人种男同志的新感染人数远超出白人，但因为前者大多是穷人，而不是有钱的白人社群，所以没有吸引太大注意。事实上，感染人数是很多的，而且在美国，五十岁或超过五十岁的感染者也增加并持续成长，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认为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性生活所以没有感染 HIV 的风险。这些中老年人有着情欲生活，但是却没有爱滋的知识，在没有任何介入下，他们没有能力去思考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的生活里也没有筛检这一回事，他们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无法系统性地面对 HIV。我们看到了现下爱滋流行趋势正在改变，然而由于没有运动介入，被掩盖起来的爱滋议题只有在哪个妓女或电影明星被爆出感染才会浮出台面，然而整体而言，处理爱滋相关复杂议题需做的广泛工作以及与社交媒体的整合，都被视为无关紧要。这些议题是很复杂的，尤其是你才 19 岁还在探索性的时候。老化、还有你以前是如何有欲望这回事等等，都没有被纳入爱滋对话里。时下人们的态度是，喔，我是都会美型男（metrosexual），我很酷。我有两个二十出头的孩子，假如不是在像我这种爱滋教育者的环境中成长的话，他们不会懂任何事，因为学校不会跟他们教这些，也不会知道如何在性爱中协商，他们的同伴也是如此。大部分的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不会对爱滋有任何的认识，他们的家人也是。爱滋教育相当重要，可是却仍在我们生活中缺席。

黄道明：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真的非常幸运能请到安珀，为我们上了非常宝贵的一课，我从她身上学到非常多。最后，

我想要引一个安珀说过的话来为今天的课做结。在我们阅读的那篇访谈文章里，安珀说：「假如你没去处理你从事爱滋工作时看见的矛盾，那你的工作早已跟爱滋脱节。」这句话非常地深切提醒我们，无论是在从事学术研究或爱滋工作，都必须学习看到爱滋场域里的差异及其作用力；正如今天安珀所揭示的，认真面对自身的欲望、处理座落在身上的矛盾，才能去深化我们研究的议题、深刻介入我们欲改变的社会现实。希望这学期在深入探讨爱滋文化政治的过程里，大家可以时时回顾安珀今天开展的对话。在此再次谢谢安珀！

荷安珀：我想说，你们修这门课很重要，它不是个简单的领域。在这个已经没有太多机会真正面对爱滋、抵抗到底的时代，你们愿意坐在这里专注的思考爱滋议题，一定会有助于促成改变，这个工作非常重要，而你们愿意投入，真的是太棒了。我也想对你们说，学术的工作有时很有趣，但是它不一定像爱滋这个领域一样，有耕耘就可以形塑未来我们如何处理欲望和风险的问题。这是个还没有答案的大问题，而你们都可能提出答案，所以我真心的谢谢你们，谢谢。

爱滋运动的社群照顾与欲望 对话之必要

荷安珀访谈¹

梁俊文、黄道明译；黄道明校订

黄道明：上次你来台在我的课堂上提到了爱滋早年历史的自发社群动员、互助，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这些都是爱滋领域专业化前发生的事。我觉得现在爱滋病患大抵不被鼓励去找寻彼此，顶多是去民间团体或医疗机构搭起的支持团体。

荷安珀：一点都没错，支持团体跟（治疗）知识团体确实蛮不同的。早年大多数爱滋组织都设有专攻治疗议题的小团体，不是由医生而是由男同性恋感染者所组成的。他们每个月都会发布最新的治疗情报，包括有什么药物实验正在进行。草根组织的群众会去找这些治疗团体、分析现有的选择。早期药物的毒性很强，所以病患得衡量身体状况，看是否需要冒险等到身体撑不下去时才用。

由于最新的研究都发表在专业医疗期刊上，因此爱滋病患和运动者要掌握新知就得自己找来读，有成堆的论文要念。我们都不是念医的，那些医疗文献真的很难，但每个人就是都得咬牙 K 下去，往往读到头昏脑胀。但那群和我共事、行事果决的战友们就跟我说：「安珀，拜托你振作一下好吗，医生也不是什么都懂，你得自我教育一下，这样至少可往正确的方向迈进。」从那时开始，人们觉悟到他们得看重自己生命、靠自己，得去搞清楚有哪些东西存在的可能。治疗

¹【编按：这段访谈于2015年12月中旬荷安珀二度访台期间进行。】

权行动就是这么来的，这也是知识的基础建设。有了这个根基，病人就会去跟医生说，「你搞错了，事情得这样做才行。」这真的很惊人，因为从未有人胆敢如此挑战医疗建制。

黄道明：他们大多数都是白人吧？！

荷安珀：是的，但另有群男同志知道这些白人并未关注跟贫困、种族、性别等跟爱滋有连带关系的议题，因此就更得自食其力。要知道，这些努力自学的人多数濒临死亡，12人里可能就有6人活不到半年，所以得不停招募新血加入才行。当时感染爱滋以男同志占大宗，女性爱滋议题不被认真对待。例如，我在执行女同性恋爱滋方案时处理过一堆阴道感染念珠菌的女人，但所用的制式病例表格却只有「口腔念珠菌感染」，显见当时医界对女人身体多没概念！另外，女性议题也常与非法用药交错，而后者总与「贫穷」跟「种族」相连。静脉注射药物（如海洛因）与AZT药物的交互作用为何？当时没有研究，像这种知识漏洞还蛮多的。

黄道明：基于贫穷、种族、性别与爱滋的交错，那时候有没有出现较为整合性的支持或服务呢？

荷安珀：纽约有，但非正式的。提供法律谘询服务的爱滋组织都很庞大，顾客也多，他们也提供餐点、剪发、帮忙找房子之类的服务，因此吸引很多穷人前来，来者也不会被拒。不过大部分组织都位于都会同志区，假如你住资源少的偏远地区就很麻烦，光交通就是一笔费用。起初有些男同性恋机构在找地方落脚时也是处处碰壁，因为房东都怕租给爱滋感染者会让房价下跌，所以最后他们只能租到偏远地段，也就容易被孤立。（叹气）

有些有钱的白人男同志一辈子不用进诊所看病（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专属医生），但因为生了爱滋病不想让保险公司知道，所以就被迫开始跑诊所。这一来就常会听到这些有钱人抱怨看诊经验。哈哈，欢迎莅临美国的真实世界！实况是

，人们进诊所得等大半天，医生问诊、开药都草草了事。医疗的社会区隔状况真的很严重，不过这也会激起人们剧烈反抗、上街抗议。活了下来，那是因为我们搞清了状况，也才会知道还有哪些未显的议题等着我们去开拓、倡议，否则是没有可能性出现的。就像当时我读医疗期刊读到一个头两个大，但我知道假如自己都搞不懂的话，就别想搞出一套符合自身需求的治疗架构。而且懂了一些事情之后，就有能耐对优势阶层叫阵、跟那些好命人展开对话。

有些男同志感染者后来变得很棒。他们没半点医疗背景，但有着极强的求知欲，透过自学展露过人的智识，并乐于将所学所知与他人分享。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社群责任。好比说，我的能力有限，对医药在自己体内的作用能搞懂的就只有这么多，而你比较厉害，所以我就去向你请教，但你不会用高人一等的姿态对待我。这样问清楚、搞懂后，下回我去看病时，就能掌握与医生的互动、知道该说、该听什么。而且有些人真的会因当时环境或是自己遭遇的对待而愤愤不平，他们就会在图书馆怒读一堆书，然后互相讨论、共学。那时我们真的很猛，出版自己的通讯刊物，而且全美的爱滋病机构也都会互相分享这些资讯。

黄道明：这些机构当时仍然是草根组织吗？

荷安珀：算是，不过得说明的是，他们背后有财力雄厚的男同志金主。说草根是因为那时爱滋领域还没高度专业化，在爱滋病机构工作也还是个污名。不过很快的，有钱金主相接过世，遗产就都捐给了那些同志爱滋团体。有关组织成员组成和工作状态，我还能多讲点。我待的那个部门（纽约市政府人权委员会爱滋部门），半数都有支薪，同事虽有爱滋但并没失能，对他们的工作要求不会太过苛刻。感染者通常是第一顺位的录用人选，很被看重。跟爱滋无关的人，通常就直接刷掉。但你还是得考量雇用爱滋病患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工作人

员是感染者，有时他们身体状况差，就得等他们好一点才能再回来工作，这理所当然。所以你可能突然今天的工作份量比昨天要多，这很正常，这种机动调度的工作型态就跟其他专业机构很不一样。由于这职场攸关社群存亡的保卫战，所以我们深深以和感染者共事为荣，而荣耀他们的方式就包括让他们得以继续在社群内发挥他们的功用，不因疾病而孤立他们，这就是我们共处的方式。

记得 1983 年一群爱滋病患发起的「丹佛原则」(the Denver Principals) 吗²？我们都应该知道那份争病患尊严的宣言是个政治性的产物，不是支薪工作可以衡量的。人们会去接那份起草工作绝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整个社群正在凋零，而这义无反顾的投入同时也彰显了镶嵌于社群的价值观。其中最主要的价值就是，那些受爱滋影响最深的人必须是组织政治的核心；他们不单是接受服务的顾客、也不单是医院病床上的病患，而是在治疗、接线、或个案服务上协同做出裁决的人，例如什么该优先处理、如何理解疫情等等。感染者的需要深植于社群价值；他们不是接受帮助的局外人。

所以，支持感染者、让他们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为社群工作，是我们优先且严格执行的。不管病得多重，他们依然是社群的一份子。所以，当时就有了「哥俩团队」(buddy team) 的出现。这团队通常由一身体健康的非感染者负责筹划，另搭配一个队长做指挥群组的支持工作、协助生重病起居有困难的感染朋友。我们当时还弄了个溜狗的社团呢！不过实在是太多人病倒，人人自顾不暇，有时就是找不到自己的好友帮忙，所以哥俩团队的支持结构至关重要。早期有个观念叫做「我群」(WE)：「我们」共体时艰，是生命共同体。「我们」想办法打造一个友善的系统，服务涵盖了医疗、住屋、饮食，因为没有这生存结构的话，患者在相接失去了同侪奥援的情况下，生活是会被彻底摧毁的。

² 这项重要文件的全文见本文附录。

我在纽约市府爱滋人权部门工作的时候，曾发现某个同志社区中有房东想要赶走爱滋住户，但碍于不能非法驱离，后来那房东竟然就把整栋大楼的暖气都关掉！住在这栋大楼的人可是那些快要死掉的感染者耶，冬天没有暖气叫他们怎么活？房东以暖器坏了为由搪塞，但不用想也知道，40多户的暖气设备全都坏掉可能吗？！后来身体状况还行的人就自行搬离，那些没体力的就只能在家挨冻。房东使出这种要人命的恶毒招数可见爱滋污名之深！事实上，那一区里的房东彼此都认识，也都愿意干这档事，我们后来发现「暖气坏掉」竟成一种模式！那位恶房东的生意合伙人租出去的大楼里的暖气竟也相继没了！此外，贫困地区有爱滋病患者死亡时，殡葬业者还会向家属多收好几千元的费用，说什么棺材只能用钢制的、以免爱滋病毒传播出去。这又是一场密谋，员工不想碰大体、不肯埋葬，但多塞点一点钱的话，又不一样了。原来这就是靠污名赚死人钱的资本主义！于是我们只好对他们提出法律诉讼，后来也打赢官司。

黃道明：这场官司打很久吗？

荷安珀：其实没有很久，原因是我们的部门是市政府单位，所以法院很快就受理了，不过要是发生在纽约外的小城镇上，事情就难说了。其实起初纽约市政府的人权促进委员会并没爱滋部门。我们当时跟在 WHO 主事全球防治的 Johnathan Mann 教授一同努力，因为他知道爱滋歧视问题需要实质协助、也需政府介入，官司不是单靠律师孤军奋战就打得赢。所以我们就努力做出一套能让歧视案件能快速解决的方式，而这也符合市政需要。纽约有医疗机构和照养服务，但却对爱滋宝宝置之不理；有救护车和消防局，但救护人员却因为怕被传染爱滋而不敢做口对口人工呼吸。纽约市政府怕被告吃上官司，所以就在人权委员会下设立了专门处理爱滋的部门，如此我们就能够站出来协助，像是叫房东打开暖气设备。

当时医院情况很糟，每天都有一波又一波的爱滋病患死去。医疗人员不知如何清洗处理遗体，所以我们就去做培训。照理说，医疗人员在处理传染性疾病需要戴手套，但实际上他们真的没有这个习惯。虽然纽约市政府不想花钱购置医疗手套，我们还是让它成了强制性的规定。另外，还有些像是当时的病人没有妥善照顾的问题。走进一间大医院，你会发现走道排满了病床、走廊上都是病患。医护人员只好把食物摆在地上，病人还得自己下床取用。

黄道明：你们是怎么撑下来的？

荷安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但坦白说，不是说我自大，但我们当时真的很勇敢、也很慷慨。我们不甘愿社群中人就这样死去，所以就努力在这恶劣的环境中奋战。那时我一脚在体制里，一脚在体制外搞运动。才在医院外头抗议医疗歧视，隔天就又得回到医院帮助照料病患。一离开医院，就直奔 ACT UP 开会。在医院体验到的实在太令人心碎了，于是就需要去个能真正做自己、表达内心不满的地方。ACT UP 不是个专业组织，成员多半都是这个圈子的友人，就是因为知道情况有多糟糕、人多无助，才会选择协助彼此。「哥俩团队」的出现就是因为爱滋病患叫救护车，但医疗人员不愿去载。我想说的是，你当然可以说情况糟透了，但现实就是人们永远且迫切需要资源，所以你就得看清的问题本质为何，并且对在做的事保持存疑的态度。如果不这样，是混不下去的。

黄道明：上回妳讲到妳孤身面对 300 位工地工人的故事实在太震撼了，能否请你再多讲一点。

荷安珀：这种一对多的情况其实可多着呢，我们这群人说来真的好笑，只有我们傻傻地愿意冲锋陷阵、直接跟群众对话。现在想起来，没三两下功夫还真不行哩！

我有两个主管，一个身高 190 公分多，是个美到爆的变

装皇后，酷爱皮革，爱穿高跟鞋上班，加上他那身高，没人敢在他面前放肆。他的副手是个蕾丝边，办公室还有另两个变装皇后和一个非白裔的男同志，都是爱滋病病患。另外还有一位律师，他的伴侣是黑人，也得了爱滋。我们整个组合就很爆笑，你想有谁能去跟那群工人聊啊？他们说：「安珀就妳吧，穿条裙子就可以去了。」我才不要穿裙子哩，我是歹戈（dyke）啊！（笑）

黄道明：结果妳有穿吗？

荷安珀：有啊！

黄道明：真是牺牲！（笑）

荷安珀：这样我才有脱困而出的机会啊！有个女生的样子毕竟是个好策略。但真正麻烦的是，你想 300 名工地工人会想对一个女生敞开心胸聊性事吗？他们肯跟你聊几句就已经很偷笑了，还妄想他们对你掏心掏肺？你想这些工人会在人前迳自聊起以前有没有偷偷喜欢过男生？！得了吧！依我的经验来看，只有在我是妓女、他们是我恩客的情境下，才有可能听他们讲真心话。我得把事情搞定，而且就只有一次机会，况且还有一个被这群恼怒工人关起来的倒楣鬼等着我去救呢！到底要跟这群工人讲啥？我想大多数人压根儿没辄，因为人们连自己怕得要死的东西，甚至都还叫不出名来呢！我想我大概有抓出问题核心的本领吧，知道这群人恐惧和仇恨的根源来自何处。

黄道明：我相信你的本领来自妳深厚的社运经验……

荷安珀：是啊。我喜欢接受挑战，别人越跟我意见相左，我就越想跟他们对话。我当然也会怕，走进充满敌意的阵营实非易事。但坦白说，打从同性恋运动开始，人们就厌恶我们这些妖魔鬼怪，爱滋到来前就已有太多的歧视。我公开以拉子身分过活也有些时日了，这身分是我家人所鄙视、憎恨的，我成长

的社群也觉得女同性恋很恶心。这些我全都领教过了，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喜欢去改变人家习以为常的事，凡跟酷儿有关的事我都爱做。人们在谈酷儿是否偏差时，我就觉得应该介入、好好展开对话。所以爱滋刚爆发时，我们就得去谈是否有存活下去的权利、为自己辩护，会这样做正是因为人们对我们的品头论足的方式根本就认定我们的存在是多余的。所以我就觉得非把得话谈开不可：告诉我，你凭什么那副样子？你他妈的把话给我讲清楚啊！

污名和恐惧会在知识管道欠缺之处滋长表示社群内在的资源匮乏，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在做社群对话：父母怕儿子同性恋、怕他会死于爱滋这种脏病，而因为没人谈，这些情绪就将人们困于暗柜，所以我就去逼他们好好把他们的忧虑、顾虑摊开跟我谈。被派去工地救援说来其实不是什么好笑的意外。我爸是个木匠，从小我就在工地长大，所以我很熟悉在工地干活的人。要不是我爸的缘故，我哪有分量可以跟那些工人对话？所以，我就对那群工人说，「别见外啦，我以前在工地长大的，对我来说，你们就是我的爸爸，所以我很看重你们的恐惧以及此刻的对话。可是我无法认同你们就这样去伤害别人。所以你们想问什么尽管问，但要讲明的是，我不会让你们在那里装疯卖傻、把那个困在牵引车里的人搞死。我是木匠的女儿，我不怕跟你们杠上，要谈多久都行，但总得谈出个新方向，我是不会呆坐在这里听你们瞎扯的。」所以那场对话就在这样的引导下开展。我的成长背景让我看到底层人民怎么艰苦度日，所以可以去跟他们对话，而且我也不怕跟他们谈性。

我知道谈性不容易，「阴茎」两字一出口屋子马上会有回音（笑），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在想性教育怎么做。你要教别人有关传染的知识，自己却不敢谈性，那实在太惨了。我遇过一些很野、很疯的人，不过这些人一成了性教育者，

就变成世上最无趣的人。我对他们说：你是我的朋友，你人怎么样我很清楚，我们成天聊性，不过你看看自己是怎教人家的？你这样教到底能开启什么实质的对话？你没在谈你的经验，也没有办法跟别人的经验连结起来，说什么身体这、身体那，全是理论空话。

现在的性教育很有问题，因为它不承认「性」本身就是充满争议的，所以教育者就会先行把所有可能资讯都中立化后再喂给你。然后，坐在台下听讲的人就会想，唉管他的，台上在谈的又不是「我的」身体、也不是我的人生，听起来也不像我跟朋友的互动方式。标准流程式的教学只会告诉你别做这、别做那，根本没用。运气好的话，你或许会听到些独家趣事，不过性教育使用的语言本身就不是设计来让人有能力可去自行探索。结构上来说，性教育用的那套语言本来就是专门给官方批准用的；要真正的谈性，就不可能用一种抽象方式去描述人们在干的事。性的对话一定要开启，因为人们对于性的认知不是太少，就是否认自己身上的性。我想这点我们都清楚的很，因为我们也都否认过自己啊（笑）！每个人都会欺骗自己，尤其是他们正在干那档子事的时候，而那正是最危险的时刻：你无法面对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也就无法保护自己。那么，「安全」到底与你何关？你早就做了你自己认为很危险，或是自己和别人都无法接受的事。然而你就是想要，也付诸行动。那你觉得保险套在安全性教育里会有多大意义？答案是否定的，这与「安全」无关。该谈的是欲望和风险，该和人们谈的是最搅扰他们内心的事、到底自己是谁。

黄道明：提到面对自身欲望，通常人们会马上想到的是有没有资源去活出欲望。不过你曾说，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去做尝试，然后再来问那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但我得说，这超难的！

荷安珀：的确不容易，可是我们在谈的没一样是简单的。我们不是在

说，你要这样把润滑液涂在套子上。不，我们在谈的是，性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带给我们各种复杂的感受、欲望、希望、绝望。性不只是血肉之躯，而是我们投注加码的对象，是其他事物无法带给我们的。性就是这样惊人的媒介物。因此，安全性教育的真正对话其实无关保险套。我们在面对的是个危险的情境，之所以会那样正因为它是会带出你最想要的东西。我认为教导学生面对欲望的挑战及复杂的情欲问题是有可能的，但你得一路陪着他们谈下去，因为欲望实在是很恐怖的东西，要不要承认自身欲望的内在冲突也相当可怕。在教学环境中，若没给予学生足够的空间去探索欲望为何危险，真正的对话是不会发生的。人们之所以无法好好操控自身畏惧的事物，是因为他们没有谈论欲望的框架。

在执行女同性恋爱滋方案时，我常对那些正派女同志说：「咱们来谈谈性爱吧！妳会去干啥，啥是你不干的？来谈谈风险吧！妳们的性幻想是什么？妳是怎么想像的？」。结果她们答说没有性幻想。这真的很不妙耶！我就说，妳们一定要开始阅读色情文学，这样才能开始学着去想像自身的欲望，因为欲望不是那么直接了当的一回事。自小人家就跟你说，你一生都不应该把心思浪费在性事上，不过既然你已经错当了女同志，那就表示你一定在某个节点上有想过，然而现在妳却又怕起来了……当个酷儿是怎么回事你点滴在心头，而妳现在怕的是，果然就是因为欲求而注定终生邪恶、离经叛道。如果妳没法把这搞清楚、说出来，那妳就会害怕做爱。即便做了爱，你也会担心那些不欲人知、甚至也不愿已知的事，会东窗事发。

性幻想很有意思，即便约炮前你跟对方说了你偏好什么口味，不过一旦上了床后，那些喜好是会改变的。可能原本你不爱做的，就因这个人的关系而变成你喜欢的：性爱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一样的。你尽管可试着描述怎么样做才合你意，但每个性的际遇都有出乎意外的可能，而这也是你会想

要尝试的缘故。幻想，或说幻想的可能性，就在于那意料之外；那是你无法事先道出，却又偷偷希望会发生的。性爱在许多方面都很神奇美妙，可是不会凭空出现，你还是用你的身体、花心思去应对才行。

必须说，我以前在做接线工作时所学到很多关于性与欲望的洞见，因为打来的人会不加修饰把内心话讲给你听；如果不是实话，讲的也都是他们心中的幻想。在无从辨识真假的情况下，你就是得把他们的话当一回事；一旦你当真，他们所言真假的疑惑也就不再是问题了。我的接线工作经验是，打来的人通常都挺绝望的，所以我不会挂人家电话，也不会说教或施予卫教。这些人打来是真的尽全力想把他们真正害怕的事情，还有他们真正想要的事情，全都讲给你听。之后，一个真正关于欲望的对话就展开了，因为你问的是：「你在说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是什么东西让你如此着迷？」、「你所欲求的性爱，对你自己来说是好是坏呢？」、「假如你获得了你正在跟我讲的那种性爱，那对你有何意义？」、「你可以对我诉说，却不敢对别人说，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样，你就真的在帮助这些人道出长久以来面对欲望的难言之隐。我觉得性的集体对话很危险，这点人们很清楚，也就非常抗拒。所以身为一个性教育者，当你应该鼓励他们去挑起内心情欲的想像，但别逼迫他们讲出会后悔的事情。

黄道明：但这样是否就无法直捣问题核心了呢？

荷安珀：身为性教育者，我发觉我自己得承担更多的风险，像是分享我自己性生活上仍在克服的东西。我自己也努力了很久，不是说我一直以来都有很完美的性爱，也不是说一讲到性，我就能谈笑风生。这跟聆听别人分享不同，这可是在描述自己的问题啊。我的观察是，性教育专业者会去跟人们讲一套他们自己不会干的事，像是叫人沟通要直接、事情发展不顺己意时就要明讲之类的，但老实说，大部分人自己是不会那

样做的。大多数人不会跟别人明讲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事。我们在对一个陌生人暴露自己时，通常都会很焦虑，哪怕是对认识的人也是如此，因为会怕露出自己有问题的一面、怕自身纠葛的欲望漏了馅。所以我认为这边有个巨大的专业鸿沟。

最近在处理同志年老议题时，我就发现，这跟早年爱滋运动生出的社群照顾不正是同一码事吗？像是生、死、失能、孤立、社群介入动员、照护的运用、住屋问题等等。人老了又没钱，需要有个安全的住所，又可容易取得所需的医疗……这些爱滋运动不早就处理过了吗？酷儿社群在因应爱滋危机时就已自行创发、打造了一套照护系统，然而这段历史却被人们所遗忘。晚近同志老化议题浮上台面，人们开始努力寻找对策、彷彿得创发一个崭新方式来因应老化；人们忘了，早年爱滋社群照护的集体记忆就是最佳的参照与典范。只要往回看就会知道，老化做为一项社群议题就是把人们聚集起来、一同面对身体终将衰老的现实，而爱滋运动历史提供的答案就是：我们要把人留在社群里，以敬重而非可怜的方式对待他们，也会在生活各方面提供支援，使其有尊严过活。不就是这样吗？这边在谈的是集体共识、集体价值，正如同我们看重感染者一样。

黃道明：你如何看待此刻的爱滋运动呢？

荷安珀：爱滋运动后来停滞，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项悲剧因素就是关于欲望及性的运动对话并没有持续深化、往前推进。早年爱滋运动本身被疫情的迫切性所驱动，在运动对未来没提出愿景的情况下，治疗策略便主宰了运动的走向，因为没人想去做其他那些彻底改造社会的基进工作。让运动继续走下去就是基进，而我觉得 ACT UP 之所以激进不是因为它有运动愿景，而是因为人们处于生死关头、在无路可退的时限下放手一搏、寻求抵抗的方式。因为它的目的不是去改造环绕于

「性」的文化、没去体认到所欲改变的社会现实和议题其实远超出 HIV 本身，所以也就容易被收编、专业化。组织团体在申请补助案时如果无法把爱滋的复杂交错面好好铺陈交代、将之脉络化，那就会落入经费补助既有的单一议题框架。一旦社群组织工作受限于经费补助的单项服务供给面，组织团体所能或愿意提供的也就越来越形窄化了。此外，在美国政府开始大量从事爱滋研究后，组织团体以往从事的社群相关研究补助也就随之被砍，发问权转移至局外人手上大大削减了社群的力量。

过去有种说法是，爱滋产生的作用影响实在过于巨大，这迫使资源有限的社群向国家求援。这没错，我们确实无法自个儿成事。后来有人把逼国家进场视为运动成功，却不去思考这援助的本质究竟为何。我们到底要的是更多的匿名筛检场所，还是针对社群内部的不同群体需求及处境来提供另一套服务呢？若不是由此去看，那就不能说社群握有主控权。后来爱滋防治朝扁平发展专业化，专业界线分明，现在你得先经外界认证，才有资格说你在从事社群服务。

黄道明：这让我想到公卫研究论述里常见的制式用语，例如人们近用哪项服务有什么「障碍」、这项服务跟那项服务间有的「串连」有着什么「缺口」。

荷安珀：没错！坦白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该怎看待国家进场协助社群防治这回事。社群做出的让渡与真正现实所需两者间怎么衡量、利益交换又是否得当？过程中我们确实获得很多资源。能让感染者参加种种临床试验进而取得药物、介入医疗研究的议程设定、乃至现在有的治疗，这些都是爱滋运动重大的胜利。可是我不知道，要是我们生在一个珍惜酷儿的文化里，事情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发展？国家若是出于呵护之情对重大疫情做出的回应又会是怎样？我们又能对政府有什么期待？我不知道答案，因为那从来不是我们可以问的；现实

是，人们那时希望我们去死，或是冷眼旁观，一副「你们那种人的死活干我屁事」的态度。美国政府后来被迫采取行动，是因为爱滋疫情的严重性暴露了（被认为不正常人的）酷儿性爱与用药充斥美国文化的现实，这远比人们想像的还普遍。

黃道明：长久以来，台湾爱滋民间团体一直不愿挑战官方歧视性的强制筛检政策，因为那触及性交易入罪及非法用药的问题，两者的公权力运作都有强大的道德正当性。同时，强制筛检政策也涉及了国家对非正式经济活动的管制，而台湾民间有庞大的非正式经济规模。

荷安珀：这里有个阶级意识形态在运作：对统治阶级而言，是谁失控了？彷彿中上产阶级、官僚就没问题。

黃道明：台湾的感染者长年以来一直处于被代言的状态。现下的爱滋个案管理制度对就医感染人口的监护和医疗规训有着分而治之的作用，晚近竟还出现感染者以爱滋防治条例告感染者的案例！

荷安珀：我觉得打造一个能看到那些有着相似惩罚性质的建制力量、并与之对抗的爱滋运动，是很重要的。如果人们不愿接受这样的挑战，集体行动就只会昙花一现，不会持久。这样的运动必须滋养。对我而言，中央性／别研究室正体现了那种坚持下去的集体力量。

回顾爱滋这些年来转变，我觉得我们所处的文化依旧是恐性、对性充满妒恨的，而你正是在这样的脉络里去跟人们谈欲望。欲望很复杂且一团乱，并非说变就变，不是说「好吧，我不会重蹈复辙了」，那不是欲望运作的方式。我常在想，我们又不是精神科医生，在帮人做精神分析、看他们想要什么，但我们确实也得去跟人们谈他们在做的事。然而对话怎么进行而不落入偷窥，可以打破孤立、提供奥援？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答得了这个问题。一旦你在性的对话里打

破人们的孤立，会发现人们什么都要，因为他们是那样心碎、走投无路。这不是叫他们去支持团体就可以解决的，因为就连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地方，我也不认为是安全之处。有件事让我觉得很矛盾，就是感染者运动固然不用去为这恐性文化的修复负责，可是假如我们不扛起这责任的话，实在不知如何能让人放心谈性！这根本就是个设局嘛！人们没有资源可以谈性，唯一能冀望的是能有个还算说过得去的对话。我尽可能让对谈有个结构，但那也只碰及一小撮人，虽然寥胜于无，但那实非解答。还有另一个我觉得矛盾是，虽然做性教育我很在行，但谈完话的结果却是又把人们推入深渊之中！这也是性教育工作者避谈的。我们究竟在谈什么性？我们尽力传授技巧给人们，也用积极肯定的方式谈性，然而对挣扎中的人们而言，这样的教育效果还是很有限，因为就算他们暂时解决关系中的纠结，一旦有新问题冒出来时，依然身处于忌性文化的他们，又会落入无助的局面。

附录：丹佛原则（1983）

我们谴责各种把我们贴上「受害者」标签的企图，因为这个用词意味被击败。我们偶尔会以「病人」自居，因为这词意味被动、无助、依赖他人的照顾。我们是群「爱滋患者」（People living with AIDS）。

给所有人的建议

1. 跟我们站在一起，一同对抗那些开除我们的人、把我们逐出家园的人、拒绝接触我们的人，也抗拒那些把我们跟所爱的人、社群或同侪拆散的人，因为现有的证据显示，爱滋不会经由接触和社交散播。
2. 不要把爱滋患者当成代罪羔羊，不要责怪我们引发这流行病，也不要以趋同化的方式看待我们的生活方式。

给爱滋患者的建议

1. 成立爱滋连线团体，选出自己的代表来和媒体交涉、设定自己的议题、规划自己的策略；

2. 亲身参与每个层级的决策，尤其是成为爱滋服务组织的理监事；
3. 能被纳入所有的爱滋平台，并且和其他参与者有同等的说话份量，从而分享自身经验和知识；
4. 以低风险的性行为替代那些可能会伤及自己及其伴侣的行为。我们认为，爱滋患者应有伦理责任让可能的性伴侣知道他们的健康状态。

爱滋患者的权利

1. 爱滋患者和人人一样，有权享有全面且令人满足的性生活及情感生活；
2. 爱滋患者有权享有高品质的医疗和社会服务，不因性倾向、性别、诊断、经济状况或种族而遭到歧视对待；
3. 爱滋患者享有被详尽告知医疗程序及风险的权利、有权选择或拒绝他们的治疗模式、有权在不损及自身治疗权下拒绝参与研究、有权为自己的生活做出知情的决定；
4. 爱滋患者享有隐私权、医疗纪录保密权、尊重人格权，有选择他们生命重要他人的权利；
5. 爱滋患者有权尊严死去，并且有权尊严过活。

妇女・爱滋・家庭？

纪录片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在台首映座谈会

爱滋病一向被视为男同性恋的疾病，谈到它和女人相关时，要不是责怪染病的女人是执意选择吸毒或性工作因而感染爱滋的坏女人，要不然就是愤慨在家庭婚姻中的好女人只因丈夫在外乱来就无辜染病。这种两极的描绘模糊了爱滋感染的性别、经济、家庭、族裔、阶级面向，也简化了女人和爱滋的多种相逢故事。

本片是第一部有关女人和爱滋的纪录片（1994）。在那个对爱滋还充满误解和无知的年代，导演访问了许多不同身分的女性感染者，包括黑人、女同性恋、家庭主妇，分享个别女人从「不觉得自己可能是高危险份子」到感染爱滋后的真实经历和生活，也在差异主体的异质声音中拆解了两极化的性别叙事。

时间：2015 年 12 月 19 日下午 2-5 时（影片长 56 分钟）

地点：台北市龙江街 281 巷 22 号狐狸野餐地下室

主持：王莘（台湾性别人权协会）

引言：荷安珀（本片导演／监制、美国资深爱滋运动组织者）

倪家珍（《爱要怎么做：爱滋年代里的女性性指南》编者）

翻译：丁乃非、黄道明（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王 莘：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首映和座谈活动。因为讲的是爱滋的历史，特别是和女性相关的部分，我们安排了台湾性别人权协会的干部倪家珍来和大家谈谈，家珍当年翻译出版了台湾第一本谈妇女和爱滋的著作《爱要怎么做》，原作者 Cindy Patton 今天也在场。其实当时中译这本书的时候是集体翻译制作，但是我们以前很喜欢集体，觉得个人的名字最好不要出现，现在回头看觉得非常遗憾，自己好像消失了。好

，先请黄道明介绍这部片子的导演，也是今天的主讲 Amber Hollibaugh。

黄道明：大家好，Amber Hollibaugh 荷安珀是个身分很复杂的人，她是知名的运动组织者、纪录片工作者、艺术家、公共知识份子、以及社群组织者，是「酷儿经济正义」组织的创始成员，目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研究员。80 年代初期她曾担任纽约市政府人权委员会的 AIDS 教育小组召集人，后来主导了男同志健康危机（Gay Men Health Crisis）组织的女同志爱滋计画。她曾因对女性健康议题的卓越贡献而获颁 Dr. Susan B. Love award 奖，她的个人回忆录专书 *My Dangerous Desires – A Queer Girl Dreaming Her Way Home* 广受好评，已经成为女性主义经典。刚才播放的女性情欲和爱滋纪录片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是她导演的，1994 年获得着名的日舞影展自由表达奖，是第一部、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处理女人和 HIV 的纪录片。从这一连串的创始成员、召集人头衔，各位就知道她是非常资深的运动组织者，可是我想特别说的是 Amber 看爱滋的角度非常广，她总是看到爱滋和贫穷、性别、阶级、种族、用药等等轴线的交织，看到这个疾病是怎样与社会结构和社会成见连在一起被处理，因而也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狭隘和平等。由于爱滋早期完全不被认为和女人有什么关连，因此 Amber 召唤了很多女性感染者出来，拍了这个纪录片，呼吁大家注意女人的处境。

王 莹：先请安珀说两句感想。

荷安珀：每次看这部片子就有很深刻的感触，这么多年来女人和爱滋的关系处境好像从没改变，特别在用药和性方面。本来这个片子已经蛮老的，里面讲的东西也应该没什么时效了，可是这些故事所反映的女性处境还是没变。女人的世界和女人要怎样处理爱滋的问题，好像还是一样，真令人不胜感叹。

王 莹：我们先请家珍从差不多同样的年代带出 20 年前台湾面对爱滋

防治的最初阶段，这样可以显示为什么我们当时要翻译《爱要怎么做》这样一本妇女爱滋的小书，然后再回到现在来看台湾的改变或没改变。

倪家珍：我已经很久没有公开讲妇女爱滋这个主题了，的确这是我非常早期的工作，1994年离现在大概20年了，如果从这个影片对照台湾的处境，很多脉络跟台湾20年前是相呼应的。在爱滋的主题上，妇女是一个隐形的对象，甚至是被怪罪的对象，20年前台湾的爱滋防治政策基本上以恐吓为主，那时的防治文宣就是病体照，让你看到这个疾病有多恐怖。当时卫生署长张博雅有一个很有名的名言，就是说「感染爱滋就是活得很难堪，死得很难看，自作孽。」政策上就是把爱滋当成一个很恐怖的道德化疾病。这种说法在表面上也很有说服力，因为像是在影片里主要反映的是美国基督教为主的贫穷黑人女性感染者，在原来的社会结构里，这个群体本来就是被人蔑视的，说她们活得难堪，死得难看，也不会激起人们的关注，反而觉得罪有应得。

20年前这个主题刚在台湾出来的时候也有几种被怪罪的主体，第一个最主要被关注的对象当然是男同性恋者，再过来就是药瘾者，然后就是女性性工作者。从道德面向来看，没有一个感染者会被当成完整的人看待，她总是片面的面貌，或者就是一个被道德谴责的黑影。究竟这个人的人生是什么？看不见。我们看了这部纪录片就知道，爱滋感染其实参杂了非常多层次的面向，可是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么细致的分析。在防治的论述里总是用道德论述来说公共卫生，说只要大家有忠诚性伴侣，一切就都没有问题。当时我们曾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跟卫生署官员对话过，他从公共卫生的角度认为感染的人和病人人数如果不够多的话，根本就不构成需要被关注的群体。女性的身影，不管从预防或生活或者从大视角的状态来看，都没有任何面貌，甚至被认为不是值得关怀的对象。这的确是20年前的脉络。

20 年前妇女和爱滋这个主题在妇女团体里面也不被当成议题，只有我们这群人关心，像是王苹或丁乃非其实在这个翻译编书的过程里参与了很多，出了很多力气，很可惜最后手册以当时团体的名字来出版发行，没有反映真正出力的那群人，我的名字有出现，因为我是编者，我也是这个计划的主要策划人。当时这计画是在两个脉络下出现，第一个是因为这个主题在当时的妇女团体里不是什么明显的主题，却是我的工作、我的同伴认为是重要的主题。第二，这个重要的主题放在当时台湾的爱滋政策或同性恋运动里来看——真的，那时没有同志，都还是同性恋——这个疾病带来的冲击加上台湾政策的道德污名化，可想而知在原来同性恋的污名之上又增加了另外一个很大的污名，就是同性恋就等同于爱滋。

这个连结不是只有发生在台湾，很多国家在爱滋早期都有同一个迷思，就是祸首是男同性恋者，所以对于当时的个别同性恋者或是小型的同性恋团体来说，出柜当然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是 1990 年代的初期，社群的发展或小型的社团事实上是非常活跃的，不管在大学或大学外面或社会性的团体，社群性都很强，跟现在网路社群是非常不同的。也就是说，以前是有实质的、地理性的、也有在生活层次相互的连结，社群感非常强。好在那时没有这么多像现在这样的认同身分要去形塑，因为形塑的过程往往造成了切割和分裂。

也是在那个机缘里，我跟黄道明认识了，后来就玩在一起。现在这种场景不常见了，但是以前如果你去一个同性恋的聚会或是社群的活动，不管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大家都玩在一起。而且我们这些二十几岁的人可以和像是王苹、丁乃非这样更老一点的人玩在一起，这就是台湾早期同性恋运动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史实。大家都正青春，有魅力、有知识，王苹、丁乃非所带动的那种学术的洗礼或是人生的历练，对于台湾第一个女同志团体的诞生是有关键性意义的。

20 年前为什么可以有这种场域，让我都可以跳出来？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两条轴线的历史交叉，一条是妇女的，一条是同性恋的。当时在妇女团体里面，女性的性或是情欲或是爱滋当时还是非常初期萌芽的议题，我们恰好踩到了，大家都知道 1993、94 年台湾发生了非常多和女性情欲相关的事情，刚好 Cindy Patton 被陈光兴邀请来台湾做演讲，那时候她担任世界卫生组织的顾问，也做相关的研究，在演讲的过程里提到了她这本书。我们看了以后就觉得在台湾的脉络里有介绍进来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台湾那时候没有任何以妇女的角度来谈爱滋的论述，而我们作为妇女运动的工作人员，自然觉得应该在所有议题上都有女性的观点。另外一方面，当时的爱滋政策其实对于同性恋社群的打击非常大，我们不能陷入这种盲目的政策或道德批判里而不管每一个人在实质关系里、生活经验到的具体处境，所以对我们而言，觉得当时很需要去把这本手册出版出来，因为它具有实质运用的价值。再加上，她那本书的切入点其实是欲望、关系、实际的行为，这也是既有的防治政策里面完全不谈的。

这本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并没有在那样的年代里说你必须放弃欲望，没有说必须禁欲，这个态度正好突破了既有政策的盲点。就像刚刚影片上看到的，美国当时的说法是，只要你是正常的异性恋女性，你是不用担心的，你是安全的。在台湾的脉络里我们的政策说，只要你们是忠实性伴侣，你就没事。那么在性关系里面，最忠实的是谁呢？其实就是异性恋的妻子。但是在婚姻关系里，性涉及了欲望、权力，它涉及了在关系里妻子可不可以过问先生的婚外性行为，这些面向通通都是既有政策不关切也不谈的，总是假设你只要在道德或理智上、意志上忠实，那就是你的保护罩。但是在实质的生活里，这个道德矛盾很容易被戳破，因为你发现确实有女性感染者，那她们是怎么感染的？如果

她不是性工作者，也不施打药物，她却感染了爱滋，你自然会好奇她是怎么了？我遇到的第一个女性感染者就是家庭主妇，非常忠实于她的先生，但是她感染了，她很困惑，但是又遭到婆婆的排斥，因为婆婆相信官方的说法，认为一定是她传给先生的，怀疑她在外面做了什么。这是当时台湾的现实。

这本小册很直接的突破了防治的盲点，直接推翻了防治的 ABC 三原则，A 就是禁欲，B 就是忠实，C 就是戴保险套，手册完全把这些原则剔除，直接去谈人际关系里的协商，直接去谈各种欲望。从当年到现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有很多欲望和行为大家都在做，可是没什么人敢把这些事情拿出来谈，甚至不可能细致的知道在关系里人们是怎么玩这些行为，他们又是怎么协商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碰触到非常多的禁忌和迷思。我们觉得这个手册在这个面向有它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希望实质的把它介绍进台湾，对于这个突破的工作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先讲到这里。

荷安珀：对于家珍讲的情况，我完全同意。我们这些做爱滋工作的人常常遇到的困境就是想要谈用药和性的问题，但是却被纠缠在道德辩论里。一般防治人员根本不讲保险套，满嘴讲的都是对伴侣忠诚与否，有没有婚外情，她们的教材也暗示，要是你是好人，乖乖的，就不会得爱滋；要是你不乖，又干了不该干的事，那你就会活该得病。美国和台湾的文化脉络可能有别，但是基本上的态度都是：感染者都是活该，因为他们干了坏事，自作孽不可活。其实爱滋教育应该是要和大众谈传染途径，谈病毒如何扩散，但是大众从防治人员那里听到的都是宗教狂热话语，都是道德训示，都是罪恶恐惧，使人不敢正视自己心底不可说的欲望。这些谈爱滋的方式从来不是直接面对，而是转着弯去恐吓人们，说他们心底的欲望会引诱做坏事，然后就是自作孽，最终染病。当时的防治宣导都是这种疯狂的对话，从不讲传染途径，也不讲性，而是

讲道德，讲恐吓。

王 苹：好，我把家珍讲的稍微跟 Amber 讲的连起来。我们是 1992 年开始接触 Cindy Patton 和她的这本小册子，然后开始翻译编写，中间还发生一些跟其他团体的恩恩怨怨，不管怎么样，我们鼓起勇气在 1993 年 12 月 1 号出版了小册；Amber 的片子 1994 年推出，拍片的时间显然和我们编书的时间差不多，非常巧合。但是我们都选择了同一个立场，就是拒绝从道德的角度切入议题，我们谈的都是欲望，都是关系。这本小书从头到尾就是爱和欲望，中文原名叫《爱要怎么做》，副标题是「爱滋年代女人的性指南」，我们从那个年代就开始在这条路上走。当年在妇女新知，我们工作室推这个爱滋议题的时候非常非常辛苦，因为这个议题非常边缘，连我们的公卫体系都觉得妇女染爱滋的人数还不够多，好像不够重要，没有想要管。我们在自己的团体要推这个议题也很困难，团体觉得我们是搞运动的，资源有限，做这么边缘的议题，社会大众都搞不清楚，我们做这个有意义吗？她们关切的意义不是真的运动意义，而是说有被看见的意义吗？如果这个运动不被看见，那就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不是你真的做什么，而是怎么样才能被大众理解。我觉得这个历史应该再重新爬梳一下，去看看这些真实的状况，但我想暴露一些当时我们内部经历的事情。我们那个团体是有理监事会的，我们要向理监事报告要推什么议题，她们同意以后拨经费和预算才能做这件事。虽然这是一本小书，当然还是需要一些预算，我们在报告的时候就必须先在自己团体的菁英妇女知识份子面前做一个教育宣导，跟她们说清楚什么是爱滋和为什么要推妇女爱滋的议题。我讲一件真实的状况，现场的高级知识份子女性问我们一个很可怕的问题，这个问题还算不上道德立场，就连基本的传染途径她们都非常困惑，她说：「我在学校工作，如果学校有爱滋感染者，他用完饮水机，现在我去用那个饮水机饮水，会不会传染爱滋啊？」各位可

以理解这本小书很有必要性，她们都需要好好看看。这是 20 年前的往事，但是我相信 20 年后还有人是这么想，我觉得我们真的要面对的是，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对爱滋的恐惧，去除不了？它是建基于什么样的国家政策？建基于什么样的民间思维？这真是需要分析的。

黄道明：家珍和王苹当时是最早投入台湾爱滋运动的，而且这个历史今天都很少人谈，但是我要给它一个历史定位，而且这个定位是现在的运动都没做到的，因为她们那时检视筛检政策除了要求匿名管道外，更抨击制造、强化爱滋污名的强制筛检政策。目前的爱滋运动老实说过了 20 多年还没有超出当时王苹和家珍的眼界，依然避谈强制筛检。这本书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有典藏，许多图书馆也有，大家可以找来看看。真的很值得一读。

梁俊文：我是中央大学英美所硕士生，今天很开心看到 *Amber* 这部片子的首映，其实我脑中有很多问题。刚刚王苹问爱滋运动的现况建基在什么样的民间思维和政策思维上，我其实有个例子，我在剧场工作，最近可能 12 月的爱滋世界日刚过，所以有很多民间团体或是剧场刚好搭上这条线，推出一些相关的戏剧制作。其实爱滋相关的戏剧或是同志情欲相关的戏剧一直以来都有，可是我最近有些不一样的观察，昨天我看了一出戏叫做「平常心」（*The Normal Heart*），它是从电影改编成剧场作品，那个剧团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也会跟爱滋感染者权促会一起合作。另外还有一些剧团也会选跟相关爱滋机构做合作，比如说萤火虫剧团就会去跟红丝带基金会一起合作，露德也合作过一些团体。除了剧场作品之外，还有很多微电影，甚至纪录片，我们姑且不去谈纪录片是否呈现了爱滋的全貌，但在 *Amber* 的纪录片里，我一直在观察她的叙事是怎样铺陈的，比如说，她提到愉悦和危险之间的张力。去年 Carole Vance 来台湾时对救援人口贩运纪录片有一个

批判，就是说现代纪录片往往变成了煽情片，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这部纪录片，我觉得很有帮助。我想要问的是，这部影片也 20 年了，当时一定有很多机构回应这部电影，经过了 20 年之后，这些机构有没有做出不同的回应？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或者是什么样的效应使得他们的立场改变了？最近我也在观察，过去何春蕤老师喊「我要性高潮」作为一种主体改造的运动模式，但是现在的爱滋运动并没有主体改造的现象，我就在想，运动作为一种指导的力量，它和其他领域比如我刚才说的剧场领域或是艺术工作领域是不是可能互相有一些影响？

荷安珀：你提了好几个问题，我一个一个来回答。这部片子推出的时候有很多争议，主要是因为它直白的支持女人——包括女性爱滋感染者——拥有性、拥有欲望，这是非常激进的。片中主要的叙事者 Janice 说，我希望拥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享受愉悦，如果我想要做爱，我就会去做。当年的女性感染者还敢说这样的话，太不可置信了。很多电视台不愿意播这部片子就是因为太露骨了，而且还有女同性恋出现在片子里，虽然没有直接谈女同性恋，但是只要有她们露脸，那就是有问题的。所以这部片子当时被视为非常危险。其中很关键的就是一开头的减害教育场景，人们被问到是否有做某些性活动，如果有，就坐下，结果除了两个还没到 13 岁的少女之外，全部女人都坐下了。虽然没公开任何私人的资讯，那个现场已经显示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女人被社会规范应该过的生活和她们实际活的方式，显然有很大差距，而这样诚实的呈现是很激进的。

很不幸的是，这部片子现在几乎被埋没了，人们也不再谈妇女和爱滋，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运动团体在推片子里当年推的这些议题。这可能是因为爱滋运动主要是男同性恋主导的，虽然也有妇女运动，但是她们非常讨厌甚至鄙视这部片子。她们说我不应该让主要叙事者说自己明知丈夫是感染者

还跟他做爱，就算主角提到这件事，我们制片人也应该谴责这种行为，反正我们就不该用这位女性的声音来讲述这部片子，因为人家看了会觉得所有女人都很愚蠢。（听众大表惊讶）是啊，我们当时听到这些评论也快疯了，真不可思议。而且女性主义运动还拒绝提供资金让片子能够广泛播放，其实有钱的女性捐款者很多，可是她们都不愿意捐，因为觉得片子太肯定「性」了，她们说拍片应该着重于女性如何受害，可是我们在片子里却说女人不一定是受害者，也不应该继续安于受害者的位置，那些捐款者当然不会支持这部片子。现在这部片子几乎没有放映的机会，因为也没有社群和情境愿意找出它来使用它，我们过去做的那种组织工作也没有了，现在经费上亿的爱滋组织也不会想要放映它，所以除了政府或机构愿意放映，这部片子已经完全不见天日，说不定根本就没多少人记得这部片子存在。此刻的爱滋运动真的很不一样了，比起 20 年前，人们现在或许承认女人可能感染爱滋，但是女人仍然不被看重，女人感染爱滋也不被当回事。

黃道明：可以把这部片放到网路平台、扩散影响吗？

荷安珀：可以啊。如果你有办法搞，就去做吧。好像中国大陆已经有人在做了，目前是以非官方的方式透过酷儿和拉拉的管道在传播，所以应该是有办法的。我和另一位制片人都会非常希望这部片子重见天日得到第二春，当年我们投入了很大一笔钱把片子拍出来，从来没赚到什么，要是人们愿意继续传播它，欢迎使用。

Nina：我想要问资源分配的问题，我是荷兰乌特列兹大性别研究博士，刚回到台湾。我在荷兰看到他们做爱滋宣导，和台湾看到的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爱滋体系是放在公卫里面，公卫则把它当作一个疾病在处理，主要方式就是防治和防毒，现在更是罪犯化；目标人口就像王苹讲的，女性的数量很少，

所以就把男同志和用药者当成是主要的目标人口。首先，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阶级问题，比如说需要免费提供保险套或是交换针头的人，可能根本没管道拿到，或者就算拿到也有危险，因为他就被列入观察名单，这对他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更别说这些都不把女人算进去，不愿意花钱在女人身上。第二个感想是，我觉得在台湾要做女人安全性行为这个工作现在越来越困难了，之前我到一个天主教高中女校去教性别平等教育，我想跟她们谈婚前性行为，告诉她们怎么使用保险套，但是马上就受到关注，我跟校方说这其实也在教女生防治性病与爱滋，但是校方就说，不会，我们的小孩是信教的，未来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当女人要去谈爱滋或性病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在谈这个病，而是就像 Amber 讲的，是在处理女人的性，就是女生可不可以主动？她们可不可以有性关系？等等，可是要谈这些，在台湾好难喔，现在还有很多宗教团体的联盟挡在前面。美国也有一些声息相通的极端宗教组织出来说要回到过去禁欲的做法，我想问，现在美国高中或者中学有没有在做这个部分？是怎么做的？我们还是必需讨论到女人什么时候决定要性，然后要怎么做，这是我觉得不可能不谈的，不能只把它当作一个疾病在处理。

荷安珀：在美国爱滋扩散的初期，我们这些性激进份子或进步份子还可以推广性教育，因为当时政府想到人人都可能感染爱滋就抓狂，因此愿意尝试任何方法教育群众。但是最后的结果也并不理想，因为那种急就章的性教育也没想通要怎么做，例如就没有持续的从幼稚园到高中的一贯性教育，而且要修这个课还得家长签字，这就不容易，再加上教育者自己本身执行性教育时也很不安，因为她们自己都没好好的受过专业训练，给了她一本解剖的书就要她上阵讲一大堆不同的性问题，真的很难。另外，性教育也有阶级之别，富裕学区的学校很有钱，就会开一堆花俏的性教育课，穷学区的学校就什么

都没有，可是政府也不管这些。现在右翼又当道，更不能讲性教育，政府也不生产发放相关的性教育材料。疾管局针对特定人口会准备一些安全性行为的材料，但是真的很少，像现在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 50 岁以上的老年人是新感染人口中的大宗，于是疾管局开始从性和老年角度谈爱滋，准备了一堆宣传单张，可是不知道要拿到哪里去发放。他们不敢去老人中心或养老院发，因为一般人不认为老人还有性爱需求或性爱实践，疾管局也不想承认老人的性行为还很活跃，这种社会因素就阻扰了防治工作的推广，真的非常糟糕。

赖丽芳：我想问的是，Amber 想要做的教育显然不是只有局限在学校吧，如果只是把它局限在学校教育来做，就会像她说的最后变成很恐怖的做法。我觉得台湾其实也正在经历这个过程，学校生理卫生教育谜一般的 14 章和 15 章过去是从来不教嘛，可是后来妇女运动谈性别议题之后就有一个从性教育转向性别平等教育的过程，因此现在不是用性教育的名义讲，而是用性别平等教育来做，爱滋也是扣在这里面来做。可是学校教育毕竟还是一个局限的地方，所以爱滋和性别平等也要家庭教育来做，那就变得更恐怖，因为总是坚持在一夫一妻、忠诚性关系，爱滋就被拿来作为恐吓的工具。我昨天听到朋友讲一个例子，他不是老师，而是在爱滋的 NGO 工作，去学校演讲，都还没有说要讲什么，学校就跟他说；「老师，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讲得可怕一点，吓吓他们吧。」现在爱滋教育虽然能够进到学校，但是就是变成这样。黄道明处理过类似的现象，像他提到红丝带基金会的「爱现帮」会让爱滋感染者现身说法，可是他的故事就会讲成过去年少轻狂，所以现在痛改前非，坚持要戒掉性滥交的习惯。这种宣导从来不会谈欲望，只是说不要。另外，我觉得也必须承认，即使教育也会失败，你跟人家对话，本身就不见得会立即有效，而可能也是失败的。

荷安珀：你问的问题都很大，我试着回答。性教育需要进行的是能够触发讨论、挑战成见的对话，但是我们的社会决不容许这样的对话围绕着「性」来发生。我认为谈性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很复杂，而是因为人类主体就是复杂的，我们渴望的和我们实际做的都很复杂。可是性教育却是总是简简单单的看表面，阴茎插这里，阴道这样打开，肛门是这个形状，如果你把这个放进那个，最后就会生小孩或者会生病。学生听完这些，懂了这三样东西，但是对自己的欲望和自己的器官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完全不知道。我们当然需要认识自己的身体器官，但是性教育也需要跟我谈性！不能只给我一堆生理资讯。生理资讯固然很重要，但是不谈欲望，不谈情色，不谈幻想，不谈危险，那就只是生物学，不是谈性。当然生物学知识有其重要性，因为你得懂自己的身体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很多人都因为不清楚自己的身体极限而付上极大的代价。但是要了解性，就需要实践它，想像它，虽然害怕它，但是仍然决定继续做下去。要针对这些方面来谈性，我们就需要一种很不一样的教育，和此刻所进行的性教育截然不同。可惜到目前为止，我没见过任何人或国家尝试往这个方向尝试。

赖丽芳：现在的教育就是保守派和进步派争夺性别平等的诠释权。我觉得这里很重要，大家在争战性道德，看谁可以拿到学校教育的主导权，可以去宣传他们认为对的性教育观。大家都在说自己对，可是两边也有一个共通性，因为背后的妇女运动历史就是奠基在「反性」上，所以就会把身体区分成敏感部位、禁忌地带、和可以开放的地带，用这种方式区分身体领土，然后教导你有些地方特别不能让人家碰到。这其实就是性侵害和性骚扰防治的语言，而这个模式可以很容易地跟保守派接合在一起，因为双方都在谈女性受害，甚至现在性少数也纳入了这个受害者的框架。既然性别平等教育就是教大家如何保护受害者的身体，保守派和进步派基本上没什

么好吵的，他们的论点是可以互通的，过去在学校里也都可以和平共处，没什么矛盾，但是现在就激烈的吵性道德，看谁可以坐主导的位置。

荷安珀：我知道女性主义老将 Carole S. Vance 前几个月曾经来中央参加性／别廿年会议，她在 1983 年编出专书 *Pleasure and Danger* 并非意外，这本书指出女性主义不能只说女人的位置充满风险和恐怖，女人也应该可以拥有欲望和情色愉悦的可能性，这样才能享受完整的生命。女人不能只躲在某个飘渺的地方，永远担惊受怕，以为什么东西就要来戳刺你，而你会因此丧命。你需要知道真正的危险何在，才能在危险中仍然找到愉悦，享受生命；你不能逃过你应该面对的事实，它们可能像乱伦一样，难以启齿，万分痛苦，但是这并不表示你就要放弃你的身体，放弃你可能拥有的愉悦。你不能回避那些可怕的事情，但是你也必须抓住想像力和欲望的可能性，以便掌握未来，要不然，人生是绝望的，而女人不应该只有绝望。我们认为女性主义必须把性、权力、欲望的可能性当作女性主义愿景的一部分，可是通常她们一听到这话就抓狂了，因此后来 Carole 被整得很惨。我认为 Carole 那本书里的东西直到今日都是美国女性主义者不愿意面对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关性人口贩运的修辞和当年反色情的修辞同出一辙，只是运用在不同的议题上，一个说是卖淫，另一个说是色情，但是语言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只讲危险和受害。老实说，女性主义比较喜欢唱衰女性情欲，不愿意想像女人的身体可以拥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王 咪：我成为男同性恋是个很有意识的过程，譬如会看着黄道明的书，让自己性基进化。可是这过程充满痛苦，譬如每次嗑药性爱后，还是会觉得自己肮脏，自我培力那么久，仍一直活在不洁、不舒服、不被爱、被遗弃种种负面感受及自我污名。我不知道我在对抗什么，如果我被人骂，我不会觉得怎么

样，可是问题是我发现我已经把那一整套东西内化在里面，当我每天去跟这些愉悦协商面对的时候，我同时也跟一些痛苦、自责、肮脏感共处，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它们面对，我也很怕，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后来就自杀了，其实我也很怕我会这么走了。我想问，我可以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我相信是脆弱让我们更愿意聚在一起，愿意给予彼此照顾和关爱，刚刚的影片最后也谈到这部分，我会比较想知道，假如爱滋让我们脆弱因此我们愿意聚在一起，那聚集在一起的这个社群长的是什么样子，由谁组成？怎么运作？然后这个自发、自己加入的社群该跟公权力国家有着什么样的距离？是不要国家的任何资源，不要相信国家的任何话，然后完全照着反方向走？好像也不是这样子，那我们该怎么去拿捏那个关系？第三个问题，影片的后半段说到爱滋其实改变了家庭成员的秩序角色，甚至情感厚度，看起来它对很多家庭是一个激进的变革。可是我们该怎么去看待变革？刚看到时可能会反射性的说：哇！很棒啊！革命啦！可是后来我就想到这样子的变革对很多家庭来说可能是不得以而为之，比如说一个姊姊可能要身兼父母的角色，在各种困苦或穷困中不得不来。那我该怎么看待激进变革带来的某种喜悦？当我理解到是有些家庭不愿意如此变革时，我该怎么在认知和情感张力中徘徊？我该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这是我的三个问题。

荷安珀：这三个问题恐怕要讲一整个晚上。对我而言，恐性文化的悲剧后果之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我们在肯定自己是性主体的时刻，也是我们痛恨自己的时刻。这真是很可怕的代价：成为性主体，而同时痛恨自己。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轻松的答案，但是我认为你的描述清楚的说明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奋斗创造一个不再恐性的文化，以便人们不会在享受愉悦的时候这样责备自己、蔑视自己。要怎么做，其实不容易想，我也没有好答案，但是我觉得你能这么

精准的描述它，这就已经构成很好的理由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努力改变这个现实，这已经不是说别人会怎么看我们而已，我们自己心中深刻的感受已经太可怕了。第二个问题有关社群。我认为真正深刻的改变应该在社群内部发生，不能等待国家来拯救，也不能靠什么专家来给我们正确的性知识，解决我们感受到的矛盾。我们必须照着自己的构想，自己来打造我们需要的运动，也只有这样的运动才能让我们问出对的问题来找到我们需要的答案。这样的运动不是一份手册或一部纪录片而已，而是群体积极的把性以集体的方式活出来，这件事只有我们才做得到。其实不是只有国家才害怕我们开诚布公的谈性，我们自己的社群也很害怕性，害怕对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想想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正面迎击这个问题。我们不做，世界就不会改变。对我而言，这就意味着这件事很可能很尴尬，很困难，但是我们必须试试看，看看会走到哪里去，我很确定那会是一个和此时此地很不一样的地方。第三个问题问的是家庭对爱滋的反应。我想爱滋的现实就是家庭发现之后必须面对问题，而每个家庭回应的方式都不一样，很多家庭会拒绝感染者，扫地出门，断绝来往。我们在片中拍摄主角 Janice 的家人，是因为他们的反应就是正面面对问题，没有怪罪 Janice 的意思，反而把这件事当成是全家人的事，因此这个故事显示了家庭里的很多互动，甚至妹妹会变成姊姊来照顾大家。但是这个家庭也因此改变了，片子里没有显示的是 Janice 全家真的改变了，全家团聚的时候他们会谈爱滋，身上也会印着保险套宣导，他们整个转变了。当然也有很多家庭努力隐藏感染的事实，控制资讯只让少数家人知道，而整个家也就因此撕裂了。在爱滋刚开始的那 10 年里，虽然很多感染者被原生家庭放逐，但是至少我们当时曾经努力打造社群，做他们的家人。虽然没有原生家庭的爱，你却可以有后来建构的家庭一样爱你，看重你，跟你一起并肩和爱滋搏斗。那是一种非常棒的模式，可惜现在很

少人讲了，我们需要创造我们自己需要的彼此照顾，不用倚赖原生家庭的接纳，我们的社群可以来补位做你的家人，这也是当年我们运动所做的努力。

黄道明：我想回应一下王琳，我觉得我也没有勇敢到哪里去，生活也充满矛盾感受，所以相信我，你不孤单，一定很多人是这样子，但怎么把这些人找出来、找出支持力量？我觉得应该是像Amber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要自己来创造一个社群，如果现在爱滋NGO组织搞的东西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要，那就自己另找方式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可能你们都已经有在做了。我觉得你们这一排人就是我的社群，还好我有这些人在，所以我才有能力在这边跟你们一起推动一些东西。就我的经验来讲，这个很重要，我相信你们有一些自己的朋友网络，那个也很重要，如何把那些扣环连结，把一些奇怪的人拉来，可能组成什么奇怪的组织，我也不知道，这个都是因缘际会的。我觉得今天这个场合就是一个可能的开始，像这种场子就会吸引、会聚集一些人来，可能陌生，可能熟人，来到这里聚集。

荷安珀：我想说，人们常以为研究性的学者或性激进份子大概都已经解决了自己的性问题，而其他人还在奋斗。这不仅是错误的认知，而且是个危险的看法，好像我们一定要已经养好了我们从社会那里得来的伤，才能在性上面激进。我觉得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我们都是带伤奋战的人，我们身上都承载着我们个人的挣扎，但是我们决定面对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痛苦，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遍体鳞伤，而是因为我们决定不投降。世界不是完美了，而是我们不想原地踏步，就算要逃走之前，也要先把我们的处境说清楚，把问题挑明了。我真的认为大家对性激进份子或性研究学者的狂想是完全错误了，但是我也觉得我们需要说清楚，我们正在努力找寻前进的道路，以我们各自不完美的方式，义无反顾的前进。现在可能没有全部的答案，但是我们的王牌就是自己。

王 萍：时间也到了，大家应该听得尽兴吧，今天谢谢大家，也谢谢 Amber。希望大家继续传播这部纪录片里反映出来的议题和精神。

[逐字稿人员—曾浚赫]

性、劳动与新工会主义

荷安珀与辛尼帕尔一席谈

杨雅婷译；何春蕤校订

辛尼帕尔：我们今天想讨论「性政治」与「劳工运动」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主题上，你显然有很多想法而且也一直积极堆动，所以一开始可否先请你谈谈你所从事过和职场中的性议题有关的组织工作¹。

荷安珀：大约 10 年前，我任职于纽约市人权委员会的爱滋歧视小组（AIDS Discrimination Unit of the New York City Human Rights Commission），那时我们就已经注意到歧视的问题和工会运动之间的关连。医护工作者组成的 1199 号工会相当关切爱滋病的问题，但是他们所知的唯一处理模式或是防患于未然的积极思考都是医护人员的「安全」或是阻隔的办法。他们谈论针扎之类的议题，也认为工会成员应该要接受安全防护措施训练，但是——如同当时大多数的工会一般——对于工会成员自己个人可能已经在日常生活里应付爱滋病这个事实，却报以欲盖弥彰的沉默。爱滋病只不过让这些医护人员更清楚他们必须在私生活与专业劳动身分之间做一选择，而这个选择让人深感孤立：每一件将他们置于险境的事物都被视为其私生活的一部分，而唯一能在公领域中处理的只有职场环境中的风险而已。工会干部们总以为我们想对话的是同性恋身分的问题，以为我们想说的是工运里有没法出柜的同志——的确也是如此，但我们真正想谈的其实是阶级、性以及他们所认为的隐私问题，而这些议题几乎没办法跟他们谈。

¹ 这场对话是1999年4月30日在辛尼帕尔于纽约大学的办公室中进行的。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在某市政工会工作多年的商务代理人，他非常害怕，因为他尚未公开表明自己的性倾向。他虽然并不自我认同是同性恋，但是曾经与男人发生性关系，爱滋病毒检验结果也呈阳性，而在那个年代，一旦带原，健康状况很快就恶化。他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他需要医疗照顾，但是另方面他也很怕自己的带原身分曝光。后来他终于坦然告知其他工会干部，结果立刻被解雇，然而工会也承诺继续支付他的医疗保险费用。由于处在孤立状态，他不觉得自己有能力挑战工会的决定，可是我就在想，这真的太恐怖了，我们不能容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我问自己：我们在工会运动之内要如何才能开始针对嗑药和性的问题进行一场不一样的对话？我们如何才能挑战工会运动？我想这场挑战首先就需要承认：我们对人类经验的理解已经和 20 年前截然不同了。过去，无论是左翼、进步运动、反战运动、或民权运动的组织工作，从未把私生活看成组织工作的构成要素。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学到，如果人们不能跟你谈他们实际在过的生活，你就没法说服他们把工运——或其他任何运动——当成归属的社群；如果人们害怕坦言心声，甚至连明确表述自己生活的具体细节都不敢，他们就不会加入工会。他们心怀不满也不会申诉；他们更不会中断生产线以示抗议。就在最需要发声之处，他们却已灰心丧志。

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最新也最有趣的组织策略并不只考量经济，而是非常具体而长期的以建立社群为目标。这些策略建基于一整套全新的对移民、性别和种族的理解，而且种族不仅包括黑人或拉丁美洲人，也包括南亚人和非裔族群。既然工会运动已经扩大认定它想要组织的目标人口，性与爱滋病带原状态等议题就变得极其重要，因为它们显示了重振活力的新工

会运动需要以主动而开阔的方式去处理哪些问题。毕竟，性与爱滋病是许多人正在对付的生命议题，而好的组织行动需要同时探讨公共生活和私密生活的复杂性：倘若你不能正视私密生活，就无法创造空间让人们面对他们所挣扎搏斗的对象、让人们可以谈论哪些东西影响了他们的经济生存。对我而言，新工会运动应该很根本的考量能不能建立一种新的不一样的感性 (sensibility)，以及更深刻而丰富的工会文化？

辛尼帕尔：这就牵涉到组织起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区分——也就是「公私之分」。这个区分把「私人的」包围隔离成神圣财产与个体自顾的保留区，以各种不明说、不指认、但却自然化的归属形式来合理化和支撑它，使得历史上一些最显着的归属形式（男性、白人、异性恋）因而（连同它们所维护的财产关系）都被定位在权力「之外」，在任何公共究责与政治挑战「之外」。

依我看来，1960 年代社会运动最伟大的成就在于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政治的」。这对公／私之分提出了史无前例的挑战，不但抗拒既有工会运动令人窒息的经济主义教条，也可能在挑战公／私区分的立场上比我们现在理解的更接近旧共产主义与激进左派的立场。过去，旧共产主义与激进左派攻击的是私有财产的正当性，却没有充分辨识出支撑此一财产制度的各种专有个人主义与归属逻辑；就某些方面而言，我们今天谈话的重点就是企图将各种形式的激进理论与实践综合起来，也就是弥合旧左派与新左派的分歧——它们各据山头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荷安珀：从另一角度来看，我们也一直在挑战那些以「认同」为基础的社会运动，要求它们面对「阶级」的问题。不过，就像工会运动在处理「认同政治」上意见分歧，以认同为基础的运动也很害怕处理「阶级」问题。女同志的爱滋病之所以在自我认定的女同志社群中隐而不见是有原因的，因为那些认同

取向的白种中产阶级女同志想要平起平坐的对象从来就不包括属于劳动阶级而患有爱滋病的歹客女同志（dyke）。中产阶级女同志从来就不想让那些只读过两年高中的 T／婆歹客成为表述女同志运动政治诉求的主体。

辛尼帕尔：如果认同运动不面对并思考「阶级」的问题，它们的目标在某些方面就变成仅止于争取享受同样的隐私特权，争取享受同样的财产特权，争取拥有某种神圣化的、合法的、与其他任何认同没差的身分，并且和异性恋或其他处境类似的人们一样被财产与幸福所保护隔离。讽刺的是，到头来，认同运动所追求的，就变成是阶级晋升而已。我们两个在这次谈话中所做的就是显示：解构我们所知的「阶级」概念而开始真正去认识阶级斗争的普遍性——连带它所有的偏差变态和物质混乱——这在现实世界里会牵涉到哪些层面。

荷安珀：是的，真正的重点在于，偏差变态并不就只是同性恋而已；偏差或差异不是可以用括弧框起来或者私人化的东西。差异，包括各种有问题的差异以及人们还不知如何谈论的差异，都深植在我们各自逐渐了解自我的方式中：它可能是我们脑中的幻想、我们穿着的方式、我们去的地方、我们所爱的人。而这些东西所构成的独特描述才能说清楚我们作为劳动阶级究竟是如何过日子的。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黑人激进大会（Black Radical Congress²）的许多组织者也在工会运动里，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但是身为工会组织者，他们并没有说工会工作「外在于」黑人社群工作或者「外在于」黑人的激进政治主张，反而积极促使工会成员一起来讨论如何创造一个进步的黑人立场，以便关照黑人社群的议题和阶级基础。我之所以这么强烈的 support 工会运动——尽管也对它多所批评——原因正在于我深知工会运动有其不可回避的存在必要。你没法把阶级从性

² 译按：1998年成立于芝加哥，是一个由非裔个人与组织构成的基层网络，旨在提倡进步的社会正义、种族平等、经济正义。

当中剔除；你也没法把阶级从种族当中剔除；你必须坚持人们拥有表现其真正差异的权利——那是身为劳动阶级的人在其生命体验之内所了解到的差异。

辛尼帕尔：不过，我立刻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性」的具体特质（specificity of sexuality）——或者也还有「性别」的具体特质。的确，根植于社会运动的新工会运动看起来正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蓬勃发展，有许多例子显示工会的组织方式非常有效地纳入了种族与民族问题，甚至私人与家庭领域——这些都是人们「身分认同」或是被体现之主体性（embodied subjectivity）的各种面向。但是在我看来，同时似乎仍然有一种「正常化」的渴求在运作。举例来说，人们也许愿意谈论「妇女议题」，但是这些妇女议题都被隔离和局限，决不可溢出「被规范之性别观念」（prescribed ideas of gender）之外。又或者，人们现在也许愿意谈论对某特定种族或民族社群来说至关重要的议题，但却必须在该社群已经界定的条件之内进行。这样一来，那些可能已存在社群内的压迫还是继续以某些奇特的方式被复制着。

性解放运动将「个人即政治」的主张发挥到淋漓尽致，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运动的显着困难之一就是它没法被当成一个真正的社群；它跨越了各种自我认定的社群和利益共同体，有时甚至将自己呈现为普遍价值，就像左翼讲经济一般。我同意爱滋感染状态与性实践等议题都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里，但是当你在一个同时也想压制这些问题的社群中进行组织工作时，那会怎样呢？职场中当然有爱滋病毒检验结果为阳性的人和男、女同志，难道不需要环绕着这些人的具体状态来进行组织工作？

荷安珀：观察新的工会运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会是很有意思的。20年前，职场中根本很少有同性恋出柜，但是现在人们都出柜了。我的想法是，劳方在运用自己生活体验的真实内容作为基

础进行组织工作时，手法必须既挑衅又高明。如果你这样搞，就必须面对许多纠结在一起的议题，你需要看到他们彼此间的差异，也看到它们如何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了职场的根本组织方式，以及人们以何种方式在职场中理解自己。

如果我是个抚养小孩的单亲妈妈，那么大家都会了解我的生活方式会很不同于那些有终身伴侣而且伴侣还有工作的人，组织者大概会愿意谈这种状况，然而人们好像认为爱滋感染状态就应该被屏除在组织工作之外。也许某些工会会采取一种比较开明的「不问就不说」（don't ask, don't tell）态度——它们可能会对组织者说：「你可以做同性恋，但是工作的时候除非有人问到，否则不需要谈这件事。」

可是为什么你不能把你的健康状况、你的性倾向、你抚育子女的方式、你与人结成伴侣的方式、你是否奉行单一伴侣制带进职场？倘若这些仍然是你在工会开会时绝不能提起的事，那么在我看来，你还没建立起什么和过去不一样的工会运动。我认为人们之所以「信任」工会，而不只是「需要」工会，唯一的理由便是因为工会名符其实地使他们壮大，使他们能够了解并掌握自己的人生。我认为人们要是不把工会看成是自己文化的一部分，那就没有任何工会能够延续；这里说的文化，是一种能为不同个人提供不同动能的阶级文化，人们不必彼此完全相同，然而对应其个别社会经验的诸多特定议题必须能够自在浮现。毕竟，职场的阶级状态是工人共同经验的现实，如果这个现实促使工人开始组织起来，那么工会就不应该要求工人组织者把自我的某一部分留在家里。

辛尼帕尔：国际服务业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组织洛杉矶郡居家护理人员时打了一场大胜仗³，但是之后它却推出一份政策指令，大概的意思是规定男性组织者

³ 1987年开始，洛杉矶的7万4千名居家照护工作者透过国际服务业工会的支持，争取成立工会，1999年2月获得胜利，赢得代表权。

不得在身上有明显易见的穿洞，不能戴耳环、舌环、眉环；而女性组织者不得在耳朵上打一个以上的洞。另外，指令也对服装做出明确规定：男性组织者必须穿西装外套、打领带等等。这一切要求都预设了工会所要组织的对象主要是拉丁美洲裔工人，他们信奉天主教、固定上教堂、态度保守等等，而组织者相应需要以一种素净、沉稳、体面的样态呈现自己。

虽然这看起来像是芝麻小事，但对我来说却是个耐人寻味的例子。因为它同时显示了新劳工运动的潜在文化激进性（毕竟，那些在身上穿洞的组织者究竟是谁呢？），以及在策略性的盘算下这个激进性如何被正常化，或者新的阻碍如何被架起来。我想这些盘算通常是工会领袖们在务实（甚至有些犬儒的）基础上做出来的，他们以为要赢得劳工忠诚就必须部分采取「消极的做法」，包括不要冒犯劳工，尽量配合劳工已有的立场，不要提出薪资以外的挑战，结果反而没有更基进的去发动劳工不断拓广对其人际关系圈的想像。我觉得组织工作不该以简化趋同的概念为基础，而应该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在透过不同的再现与欲望模式，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人生体验；但是我们也参与在同一场斗争里面，我们不能为了要同情并了解彼此就强迫自己想像大家都是一样的。

荷安珀：我从事爱滋工作 15 年所听到的情况也是这样——大家都战战兢兢，不能太直白，要表现尊重就一定要略过任何可能被认为在挑衅或挑战他人的事情，特别是任何关于你自己但是可能令你的谈话对象不悦的事。我必须说，那种策略完全没用：假装爱滋病毒不在这儿，假装身上的穿洞看不见，假装同性恋不存在，以为这些事情只在别人的社群里、别人的邻里中、别人的议题里——抱着这种想法的人根本就不可能了解真实的状况。其实每个社群里都有让人置身危险或是让人们变得刺激、有趣、时或脆弱的事物。

辛尼帕尔：这就是所谓「正常」（normalcy）的谎言。

荷安珀：没错。这谎言就是以为某些议题只会发生在某些人身上，或只发生在某些情况下。有些组织者不想处理爱滋的问题，并不是因为爱滋没持续在社群中肆虐，而是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有能力谈论例如某个他们正试图说服加入工会的女人同时搞了三个男人却完全不晓得该如何坚持男人使用保险套。组织者不提这些事，也就绝口不谈这类让女人陷入险境的议题。另一方面，职场可能是这个女人唯一会关注的机构，也是她唯一获得资讯的地方，倘若这地方不提供和她私密生活相关的资讯，那么她便完全无从取得资讯了。

辛尼帕尔：我想抛出一个平行的例子。我在耶鲁大学当研究生的时候也从事组织工作，当时我们就不能在组织里谈堕胎，「如果我们对这个议题采取任何『正式』立场，工会就会分裂」，这种情绪有效的遏止了工会在公共领域中成为政治实体：根据这种说法，工会不能采取政治行动，因为就成员来说，工会的性质并非政治的，而是经济的。当然，要是决定在激进民主文化中为自己挣得一席之地，进行你刚才所说的那种组织工作，就某些方面而言，你就是在走一条阻抗最多的路径，因为你主张工会应该处理所有影响到工作者实际生活体验的议题。

荷安珀：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是，左派（不只是工会运动）怎么会没能力理解欲望如何影响了职场？某个人会来跟你说，工作场所的组织方式和「性」毫无关连，可是你立刻就想到职场上所爆发的各种状况——某人怀孕、某人外遇、某人发现自己爱滋感染、某人在工厂后面跟人家发生性关系——这些爆炸性的议题才真正驱动着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私密生活是极少数不必全然透过经济来协商操作的事情，而人们体验到最大希望和最深绝望之处，正在这些个人生活的层次——透过「性」的中介，而且牵涉到他们与子女、伴侣的关系品质。

辛尼帕尔：也许更令人伤脑筋的问题是：所谓实践反种族歧视、反性别歧视、反恐同心态的政治诉求到底是何意义？这在组织工作的情境脉络中更为棘手。我们一般都倾向于从立法、禁制和言论检查的角度来理解这些问题，而你的提议——将欲望带进职场并且对差异抱持敏锐察觉与细心体会的态度——基本上是个和立法无关的模式。反种族歧视意谓着：带有种族歧视的玩笑、刻板印象和夸张描绘在我们的职场中都是不被接受的，可是显而易见，粗俗而包含种族歧视的夸大描述依旧继续出现，甚至在许多工作场所有愈演愈烈之势，性别歧视也没因为性骚扰惩治条例的立法而消失无踪，至于恐同心态，现在也还是绝对的常态。身为组织者，你要如何将这些东西连根拔除？当你坚持不接受这些行为和语言，拒绝让它们成为运动的一部分时，你要如何同时在工会内部培养一种不同的文化？

荷安珀：我想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问题。工会运动反映了每个人在社会中试图应付的各种矛盾和复杂状况，工会运动当然不应该为那些规范负责，但是也不能自外于那些原则，因为不管它如何选择，它的立场总是会遭遇质疑：处理种族和种族歧视的问题了吗？处理性别和性别歧视的问题了吗？处理性的问题了吗？处理那些具有政治意义的争议议题了吗？要是没有，通常都会付出惨痛代价。

辛尼帕尔：即使现在也还在付出惨痛代价。

荷安珀：即便如此，很少有机构像工会运动这样运作，它不但代表多样的选民，而且环绕着「阶级」组织起来。正因如此，我认为各工会都需要积极处理性和性行为的问题，因此我对任何组织行动都同样要问它是否拥性，它是否了解人类欲望的组织原则基本上环绕着伴侣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这就包括堕胎、怀孕、生殖健康，以及各式各样的同性恋，而不仅是那种看起来像异性恋、只不过发生在两个女人或两个男

人之间的情况而已。我在这里说的，是真实的人们所做的真实的事，这些都不是枝微末节。如果劳工运动能满足这些，这个运动就能够理解性议题是如何深植于人们的生活里，以及人们是如何因为「性」而在职场中变得非常脆弱，容易被攻击。

许多人认为这些都是社会议题，不是工会的议题，但对我来说，一场重振活力的工会运动必得是一个社会世界（*a social world*）。

辛尼帕尔：的确。重点在于创造真正的另类方案，建构确实如你所说的「另类的社会世界」。美国的阶级论述太过贫乏，我们对于阶级的意象在某些方面可能都只是先前时代残留下来的宿醉遗绪，很多观念都传承自比较老旧的思考模型，预设了典型的劳工是个男性的工业劳动者，而且身兼一家之主，所以你刚才说，要在这些化约的阶级观念之外重新想像工人「团结」。现在，我们以「阶级」作为物质场域来进行组织工作的时候，就必须把你刚才说的那些包入讨论，而且不是把它们看成一堆林林总总凑在一起的不同议题；我们必须看到，物质的、具体的现实总是借由我们刚才所谈的这一切事物而被经历、被体验。就某种意义来说，这就是「阶级」。

最近出现了许多关于工会民主的讨论。其实美国的工会运动在冷战期间已经日益僵化，许多工会的管理方式弱化了内部民主，最终工会也接受了和政府及企业签订经济利益挂帅的合约——这些都很根本的使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无力面对 1950、1960 年代的黑白种族矛盾，后来也没能处理美国生活中那些因为与民主精神抵触而衍生的议题。我们今天要指出的就是美国劳工运动的重大失败：工会运动没能发展出具有重要意义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一种平行的公民社会，如麦可 · 戴维斯（Mike Davis）所提议的⁴

⁴ 麦可 · 戴维斯，〈为何美国的劳动阶级有所不同〉，收录于《美国梦的囚犯：美国劳动阶级史中的政治与经济》。Mike Davis, "Why the U. S. Working Class Is Different," in

。工会运动基本上就没能发展成另类空间，来处理那些企业文化、华盛顿特区政治圈、或者地方政府所不愿意处理的迫切社会问题和需要。

因此我们必须在工会运动内部找一些方法来思考并谈论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有一些苗头出现，但还是暂时的，因为每当有征兆出现，似乎也会有一股退却的冲动产生。让我不安的是，有关「新工会运动」的讨论依旧透露着一种想像力的局限，彷彿美国劳工运动的振兴应该是某种从上到下、从约翰·斯威尼⁵竞选工会领袖而来的东西，这就忽视了本来就活跃在其他场域的众多基层组织者所注入的能量。今天，这种激进的能量在每所大学的校园里都有，环绕着劳工与就业议题、抵制血汗工厂运动、关注教育资源的学生激进运动、致力于废除种族歧视与监禁的运动、反警察暴行的抗议行动等等……。

荷安珀：还有像纽约市新移民族群计程车司机的动员也产生了类似的能量。

辛尼帕尔：没错，而且那是以种族与族群、性与性别为核心来进行的组织行动。这个发展令人深思，因为它彻底反转了我们从老旧的绝大多数是白种男人的新左派那儿听到的那些令人作呕的「认同政治 vs. 阶级政治」的论辩。这个新的做法反而主张，阶级政治的重振力量其实来自各种各样一直持续进行有趣创新的组织行动。

荷安珀：我们已经觉悟了，平板单调、缺乏想像力的「阶级」定义没法促进组织工作；它有可能暂时因为有个特别优秀的组织者、或者当时有些极端的需求而在特定的运动中获得成效，但长此以往终究会失败。能不能创造新的组织和壮大工会，有

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the U. S. Working Class (New Work: Verso, 1986).

⁵ 译按：John Sweeney于1995-2009担任AFL-CIO主席。

赖于人们动态的去理解到底是「哪些人在这个阶级里」。

工会运动需要认清，人们所过的物质生活是非常复杂的，身分认同并不僵固，也不总是以显而易见的方式被界定，因此工会需要去复杂地理解多样性。如果你想把所有的玩家聚集起来共商大事，那就必须了解这些玩家是谁，他们的议题是什么，他们个别的议题如何影响他们看待共同议题的方式。工会运动要是没法认清这一点，就等于局限了职场的意义，坦白说，这种运作模式跟雇主没两样：两者都不想要差异，只想利用差异来分化劳工，总是想剥除劳工的个别性，以便把工人搞成能被控制和操弄的「纯粹劳工」。

工会运动想要组织的新对象在人口分布形态上和疾病防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简称 CDC）所确认的爱滋病毒感染高风险族群几乎一模一样，也就是——贫穷的劳工。那是爱滋病毒肆虐的地方，是单亲教养发生之处，是生养小孩或试图堕胎的地方，也是种族歧视或非法移民之所在。

辛尼帕尔：也是犯罪议题浮现之处。在此，我们面对了新工会运动的极限和考验。在美国，种族化（racialization）和各种民权的剥夺主要是针对非裔美国人，今日延续这种迫害的首要场域便是违法（illegality）与监禁（incarceration），攻击的是有工作和没工作的穷人，也因此明显威胁到劳工运动，特别是半强迫性质的监狱劳动此刻也有逐渐增长的趋势。然而，大多数工会却极力回避这些问题，坚决排除罪犯。

荷安珀：我从事监狱工作至今已 30 年，在和那些服刑的妇女一起工作时，你就会看到人们在别无选择之下所过的绝望人生。「我能怎么办呢？难道要因为害怕一旦提供口交赚进 250 美元就有可能被捕，所以就不干，让孩子们挨饿？」当人们一贫如洗时，他们距离违法和监禁就只有一步之遥，这就是现实，他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想要建立对种族和性别的新理解，就

必须面对上述现实。

问题还是一样：工会运动能否从各种细微复杂的角度来了解经济正义与不正义？抑或它还是要自我设限，回避监狱的议题，说它「跟我们无关，没什么好说的，我们也不愿意介入。」

辛尼帕尔：你把这个面向和你稍早提到的疾病防制中心统计数据摆在一起，就会看到相当值得注意的汇聚。性工作、街头毒品交易和嗑药是爱滋病传染风险最高之处，过去 20 年都被警方锁定施以各种形式的严密管制，而在这些场域里总是有大量妇女与有色人种。这种集中不是什么巧合，而是很可怕的趋势。

荷安珀：莱克斯岛（Rikers Island）监狱的妇女区有 500 名囚犯，其中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爱滋病毒检验结果呈阳性。这些女人未来都将回到社区里，都会需要找工作，她们将是工会运动未来要组织的对象，可是各工会将如何看待这些妇女的爱滋感染状态？又将如何处理那些掌握她们孩子养育权的寄养计画？

很有意思的是，在墨西哥边境那些美国工业设厂的小城里，许多在装配线上工作的妇女也兼差从事性工作，以补贴她们低到不可思议的薪资。坦白说，那种情况不只发生在美墨边界，也出现在纽约州的首府阿尔巴尼市（Albany）和纽约市的南布朗克斯区（south Bronx）。人们就是得做必须做的事，好让自己有个遮风避雨的屋顶，或为小孩买双鞋。在我看来，工会别无选择：如果它想要组织各行各业因为没被组织而受苦最深的人们，就必需处理种族、移民、爱滋感染状态和性等等问题。

最近，我一直在从事妇女的爱滋病预防工作，在男同志健康救援中心（Gay Men's Health Crisis）的爱滋病毒预防妇女服务处（Women's HIV Prevention Services）担任全国实地执行主任。但是，要等爱滋组织来做预防工作，那就已经太迟了，当一名妇女找上某个爱滋组织的时候，她已经感染了

病毒。所以，要真的彻底做预防工作，就必须搭配在这些妇女生活中可能并不与爱滋病有所牵连的主要机构——像是教会、工会运动、发廊、街坊公园、干洗店。你必须到人们实际过日子的地方去。如果工会训练计画纳入关于保健和积极预防的健康维护，而且如果在训练中积极讨论结成性伴侣、性病、爱滋病毒、怀孕，以及怀孕后的选项等议题，那么爱滋便会是职场上可以讨论的话题。

辛尼帕尔：在目前的雇主—员工战争中，健保是个首当其冲的议题。

对工会来说，激进的健康计画至关重要，不仅要争取那些正在被蚕蚀的权益，更是为了保卫劳工的健康。如果我们向大家都生活在其中的企业文化掀起一场更深刻的战争，那将会为许多人省下许多不必要的医疗花费。

荷安珀：不只省下一大笔钱，也会救活许多性命。例如我们很需要谈健康方面的问题，可是人们不想谈，要是在职场中承认你有酗酒问题或忧郁沮丧，那会很难，也有挑衅意味。然而在白人劳动阶级社群里，酗酒一向被承认是问题，因此，过去20年戒酒方案在工会中已变得相当常见。如果涉及更具社会争议性的议题，例如种族、性别和性有深切关联的嗑药、爱滋病、或家庭暴力，工会就不会愿意优先谈它们。以家庭暴力来说，这个问题必须和种族歧视一样被纳入工会的诉求中，因为它会分化职场；男人要是不把自己的太太当人看，相信我，他也不会对手下的女同事有多好。这些议题是不可分割的，社会态度自然会反映在人际关系上。如果我在家里或街坊邻里中是个种族歧视者，那么我在工作上大概也差不多。要是没人当面质疑我的态度，而工会也不予追究，那么工会便失去了处理这个问题的机会。

当你说出自己的看法时，人们可能不会赞同你。但是若你已经建立起真正的人际关系，让人敬重你的人格，那他们就有可能和你讨论，而不同意见也可以表达出来。虽然既不

简单也不容易，我们还是需要创造这种交手（engagement）的场合。

辛尼帕尔：我们谈的就是在工会运动里创造一种改造自我的政治文化。这就像激进教学（radical teaching）一样，为人们提供「出口」（exit），使他们得以脱离各式各样对自己和别人造成严重损伤的行为、态度与身分认同。「出口」代表某种可靠的替代选择，是一种不一样的、令人能力增长的存在方式，而且你必须能够展示、再现、并不断重新表述。当然，首先你自己就必须拥有真正的可信度才能做到；这不是由上到下的立法（legislation），而是平起平坐的说服（persuasion）。

荷安珀：是说服，也是交手。我并不要人们赞同我，但是他们必须跟我对话。作为好的组织者，我能做到我所做的事，不是因为我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而是因为我愿意开诚布公的讨论困难的问题，让人们有机会分析为何有些事情深埋人心，却又同时深深困扰。

辛尼帕尔：当工会不和群众对话时，良机已经错失，而工会组织群众挑战经济体系时最怕的就是这样。有些人以为和群众对话时必须维持其他因素的稳定，否则就没办法打这场仗，但是事实正好相反，我们的性格可以在瞬间完成惊人的改造。事实上，人们在抗争时可能被彻底改变，当他们看到别人积极举牌抗争时，突然间，整个世界就被重组了。而如果你已经设法把种族、性别和性等事项串连起来，显示它们是核心议题，而不是试图将它们再私密化，推得远远的，那么当场确实就会出现一个「替代的社会世界」。相反的，如果你仅仅笼统的说：「我们抗争的对象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来到这里，而我们想要的东西也一样」，那就浪掷了大好的机会了。

荷安珀：的确，工会运动应该已经见识过工主义最缺乏想像力与最现实的时候会形成什么后果，那就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而只有某些白种男人被视为工会政治唯一可靠且重要的发言人

。我觉得耐人寻味的是，工会运动往往喜欢呈现其激进的历史，但是却不想保留它任何激进的政治主张。举例来说，人们会谈论当年密西根州弗林特市的静坐罢工事件⁶，但若你提议在自己的工厂静坐罢工，工会就会给你一大堆不能这么做的理由，要你与管理阶层保持对话。但是你也知道，如果你想为争取经济正义而发声，就必须正面迎战那些制造不义的力量，这表示你必须愿意提出人们在日常生活现实中经历的那些违反正义之事。不具远见的工会运动或许仍能为没有经济权力的劳工争取某些东西，然而唯有当运动给予人民改善生活的真实希望时，它才能持久并成长。

我们大多数永远不会成为创意工作者，不会去拍电影或写书，不可能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获得自我满足。我们大多数会在职场里非常投入，而我们的工作品质与我们的生活品质息息相关；当我们的劳动为我们带来光荣时，我们也以身为劳工为荣，我们就在这个职位上感觉自己的工作还不错。对于我们这些出身贫穷、在成长过程中饱受惊吓的人来说，工会运动代表一种可以开始为自己发言的方式——在这个我们认为自己毫无权力的地方。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漠视其他也代表我们的场域而只认定这个违反我们意愿、令我们噤声之处？如果工会运动能涵容攸关个人身分认同的所有场域，人们在情势困厄时才会想要留下来，他们会帮忙在工会运动中建立信心，相信工会运动能把职场重组起来，其核心不再是激烈对立，而是我们共同经验中最宽厚慷慨的部分。在那种运动中，劳工为了付房租而被迫接受某项工作时，再也不必因此受辱。

工会运动必须勇敢拥抱个别劳工通常不敢坚持的远见，而这种远见的政治主张并不只是就某个主题做些微小的调整而已，其重点也不在于我是否可以在上班时牵女朋友的手

⁶ 译按：1936至1937年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在通用汽车公司大厂所在的密西根州Flint市，以突破传统、静坐占据工厂的方式，对抗其雇主通用汽车公司。最后在州长调解下达成协议，获得公司承认，开启工会主导的新纪元。

——尽管这种事也并非微不足道。重点其实不是那些象征的动作，这个运动应该反映出人类生命和潜能中最棒的部分。你必须扪心自问：除了工会以外，这样的远见还可能在哪里出现？

辛尼帕尔：我们今天的讨论聚焦于目前工会运动的状况以及上述议题，这是正确的，因为眼前是非比寻常、极度令人兴奋的时刻，它衍生自劳工运动所激发的新思维、新行为和新认同，然而同时我们仍然还有倡议政治（advocacy politics）以及新的、超越工会主义范围之外的诉求。既然你从事过关于爱滋病与性的组织工作，对于这些场域的运作，特别是关联到我们所讨论的议题与工会运动方面，你有什么看法？以同志权利运动目前的具体展现而言，在何种程度上它处理了阶级政治与就业的议题，而且把它们视为核心议题？同志运动是否需要往这个方向努力？

荷安珀：我们今天之所以进行这场对谈，不仅是因为现在的工会运动创造了一场关于希望与组织的新对话，也是因为驱动各种社会认同运动的阶级、种族和性别政治因素已经愈来愈明显暴露其局限。对我们这群曾经因为不知道如何以出柜的身份参与工会运动因而加入认同运动的人而言，上述限制尤其明显。各种具有倡议性质的社会运动——酷儿运动、性权运动、爱滋运动——愈来愈在根本的层次上由属于支配阶级的人士来表述，以一种无止尽令人生气的方式来鼓吹它们自己的阶级诉求。就拿军队的议题来说好了，那些与柯林顿总统「不问就不说」政策对立的酷儿组织说，该政策歧视了西点军校的男同志。他们没想的是：「军中同性恋大多数是什么样的人？」其实大多是贫穷、有色人种，这些男女之所以加入陆军或海军或空军是因为他们老家没有其他的就业选择。对军队里的同性恋政策感受最深的其实是底层的步兵，是驾驶直升机的死玻璃男同志（faggot），或是开补给卡车的歹客女同

志（dyke）。不让这些人有代表性成为军队同性恋权益运动背后的驱动力，正恰恰反映了这些运动的阶级政治以及在背后推动宣传活动的经济利益。

我们很多人之所以投入爱滋运动，就是要回应社会运动的阶级政治，因为在爱滋工作中，你必须有能力应付种族、阶级与性的复杂纠葛。根据我的经验，同性恋运动主要的实质讨论都局限在小部分享有特权的同性恋社群所关心的事情上，这些同志运动的政治主张都是由主控运动者的经济地位来决定，而他们眼中的同志议题在在充斥着矛盾：你问，移民是同志议题吗？「不是！」组织职场是同志议题吗？「不是！」监狱是同志议题吗？「绝对不是！」

对我们来说，之所以对新的工会运动报以强烈的厚望，是因为我们希望「归家」，我们想要把自己所具备的技术和才能带进更大的组织运动中——工会运动必须接纳各种劳动阶级的社群，而我们也是那些社群的成员。至少在我的人生经验里，如果做女同志，你只有两个选择：保持沉默或离开。在我出身的那些底层社群里，老实说，那就是你全部的选项；你可以做同性恋，但是在工作场所动不动就被找麻烦；要不然你就选择离开，试着跟其他同志生活在一起。现在，情况已经大不同了，职场的互动模式已经变了，而这正是因为我们做了许多努力去改变有关女同志与男同志生活的说法。如今，同性恋议题嵌植于十分广大的世界中，大多数同性恋属于劳工阶级，他们在生活中所面对的所有议题都是劳工阶级的议题，因此他们需要能够将酷儿身分的、劳工阶级的自己坦然展现在工会中，展现在职场中，展现在爱滋病防治中，展现在对于性的讨论中。我们不是在这些场域「外面」的积极份子；就我们的性别、我们的肤色、以及我们的性倾向而言，我们绝对是这些运动的骨干。那么工会运动究竟要不要我们这些劳工？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如果想要我们在工会里安身立命而且能够坦然出柜，工会就必须认识到，我们

的诸多认同也反映了我们做为劳工阶级的生活方式。

另外，将性工作者组织起来也必然是劳工运动的一部分。像性工作这样的议题并非无关紧要、只对少数人产生影响；它们是广大的社会议题，牵涉到许多劳动阶级的穷人，我们需要能够如实再现我们自己真正的身分与生活。我在进行爱滋病组织工作时面对的妇女们，大多是那些在居家照护运动（home health-care movement）中被组织起来的妇女，她们在医院里做着报酬少得可怜的工作，或者正在设法拿到高中同等学历（GED）只因为她们高中时期在牢里待了六个月而没能毕业。那就是她们的真实阶级面貌，但是她们也是女同志，两者同时存在，没法二选一。她们需要的是薪资说得过去的工作，大部分曾经历厄运而手里没有高中文凭，18岁前就生了两个小孩，正努力在因为自己女同志身分而引发冲突的家庭里生存下去。工会运动必须帮助她们应付上述所有问题。她们是一群对于「人权运动组织」（Human Rights Campaign）或「全国男女同志工作小组」（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 Force）一无所知的人，也许她们每年参加同志游行（Gay Pride）只是因为地点方便或者刚好有时间去，大部分根本不知道天下还有男女同志社区中心这种东西。

辛尼帕尔：我们需要认清，作为抗议动力的一部分，同志运动与黑人民权运动率先推动的各种形式的文化创新与认同展演（identity performance）已然改造了公领域，创造了情感与气质倾向的空间（emotional and dispositional space）让「差异」得以公开展现。这是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但是同时令人惊异的是，各种政治运动却日益窄化，将其关注逐渐局限于婚姻保卫战、平权行动⁷、以及被极端淡化的非歧视政治（nondiscrimination politics）事务。

荷安珀：如果我们要有进步的政治，那么工会运动就必须参与这场对

⁷ affirmative action，译按：指美国政府机构、企业和学校优先雇用或录取少数民族、女性等弱势族群以反制歧视的积极行动。

话，探讨在目前这个历史时刻「进步的政治」究竟是什么意义。「进步的政治」现在所含的意义，部分是指投入平权行动与非歧视等事务，这是无庸置疑的；但它也关注我们的文化如何僵闭、化约、和疏离人类表达与经验的各种可能。我认为美国文化即将针对这些议题经历一场大爆发，而关键在于工会运动是否能掌握此爆发的威力，并将它表达出来。

辛尼帕尔：在「正常」的面纱之下掩盖着含有各种负面元素的文化：种族仇恨与暴力、自我厌弃与绝望、缺乏处理差异或揣摩差异的能力、对于军国主义的绝对执迷……

荷安珀：而且它们正一起扼杀工会运动明知道自己应该去组织的多样文化与社群。正因为这样，各工会必须面对爱滋病以及监狱的问题，因为监狱反映的正是我们文化里的种族歧视，它体现了种族歧视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辛尼帕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谈论的议题都无可避免地必须超越平权行动的眼界。重点并不仅是针对二十世纪后期的诸般反动限制（reactionary constraints）构想出一种恰当的回应，而在于积极辨识当前这个时刻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已经转变了的具体形式和状态。

荷安珀：是的，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已经有了全球性的转移与改变，而美国很少有机构能从全球的观点来代表阶级发言，但是工会运动可以，因为它知道自己必须应付全球市场的冲击。美国境内的工会组织工作很根本的受到全球事件的影响，因此必须学会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阶级问题。目前，世界正环绕着种族、性倾向与性别等议题进行激进而极端的改变，这种改变并不只发生在美国。开发中国家正受到爱滋病毒蹂躏，非洲南部的劳动力逐渐被彻底摧毁，因为死于爱滋病的就是劳动阶级；横越中东地区的货运业也因爱滋病毒而萧条，劳工丈夫感染爱滋病毒，其妻子则产下爱滋病毒检验呈阳性的小孩。这一切都会反映到美国这里，也会反映在别处，但是

这些复杂的议题却被精巧的呈现为好像落在一般讨论的界线之外。这样一来，爱滋病就只是一堆秘密与禁忌，就只是纠缠在欲望中的无力感。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在工作场所做的事和在卧房里做的事有这么大的区别和距离？

有件事总令我惊奇不已。人们之所以愿意对我倾诉，是因为我是同性恋，也因为他们对于同性恋的想法：他们觉得同性恋是被禁止的，所以就可以和我这个被禁止的人分享他们觉得自己身上被禁止的事。你从这种对话学到：每个人都在做一些被禁止的事，而我们都深刻的活在这种被禁止的主体性（*forbidden subjectivity*）里，都背负着或幻想或秘密的重担。在我想创造的政治运动里，这些众人皆懂、日日活着的体验将不会被预先设定不属于职场对话的范围，反而有可能因着它们与当下发展中的趋势相关与否而被赋予价值。如果这些经验可以被纳入职场，那么「偏离常轨」（*deviance*）所指涉的就不会只是同性恋，而是所有的欲望。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文化从未给予人们任何有关欲望的权利——只给了某些男人欲望的权力——我们的文化也从未提供相关的智识或训练或教育让我们认识彼此的身体，认识我们各自以何种方式活在自己的身体里，以及我们如何透过自己的身体来感受欲望，结果到头来总是女人、穷人、酷儿们被迫付出惨重代价。如果这些人是工会运动想要组织的对象，那么工会就必须处理这些具体的身体、及这些身体所承受的文化影响、以及我们透过身体所体验到的愿景。工会运动绝对不能自外于上述这一切。

辛尼帕尔：说得真好。我们就此打住。

（出处：Hollibaugh, Amber and Nikhil Pal Singh. "Sexuality, Labor, and the New Trade Unionism." *Social Text* 61, Out Front: Lesbians, Gays, and the Struggle for Workplace Rights (Winter, 1999), pp. 73-88.）

爱滋防治的解放政治

当欲望碰上公卫

时 间：2015年12月20日（日）下午2-5点

地 点：台北市青岛东路8号NGO会馆一楼

主持 人：黄道明（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引言 人：裴 新（Cindy Patton，加拿大 Simon Fraser 大学）

吕祀贤（爱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理事长）

黄道明（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荷安珀（Amber Hollibaugh，纽约酷儿经济正义组织）

现场翻译：何春蕤、丁乃非

在本场难得座谈里，自1980年代初期即投身爱滋运动的酷儿老将荷安珀（Amber Hollibaugh）与裴新（Cindy Patton）将分别从欲望及美国同志健康历史的角度出发，分享她们肉身道成的防治经验及学术研究，为现下的台湾处境提供一个深具左翼视野、根植于改造爱滋情感结构的行动参照点。而在本地脉络里，吕祀贤将省思「治疗即预防」方针下生成的感染者主体，反思此刻爱滋运动的「去污名」格局，黄道明则将探究已故导演田启元的剧场世界，看待他诚实面对自我及历史的左翼实践如何介入社会体制、寻求「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一个正视欲望复杂性及其危险性的防治观点能对现下道德化的个人防治框架与减害思维提出何种挑战？1970年代的美国同志健康发展史又能对现下与公卫急速结盟的全球同志健康倡议专业有何启示？治疗挂帅下，爱滋运动该如何面对爱滋常态化所掩盖的深层规训及罪罚？欢迎一同来探索酷儿历史政治实践、发掘可能性！

黃道明

我是黄道明，今天我们的卡司阵容非常坚强，请到两位从1980年代开始就投入爱滋运动的资深酷儿老将，和一位从事爱滋感染者权益

运动的本地朋友。我先介绍一下今天这几位发言人。第一位是Cindy Patton，她是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教授，也是世界知名的爱滋研究者。她擅长的是健康照护、酷儿研究和文化研究，相关的著作相当多，每一本爱滋专著都相当有影响力。过去她曾两度到中央大学英文系讲学，是我们中央性／别研究室的国外成员，三年前我们曾请她到中央性／别研究室的「爱滋治理与在地行动」研讨会，在那个会上，她对现在全球「治疗即预防」这个方针提出了相当深刻的批判，那篇论文也成为是现在理解全球爱滋布局的必读之作，我们已经翻译收入论文集里。在那次研讨会上对Cindy论文做出非常犀利的在地回应的，就是我身边的吕昶贤，他涉入爱滋工作已有10年了，经验非常丰富，目前是爱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的理事长，今天会延续他对治疗和预防的观察，对本地的局势所产出的感染者主体提出分析。最后这一位是荷安珀，荷安珀于1980年代初期担任纽约市政府人权委员会反爱滋歧视部门的教育主任，1990年代曾在gay man's health crisis这个相当大的同志爱滋防治组织里面担任女同志爱滋防治的计画主导人，然后担任纽约酷儿经济正义组织（Queers for Economic Justice）的执行长，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女子学院的资深研究员，是一位广受敬重的社运组织者。两年前她被邀请来台担任我们「小心公民社会」学术会议的主题演讲，昨天也带着她拍的获奖纪录片*The Heart of the Matter*在台首映，非常精彩的影片，非常棒的座谈。

裴 新

为了具体理解1970年代的同性恋性文化，过去6年我阅读了许多不同种的历史资料，包括1967年到1980年代前期的诸多小说、杂志、报刊、男同志健康团体的公共和私人文件、甚至男女同性恋出版色情材料。我之所以重新阅读这段时期的史料是为了对抗一个普遍的看法，因为许多人都说1970年男同志的性与用药文化全然只是享乐而且不负责任。我个人一向认为主流的这种判断是错误的，但总是要在年岁渐长而我能和我的记忆保持足够距离时，才可能回头用1970年代的角度来研究1970年代。

爱滋病当初一爆发，就出现了对1970年代的一种描述，说那个年代淫乱狂欢，不顾个人行为后果，因而导致爱滋传染流行。这个说法也为高压强制的国家和公共卫生政策提供了正当性。1980年代男同志虽然发展出对抗的论述，却把1970年代描述为刚冒出头但还不够成熟的同志社群的一段不幸历史，以便对比现在成熟而负责的男同志想要的是同志婚姻，而不是多性向的实验型实践。这样的说法自然忽略了性解放运动里相互积极照顾和草根发明健康实践的氛围，把在爱滋危机年代还继续追求性解放政治的人都说成是自取灭亡。

其实1981-1982年左右就有了把同志运动分成两支——激进派和温和派——的说法。当时从内部书写同志运动的第一批历史就曾指出，运动组织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一个是1969年的石墙事件，另一个则是1973年《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删除同性恋的时刻。石墙事件被说成是激进解放派所为，手册去除同性恋则被说成是温和平权份子的成果。一直到今日，两股同志运动对立竞争的说法还很流行。然而回头看1970年代的历史文献，其实很难做这样的截然区分，因为当时有很多股不同而交织的性政治搞法。我们或许应该问的是：哪些形式的政治在那一刻必须被忽略，才能写成两股对立竞争的剧情？如果那些被掩埋的政治还能原样被找回来主导现下国家和公卫回应这个传染病的策略，那会开启怎样的另类愿景？

我想简短的描述一下我看到的同性恋出版品。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20世纪初开始，美国就有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共产党或无政府主义同性恋团体，同时也有温和的性权团体，它们都出版了各自的地下通讯。1970年代美国的言论审查法开始修订，各式各样的报刊越来越可以自由流通，各种同性恋团体因此得以加入公领域的另类报刊大爆炸。虽然没有传真、影印、或网路，1968年的石墙事件很快就被「同性恋解放阵线」与「同性恋运动联盟」当成同性恋运动的分水岭。温和派的通讯和刊物也很兴奋的报导石墙事件，但是就没有那种革命即将发生的感觉。石墙事件前只有少数明显走解放路线的报刊，其中包括到现在都还在洛杉矶发行的《倡议者》，但是1970-1971年间同性恋运动联盟和同性恋解放阵线一口气发行了大约30份报刊，接下来一、

二十年内大部分这类报刊都是这两个大组织办的，再不然就是左倾学生搞出来的。不过由于同性恋运动联盟和同性恋解放阵线几乎立刻就分裂，许多大城市都是同时有两份报纸，以代表不同路线的运行。另外，通常也会有一份免费刊物，主要是酒吧和三温暖的广告，这些也被称为「吧刊」。1980年代初才有了同性恋报刊协会成立，以便向大企业拉广告，像是卖酒的酒商或是生产疫苗的药厂。一般而言，同性恋报刊反映了蛮强但是不见得一致的性解放政治立场。所有这些刊物（包括吧刊们）都提供健康谘询，而且列出性病筛检的地点、支援团体和谘询的地点，此外也鼓励大家进行前列腺癌筛检，停止抽烟。最左的小报还热烈讨论瑜珈和有机食疗。

小报上的健康报导旁边就是同性恋、变性人持续承受暴力对待的报导，当时这些人都是和同性恋性解放运动接合在一起的。我特別要强调这一点，因为1970年代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被歧视施暴或是被警察逮捕因而送入医院，健康倡议者因此主张，在医疗过程中没有得到理解和体贴的照顾，对女同性恋、变性人、和男同性恋而言也是一种暴力。左翼小报当时也会报导同性恋平权活动，但是因为过程冗长，除了少数同性恋露脸之外好像也没多少具体结果，因此即使有同性恋当选市府官员，报导也只展现有限的兴奋。

我在看这些同性恋出版品时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它们都会彼此转载新闻，分享文章。虽然性革命正在发生，万事迫在眉睫，但是追踪文章转载时你就会感受到1970年代的缓慢，一篇文章刊载后往往要一两个月后才在另一个小报重刊。例如有一篇关于如何肛交的文章，显然当时肛交被当成是少数人的偏好，文章也反映女性主义运动对男性宰制的批判，这篇文章原来是1975年12月在纽约州水牛城的同性恋解放报上刊登的，但是隔年暑假又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城的同性恋刊物中出现。这回编者还加了一些评论：「肛交是非常专门的性活动，会肛交不一定意味着性能力高或者身体特别强壮。事实上，肛交并不如人们想像的普遍，男同性恋不需要因为压力而实行肛交。当然它可能开拓你的视野，但是不管如何，对完整爱恋另一个男人而言，肛交绝非必要。」讲完了这些之后，由于原文里反映了这个阶段

女性主义的平等理想，编者又接着说：「不要怕说不，如果疼痛就换姿势或是找别的方法放松，如果还痛就别做，不要被你的伴情感勒索。他们可能觉得一定要怎样做才能高潮，如果你不干，他们可能少爽一次，但是你却可以避免直肠受创。别为了他的原欲而伤了你自己的屁股。」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肛门健康与淋病之内在详情〉，文章建议：「初次肛交，最好找个喜欢被干的人，他们会比较敏感体贴。」

我想强调这篇文章里反映的感性状态，因为它完全不同于刻板印象所说的男同性恋要不是主动就一定是被动。它显示男同性恋在那时候被鼓励要关心彼此，而且要享受平等和性过程中的相互体贴。我认为，这样的体位互换，这种平等考量，可能和多重性伴侣一样促成了爱滋早期的快速扩散，毕竟，插入其实并不容易感染。这也就是说，爱滋开始传染时的数据激增，很可能是因为绝大多数男人同时干人也被干。

1970年代另一种形式的激进政治就是反精神医学运动。历史学家和同志人权运动都认为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与诊断统计手册》中除名是同性恋运动的关键时刻，因为那是同性恋除病化的第一步。然而当时的性解放运动人士并不觉得这个改变有多重要。在此之前小报上已经广泛报导反精神医学运动，男女同性恋在这个运动中的参与十分热切，毕竟太多女男同性恋曾被医疗体制施予「酷刑」，包括脑部手术、电击疗法、或是服用还在初步实验的精神用药，用以去除其同性恋欲望。在这种批判的脉络里，仅仅修改《精神疾病与诊断统计手册》的界定是没什么了不得的，小报里更热情报导的其实是1977年对一家知名化妆品、防晒油企业的杯葛行动，因为这家公司也制造了精神病院里用来驯服性不驯与性别不驯者的精神抑制药物。

比较激进的刊物几乎从第一期起就包含了健康报导，报导了男同性恋自建的健康中心，也监督同性恋的隐私是否遭到侵犯。在这个时间点上，同性恋社群的健康活动还不被当成社群对抗政府的模式，因为性病防治部门里很多工作人员都是没出柜或者半出柜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护理人员、以及医护助手，这些人都和当时的女性健康运动

关系密切。1970年代初期当性病数字开始攀升时，人们已经意识到社群的人会因为害怕资料外泄而不去检查，当时小报的批判焦点不是政府，而是如何让男同性恋知道去筛检中心是安全的。同性恋记者最初的报导在医疗资讯上很混乱，但是他们很快就改进了医疗报导的技巧，同时，记者们还得写清楚法律身分和医疗身分之别。例如，小报会提供法律建议，告诉人们在公园钓人时被逮捕要如何应对，因为好些州都容许警察扣留男同性恋和性工作者，直到接受性病检查才放人。另外，加州因为施行了严格的口交入罪而成为激烈抗争的对象，1974年运动份子利用当下有关性病的流行病学知识，说服公卫官员帮忙作证，向警方说明这些人几乎不可能透过口交得到梅毒，如果警方将他们扣押，这将是过度而严酷的惩罚。

我就停在这里，希望我所举出的这些例子可以让你们体会到1970年代环绕着欲望、性与安全的社群工作有何特质。

荷安珀

Cindy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它显示了1970年代早期同性恋解放运动具体是如何发展、如何互通，以及那个时代的情绪感觉。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时间点，把这个时间点脉络化，也就是指出，1960、1970年代其实是美国经历巨大变化的社会运动年代。当时除了黑人民权运动引发很大争议，快速扩散；农民工联合运动正在组织各地摘水果蔬菜的移工，他们多半是非法打工；性解放运动也刚好开始；还有一个庞大的反对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反战运动；妇女运动当时还叫做妇女解放运动，而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也正在展开。这些运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鼓励彼此勇敢前进，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运动，呼召新的主体，这也表示，当爱滋病相关议题浮现的时候，各处已经有了15到20年的激进社会运动积累。我个人也在当时感觉非常兴奋，在这充满各式各样运动的时刻不断参与各种动员，我们当然会遭遇挫折，但是总是有些进展，大家充满希望，觉得我们就要成功的强迫国家终止越战了，觉得女人就要站起来了，觉得我们有生之年就要看到彻底的革命了——至少那个时候我们

是这么想的。

然而就在1970年代末期，AIDS风潮冲击了美国，我们这些性激进份子、运动活跃份子最早看到这个疾病带来的冲击。本来我们的性生活就非常活跃，常开派对，常去情色酒吧、俱乐部、SM悦虐店玩耍，也最早看到这个奇怪的病在我们中间出现，但是没人知道它是什么。后来它被定位为「同性恋相关的免疫缺乏症」（GRID），可是还是没人搞得懂那是什么病，这个脉络很重要，因为它在那个动荡的社会环境里筑起了一道高墙。过去虽然有挫折，但是整体运动不断推进，有一定程度的成功，可是突然间，很多朋友开始生怪病，甚至莫名其妙的死亡。我们没有任何资讯可以判断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大家猜疑是不是和性或者用药有关，但是又没有确定的资讯。我们在社群里彼此讨论，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谁又死了？为什么死了？为什么和同性恋有关？当然最后证明这些问题都问错了方向。1980年代爱滋病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媒体提出很多冷酷的报导，人们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恐惧和焦虑，有的猜想是不是被蚊子叮了就会传染到爱滋？别人坐过的马桶你去坐也会传染爱滋？如果吃饭用了同一组餐具会不会传染爱滋？在这种谣言猜忌满天飞的时刻，政府却都保持沉默，疾管局只是说，不确定成因，可能和体液相关。可是什么是体液呢？是唾液吗？是精液吗？是尿液吗？是血液吗？到底什么是体液？1970年代末期进入1980年代，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猜来猜去的恐惧当中。

当时我们这些年青的性激进分子深深相信，性和欲望有着激进的潜力，是同性恋运动的根本动力，可以给我们一个和我们所源出的传统社会、家庭、教会、社群不一样的愿景。我们坚心努力构思一个不一样的性愿景，它不再是单偶关系，不再是异性恋，这种新关系和新能力可以巩固社群，而社群也不再倚赖属于个人的两人小世界，而以崭新的方式来思考我们如何与人形成性关系，如何成为真正的生命伴侣，如何共居在公社里，如何分享饮食，如何共同工作，如何建构一个激进份子梦想创造的不一样的世界。

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搞得一塌糊涂，但是我们真的活得非常刺激，那种全心全意的深刻投入只有19岁的年轻人才办得到。我们彻底的、

义无反顾的忠于我们的理想，决心要根本有别于我们所源出的人群，我们不断实验各种不同的方案，事实上，当时追求社会正义的各种运动都在进行各种社会实验。然而当爱滋来临时，就好像霎那间乌云罩顶，整个国家里的每个人，包括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吓坏了，很担心整个社群会因此灭亡。我们不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只知道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国家都困在惊恐中。本来爱滋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还以为会得这种天谴病的大概就是同性恋啊！性工作者啊！嗑药的人啊！甚至是海地人！那就没什么关系，他们都死光了就没事了。但是后来发现，这些族群并不局限在纽约市，而且这些快死的人当中可能就有自己的朋友，于是惊恐全面发作。

就在激进运动高涨的时刻，在各种追求社会正义的运动和保守宗教团体及政府辩论抗争的时刻，这个传染病出现了，它被命名，而且看来似乎越来越严重，美国疾病管理局每天都会公布感染者的统计数字，数字越爬越高。后来还出现一些应该是中立的医疗报告，说是在阿肯色州偏远的地区发现一批感染者，或者，在军中发现一批感染者等等……。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处理传染病的策略，至少在实践上完全无计可施，结果医疗署被推出来管理每日应付传染病的事务，由它来统筹处理相关的复杂措施和资讯。疫情的发展逐步戳穿了哪些人在用药、哪些人在滥交的文化谎言，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的邻居或好友并不如想像的纯洁或忠贞，而且忠贞也不是什么可以自动保护你的安全网，它只是道德上的宣誓，而不是人们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在那样的历史时刻，针对如何处理这个传染病出现了各种天差地远的立场，掀起了激烈而严肃的讨论，甚至公卫系统一度讨论是否要把所有检测阳性的感染者通通抓起来关进集中营？是不是应该把感染者加以烙印以便辨识？这些讨论并不是愚蠢或恐慌的乱说，在LGBT社群和公卫体系里都进行着同样的严肃对话。

当时管理爱滋的工作落在公卫体系身上，不过公卫体系过去除了花柳病之外，并没有太多经验处理其他和性相关的事情，也不懂上瘾和用药，更没有处理过像这次一样大量透过性或血液传递的病毒。我在这里一定要指出，我们活在一个深刻保守、恐性、而且对性无知的

国家里，公卫部门只不过反映了国家整体的成见，也因为这样，公卫部门根本就没有工具或能力去处理人际之间的性，以及和个人与社群紧密相关的性。公卫官员不但不熟悉自己要管理或监控的社群，又无能处理和疫情相关的所有事情，结果就只能继续扮演故做中立客观的科学家。我们这个长久以来就对和女人、青少年、酷儿、残障、老人相关的性政治非常无知的文化，现在却面对了一个特别强大的性危机，人们手忙脚乱、头昏眼花，因为爱滋基本上就是恐性文化自己生产出来的问题，我们则是这个文化不愿承认的噩耗。最终，公卫体系成了一个缓冲的中介，一边是那些被传染病深刻影响、正在努力掌握情势的社群，另一边则是无知无情的国家政府。

传染病爆发时，政府无能，医疗无知，受影响最大的社群必须自我介入，既然国家不回应这个传染病的挑战，我们就得自己干，此外别无选择。Cindy和我就是这个新运动的组成份子，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否染病，对于被要求因为风险而放弃性都感受到极大的愤怒和不情愿，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谈性和风险的方式，我们也必须开始学习如何针对我们自己的性和性活动进行批判的对话。这种面对风险的态度和政府面对风险的态度当然是截然不同的。在爱滋被建构的过程里，我们这样的性主体不断被人公开咒诅我们得病是活该自找的，还说这个传染病证实了我们是可怕的性怪物变态，在那个危机的时刻我们反而觉悟了，性对我们的存在而言是绝对的必要和基石。

这些事情在进展的同时，我发现常常需要和那些自认「要为控制和管理欲望负责」的公卫官员对话。他们的工作就是管控社群和感染者，希望透过控制被感染的身体活动，阻止感染数据上升，控制传染病的扩散。但是社群并不愿意放弃性活动，于是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爱滋组织，既然政府不提供经费，那我们就自己来支撑。当时最急切的工作就是广泛发放爱滋资讯给大众；另外，人们也需要有空间和自由去讨论他们实际采取的性模式，否则也不会了解自己在面对爱滋时可能会有多么脆弱。于是在这些组织里，我们创作了很多性文学和露骨的性图像，透过它们来教育社群，和社群对话，并且提供我们已经知道的爱滋资讯，帮助群众对相关风险有所认识。但是这些可不是什么

道德教训，而是有关欲望、性、风险的对话，我们试图理解周遭正在发生的事，讨论我们要如何认知才能真正面对这个传染病，在知识的基础上做出好的抉择。

我们内部对于应该怎么做，对群众应该说什么话，当然有过很多辩论，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一定要谈性，要谈用药，我们不希望一直讲安全性行为，最终反而使人们与自身的欲望隔绝或受限。当时的这些对话、出版、描写、图画，最后形成了一批我见过的最棒的性文学，它们没有避开变态的性、皮革性、跨代性、各种体位的性，还创作了各种非常棒的壁画和手册。后来公卫人士也以此批判我们，说这些产品会教坏大众，不应该散发，还要求我们自己必须更谨慎，说危险的性就会导致感染。可惜的是，这个「危险性行为导致感染爱滋」的讯息，以及公卫体系提供越来越多经费，后来造成了爱滋领域里也出现好几个说教型的组织，不断鼓吹安全性行为，并且照着公卫套路宣传，说为了要救人命就必须对性更严谨，更禁绝。

说得再详尽一点，为了得到最新的研究结果，我们的组织必须花越来越多时间和公卫部门对话，而在这些对话中也开始领悟到，公卫部门可以同意和背书我们讨论的话题就只有安全性行为，也就是每次性行为都要用保险套，这个原则后来也在爱滋运动里逐渐变成金科玉律——每次都要用保险套，意思就是说，不用保险套的人就是有问题的人；如果你的欲望、你的幻想、你的性行为不符合那个安全原则，那你在这个传染病横行的世界里就是问题人物。当公卫组织和爱滋组织都不容许开放对话来讨论欲望和情色，更不容许人们说出自己真心想望但是可能不符合安全性行为原则的性活动时，许多社群里就出现了在安全性行为修辞和人们实际性行为之间的撕裂：当时被雇来教导安全性行为的外展工作男同志最后发现感染了爱滋，HIV阳性的女同志也不被容许公开谈她的性行为或者她在和谁发生关系。

我认为最重要的现实就是，人们渴望性，而且会不顾风险追求性的满足——可是这个事实却没人愿意谈。大家都说我们面临的是个可怕的危机，人人都同意一定要快速解决它，但是对于性本身的价值，对于很多人明知风险还是要享受性，却不准讨论。性其实不只是一组

机械式的动作，也不是每次都一样，同样的动作，同样的伴侣，永远都可以控制。当公卫语言禁止讨论性的多样性、性的复杂趋力时，其实公卫组织和爱滋组织的语言只是在共谋创造一组新的道德定义，规范哪种性才是恰当的、可以容许的，而另外哪些性是危险的、不可讨论的。今日爱滋防治组织所面对的危机也正在这里。

我说的那种可以开放而自在讨论的性很需要社群的集体参与，需要我们和别人打开胸怀来讨论，而我们所讨论的情色也将不会是可敬的、纯洁的，毕竟，性本身就是危险的。说真的，HIV不危险，性才真的危险：这里的危险不是它包含的各种负面风险，而是它让我们的身心得到与另外一个人毫无隔绝的融合交缠的希望，也给我们莫大的愉悦，从对错定义中夺回我们的梦想，使我们不再只是在失控的全球市场中翻腾的小螺丝钉。性使我们和我们欲望的人重新拥有自己的身体和梦想，这种情色危险和奇妙美丽提供给我们性革命的强大动力，而这个翻天复地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谢谢。

吕昶贤

大家好，我是权促会的吕昶贤，我今天不会从欲望来谈，我会讲污名、讲运动、讲主体、讲公卫。其实我平常不太会准备稿子，可是因为今天我想要把一些东西好好讲清楚，也避免自己今天情绪激愤，脱稿演出，不小心乱骂谁，所以我觉得照稿念比较安全。

今年的世界爱滋日，联合国爱滋病组织（UNAIDS）提出年度主题「On the Fast-Track to end AIDS」，台湾的疾病管制署也呼应举办了「全速前进，对抗爱滋」记者会。不过若要从英文直译，「END AIDS」不是「对抗爱滋」，应该是「终结爱滋」，那么这个「终结」的希望从何而来？

为了达到零歧视、零感染、零死亡，疾管署的新闻稿提到「90-90-90」三个90作为目标。简单来说，第一个90是希望所有的感染者母群体中90%能被筛检出来；第二个90是希望被筛出来的这些人有90%能接受治疗、稳定服药；第三个90指的是服药的感染者之中90%能够达到病毒量测不到，如此就可大大降低传染率。按照这个「治疗作为

预防」的策略，若达到「90-90-90」的目标，爱滋会迈向零成长，随着世代交替，终将在地球上消失。

台湾的公卫学者以本土模型推估也得到相似的结论：只要朝向此一目标，2030年就能达到爱滋零成长。比起许多国家而言，台湾地方小，医药福利和公卫系统都很强，要更大范围的筛检和追踪服药都较为容易，所以，爱滋即将终结罗？我们再活个15年，一起等着看（台下各位专家或研究生，如果您是以爱滋作为研究主题，为了您的生涯规划，您可以考虑换领域了。不过，公卫体系的工作者倒是不用担心，未来工作量只会多不会少）。

不只爱滋即将终结，爱滋污名似乎也要落幕。爱滋形象在30年间变化很大：一开始是外国人的病、同性恋的病、自作孽者的病、很快会烂掉死掉没有尊严的病；1997年，台湾引进鸡尾酒疗法后变成可治疗的病；2004年农安趴，拜媒体大力放送裸男图像之赐，本会秘书长提出另一种感染者的身体形象——爱滋感染者不是很虚弱躺在床上烂掉等死，相反的，他们既健壮、又活泼、还可以跑趴呢！至今约10年，爱滋也渐渐被论述、被接受为可控制的慢性病。药物与治疗手段已经消解了旧时代爱滋恶心丑陋的恐怖烙印。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治疗作为预防」的推展，「测不到」与「极低传染力」二者的连结会越来越被证实与述说，爱滋即将被认识为「可控制、极低度或根本无传染力且不影响寿命的慢性病」，前提当然是：稳定服药、治疗有效。

一直以来，爱滋防疫的老套路都在反复控管危险族群和危险行为。当传染病遇上性变态、性滥交和毒品，污名简直是黑得发亮。但是现在防疫的重点就要挪移：重点不再是你的性身分，或是你的不安全行为，而是感染者们有没有稳定就医服药；或者双管齐下，仍然强调危险因子，但力道与恐吓效果必然降低，因为太强的污名会成为扩大筛检和稳定就医的阻碍。不论如何，看起来爱滋即将改头换面，有望与各种难堪的污名身分拉开距离，就一个反歧视、去污名的运动来说，真是天大的福音！倘若社会运动的目标在于改善弱势者的处境，终极目标在于消灭运动自身——因为已经达到平等——那么看起来，

爱滋运动只差最后一哩路。非常有可能，10年、15年后不再需要爱滋运动，或者成为一种爱滋医药福利服务运动。我们一样等着看。

然而，倘若运动是要挑战和变化社会，或更根本的，是要改变人－个体与社群，使他们能对体制的不公义有感，对自身行动能够负责，同时创造群与群之间新的社会互动，那么我得说，「治疗作为预防」并没有朝向此一变化。

「治疗作为预防」给了我们一个虚假的去污名想像。鸡尾酒疗法丝毫没有治疗污名，同性恋可能不再是问题，但患病的情感结构仍在，滥交一样恶心，吸毒当然万劫不复，只是现在服药似乎就能让我们绕过这些污名。

然而，污名不是属性，不是从污秽身体撕下某个标签就叫做去污名。污名存在人际关系中。要能变化感染者与非感染者双方的互动惯性，以及各自在社会历史中积累结构而成的情感，才叫做爱滋去污名。

对非感染者而言，爱滋好像离他们更远了。原本我们总是强调爱滋与每个人都有关，也谈人人要为自己负责，安全性行为就是爱滋防治的重点。当稳定服药取而代之，防疫的责任就倾斜回感染者身上了。二十年前的感染者会被告诫：「你不要做爱，以免害人」；现在这个古老咎责有了一个看起来更通情达理的新版本：「（既然爱滋只要稳定服药就能控制）有疑虑就要筛检，有病就不要放弃治疗喔，以免害人」。那么非感染者只需要远远站在外部，知道爱滋不可怕，可以服药受控制，同理关怀不歧视，也就够了。

对感染者而言，又会被召换什么？动员什么？生产出什么与自我、与身体的新关系？在作为防疫的治疗中还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爱滋感染者会自愿提早进入服药的社会存在以便处理原先关系中的难题。提早服药并且「测不到」，在爱滋男同志之间成为良家妇女保护另一半的体贴，也是跑趴女王进行无套性行为的自我负责。吃药其实没那么简单，但如此处理关系却是轻巧又简单。例如，关于性行为，什么叫蓄意？是否要告知？危险性行为的责任在谁身上？这些暧昧难解的伦理议题不复存在，在安全与危险之间游移的各种性实践也

不再需要努力创造，取而代之的新伦理是：「你有没有吃药？」在关系中斗争拼搏的机会消失了，只剩一翻两瞪眼，这是第一个代价。

甚至现在也不存在「提早服药」这回事了，因为所有的感染者确诊后，不论身体状况，都会被建议马上服药。上个月我在一个公部门的会议提出，「治疗作为预防」可能让某些感染者接受不必要的治疗，我马上就被教育：「理事长啊，你的资讯过时了！大家都以为我们是为了防疫牺牲感染者权益，其实我们也是为了感染者的健康啊！越早吃药，免疫力才回升越快，而且根据最新的科学的什么研究，还能下降什么什么癌的机率50%以上。」我沉默微笑以对。好吧，想不到鸡尾酒药物还可以抗癌。撇去一部分非凡控制者（elite controller）——根本不需要吃药也能长期控制病毒的人——不谈，作为资讯过时的理事长，我仍然有一个落伍又反智的怀疑：「一只白老鼠10年、20年、30年，吃这款药，换那款药，再加上对抗副作用的另外一款药，血液中维持一定的药物浓度，白老鼠最后究竟会如何？」会这样问，当然是基于身边朋友的例子。综合所有的因素一起考量，我仍然认为应该要有一条线，而且每个人的线不同。到底这种治疗政策会带来什么集体后果？我们一样再活15年，继续看下去。

最后一个代价是，医疗自主的空间被剥夺。以后感染者现身，大家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你有在吃药吗？」这个月初，我陪一位朋友去某大医院看病，预约肛门菜花电烧。护理师问他：「有没有验血？」朋友问：「要验什么？」护理师就说：「验爱滋啊。」朋友坦然回答：「喔，有验，是阳性。」护理师的表情很自然，没有任何皱眉或另眼相看，接话说：「你有告知，这样比较好，我们知道啦，没问题。」但接下来的反应就很有趣了，她问：「那你有在吃药吗？」朋友说：「目前没有。」他是一个会稳定就医但没有选择要进入吃药生理状态的人。医疗护理师就「喔」的，愣了一下，然后对着朋友叮咛：「你要去看医生啊！」这就是2015年的台湾。这句「你要去看医生啊」将会更多在社群内流传，从伴侣、朋友或路人的善意关怀中不断出现，烦不胜烦。然后「不稳定吃药」恐怕会跟「不戴保险套」一样，有着等量齐观的道德责难。病人彷彿有自主，但是选择半点不由

人。

谈到自主医疗、抵制和运动，让我想到田启元。这个月初，预防医学会播放了一部爱滋在台湾30年的纪录片《我会幸福的》，其中认肯了田启元对台湾早期的爱滋权益有很大贡献，然后介绍鸡尾酒疗法，也提到「90-90-90」的目标。纪录片以「1996年8月田启元病逝」作为最后一句话，然后打出字幕「仅以本片纪念因为感染爱滋，等不到特效药物治疗而过世的人」。这种处理手法让热线义工、也是本会理事高小龙当场抗议。

田启元当然不是什么等不到特效药而过世的人！他所导的剧充满对体制的批判，他所在的爱滋团体「Speak Out」也曾向国际揭露台湾政府的诸多歧视。本会前理事长张维曾在1997年的追悼文中写下田启元住院被粗暴对待的一次经验。他是这么写的：一天夜里，（田启元）被护士叫醒说：「你后悔了吧！」他非常震惊，如此过分的行为出自于身为医生护士职分，不管生什么病都应该全心治疗的啊……于是，那天夜里他爬起来，离开了医院。在张维的记忆中，之后10年，田启元自主抗拒这个医疗系统，即便到最后他身体很差，一直咳嗽，都不愿意去看医生。在纪录片中，这样的生命被刻意删除抵制性，以一种追悼、不舍受苦天使的故事版本呈现，我认为是极度不尊重的。

但我要再往前问，如果是现在——在2015年有特效药的台湾——还出现一个田启元，不论是因为拒绝药物、拒绝公卫列管追踪、或是拒绝就医歧视，我们还能欣赏这种肉身抵制吗？或者，在「治疗作为预防」的架构中，田启元不过就是个「防疫漏洞」？

我在田启元的剧中看到另一种姿态。张维说田启元「吃中医、去针灸、试偏方」，对我而言这并不只是在尝试替代疗法。田启元在1995年谈他的戏《平方》，他问：「那什么是我们这块泥土上混着传统、现代、不协调——既放纵又制约的身体呢？」然后接着说：「《平方》是中医师给我的启示。」中医师对田启元说：「如果你自己都不开始，那我的药只是垃圾。」田启元写道：「天啊！我好像听懂什么了——『从自己开始』。大家都知道中医讲经脉气血、讲运行，强调用自己的身体能量的增强来保健、来抗疾病。……既然咱们祖

先有这么一套对身体的法宝，为什么不用在演员处理身体问题的开发上呢？」所以他总结，《平方》是「由演员自身的能量按经脉运行，来自动创作肢体与声音的表现」。

表演是如此，生活亦如是。什么是此刻爱滋感染者「传统、现代、不协调——既放纵又制约的身体」呢？又如何「从自己开始」？这种自主和能动是我所看重的。

这10年来，我学习了各式各样的自然疗法，只要与治疗爱滋相关的——当然这个「治疗」很广，从杀病毒到提振免疫力，或处理药物副作用——都会让我特别记着、收着。我也学针灸与中医，从中找路走。也正好是这10年，中国投入许多资源发展爱滋的中医药治疗，当然这跟它内部爱滋历史和政治经济局势相关。于是，我有意识的搜集爱滋医案、标准治疗方案和科研成果，也有一小群朋友一起自主了解和实验。我没有任何医学背景，只是一个资讯过时的理事长，应该是不会找到爱滋的解药，但这个过程仍然有趣且值得。我们观看污名身体：看待鸡尾酒药物导致的皮疹、腹泻或高血脂；又或者是研究烟嗨之后的身体过亢，脉象怎么显示；就是公部门还爱到处抓大家吸毒或用药，然后我们就会玩一个游戏，就是把脉来测量你最近这一个礼拜有没有用烟；或者是我们也看待马拉松式性爱后的跌打损伤（找了一组针对老人失禁、肛门松弛的穴道，来处理拳交后的松，同样有效）。从一种主观感知的视角来贴近身体（而不是只看病毒量、CD4等外部检验数值），然后才能讨论还能为自己做些什么。处理症状，同时不让渡自主性。重点永远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把身体、同心、同社会处境联系在一起，然后为自己负责，拼搏。这就是我的实践。

不论你是感染者、个管、医师、护理师、研究者，或是走过路过的亲朋好友，倘若你也相信促进他人（含自身）的自主与解放，或者说，让人拥有、把握住一种「精神」，这才是运动的实践方向。倘若你也认同爱滋污名在历史与当下的种种情感和记忆应该被珍重对待，请与我对话。我们一道再看看还能怎么往前，谢谢。

黃道明

1996年因爱滋病逝的剧场导演田启元，在1988年成立「临界点剧象录」担任该团艺术总监，他10年的剧场生涯中共创作了二十五出戏，是台湾后解严时期小剧场运动的核心人物¹。继献给田导的《我会幸福的》爱滋纪录片（见上文昌昶贤的批判）在今年初（2016）被爆错用本尊照片后，「田启元」这名字又因感染者「阿立」遭国防大学退学事件而再被唤起；一时间，田导被师大隔离处置成了丈量本地爱滋歧视的标竿，而这也让他成了「让生命不再逝去，为婚姻平权站出来」凯道音乐会上被同婚运动追念爱滋受难先烈。我这篇文章想说明的是，如果我们开始认识田启元的剧场世界，就会发现这样的追念方式实为不敬。以下，我想粗略介绍田启元的左翼剧场实践，看他如何以一贯的自我批判态度面对殖民历史的当下，借自身民俗文化的再造，诚实地探讨欲望及污名处境。我以为，田启元活出的爱滋生命为酷儿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80年代兴起的台湾小剧场运动是对戒严体制的反动，亦是后解严时期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一环。临界点早期作品因批判党国体制、挑战性禁忌而广被视为「前卫」，然而在冷战分断体制效应持续发酵下，田鲜明的左翼视野迄今未被看见。例如，临界点成名作《毛尸》（1988）不但揭露儒家道统教育如何湮灭史书所载、与中华文明共生的男色传统，更把历来用以宣扬政教的诗经国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喻为右翼资本政权对美帝的朝思暮想。而同年探讨老兵、雏妓问题的《夜浪拍岸》，不仅批判资本消费社会的「标准温情主义」与「感情商标化」，更借妓院交易场景回顾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史、以一滩精液解构民主游戏规则（先验整体性下的少数服从多数），从而置疑「人权」理念对农、工、性与老弱劳动者的选择性排除。另外，取材自魏京生审判案的《芭芭弹予魏京生》（1989）则以魏的法庭抗辩，力陈社会主义民主理念，并暴露了台湾知识界一片大陆民主热（天安门学运）却不明自身金权民主为何物的荒谬。这三出戏都运用了布来希特左翼史诗剧场的疏离手法，也无情

¹ 当天的部分发言已写入代序，为了让读者进一步认识田启元，特作此文。本文得以完成要特别向郑志忠导演致谢，感谢他在访谈里、外的牵引。

嘲弄自诩进步却无道德勇气面对社会真相的菁英阶层；在这些辩证性很强的戏里，被右翼政体及异性婚家体制压抑的「性」及排泄物则以露骨的「反含蓄」方式返回，成了搅扰现状的主要批判力道。

1989年田启元师大毕业因被剥夺师范体系的分发任教权，便在台中一所私立高中找到教职、担任美术老师²。教书经验让田启元看到了人的可能性及前期作品的冲撞性格局限，因而转向开发演员身体来处理「人」与体制的关系³。他从看中医得到启发，开发出以吐纳、经脉血气运行为据的表演方式。临界点1993年的复出作《平方》即尝试以演员声音、身体调度汇成的能量和气流来触动观众。同年佳评如潮、改编自白蛇传的《白水》则起用四男演白蛇、青蛇、法海、许仙四角，以演员在海水、温泉开发出来的身体感官空间，处理「情、理、法」中国文化基体中的欲望冲突。于是我们看到白蛇为妖却想变人的矛盾、自溺又自私的许仙不愿承担自身欲望后果（而田启元说，这种人最容易博得同情）、法海本该慈航普渡却高举「天纲法纪」的假道学、爱恋主人的青蛇旁观咒骂却无力改变现实⁴。值得一提的是田启元因材施教开给演员的各式功课，包括写诗、看书、照镜，到养小动物或盆栽和另一生命体建立伦理关系等等。他曾说，这些功课的最终目的无非要让演员能够诚实面对自己。他很清楚，人在诚实面对自身欲望及矛盾时一定会恐惧（故而人们大多选择逃避）。

若说《白水》把「我们对婚姻和男女二性的制式规范，从社会系统中刨出来」⁵，《同志光阴》（1994）则进一步直剖同性情欲及爱滋污名。田导在节目单中指出，「同性恋」做为现代科学产物与中国文化传统产生断裂（后者不以道德非难男色），而现代化过程产出的性别主体则被统治阶级利益所消费、牺牲（「同性恋作为一种异文化被解读是以异性恋正统的权力游戏立场来界定的」）。因此他认为，女性与同性恋解放不仅需打破婚家体制的两性分野及规范，更需严肃

2 田任教期间（1989-1993）临界点处于休团状态。

3 田启元从一开始就抨击剧场界横植西方表演方法的现象。

4 参见钟得凡，2007，〈田启元编导风格研究：以「白水」为例〉，国立艺术大学表演研究所硕士论文。

5 田启元，〈戏，我爱，我做〉，《中国时报》，1995年5月27日。

看待同性恋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他深具远见指出，在「『多元化』和『自我意识』的交媾下」，身分认同政治只会产生「自以为是」、只求自保的孤垒，因此他强调当务之急「不是同性恋这种异文化如何建立、如何累积，而是我们如何接纳『同性取向』做为一个人的生活模式。尊重这种人的生活模式，以及包容这种模式所累积出的文化现象。」《同志光阴》手稿有这么一段爱滋病房的对话，非常值得此刻高举「友善多元」、「尊重差异」的性平教育者及爱滋工作者省思：

「你好点了吗？需不需我带些什么东西过来」，平头这样问我。

「不用！好多了，对了你」你……我？喔！我是因为肺囊虫住进来的，还有白色口腔念珠球菌，现在好多了。

「你也是……」我愣住了，他好像要问我是不是同性恋？但又没说出口，他有点尴尬。「我是输血感染的」。天啊，多好的理由。没错，我是在7年前车祸时输过血。

但是我也和别人共用针头打过速赐康，我也召妓过。可是这些我却没有告诉医生。我怕，我怕医生用那种批判歧视的眼光看着我！可是，现在，我觉得我伤害了平头，我好像是正当理由感染的，不必负担社会的歧视眼光，事实上，我错了。

同性恋污名在这含蓄交谈中浮现，而这位病患自省所展现的「尊重」看到了爱滋与其他污名的共构，以及与主流社会同声气的彼此伤害。这段话也是对欲求正常而与污名切割的同婚运动的深刻提醒。

田启元的剧场自我批判却不说教：一方面，它呈现了做戏人对体制、特定议题的立场，另方面则打造空间让观众省思。正如他以中元普渡搬演「目连救母」习俗而做的《目连戏》所传达的，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善恶：善恶判断问题，终究需要回到观众自己身上，如此社会方有转变的契机。戏中超渡亡魂的法师在发愿入地狱以消众生罪孽时竟引来其他角色一阵爆笑，而这巧妙的疏离手法让观众省思如何面

对自身业障的问题：

有人做些善事，有人做了些坏事。
人白天做善事，晚上做坏事。
也有人人前做善事，人后做坏事。
也有人人前做坏事，人后做善事。
好事，坏事，好事和坏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根植于庶民习俗的伦理观——即中国文化传统「人在做、天在看」的天理观——当然在考验观众回问自身作为是否对得起天良（而这也包含对行动后果的道德意涵保持存疑的自觉），同时也置疑了现代法制的理性专断，因为后者不但假定了抽空历史的主权主体，更不去深究主体的行动与选择总是生成于特定又复杂的道德情境。

《目连戏》节目单指出，现代性规范带来区隔好、坏的撕裂暴力，因为趋同过程必然会厄杀「人的某些质地」；而如何化解人与人之间因差异而起的冲突、让「个别异质性」能自在生存，是田启元的佛老观所侧重的沟通伦理。他说：

任何一种生命——人和鬼、你和我、鱼和猪、草和树…这天生万物之间，都各有所处，互相尊重的和谐生存。将原本的冲突，化为对彼此「态度」之间的了解与认识，而不再强调冲突这个官能上的刺激，而退一步看清楚各种生命态度的多面性及刺激我们每个生命潜在的包容性。如此这般，大家或许可以在彼此之间及在自己的体内，能一样欢喜、一样自在、一样生老病死、一切顺其人本、自然。

这里的重点在于激发个别生命潜在的包容性，以及接纳自身体内的异质性，包括HIV。关于前者，《水幽》（1995）三人版（改编自《白水》）或许可以视为田启元在剧场上的尝试：三人轮演四角意味每个演员身体必须同时承载两个角色身上的欲望矛盾（见上）。虽然这戏最后因演员达不到导演要求而排不下去，但我觉得田启元给了我们一个在日常中相互了解、尊重他人的方法（同理心并不如想像中

容易！）。关于后者，1994年临界点曾应预防医学会邀请在世界爱滋病日宣导活动演出《波光粼粼》。它揭示了「HIV也是一种生命形式、它也想活下去」的观点，并据此声言爱滋病患不该受到歧视。

《日莲：喃喃自语的岛》（1996）是田启元在临界点的最后一出戏，其首段即为《波光粼粼》。两位身子沾满绿豆泥、身形对比鲜明的演员（身障长发的郑志忠及光头的刘守曜）在苍劲的日本吟歌「日莲」中交迭缠绕互生，幻化出「似人、似鬼、似爬虫、似妖孽或罗汉」的意／异象，演出一段求证涅槃的生命历程⁶。中段在Philip Glass 〈沙滩上的爱因斯坦〉配乐中来到摩登时代，两者急促动着，交织滑稽、狰狞、疯癫的面容，而在制式的寒暄问暖后，紧接出现的是「Would you be honest？」的百般言说样态。Would you be honest？田导把问题丢给了我们。左翼剧场人王墨林曾说，田启元后期作品都在喃喃自语，然而柳春春剧社郑志忠导演（前临界点元老团员）则认为，「田启元不同的是，通常我们看到自己就了事结案了，他是进而从看到自己去连结那些不被正视的他者」，和「自身过去的文化历史里皆已亡佚的人们取得联系」。的确，《阿女—白色玛格丽特》（1994）就是以一生坚持理想的台共谢雪红做戏。它邀请观众走进入被国民党抹灭的台湾左翼史、看见日殖暴力及美帝支撑下的白色恐怖。《阿女》追问台湾光复后的文化主体性为何，更有意识地在228事件开始被民进党神圣化的时刻，公开哀悼为人民奋斗的台共亡魂。

田启元生前居无定所，就学、就医都饱受歧视，然而他的戏却丝毫不没受害的悲情妒恨。他巧妙起用80年代台湾最知名的公开同性恋者祈家威饰演《毛尸》中的启蒙角色，而观众在《阿女》看到的不只是演员郑志忠的残障身躯在殖民者讪笑中的扭曲苦痛，更见他身障调度爆发如「异形」般的抗殖力量。田启元是地下爱滋运动团体SPEAK OUT的主事者，也是台湾所有爱滋纪念被单里唯一绣上真名的人物。他拼了命带病做戏，用剧场「这个社会所剩无几的诚实空间，试着表现个人内心的诚挚与动容而产生的气味，再一次的和观众发生关系，让气味扩散出去，各自蕴化生成，而有更多的可能」，力图开拓「一

⁶ 感谢林纯德提醒日莲正宗批判趋炎附势、无视民间疾苦的僧侶。

种接纳别人而自主的生活态度」⁷。今年适逢田导逝世二十周年，仅以此文纪念这位以自身左翼社会实践砥砺后人的爱滋诗魂⁸。

问题与讨论

黄道明：谢谢三位非常非常精彩的引言，我们接下来提供给现场朋友们进行对话和讨论。

王 咻：我想先回应理事长，我觉得很 amazing，每次用药完去推拿，真的是靠北的爽，中医真是玩药的好朋友，玩药之后的确会有些身体负担，比如说筋络关节气结！去看中医推拿就会通体舒畅。我想问，刚刚 Cindy 讲到 1970 年代透过这些小报展开种种社群间对疾病的关照和预防，那是有比较偏重哪些疾病吗？假如那些对疾病的的关注是出于性病防治，是担心疾病可能在社群间造成传播效应因此加以预防，这种预防可能就不会去关注其他的伤害和疾病，1970 年代是怎么照顾这种种疾病？有哪些疾病被优先处理？或者并没有所谓的优先次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Amber 刚刚谈到 1960、1970 年代性激进运动者不仅进行比较多样实验性的性实践，并且是以公社的居住方式来共同生活，对我来说这是很陌生的生活形式，最近有一部偶像剧搭着同志婚姻的风潮出来，里面讲了三对伴侣，一对是异性恋、一对女同志、一对男同志，很多元的伴侣，但是都是以专偶的方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可是他们还是过着很专偶的生活，我对于所谓共同生活的想像可能比较贴近这样子。但是我会想知道在当时所谓公社式的居住里，比较怪异的亲密结社是怎么样运作？谢谢。

裴 新：1960、1970 年代对于花柳病的理解经历过一个重大的转变，过去认为花柳病是一种皮肤病，因为它在男人身上的结果明

7 田启元，〈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中国时报》，1994年10月20日。

8 关于田启元及临界点的史料，请搜寻郑导设立的「纪念『田启元』爱的小花社」脸书粉丝专页。

显可见，1940、1950 年代还曾经推出一大批我称之为「阴茎展示」的性教育片，片中会呈现每种花柳病在皮肤上的表现形态，1960、70 年代以后才知道花柳病其实是透过血液来传递的。淋病的出现可以说是一种突破，因为淋病就不是眼睛可见的，这才使得花柳病改名为「透过性传染的疾病」。再过来就是 B 型肝炎，1970 年代以前还不知道有不同种的肝病，人们只知道肝肿起来，皮肤变黄，就是肝病。后来新科技让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病毒致病，才知道有不同种的肝炎。由于 B 型肝炎的病理学分析完全不同，后来才知道淋病也是一种透过血液传染的疾病。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起初的同志刊物报导是很混乱的，那是因为医学本身就是混乱的，1970 年代末期在同志群中展开了大批的 B 型肝炎疫苗试验，这种科学资讯在同志小报中就有很多，后来还有关于前列腺癌筛检活动、反烟活动等等的资讯，有很多类似的健康议题出现在同志的出版中。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当时科学也正在变。

荷安珀：我们当时正在经历各种企图改变社会的运动，过程中也大量的讨论要如何改变社会，包括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理解世界？怎么锻炼身体？跟土地的关系是什么？等等。我们天真的希望一切都能改变，但是毕竟我们那时才 19 岁，不太可能做到，然而「公社」却是我们严肃批判中产家庭的一个具体行动。我们决定不要等待革命来临才改变我们的生活，而是在此刻就活出我们相信的价值，我们认为核心家庭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因此非常努力的讨论如何集体生活作为革命的实践。当时拥有同样社会公义信念的人，有些是伴侣，有些人单身，大家合力租一整栋房子，共居共食，甚至可能全体吃素，就看成员有多激进，想要实验到什么程度。我当时住过好几个不同的公社，其中有一个很疯狂，因为认为有门就是个人主义，所以把所有房间的门都拆掉，只留下一个有门的房间，想要隐私的人

就可以登记使用。很多人嘲笑当时公社所进行的各式各样实验性的居住方式、互动方式很荒谬，可是我们是真的想要改造自己成为不一样的人，我们在尝试彼此共享一切，我们想要试验如何找到可行的方式和别人一起解决问题。大家住在一起的时候，日常生活的劳动要怎么分担？我们劳动的果实要怎样分享？这些都在公社的生活环境里具体的实验如何操作。我们的文化教我们专偶、异性恋，那我们要如何挑战性和性别方面的规范？当时我们认为能和很多不同的人配对是好事，不是跟一个人，而是跟很多人，而且觉得不结婚是件很棒的事，因此每个房间都有很多张床垫，常常进行群体的性行为，尝试各式各样的安排。还有一个公社做了一个生活分摊表，中间一个圆盘，分成很多块，生活中的各种劳动分别写在一块一块上，例如煮饭一块、打扫一块、倒垃圾一块、性是另一块，外圈则写上每个人的名字，然后转动分工表，转到你名字的工作就由你来做，你的名字碰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时，你们就可以发生性关系。大家在这个集体的环境中因着这个圆盘的安排而转换角色，尝试不一样的活动和承担，当时我们认为个人有「选择」是一件很中产而不可取的事情，连性也应该是集体共通分享的。我听过很多人嘲笑当时的实验生活方式，但是我觉得我在公社的过程中对自己有了更多的认识，我出自非常贫穷的家庭，家里本来就没有个人的房间、个人的隐私，房间也都没有门，所以分享一切对我而言没那么困难，那些比较中产的伙伴们就比较有困难了。我们在公社的生活里承诺彼此照顾，彼此支持，照着我们认为可以创造新文化的方式共居同住，那种生活一点都不抽象，因为我们相信每件事情都可以改造我们。现在回头看公社的生活，可能年纪大了，我不太适合再过那种生活，但是我绝不后悔当时曾经大量的实验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在过程中变成了不一样的主体。

黃道明：我读过 Amber 的文章，也听她讲这些社群生活，早年爱滋社

群里那种互相照顾而在性上面也群体结合的传统也是这样搞出来的。Amber 说欲望本身是危险的，她也肯定危险其实是性不可或缺的元素，因为要是没有那个不确定性，性就会变得很无聊，所以你就是要冒些险，永远都在处理不知道的身体或者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欲望，这是她谈欲望的方式。我想问的是，照顾的伦理要怎么把性愉悦中不可少的风险也纳进去？或者说照护和风险要怎么谈？

荷安珀：我非常希望能看到在性上面相连而彼此负责的人一起打造社群，因为我认为孤立而没有彼此照顾、没有连续关系的性，或许很好玩，但是有长期关系的性，和与陌生人偶而邂逅就快进快出的一夜情是很不一样的。我个人觉得长期的性关系比偶尔邂逅的性有趣得多，不过那只是我个人的偏好；我也知道性激进份子可能不会赞同我的立场，但那就是我的立场。至于「彼此照顾」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深刻，我们周遭的文化越来越不喜欢社群里的成员肯为彼此负责，彼此相连，而且看重那种责任感，事实上，我们的文化逐渐掏空了人溺己溺的感受和能力，想要建立那种彼此照顾的社群也越来越难。我认为当人们发生性关系时，他们对自己的性对象就有一种照顾的关系，要对那个对象负责任。这种责任倒不是我们华人爱讲的名份，而是对于对方的一种关切，毕竟我们要对自己的欲望负起某种责任来。我当然希望人们能够如你所说的变成负责任的性主体，但是我觉得创造那样的一个性文化是很难的，过去历史上曾有过一些尝试，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社会氛围使得这个可能越来越渺茫了。

Ray：刚才 Cindy 讲了爱滋疫情展开的 1970 年代同志社群如何面对性病的过程，Amber 讲了爱滋病出现时同志社群如何发展出彼此照顾的实践的可能性，然后昶贤提到了田启元的一些故事。对我来说，三位讲的都是科学的知识和技术还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可是十多年来公卫政策建立在科学基础的

上，进到了爱滋里，包括医药的进步和筛检的技术或病毒的治疗等等。公卫的政策想要让这个感染的状况得到改善时，他们最常说的就是这些实证科学的技术，可是三位讲的都是实证科学还没有跟公卫强大关联的时候，或许我可以问，你们怎么看现在公卫所引用的那么强大的实证科学论据，或是用这些数据所做出来的政策？好像科学也改变了感染者，改变了爱滋这个疾病，当然它也改变了我们对于欲望、对于性、对于风险的看法，所以想多听听看你们怎看科学知识，谢谢。

吕昶贤：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再活 15 年，等着看。我觉得我对这些知识、对这个世界毫无办法，所以我很坦诚地说，最后我的实践就是在我的边边角角待着，有什么人愿意跟我进行什么实验，我们就来做，就是这样子。例如说刚才说，现在的发展会让人彼此更不需要负责任，让大家感觉好像已经去污名了或者活得更好了，可是其实它让你绕过了很多很根本的东西。我觉得我对这个发展束手无策，也不想要对它做什么了，我目前只能这样回应。

裴 新：我觉得区别不是存在于社群和公卫之间，而是在那些想要不计代价找寻终极疗愈的人，和那些只想此刻过好日子的人之间。别的疾病也会产生这种区别，但是在爱滋上这个区别特别尖锐。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想问题，那我们这些长期的社群组织者可能要对现在大家假装只要挺过今天、明天就会找到治病良方的偏安心态负起一些责任。对我而言，我不知道情势究竟是什么时候变的，但是过去确实有一段时间，社群和公卫携手「全力找寻治病的良方」，不管有何副作用，对个人有何影响，对社群有何冲击，好像这些都不重要，只有那个科学研究成果最重要。这种趋势出现当然是个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补救。

荷安珀：我想用一个问题来回应你的问题，就是，你觉得本地是否有

一个以社群为本的阳性感染者网络，不管他们个人和服药、监督有何关系，都能独立的彼此对话，讨论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我不知道本地的感染者是否能对话，能批判整个体系的运作方式，是否感觉自己只是个客户，或是真的能够有所作为，我觉得那是思考你的问题的开端。我不清楚本地的情况，但是现实是，人们对于表露自己的身分还是非常谨慎，而感染者其实没有空间很政治性的深入讨论自己想要什么，梦想什么，如果一朝有了更多力量和掌握，会想要做些什么改变等等。如果只有公卫人士向感染者讲话，而感染者自己彼此之间没有对话，没法以社群为本而独立的讨论、自主的发言，那么问科学的问题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黄道明：相信大家收获都很多，三位引言人都太强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也特别感谢今天担任翻译的何春蕤和丁乃非老师两人的辛劳。

[逐字稿人员—曾浚赫]

男同志持续高危险？

一个性解放的历史、政治观点¹

Cindy Patton 着；颜维毅译；黄道明校订

我想从1985年12月刊载于《美国公卫期刊》的一封公开信开始谈起。作者汉司斐德（H.Handsfield）是位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顶尖公卫医生，信中他评论了一份稍早发表的研究。这份在1982到1983年间于旧金山进行的研究指出，有多重性伴侣的男同志因调整了性行为模式而较前一年减少了约10%的感染HIV风险，然而汉司斐德却认为这样的改变幅度小的可笑。他说，在西雅图，有高达三分之一的男同志感染爱滋，而就算高风险的性接触从每年十位性伴侣到明显下降到每年两位，男同志还是有55%的暴露风险；另外，在旧金山，有三分之二的男同志可能已感染，暴露机率则是89%。汉司斐德认为，人们对于性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仍缺乏足够了解。他不解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仍持续进行有多重伴侣的高风险实践，但他觉得那是时下欠缺减低风险指南手册之故。他认为，如果要制订风险指南的话，就应该根据现有流行病学数据来做出客观诠释，同时也决不能低估事态的严重性。他说，我们要劝告男同志进入长久、有承诺的关系，并禁绝单一性伴侣外的性活动，另外，在处理新式或随意伴侣关系时，「Safe Sex」的忠告则该以下下之策的方式来呈现：一个审慎的人不该心存侥幸，冒着1%的机率，让自己暴露于染上这要命传染病的风险。

尽管同志运动已进展了三十多年，汉司斐德这封信里所蕴含的一些文化预设至今几乎没啥改变：男同志并未体认到他们性爱活动的危险性，社群领导人物对那些从事高风险性行为的男同志也不够批判，

¹ 【编按】2014年11月15日，世界知名的爱滋防治专家／酷儿学者、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社会人类学系教授裴新（Cindy Patton）应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邀请，于台北狐狸野餐进行了一场公开学术演讲，这篇文章是她当天的讲稿及问答实录。

更令人发指的是，男同志在这种情况下竟还指望可免于公卫或法律对其高危险行径所进行的管制！你或许会想，同志运动者要是听到这种公卫论调，应该会跳出来对干吧？不幸的是，现下国际间政治可见度最高的同志运动，也就是同志婚姻平权运动，似乎赞同这些预设。吊诡的是，在爱滋罪刑化的情况下，同志婚姻意味只允许那些感染状态皆为阴性的同志伴侣关起门来在房间里做爱的权利。而对其他那些同婚外的人来说，对爱滋药物的顺从医嘱——不管是给感染者的治疗或是给非感染者的暴露前预防性投药（PrEP）——则是展现其好公民身分的唯一方式。

在此，我想要为大家上点数学课，来解释公卫官僚为何及如何操作数字，这有助于理解爱滋早期疫情的监测数据，以及使用这些数据来提倡特定政策的伦理（就像同前面那位西雅图公卫医生所揭示的），从而厘清这两者间有着什么样的危险落差。在任何指认新兴疾病的初期，流行病学家会小心翼翼把有相似症状的人们或在人口统计学上有相似特征者做分类。就爱滋来说，流行病学家面对的迹象在结构上是崭新的，因为这是种慢性且能透过性行为传染的疾病，而这对他们来说还是头一遭。1970年代男同志间流行病的B型肝炎还没被公卫掌握，接踵而来的又是个在特征上显示可能由反转录病毒所引起的新传染病。这种病毒在当时还是个假设性的粒子，仍未被描绘出来，更别提对其有所了解。事实上，在疫情初期，流行病学会高估或低估疾病发生率是很典型的，因为要辨识出易受感染辅因子（co-factors）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流行病的宣布所根据的往往是人口层级的资料，会倾向同时制造恐惧和疑虑，而感受状态则会因你的居住地而有所不同。对住在大都会区里的男同志来说，男同志诊疗所的存在带来了最佳的监测系统，因此爱滋早年的戏剧性数字所代表的是他们认识的真实人物：当你周遭的朋友一个接一个死去时，任何预测都显得过低、任何的因应措施也都显得太迟。而对住其他地域的男同志来说，由于没人目睹有人正在死去，这些数字看来就像是用来恫吓同性恋者的另一种恐同招式。

上述1985年西雅图官方使用的数字是有问题的。公卫当局在生产

流行病发生率数据时有个主要的问题，我称之为「分母问题」，而这是在做人口层次的资料分析时常犯的错误。为了要判定有多少案例，美国疾病管制中心（CDC）必须下个定义，而最初的定义是，一般而言该算健康的人身上出现了特殊的伺机性感染。为了要判定他们在观察的是单一还是多种疾病，CDC于是借由人口统计学类型制造出了次要类别，即恶名昭彰的「4H」（「Homosexuals同性恋」、「Haitians海地人」、「Haemophiliacs血友病患」、「Hookers娼妓」），随后使用注射针头的药瘾者也很快就被列入名单。要统计落入每个类别的通报案例比例相对容易，然而这样的分法其实有模糊地带，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坦承有同性间性行为，而即便坦承，要是你也有用药或本身是个血友病患，那也只会被归类到同性恋这个范畴。也就是说，同性恋被假定比其他类别来得更高风险。

过去有段时期的爱滋运动在对抗这些分类，因为它们应允了当局对感染者和社群中人的监控、并且深化了歧视。然而，这是个分子问题，也就是说，每个类别里有多少人。如果要了解像那位西雅图医生所使用的发生率，亦即，某个城市男同志的感染比率有多少，那你接着就要去看分母。我们可举例说明发生率的数字可怎么表达：「来听我演讲的五十人之中，五人有红发」。红发的发生率就是十人之中有一人红发，即10%，但这并无法反映台北、台湾、或全球的红发发生率。把诊断感染某疾病的人数除以可能感染疾病的人数，就得出某疾病的发生率。就爱滋防疫而言，所有男同志都被当成处于风险中，所以把西雅图诊断出感染爱滋的男同志除以西雅图的男同志总数，就得出了西雅图的男同志感染率。可是1985年有多少男同志住在西雅图呢？谁知道？谁又可以被算成男同志？制造这种数字（现在依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有多少男人有同性间性行为，也不知道他们如何、以怎样的频率、在哪里、何时、为何做爱。即便用时下更精密、仰赖人类学与统计学的详细研究而制成的数学建模（modelling），得出的顶多也只是个有教育程度的臆测结果，而且只对数学建模发生的时间以及地点有效。社会科学家并不认为分母（也就是某地有多少同志？）可能被估算出来，这是因为身分与实践之间

有着持续变动的关系，例如社会上有男同志、有为赶流行而充当男同志的直男、有卖淫的男同志、双性恋、不搞身分认同的酷儿等等。

从性解放以及性健康的观点来看，身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人们理解一个组织的活动或提供的服务对象是否针对他们，但是从追踪性病的公卫观点来看，你的身分是什么真的不重要。公卫唯一感兴趣的是谁从事会散布疾病的行为：公卫眼里没有男同志，甚至没有男同性恋，但是有吸屌的、干屁股的，或者更精确一点来说，谁内射、谁让他人内射、还有坚持不跟他人交换体液者（请注意后两个范畴同样都包含了「男人」以及「女人」。）这些数字问题有其政治效应。HIV的发生率在疫情初期被夸大，现今则仍然埋藏在一堆数据中。全球的发生率在1%以下，而在疫情稳定成长的地区或群体中，每年的感染率是1%到3%。在大部分全球男同志都会区的相似男同志社群，发生率大约是15%，然而这实在是不可能可知的，因为每年会有新的人出柜、人们会在城市间移动、而且性实践的潮流也常常在改变。

这些数字对想算计自己感染风险的个体来说几乎没有用的。不论政府花了多少经费挹注爱滋民间组织，没有任何政府相信男同志早已在重新组织他们的性生活方式。公卫一直对男同志说他们改变的不够快、而且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去做爱滋抗体筛检。这只是把男同志送去跟医疗、照护、社工、谘商等专业人士密谈，而不是像过去许多地区的男同志那样去参与Safe Sex场子的公开对话。男同志陷于终生的医疗监控中：持续做筛检，直到你测出是阳性，然后开始服药后再去看你吃的药是否有效。事实上，现在几乎人人都否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男同志们会持续做出理性选择来减少个人及全面感染性病的风险。值此同时，让同志们能代代相传分享性秘密的酷儿庶民文化则在此间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不过，做点研究就可以发现，至少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男同志就很关注自己的性健康。石墙抗争事件后出现了一本最早叫做《男同志》的男同性恋解放刊物，这刊物认为，普遍与个别化的恐同症让男同志难以指认、预防性爱方面的问题。这份刊物在1970年4月到1970年12月间发表了五个单元的性健康手册，其中涵盖

了传统性病（如梅毒以及淋病）以及彼时甫被认定经性行为传染疾病（如肝炎以及寄生虫）的相关资讯。到1980年代中期为止，这些手册是同志报刊中最精确的医疗报导。而为了要报导爱滋相关的进展，男同志记者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转型成为科学记者。

1970年代中期，在同志运动者与公卫护士密切合作下，大部分主要城市都有治疗性病的方案，这些诊所有时候会起用经过训练的男同志志工来做性病检查及转介，也有好几个三温暖连锁店做东主持性病防治诊所。1971年，《男同志》（GAY）的编辑群合拍了几张照片、摆Pose让一位可爱的男同公卫护士检查性病。另还有张编辑群跟一位三温暖老板的合照，这位老板同意让公卫护士在他的营业场所里主持定期的性病诊疗。《男同志》提供免费广告给任何愿意与公卫护士合作主持性病诊疗的三温暖。获得好的健康照护渐渐意味找到一个安全所在，那里有某种程度上的隐私和同理心让男同志可以讨论「那档事」。1981年1月出现了第一本针对男同志推出的正式性爱指南，恰好就在爱滋病被指认出来之前。作者群是男同志性病服务国家联盟，这是个已在在地男同志群体努力了十年、为寻求健康照护而长出来的组织，由年轻的医疗、医护、社工、以及公卫学生等专业领域人士所组成。《健康的性活动：指南与建议（第四修正版）》（1981年二月出版）反映了一个持续争论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找到最佳的语言呈现方式，用一个句子来涵盖「男同志」、「性」、「健康」这三个词。1970年代及1980年代早期的健康倡议者常会援用反殖民式的批判，认为对性健康资讯的否认就是国家暴力的一种展现形式。但他们同时也要求男同志借着性健康的自我照护来展现他们的好公民身分：这不只是自我照顾，更是为了大抵上排除他们的社会着想。这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在以下呈现的男同志健康概念里得到折衷：「健康不只是避免感染性病。健康是一种人的状态，其中个人的身体、心理、情感需求要达到平衡。健康的性行为所表达的是满足个人天然性驱力而又不染病的方式。」然而，这立场代表的已然是主流化了的男同志健康，较为基进的反殖民与「性」无政府主义立场则几乎不复存在。尽管如此，《破麻仔》（Fag Rag）杂志的宣言写手、也是波士顿法律教授

查理西佛里（Charley Shively），于1983年写下了以下这段极为挑衅的文字，而他叫阵的对象正是与公卫所建立的新关系的男同志健康倡议者：

你有为性解放从容赴义的准备吗？

近来杰瑞法为尔（Jerry Falwell）把他的（「道德大众」组织）街头剧团带到辛辛那提市巡回演出，然后以爱滋为由，要求当局立即关闭男同志三温暖。（然而实情是，虽然广告了好几年，但没半间男同志三温暖能在辛辛那提市开张。）他的呼吁跟男同志社群里的某些论调口径一致，就是把自己的性看成罪恶、寻求忏悔、原谅的那种调调。这些人相信他们能够牺牲性爱而获得永生。这简直胡说八道，人生自古谁无死，放弃性爱只会使得余生更索然无趣……就算我们假定异教徒和基督教徒说「性爱导致爱滋」是对的，我倒想问问，为何人们就不能为性解放而慷慨赴义？这总比饱受医生、牧师、政客恫吓而将自己锁在房里还来得好吧？性爱有其风险——只要想想各式强暴以及专找酷儿下手的肢体暴力——但同志解放的抗争应该要去除这些风险，而不是向我们的敌人低头……在还没讨伐中央情报局、CDC、医疗、药厂前，就有太多的男同志先行向制造谎言的这些建制缴械投降了。这些体制说，我们之所以既残又废，都是我们的性所导致的。它们说，我们的性不成熟、有强迫症、弱智、不负责任、罪恶、可怕，然而正是这种教化助长了梅毒的散播，同时也损坏了我们对抗爱滋的战力。我们不该信任医生、政客、或其他专业人士来为我们做我们份内该做的事。我们不能让他（不论多有善意）来为我们代言。

眼下要倡议性解放不容易。君不见连右派人士都乐得把酷儿放进单偶婚姻中。对那些曾经倡议要在男同志屁股刺上「HIV+」的那班人来说，这样的政治转折很诡异：难不成他们把婚姻想像成一种隔

离的形式？而众多爱滋组织开出来的另类解方，则是暴露前预防性投药（PrEP），也就是把HIV药物给那些没感染的人用。他们的预设是，这样不但会降低个人的风险，也会降低「人口层级上的病毒载量」。两年前PrEP还只是「安全性实践策略中的其中一种」，然而现在它已成了许多美国城市的照护标准。值得注意的是，统计学家用来预测男同志整体新感染率的数字——而这比率同样适用于PrEP的诸多研究——是每年1.6%。因此，PrEP这新常态会将大量的男同志暴露于严重的副作用中，为的只是防止一百人中会有一人感染：尽管使用PrEP，还是有一个人会感染，而九十八位即使没有使用PrEP也不会感染HIV。

所以，别再搞那些不切实际的数字游戏了！我们该做的，是回到早期具有解放意涵的性资讯年代，针对怎样安排性生活提出最佳的逻辑和解释。与其用夸大的感染率及胜算比值（odds ratio）来恫吓人们、让他们感到迷惑难解，我们该当解释的是，任何性病感染都是一连串偶然际遇所造成的，而这偶然性对个别的性交案例来说都是独特的。就像是任何的传染病，你个人的生理构造、体质、身体状况在某天是否大致健康、致病原的变数、是否有用保险套、有无进行肛交，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你是否会「中镖」，也决定了你会不会或多快发病。什么东西是我们最能掌控的呢？那就是我们怎样做爱。早在科学搞清楚是什么导致AIDS前（编注：HIV到1985年才被正式辨识出来），麦可可伦（Michael Callen）与李查贝可卫兹（Richard Berkowitz）这两位男同志于1983年出版的《爱要怎么做：爱滋蔓延中的男同志性爱指南》（*How to Have Sex in an Epidemic : An Approach*）就已经这样告诉我们：

早年的性自由已被现下性行为传染的疾病肆意蹂躏……要找到方法能从事性行为而同时又可以避免染病，看来似乎不可能，但是我们相信并实情非如此。这本手册教你方法来降低

（希望能消除）这种尚未得到应有关注的风险，那就是：只选择能够阻断疾病传播的性行为模式……这种作法的关键在于调整你的行为，而不是调整次数或伴侣……我们面对的挑战是找出如何才能拥有积极肯定生命的同志性行为、满足我们的情感需要，并且继续活下去！

问答实录

王 莹：我们谢谢 Cindy 还有黄道明的翻译，我们大概还有一个钟头的时间，那是不是我们就开放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或是刚刚听的地方你可能有点不是很清楚的话，也许就可以直接对 Cindy 发问，因为她经验还满多的，所以不要放弃机会，欢迎各位，然后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会由丁乃非帮忙翻译，所以不用担心你们的问题，你听不懂就再问一次，他们会再讲一次。或是对刚刚所讲的部分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呢？因为我相信在场应该有一些人是实务工作者，可能也带着工作上的一些经验过来，所以欢迎来对话。

A 男：我们现在身处台湾嘛，在亚洲东方国家，大家对于性的恐惧是严重的，这严重影响到爱滋，不管是认知上面或者是去污名。在所有恐爱滋的人眼中，爱滋已经不是一个疾病而可能跟性有关，是个道德的问题，是个谕示人性腐败的问题。那在未来如果想要在爱滋去污名的步调上面，或者是未来的进程上，应该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社会，或者是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爱滋：它就是个疾病嘛，不是这么复杂的。

Cindy：我提出两点回应。第一点是美国 1950 年代其实有着非常对性的强烈恐惧，而历史地来说，性传染病与爱滋的出现也同时开始挑战这恐性的文化。一直到现在，这恐性文化都还没消

失。或许我们对性文化的存在有个误解，我觉得每个文化中都有忌性的成分。如果你去看美国 1950、60 年代小说里呈现的同性恋，你会看到那种惧怕，也会看到很多国家与众人所施加的恐同暴力。不过，你也会看男同志是如何活跃地在进行性的协商、以及他们如何创发「性」。黄道明对台湾戒严时期的同性恋研究也彰显了这点。所以说，即便国家暴力和恐性文化的作用强大，同性恋文化却仍发展出积极正面的关系，因而规避了压抑社会可能带来的一些伤害。

黄道明：我附带提一下，她刚刚在演讲里提到爱滋防治文化正在大幅摧毁酷儿庶民文化。比如说，以前你去新公园，就会看到老鸟带小鸟出道。这种根植于生活经验的性文化，也就是男同性恋世代相传的钓人文化，正被新兴的性健康文化摧残，因为眼下你面对的是专业人士，而不是混迹玻璃圈多年的老鸟。

Cindy：1980 年代美国和欧洲同志运动里的保守路线开始崭露头角，而且正逢爱滋政策开始成形之际。那时要所有同性恋都出柜的呼声很高，不过同志身分浮出台面带来的却是暴力的滋长：美国发生的状况是，警察扫荡同志酒吧的频率随着同志的可见度而增加。另方面，同志身分同时也开始与公卫连结，因为官方有辨识人群的需求。假如社会上出现了一群同志公众人物，或者有群人觉得一定要把自己的同志身分公诸于世，那么这群人就很有可能和公卫部门衔接、唱和。因此，同志公民身分就一直有个吊诡，亦即，同志所获得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和国家缔结做为代价的。重要的是，这就牺牲了许多不愿认同同志身分而又积极快活、不染病的生活方式。但是官方却无法认知到这点，因为它们的模式就是，「不行，你必然得是个同志」、「一定有种当同志的特定方式」。我们很清楚社群里有这种人存在，但是政府就会认定这些人专门在干坏事。

B 男：刚刚最后有讲到，说不要再相信数据，然后回到性解放，就是我们自主知识的那个时代。可是我会觉得，这个放在好像台湾脉络有点难，因为就我所知，台湾同志社群开始变得显着，基本上与 1980 年代爱滋被发明出来同时发生，然后造成很大的恐慌。也就是说，同志社群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其实跟整个公卫就是绑在一起，你很难去追索，在那之前会有一个所谓的知识自足、自由的时期。当然那可能像是黄道明刚讲的，比如说可能在 228 公园里面有那样那种口耳相传的所谓庶民性文化。可是问题是，就我所知好像很难看得到。又比如说，在卫教知识渗透前，有没有一个早先的知识世代？这是我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刚有讲到杂志或 bar 跟公卫当局有一个长期的合作。就我所知，台湾也是这样子，某间在北部、最近开始重新营业的一家 gay bar 店，其实最宣扬自己的那种健康、阳光的形象，然后也是非常积极的去跟医院体系合作，并且不断地去讲自己的反毒理念。就我所知，它会这样做其实是，它一开始在经营的时候，就跟很多毒品问题牵扯不清。另外一个是说，最近政府在清查跟所谓男男按摩师合作的店，其实男男按摩师就一定要和店家合作，因为如果不合作的话，基本上现在是处于合法与非法边缘地带。所以，商家在合作上其实有一些不得不然的理由，不知美国是否有同样的情况，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谢谢。

Cindy：我觉得台湾过去长期戒严管制，但解严后，事情一发生就进展飞快；相较之下，同样的事情在欧、美发展的步调就慢很多、或从未发生过。不过这边仍有些重大的差异需要指出来。在美国的大多数州里，同性恋一直到 70 年代都是违法的。这种状况我当时是知道的，不过后来自己也忘了，一直到因为最近从事那年代的研究，才又记起来。在研究过程里，我翻阅了近三十份、由不同城市所发行的同志报纸。现下美国年轻一代同志都忘了，同性恋罪刑化的年代其实不远；在他

们的想像里，法律通通变了。然而重要的是，1970 年代的同性恋非法性确实影响了彼时同志健康运动的开展，而这正是我目前正在研究的研究。那时同志健康开始官僚化，而我觉得这和台湾现在发生的状况颇为相似。基本上，同志医生就是在医疗业的顶端，再来则有同志社工、同志护士，他们也试着在其职业组织里集结、成立次团体。这里出现了一个吊诡：一方面，他们想要做出一个公民权的宣称，也就是我应有公开当同志医生、同志护士的权利。然而他们做的第二个宣称实际上就较为屈就：他们说，我们的社群需要有更好的健康。这显然在后来的医疗从业者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这种张力在整个 70 年代变得剧烈。政府那时有经费补助成立少数族群的地方健康中心（主要是黑人），而同志健康专业者就跳出来说「我们也要！」所以来这个时期就有 5、6 个同志诊所成立。这些团体后来成立了一个全国连线，出产了第一份就我所知最早的「安全性」指南。不过这些团体也在过程中一直遭到批评和异议。黑人社群中心和健康中心分裂为社群和黑人专业者的对立，前者说，「黑人医生跟白人医生没两样，没在为社群服务。」同志诊所也有相同的状况。在同志报纸的读者投书栏里，有人就写道，「这家诊所摆烂，没真正为我们的利益代言。」

那时采行反殖民修辞的激进左翼同志是和黑豹党一起合作的，1976 年他们草拟了一套全新的美国宪章，而里头就有着较为反恐同的同志健康修辞。他们也开始把恐同当作一种疾病来谈论，好为有这种病的人进行治疗。那时人人都在读法浓的《黑皮肤，白面具》，而且会把同志医生视为中介／仲介美国殖民式公卫体系和一般民众的殖民力道。这些都是当时提出非常重要的分析。

Cindy：这奇特的政治组合后来集结，在 1979 年成立了一个叫做「全国同志健康连线」的组织，他们相信能与卡特总统主导的政权共事，并且出产了一个庞大的文件，里头提及了四项方案

。第一项方案是全国健康照护教育方案，对象是那些愿意和同志一起共事的执业医生。第二项方案则是让同志医生可以在国家机构进行研究，用以改善性传染病的诊断技术。第三项是把恐同视为病症的新研究议题开发。让我吃惊的是，第四项叫做「免疫预防」，其指的是性传染病的疫苗。很有意思的是，80 年代以降的爱滋年代一直盛行着找出爱滋疫苗（好终结爱滋）的思维可回溯至此。第四项里还有个分项，基本上是 B 型肝炎感染的暴露后预防，而这可看出来他们在倡议男性接种 B 肝免疫球蛋白。就在这些方案送往联邦政府之际，保守基督教右派人士 Anita Bryant 发起了「拯救儿童」的倡议活动。美国政府于是立即表态，不愿再跟「全国同志健康连线」谈下去了。而这时右派人士也开始进行两项倡议。一是防止免费提供的法律服务从事同性恋合法化的运作，另一则是删去在同志三温暖进行的性病防治计画。

黃道明：Cindy 这边提到的「免疫预防」历史可用来对照现下爱滋防治推行的 PrEP（暴露前预防）。虽然爱滋疫苗问世依然遥遥无期，但抗爱滋病毒药物在防疫上的新用（即晚近「治疗即预防」全球防治方针）使得 PrEP 的推广落入流行病学的疫苗接种逻辑：让高危险群未感染者和感染者都服用抗爱滋病毒药物，以期降低所谓「社群病毒载量」、好降低社群内的传染。不过，对抗爱滋病毒药物长年服用可能造成的副作用是目前各国公卫当局刻意避重就轻的。

丁乃非：我大概补充一下 Cindy 提的这个时间点。她的意思是 1970 年代那个阶段同运里头的政治张力，一方面有个解放跟反殖民的路线，可是另一方面又已经出现了专业化、体制化的可能性以及人员，然后这些社群内部的不同区块，其实也已经出现了张力、对抗及批判。她刚刚讲到同志专业团体与卡特政府的合作计画，是因为有了这个可能性、能够提出这样子的方案，才会出现右派的大反击。于是，右派的反扑大大地搁

置了一种带有激进路线、可是又很矛盾或者吊诡的一种路线进程。

黄道明：这段美国公卫史跟台湾有着什么样的对照呢？Cindy 刚刚说台湾历史很压缩。2011 年四个同志健康中心的设立当然是台湾同志健康文化浮现的一个重要指标，不过在这之前其实有个涉及本地爱滋产业在 21 世纪初兴起的过程。莫约 2000 年初中期，成大护理系柯乃茨教授在其研究计画下带出了第一批从事同志爱滋防治的同志健康专业者，接着在农安轰趴事件后，爱滋列管重心从公卫转移到医疗／照护端，过去十年来爱滋个管师制度规模逐渐扩大，这是台湾同志健康文化出现的大致历史脉络。

赖丽芳：Cindy Patton 把国家政府跟一些民间机构专家学者视为政策的中介。我想问的是，如果专家学者跟一些民间组织现在拓展出的某种矛盾同志路线，已经开始往下扎根了，它基本上是个综合版的国家政策，不能太威权，所以其实是怀柔的，会跟你用爱的语言，然后用关怀的方式要下游的人去服从它。所以会不会有遇到一些状况，就是本身患病的人其实是自愿接受这套方式的管理？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再来就是，我也在思考台湾跟 Cindy 讲的那个脉络可能会不同的地方。在我自己位置上可能看到的不多，所以我就只能就我观察的讲。我其实是一个高中夜校老师，我觉得老师的位置基本上现在也被国家赋予某一个辅导的角色，就是要往下去把高关怀跟高危险群的学生给找出来，然后去通报跟列管。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也有点在扮演刚刚 Cindy 讲的那个中介角色。我昨天在课堂上的状况是，班上在谈一个唐氏症的学生，然后是用嘲笑的语气，后来有一个学生就说没关系，我们要关心他，这个话题就此结束。我要讲的是，其实根本上就应该要有人站出来就说我不需要这种关心。事实上，我接触到的那些学生就是奇奇怪怪的，不管身体上或者是心理上或者是性

别上都很奇怪的人，可是他其实在那个现场会是沉默的，那个关心为什么你不要，会变得好像让人很难以接受，所以没有人会站起来要反抗这个。我就说，那不需要，请你收回去了，可是我会觉得这就有点牵扯到台湾的脉络，因为我读过甯应斌的文章，他的分析是说，台湾虽然也有同志文化，可是其实我们引用的酷儿其实是在学术圈里面，而且酷儿这个字如果你拿到底层去讲的话，没有人会认同这个位置。但是我不觉得因此台湾人就没有酷儿，只是说这些人没有文化、他们没有可以表达的空间，所以在那个空间里面没有人会站出来，这其实好像也是可以预测的。所以我也是要讲那个专家学者的位置，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位置，有没有可能被国家赋予的某一个位子，或者是运动赋予的某一个位子，然后你以为自己在做好事，可是事实上有没有可能你也是在帮忙管理，也有可能加强了学生跟学生之间都互相监控，所以人跟人是互相监控的，因为大家觉得那一套很好啊，为什么要质疑，如果你不质疑那一套的话，大家其实会互相监控。所以学生之间发现彼此有问题，哪个人好像怪怪的，他们其实也会互相通报。有没有可能在往下游一点的话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出现？

Cindy：你刚提到的是个蛮普遍、广泛的现象，尤其像是台湾这种带着深厚威权历史之地，状况可能更为剧烈。在处理这段同志公卫史时，我想探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男同志为什么会那么迅速就位？他们的主体性是如何形构的？我提出这段历史，目的就是想提醒人们，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存在着经历同性恋或身为酷儿的另种方式。

丁乃非：因为她在做历史的研究，所以她其实是要问，在那样子的历史过程里头，也就是这个建制化以及在这个建制化过程里头，专业的同志是怎么这么快就站上一个位置：这么快就位的主体性到底是怎样的主体性？可是同时她也想看，其实历

史化会让她能够去问不必然如此，然后那些没有就位的那些路途是怎么样，那些资源是怎么样，那些可能性是什么，所以这个脉络里头的条件是怎么出来的，其实是让人们可以想多一点的。

Cindy：你刚才把个双重的张力描述得很好。我们都想贡献己力，让世界更美好，然而在我们身处的空间里，许多政府老早就有堆关于什么才叫做好事的修辞形构，而官方的定义不见得和你认定的相契合，也有可能你觉得在替政府成就美事，如此一来便制造出了不良的效应。我觉得老师也好，NGO 工作者也好，唯一能占据的位置就是永远持着存疑的态度。假如我做的和政府做出来的完全一样，那一刻便是我开始忧虑的时候。

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问题，在学院的研究工作上，我得和自以为进步的同仁角力着。12 年前我刚拿到这份职位的时候，我被期待带进大笔研究经费、引进许多公卫人士包括医生和护士。到了第五年，我在一个社群里工作的时候，发现社群里的人对研究者想发现什么早就摸得一清二楚，而研究人员也就这样生产出了知识，彷彿把社群中人都当傻瓜看，然后研究者就带着让社群摸不着头绪的方案回到社群，叫他们做这做那。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教导人们如何对抗研究人员，最后，我连研究经费都不再申请了。我们一群人打算成立个叫「研究者反研究」的组织。我过去 7 年来做的研究都可称之为「与研究对抗的研究」。相较于研究者提出的问题，让我更感兴趣的是研究者缺席处境下所引发出来的问题。

丁乃非：我觉得她在讲的是，其实整个研究建制体制也是要放在我们的思考中，也就是那个体制（而不是社群）其实左右了我们如何问问题。可是社群本身其实清楚地不得了，这是研究者深陷其中、一种很麻烦的状态。

王 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差不多了，刚刚这边有举手，好，我

们最后就这三个问题，那我们可不可以把问题都先讲完，然后她一起来回应。请尽量减短，我们结束之后你还可以私下跟她聊。

情 僧：刚刚在谈论这个知识状况的时候，我们一直忽略了美国跟台湾在这个后冷战结构已经留下某种知识上的连续性。我把它拉开一个时间轴来看，就是我们从 2012 年的麦金侬年底来台的法理女性主义演讲，到 2013 年 2014 年 Lisa Duggan 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演讲，跟现在这场摆一起来看，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其实性健康的议题要与性保护对照来看，就像方才提问者提到校园保护机制，保护跟健康话语的一体两面性在台湾其实是非常同质的，就像护家盟跟同志婚姻看起来好像两个不同的集体，但他们其实是同一套东西长出来的不同的枝枒。从 Lisa Duggan 的讲法来看，台湾在解严后马上就是接受了美国这个部分的新自由主义治理外移的状况，那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的性保护政策或性保护话语一直延续着法理女性主义者的妇女保护方式，它也间接跟男同志的性健康话语打造了某一种神秘的共识。我好奇的是，男同志性健康的知识生产状况在国际上的布局会是怎样的。

王 莘：我得说，只能很快地设法理解你想问的，但是我会建议回答可以就尽量，会后我们还会有时间。

丁乃非：我就尽量翻译了。

C 男：我是念生物的，我要讲的是 PrEP，刚刚讲到爱滋疗法跟疫苗的比对，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因为疫苗是说你打这个疫苗后，就从此以后可以对 HIV 免疫，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理想，已经研究 30 年都没有任何成果，这跟拿 PrEP 出来当疫苗的疗法有天壤之别，所以我想要指出这个差异。然后我最想问的是，现在政府一直恫吓我们，说台湾是亚洲四小龙里面 HIV 感染率最高的。但其实我们去看了报告后，就发现其实跟欧美国家的感染率差不多，台湾只是比日本、南韩

、香港、新加坡高了一些。我想问，是什么样子的文化结构造成这四个国家感染率较低，因为跟这四个国家比起来，我们知道台湾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同志运动的兴起。

A 女：不是吧，薪资也差很多啊。

C 男：可是基本上医疗水平是类似的，台湾拥有的是最优秀的，可以说是全额的医疗补助。

D 男：你是指「全国医疗服务卡」。

C 男：对。再来一个问题跟医疗补助问题有关，因为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HIV患者因长期服用药物、一直使用政府经费，就被很多反同的人或是其他异议人士认为他们在浪费政府税金，这里就有很可怕的歧视存在。然后现在很多民间团体跟政府在讨论自负额的问题，那自负额这个政策的讨论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想请Cindy帮我们来解释分析一下。

王 苹：这个要喘一口气，就是她要先了解台湾国家目前对爱滋的一些作法，像是自负额。好，我们尽量翻给她听，如果她理解的话，但是如果没办法，也请让她用她的方式先回应。好，最后一个问题。

小B：我给回馈就好了，首先能够在感染三周年的时候来听这场觉得很值得。我想要回馈的两个点是，第一，先针对黄道明提到他不想把Safe Sex翻成安全性行为，这我还满能够深理解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面对就是，每一次约炮的时候，会想到安全性行为在台湾已经变成一个僵固型的规训。我同时是同志谘询热线跟爱滋权促会的志工，每次出去巡回演讲的时候，会理解到它其实造成了一种僵固的想像，而我们很难去跟政府沟通的时候直接去面对。譬如说，若你使用药物或是采取无套性交，这时你就没办法出声。另一个点我想回应赖丽芳一下。我本身可能因为斗M的性格，所以就进入了这个爱滋体制，我自己是还蛮接受的，是个蛮被驯化的感染者

。可是，在驯化的过程里，我同时接受了论述跟实务经验的交错冲击，所以我会觉得在台湾的同志运动里，我们其实面对一个很重要的挑战。爱滋运动常提的是防治条例第 21 条，也就是蓄意传染罪。这法条其实会造成一个反挫，就是说，我每次巡讲时，我都好像要先讲说我是一个很乖、有定期服药、愿意被追踪被检视的感染者。但是那其实就在区分感染者的好坏，就是说，你今天是不是愿意表态，你愿意站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符合某一些条件你才能站出来发声呢？如果今天跟别人讲说我是愿意、我就是自愿当个感染者的时候，其实在同志的不同社群里或者是不同的 NGO 团体去看待这个感染者的主体时，会造成不同的想像。这些想像其实在对话上造成了局限性，况且感染者跟感染者之间其实就有位阶存在。如果你今天就是说，我就是想要得病啊，那又怎样？那就会没法让感染者拥有一个位置去看待性解放这件事情；它造成一种分裂，因为我们只要面对罪名、套在自己身上时，就会造成内化恐惧，就好像我自己目前还在处理毒品管制条例的案件时，我就会更同时面对国家机器，即便我每一次回去地检署报到，它也是同时在关心我，问我你有没有按时服药，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在台湾，道德造成的这种罪犯条例其实压缩到很多我们如何去看待疾病，或者说回归到一个人的本质，看他如何去接受这件事情。

王 莹：谢谢两个大问题，虽然你们是不同位置，但是问题都很大，然后两个回馈也麻烦 Cindy 一起做回应，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好意思压缩大家，但是我们还有机会私下再对话。

Cindy：我想我可以。

王 莹：她喜欢接受挑战。

Cindy：我依序来回答问题。我跟 Lisa Duggan 不一样，我是社会科学家，在思考上比较强调社会理论，尤其侧重 Pierre Bourdieu 提出的官僚化理论。众所皆知，Bourdieu 的官僚理论受韦伯

影响深刻。Bourdieu 认为，在官僚体制的个人要面对两个要求，一个是不论其职位为何，要做好专业，像是好医生、好会计师等，另一个则是当个好官僚。碰到从社运出身的人，我会说还有第三个要求，那就是当社运的好人。所以我尝试描述的是，同志医生来到了 80 年代就变得很有问题。在很多脉络里，他们做了许多好事，但我认为，从某方面来说，他们在往前推进时冷落了性解放思想，他们要为此负起责任。他们想当好医生，也想当好官僚、好公卫专家，然而却未曾理解到，他们早已不再与社群有所互动，也因此变得高高在上了。方才听众提到社群内部的分裂，就是同志医生制造的。所以现在有好、坏病人之分，如果你不遵从医嘱去过你的性生活，那么你就会被认定是个劣等病人。

丁乃非：Cindy 认为从同志社群跟运动出来的人就会、也想要成为社群的代理人。有点惨的是，在她看到的材料里，过程往往变成是专业跟官僚行政的面相取胜，而越来越忽略或开始忘记他跟社群的关系。

Cindy：提到官方如何操弄统计数据的问题，我觉得台湾是个有趣的案例。1980 年爱滋成为全球现象时，有两个国家异常热衷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一个是刚走出极权阴影的乌干达，另一个就是台湾。台湾有很多医生和研究者都是留美的，而我觉得台湾以一种奇特的爱滋研究取径在和全球接轨，此刻被视为全球准则的「治疗即预防」就是个例子。如果你去看「治疗即预防」发迹时的讨论，他们引用的就是台湾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后来消失了，因为医疗研究者向来只会引用最新的东西。说来真的很奇怪，但台湾当局在与「治疗即预防」接轨时，表面上看来符合世界标准，但其实一直在重新贯彻早年的防疫政策。

黄道明：也就是说台湾算是「治疗即预防」的先行者。刚刚 Cindy 提到被引用的那份台湾研究，我记得没错的话，是由台大方启

泰医师领衔的研究团队写的，这份 2003 出版的论文指出台湾免费的爱滋治疗政策有助于降低感染率。有趣的是，这项研究红到国际，但至今还没被官方拿出来褒自己、成为「台湾之光」。

丁乃非：他们不会那么想要褒自己，因为 Cindy 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早期的数字的来源正是延续了极权制度，所以很清楚就是极权制度的强制性跟公卫早期的一种合作，造就了一种在国际学术研究上可以跟世界卫生组织连上线，有点像是捷足先登，而能变成那样，本身就很奇怪。

Cindy：最后关于爱滋入罪的问题，我会把它称之为「爱滋再犯罪化」，而这也同样发生在加拿大。说来震惊，但加国是世界上起诉感染者比率最高的地方。最近有两起最高法院的案例都再度确立了原先「未进行告知」的罪罚。值得注意的是，司法过程里纳入了辩方律师提出的病毒量检测。被告说，虽然未进行告知，但我的病毒量测不到、没有传染力，这有啥差别呢？结果官方说，不行，管你三七二十一，就是要定你罪。所以现在变成不但你病毒量要测不到，而且也要带套才行。所有的医生都觉得这很荒谬！

我觉得在台湾服药成了区分感染者社群的机制是很耐人寻味的，这有历史因素在作用，值得深入探讨。但对我而言，最可悲的是社群自己愿意去做这样的区别。在演讲里，我提到了《爱要怎么做：爱滋蔓延中的男同志性爱指南》。上礼拜黄道明问我，这手册的两位作者都是感染者吗？我本想回他说，这有关系吗？在那时，感染者与非感染者是团结一心的，没人在分谁有没有感染，因为根本没差。后来随着感染者走入复杂的历史、与社群、医生建立关系，感染与否的区别变得越来越重要。上面提及那两件爱滋诉讼案的最高法院判决出炉时，为数不少的男同志竟然拍手叫好，说那些感染者罪有应得，实在令人心寒。事实上，就是这批人在帮国

家撑腰、起诉其他的男同志。对此，我实在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不过，我觉得做为社群一份子，不管政府怎么做，我们都有义务扛起对抗分化的任务。社群已经够小了，实在无法容忍这样继续分化下去！

王 莹：非常感谢今天 Cindy，我觉得她非常有一个历史向度，甚至是一个政治的脉络，让我们去理解当同志健康这种看似普世价值、这种好的想像已经深入人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在此刻作为运动者、作为专业者来重新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非常多内在可以对话，今天也谢谢各位提供大哉问，让我们的对话更深入，我们希望继续对话。最后可不可以给 Cindy 一个热烈的掌声，非常谢谢大家。最后我觉得，我们都站在应该说同一个岗位上，我们希望来做点所谓的好事，但是我也期许我们自己能够对自己有一些永远能够自省的可能性，然后看看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是不是我们有真的在远离社群了，远离自己，好谢谢大家也鼓励自己，谢谢。

跟 Tina 谈谈

梦幻成真之际

Cindy Patton 着；张竣昱译；黄道明校订

甲基安非他命的结晶熠熠生辉，闪烁得像是夜空中的点点星辰。每颗粒都可能许你无尽的狂喜，也都可能要你沉入那夜色所揣藏的无尽毁灭，有多少生命受其蛊惑而从此坠落……
(Turner, *Houston Chronicle*, June 21, 2005)。

在洛杉矶，社运人士四处发送印有「扔掉 Tina」的别章（Tina 是甲基安非他命的俗称），不过已被冰毒蒙蔽的人们却充耳不闻。今年春天，「男同志健康危机」(Gay Men's Health Crisis) 组织的志工在曼哈顿举行一年一度的同志狂欢派对里穿梭发送保险套。晚近传出有冰毒使用者可能已经感染了新型超强 HIV 病毒株的报导，深深震撼了这群跑趴者。不过在咫尺之处，就有两名男同志在烟嗨、进行无套肛交 (Jefferson et al. 2005, 41)。

美国人很爱消费性爱、毒品、死亡这些话题，若有新闻结合这三件事就更有卖点。就某方面来说，过去几年来「冰毒如何危害世人」的报导愈来愈多，其实也不过是大麻风潮、天使尘与精神分裂、古柯硷和妄想症等这些既有故事的又一篇章。事实上，这些冰毒新闻和先前对毒品的一堆歇斯底里报导在叙事构成上有很多相似处，像是说某种毒品以更危险的姿态「重返」市场¹（「相较于1970年代毒品在西

¹ 《波士顿环球报》有个挺奇怪的说法，报导叙述Tina的移动轨迹（有点像解释HIV传播路线会看到的那种地理学式的解释），将其起源地定位于「大都市」——特别是美国恶名昭彰的鸡奸地域。在报导中，性爱用药突变为乡村危机，转折非常快。这个驱使男同志性爱与HIV感染的药物，也让乡村里的异性恋者个个都变成了电影《我俩没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 里面的鸳鸯大盗：

岸不法的飞车党中受欢迎的情形，冰毒在现今的市场中更加强大」（Zielinski, *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 March 6, 2005））；说此毒的危害更甚以往（「全国县级协会准主席Bill Hansell说：『这种毒品对社会和环境所造成的问题，比以往其他毒品还要严重』」（Jefferson et al. 2005, 41））；说此毒对社会特定群体特别有吸引力（「专家们担忧愈来愈多人，特别是男同志，依赖毒品的提神效果」（O'Conner,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2, 2005））；或说毒品危害个人心智健全，导致人、我界线混淆，从而对自己和他人身体都造成危害（「用毒者成了他们先前破碎的自我：行尸走肉、牙齿溃烂、面容消蚀、偏执妄想」（Zielinski 2005））。

面对爱滋和性爱的媒体再现，我们尽可援用已然成为典范分析模式的道德恐慌理论来加以审视，不过Stanley Cohen（1972）关于道德恐慌的名着虽然后来Gayle Rubin（1984）修正过其在性的相关论证，但仍有其局限²。即便这个社会学理论曾经很有解释力，但是我们却很难在晚近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责任个体化的镇静修辞中发现有什么恐

冰毒从西岸渗透同志社群后，一路移动到中西部的密苏里州、爱荷华州、印第安纳州等州，在乡间小镇落地生根，搅扰异性恋生活安宁，有时还引发犯罪肆虐（Smith, *Boston Globe*, April 24, 2005）。

这里的逻辑运作跟我在它处（Patton 2002）讨论过的一样：在发展中国家，HIV从男同志扩散到「性交易工作者」。男同志似乎总在在异性恋人群中孵育「流行病」的诡异能力。

- 2 在此概述一下我认为道德恐慌理论的问题。首先，这个理论隐含了一个类马克思主义的底层和上层结构模型，然而这已经不再适用于我们所理解的社会过程。确切地说，道德恐慌理论似乎预设了有个潜藏的议题（经济或环境剧变），让一个原本平衡的社会陷入混乱。在这种说法中，最后的解决方式就是（把某些发生在根本层次的问题）置换成Stanley Cohen所说的「公害」（folk devil）或Gayle Rubin说的「酷儿」身上处理掉。问题就出在这里：为何要「下探」去找对次文化形式发动的攻击？难道炮打公民自由或次文化形式本身就不是一种攻击？其次，道德恐慌理论预设有种围绕于议题表面的「恐慌」——在冰毒案例中，指的是性爱、毒品和疾病之间的连结。然而「恐慌」这种心理学式的说法也没有详细的解释。这种恐慌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又是何以知晓恐慌的存在？道德恐慌给的答案是套套逻辑式的重复：当局要是祭出了个搞错方向的管制措施，你就知道有恐慌存在。但这种恐慌是在基本层次（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得有证据来证明这大规模现象的存在），还是在国家的层次上运作的（这就需要另一种非常不同的证据）？如果两者皆有，那么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交互关系为何？探索这个问题会把我们带入某种理论框架，即国家与其中介者如何利用恐慌、导出人民和国家的逻辑一致，以便让特定政策的制订看起来言之成理。但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就再也费不着做底层与上层结构之间的置换了。关于道德恐慌理论应用在都市「性」研究所产生的问题之进一步讨论，见Patton 2005。

慌的存在。的确，此类新闻论述采用了Nikolas Rose所称的「审计文化」（audit culture），也就是用一种算计过的语调来说什么人在何时会死。若说过往的国家监控透过阿图塞（1971）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学校教育、宗教及家庭）进行，此刻的社会控制模式已然转移至微观的层次运作³。没错，白种中产美国人身怀种种恐惧，媒体只需稍稍暗示即可引发。讲白一点，种族主义在美国依然横行，这无须科学证明。不过一旦涉及性偏差和毒品，此间当道的是窥淫（voyeurism）而非恐慌，至少对这两样都爱参一脚的战后婴儿潮世代来说是如此。

道德恐慌的分析框架大多认定再现恐慌和引发恐慌间有很大的差异，其所预设的是媒体助长了恐慌、促成当局祭出因应罪罚措施的情境。在这篇论文中，我采用了非常不同的分析模式。有别于以往追溯道德恐慌的生产过程，我想从其对立面着手，关注「镇静」策略的运用。举例来说，《新闻周刊》（Newsweek）（Jefferson et al. 2005, 41）分明对用药者做了超级夸张的描绘，然而一旦现象炒作过头，记者便会适时引用专家的话来冷却一下。恐惧的炒作与冷却原来是用来巩固现状。报导描述用药者人生被冰毒「毁了」，在引用最夸张的用药者统计数据、指控布希政府搞错扫毒方向（大麻）之后，写到了最令人感到恐慌之处：

事实上，很少市政当局（尤其是乡村地区）有资源来对付冰毒的肆虐：毒品实验室爆炸，造成毒虫及其家人残废或死亡；有毒废弃物四溢横流（每制造一磅的冰毒，就产生五磅的有毒废料），造成社福紧缩、暴力犯罪增长。

但记者紧接安抚读者面对「社会问题」，其格外温和的语调彷彿萃取自「毒瘾戒治十二步方案」（twelve-step programme）般，坚信戒治者永远在修复中而非完全康复：

³ 在此及下文我会指出，无法超克社会理论辩论中常见二元论（即微观和巨观层次的相对），正是进步人士难以遏阻向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实践一面倒的原因。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不仅曾批判、饶富趣味地分析过新自由主义的运作机制，也长年致力提出分析工具（尤其是*Distinction* (1984) 及*Homo Academicus* (1988) 这两本专著），以审视微观和巨观分析之间的关系。

该严肃而冷静对待的是，这股流行病正如成瘾一般，仅能暂时抑制，但无法根治（Jefferson et al. 2005, 41）。

这短暂一刻的冷处理意味有关当局（这里特指美国缉毒局、市警局和成瘾治疗专家们）虽然压力沈重，但他们最终一定可以战胜冰毒——只要「我们」有和毒品流行爆发的潜在危机「共处」的体认、意识到「我们」无法「根除」问题。这种策略与布希政权处理其他问题的方式同出一辙：先是以一种歇斯底里至极的方式陈述问题（如恐怖主义、飓风），接着坚称相关人员已就位、大致掌控局面。这种恐惧／镇静的叙事策略是在为现况辩护，并要读者「早点习惯」。这不是道德恐慌，而是一趟恐怖鬼屋之旅——在目睹了吸毒殭尸、制毒所爆炸、无法抑制的病毒扩散之后，当局再提供民众一张地图，让他们按图索骥、平安回家。这前提当然是，他们愿意接受当局引导，同时立志变好。

在这篇论文中，我回顾了近期的冰毒报导（2004至2005年），特别是「冰毒HIV超级病毒」讹传被驳斥后出现的报导（2005年5月），来呈现镇静策略是如何将那些禁不起检验的证据（无论其出自医疗科学的研究或社会科学研究）予以合理化。我先前曾为文指出，道德恐慌的存疑诠释法可能会忽略掉这些新闻报导解释中更重要的「表面」因素。早年我曾做过一个关于恋童案件的新闻再现分析，那时把重点放在报导中的恐慌片段（Patton 1992），不过这样做忽视的是记者如何建构了那些「受害男孩」劳动阶级出身的地理环境。在后来做的反省中（Patton 2005），我体认到那则事件报导根本不是性恐慌的置换，症结在于那种报导是以镇静、窥淫的方式来侧记邻里内部的生活纷争问题。同样地，把现下的媒体冰毒报导看成是引发恐慌的范例固然很吸引人，但事实上，仔细探究后会发现，记者比较像是在安抚读者，而非引发恐慌。这种报导方式在社会陷入恐慌时，不仅无法阻止草率的政策推动，反而正当化了一样很有问题的歧视及医疗监控体制（正因后者以科学为据，所以压迫作用更为狠毒）。

虽然此间媒体的冰毒报导有升高迹象，特别是痛陈它与性爱的直接关连（包括染病的性），但还是很难认定这是恐慌。状况看来反而

像是媒体（以及许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再度活化了早年爱滋报导就已建立的一套科学逻辑，而这套逻辑同样也镶嵌在媒体、政策拟定者与同志媒体的互动中。我的旧作曾揭示，正是科学表象让记者得以产出看似客观的报导（Patton, 1990; 1996; 2002），而这放在冰毒报导上也同样成立。不过，此刻所见的是科学逻辑形式的扩张：记者不仅运用了生物医学的研究成果，断言男同志使用冰毒与爱滋感染率的关连；他们更懂得使用社会科学数据，却不在意如何筛选立论不同的研究。若说记者真的在挑拣研究成果这方面有所长进（我不是在说他们变得多厉害），那么他们对社会科学界里哪种研究相对可靠的争辩显然所知不多⁴。

我下面想谈谈最近冰毒报导中的一组「镇静」手法，以便理解自然科学是如何利用某些品质堪忧的社会科学。第一部分我先说明记者如何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认可、揭露，并且试图减缓男同志性爱与毒品的相连组合对「同志社群」所造成的伤害。这种以反恐同为名对恐慌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同志人权的里程碑，因为报导大致上都先认定男同志存在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的代价，却是先预设男同志的公民资格需具有什么样的条件。报导要求男同志个体的性爱必须责任化，而这和都会中某些抗拒被异性恋正典模式同化的重要酷儿性爱形式（例如连场电音派对、私家派对、SM偷虐空间等，而这些同时也是社会流行病学的研究对象）⁵，有着根本上的冲

⁴ 整个「镇静」策略之所以成功，社科研究者（他们容许媒体扭曲采访内容）和爱滋服务机构（太想要为自己的研究寻求发布管道）要负很大的责任。前者可以好好地去研读《布尔迪厄论电视》（On Television, 1996），后者或许也可以反省一下自己错误的信念，认为他们发出的新闻稿已打好了预防针、防止媒体滥用。

⁵ 以美国来说，男同志得在一套复杂的责任个人化论述规范下过日子，除了以桀傲不驯之姿、占据媒体讨伐的那个跑趴享乐空间，不然似乎没别的出路。除了以犯戒来打造出社会运动（但这其实不会发生，正如我在他处所指出的，社运的本质是要把庶民的各式性样态提升到一种普同式的性身分，除非是很极端变态，不然是不怎么火辣的！）（参见Patton 1990），那些无法逼自己进入异性恋正典伴侣关系（包括同志婚姻）的人，就只能在别无他选的情况下加入甲基安非他命无名会（Crystal Meth Anonymous, CMA）的行列，因而把同志社群重新打造成十二步疗法的全国性戒治团体。虽说写得有点夸张，但《新闻周刊》在一篇题为「派对，玩乐——并且付出代价」的报导里，对CMA所扮演角色的解释也大致如此：

曼哈顿的周六夜晚，三十多位男性鱼贯进入Ground Zero对面的高档饭店房间里升起轰趴。这些在网路上报名的趴客每人缴交20美元入场费给主办人，他们把换下衣物放进Hefty袋子交付保管后，就开始干起正事。一位年约三十的肌肉男，赤身

突。

第二部分我会显示一个科学事实的兴起、衰落与再起。虽说同志性爱烟晦在2002年就进入了主流媒体视野（Grant, Semple and Patterson 2002），但自从数篇「科学」研究在2004年发表后，报导数量便急遽增加。2005年主流媒体的相关报导达到最高峰，这时出现了一名纽约市「冰毒超级爱滋病毒感染者」的报导，但旋即被批评没有科学根据。一则被「揭穿」的医疗故事竟意外强化了社会逻辑，这乍看之下很反常（「超级病毒」概念的出现其实并不需用到冰毒——男同志性爱长久以来在媒体建构为淫乱而不安全性，单单这事实本身就够了⁶）。事实上，除了超级病毒这件事之外，其后的相关报导中关于冰毒的研究，并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新成果。2002年所发表的都是正港科学研究⁷，但并没有在健康业界内的专业通讯刊物流通（大多会重刊

裸体地坐在沙发上大口吸了甲基安非他命，几分钟后就躺在地上，开始和派对主办人进行无套性交。主办人凹陷的双颊、肿胀的脖子，还有突起的腹部，都显示了他多年服药对抗HIV的迹象。在卧房里，十几个男人全数在大床上群交，其中当中有几个药性当头，全身大汗、呈脱水状态。放眼望去不见半个保险套。「冰毒加上无套肛交完全是自杀行径，但这一整个又很解放、火辣」，其中一位趴客如是说。

在许多同志区中，甲基安无名会的参与规模跟戒酒无名会平分秋色，踏进这里，你会不断听到同样的故事。John四十多岁，在金融业工作，是个收入达六位数美金的纽约客，已经有了一点白发的他，不久前开始约炮用药。起初，John偶尔会在周五夜使用，后来渐渐从每周五变成每周五、六。最后，冰毒占据了他一周大部分的时间。每次被无止尽的派对搞得筋疲力竭后，他就爬进办公室厕所，蜷伏在马桶边，西装都没换下，就得赶紧偷偷补眠一小时。「你的视野变得很小」，他说，「最后你的世界就只剩下你、烟管和网路。」而对愈来愈多的毒品使用者来说，还加上个HIV。（Jefferson *et al.*, 2005）

6 冰毒报导和美国政策因应中的一个有趣面向，就是把放荡不羁的男同志、减肥的郊区女性，以及一无是处的白人垃圾（white trash）建构为三种不同的成瘾「流行病」。这些人群都受制于更大的社会认可系统，认定他们是「成瘾」的理想候选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是人人都会药瘾缠身。此项策略建构出一套谁会染上药瘾的「社会决定因子」，因而以医疗化置换了成瘾以及其他社会现象旧有的道德逻辑（医疗化是个未竟的现代筹划）。从社会和政策的角度来说，断不能做出人人都会受毒品诱惑、成瘾的假定，不然就会像流行感冒一样，人人都可染上，因而就得被一视同仁对待、得到应有的治疗和关怀。一旦疾病的道德解释失效（贫穷、肤色、年纪小小就有性爱等），社会与政策逻辑就必须建构出某些因缘际会。对那些用冰毒助性的，比较禁欲式的性生活是个别的「解药」，也是他们想得到资源就必须付出的代价；对那些施用冰毒减肥的人…好吧，就切断她们的供给来源（我们当然是不想翻转整个美体文化啦）；至于那些乡里穷人…他们被整合进新的经济体系后，过渡性的药物滥用就会停止了吧。在这些例子里，个体只有去认了她们的部分公民权后（例如单偶制、表现出适当的女性特质、愿意为沃尔玛工作等等），才会被视为值得社福援助。

7 事实上，HIV神经认知研究中心的研究，或许还比2004到2005年间许多急忙产出的研

相关新闻稿⁸），也没有得到重要报社的青睐。超级病毒的报导因而形成同一种专业知识扩散的引爆点：无论冰毒是否已在任何地方构成「问题」，它就是有潜在可能，因此对专业出版物的读者而言，得知冰毒、性行为和HIV的相关「事实」就成了一件必要的事。吊诡的是，2005年子虚乌有的超级病毒事件不仅丝毫未损及科学在新闻报导中的地位，还替这则故事留了白，让社会科学去填补。

第三部分，我会仔细地检视媒体的修辞手法，显示报导如何组合特定的科学研究、专业知识及人道新闻报导，从而将之塑造成「证据」来证明冰毒使用率升高（这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和HIV感染率升高（这迹象可一点也不明确）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就修辞手法而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当代社会科学的证据标准来看，报导中引用次数最多的那几份文献都有很大的瑕疵，尤其是相较于那种结合了不同研究取径的团队所做出的研究，其涵盖了纵贯性、质性与量化数据（这种研究只被媒体引过一次，而且还是在超级病毒被爆乌龙后）。事实上，到底该如何在男同志感染HIV的脉络里去探究性行为与药物两者间的关系，在方法上是有争议的：初始的单变量和二元变量分析确实显示两者间有关，但更复杂的分析（目前还在辩论的是，哪种互

究（大多都是爱滋服务团体做的）做得还好。这个中心有一个跨领域的团队，对于冰毒的社会和心理层面做了很多的研究，还包括了神经系统的部分，以及与HIV有关的脑部变化研究。

8 我在本文所采取的研究策略是，搜寻医疗相关的新闻通讯，找出其中采撷新闻稿的模式。这其实蛮简单的：我先用Nexus Lexus资料库对主流及业界媒体做一轮宽泛的搜寻，之后针对商业新闻社中频繁出现的相同文章（很明显出自同一份新闻稿）以及主流媒体报导里任何值得比较的「出现波动」，都进行交叉比对。大体上，在超级病毒报导出现之前，主流媒体文章看起来和新闻稿或研讨会论文集关系非常密切（新闻稿多在全国性会议举行之际发出，因而两者也常混在一起）。超级病毒报导出现后，「冰毒论调」开始发迹之际（政策和公卫机制全面启动后，故事还会继续发展）广泛涵盖了各种权威及研究，这之中大多数是全国性研究或后设权威，接着引用论文出版地所做过问卷调查，并仰仗地方公卫官员和专家，而这些人倚赖的资料则是来自CDC或几个大城市的主要研究团队。因此，冰毒报导中所说的「地方性的」扩大传染，自是需要解释「冰毒是如何进到这个地方」（而这几乎完全经由男同志——关于容易感染HIV群体之移动／停滞文化形象，可参见我先前的研究（1996）），同时也必须解释为什么地方官员似乎有着愈来愈大的专业权威：他们看似在从事前端、初级科学研究，而实情则是在做回收。无论如何，每当有冰毒性爱的新闻稿发出（而我就在2004到2005年之间找到四份），就被更多的业界刊物接收。我认为，这表示冰毒故事渐渐被视为各种医学专业（从律师到实验室人员）所需的重要知识。有了主流媒体报导后，就有愈来愈多的地方报纸派记者去发掘自家地区的事件。

动模型最佳)却显示，在插入者为HIV阳性且内射、被插入者为阴性的情况下，用药和无套性行为之间的关联很薄弱，甚至无关(在其他情况下感染的机率则是非常低)。举例来说，若把那份广受关注的美国研究跟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国立HIV社会研究中心做出的一份研究相比，就都会同意性文化的理论化及探究来说，后者在方法上显然有着更深刻的思考⁹。虽说不是人人都会同意此评价，但至少澳洲的研究方式对那些致力为大众建立新式科学的研究框架之人，是值得驻足思考的。不过，美国大报社记者还是直接把那份美国研究当成「事实」。重要的是，澳洲那份研究在社会科学界与爱滋领域里都大受赞扬，而且可轻易在网路免费取得(<http://nchsrt.arts.unsw.edu.au/>)，那些从事冰毒前哨调查的研究者还有那些乱报的记者，都该去找来读读。

9 澳洲国家HIV社会研究中心(前身为「爱滋行为研究单位」)的历史悠久，是个致力研究HIV感染人群的研究团队。澳洲还有一个和社会研究中心密切合作的国家HIV流行病学中心，但两者是平行运作，而非吸纳彼此的研究取径。社会研究中心里有质性与量化研究者，以独立或合作方式进行研究。过去几年来，美国研究者愈来愈倾向于新自由主义式的人类行为理解，并且在受到资助单位的压力下界定何为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子」，而这和质性或量化研究策略下描绘之社会生活复杂性是完全相反的。相较之下，澳洲团队却已然跨出大步、发展出新的研究取径来理解社会／性文化以及药物使用／文化之间的连结。因此，医学学士及博士研究者的养成训练就同时包含了社会心理学与流行病学，像是Limin Mao博士过去几年来的研究就用了民族志来描绘男同志用药的性爱「场景」。与过往将「异国风情式的情欲实践」直接化为风险高低阶序的做法有所不同的是，她借重了同仁在描绘「性爱探险主义」(sexual adventurism) (参见Smith等人的研究)时所采用的社会互动理论框架，因而得以在针对一群311名爱滋感染者所做的调查中，辨识出他们最近一次「跟约炮对象进行无套肛交」与「跟约炮对象进行戴套肛交」的差别。Colfax团队在研究感染者「不安全性行为」经验时即把各种相对感染机率不同的行为都纳入「不安全性行为」的定义，而相较之下，Mao博士的团队则把每个个体的行为视为在其自我掌控中。戴不戴套的时机差别在于个体猜测对方的血清状况如何，研究者这种实践称之为「血清状态配对」(sero-sorting)。社会研究中心里的另一位研究者Paul Rawstorne则进一步深化「性爱探险主义」(Smith等人)，显示感染者会透过不同的策略来减低传染风险，包括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行血清筛选(问对方、去感染者常去的地方等等)，以及「策略性地采行插入／被插角色」(strategic positioning)，也就是如果认为对方是HIV阴性，那自己就充当0号。同属这个研究团队的Gary Prestage的研究也显示，大多数用药助兴的男性都能够落实从事安全性行为的意图。虽然男同志用药的人很多，但这和HIV比例很高之间没什么关联。这个研究单位目前正在多个澳洲城市进行长期追踪调查，也从事民族志和访谈式的研究。由于该机构的研究同仁平时互动频繁，因此设计出多重研究方法来处理现实的机会也就多了。不像大多数的美国研究(多为一次性的普查或数据挖采)，澳洲研究团队对如何深度探究男同志之社会－性生活问题，已经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种作法可类比于生物医学的「基础科学」研究，而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我们快点来调查冰毒和药物」这种号召，或是企图找出关连性的研究，抑或是对出于各种目的搜集的资料做出的后设分析，都无异于炼金术。

安抚恐同症：脆弱心灵需强硬手腕伺候

过去几年来的冰毒男同志爱滋故事有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记者对爱滋报导被批恐同的敏感度提高了。这些记者花了很多的力气，从多方探究为何冰毒特别吸引男同志。《休士顿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记者Allan Turner引用了专家看法来解释其潜在因素：

德州大学公卫学院行为科学助理教授 Ron Peters 认为临床诊断有忧郁症的患者会把冰毒拿来当自我治疗之用（Turner, *Houston Chronicle*, June 21, 2005）。

长期被同志运动者当成抨击标靶、编辑室内部还传有「同志议题」写作风格手册（也许还有专责编辑呢！）的《纽约时报》，则是花了大篇幅探讨了男同志的历史困境。《纽约时报》也引了一位专家说：

任何成功对抗爱滋的战斗都必须处理忧郁症、药物滥用，还有自尊心低落的问题。研究指出男同志为这些问题所扰的比例特别高。「许多人或许会这么认为，做一个群体，我们全都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这是因为我们都曾被社会所排斥、被家庭、教会所拒绝，而在最近更为政府所拒，这些种种当然都对我们造成了冲击。」Halkitis 博士如是说。

虽然《纽约时报》某程度上肯认了爱滋流行对都会同志社群造成的影响，不过在此还是得借一位受访者之口来强化其真实性：

「我们是长年幸存者，眼睁睁地看着朋友离开，从没想过自己竟存活了下来、还碰上中年危机」，爱滋感染者 Staley 先生如是说，目前他正在戒除冰毒成瘾。「然后新药（抗爱滋病毒疗法）问世后，人们就又回去过老日子，其他人则跑去关注别的议题，像是同志从军或同志婚姻。现在去哪找社群中人一同处理我们一路走来的情感炼狱？我想，我们就这样成了饱受惊吓的一群。」

虽然记者留了空间，让这位受访者的个人经验分享带出一种集体、历史性的说法，但是却不愿去深究它的意涵，反而选择让另一位「专家」来做定夺。更确切的说，是把历史诠释权交给了一群未具名的「心理学家」，而这些人的专业存在目的就是去找出社会结构性问题的个人成因：

虽说这种创伤会导致他们滥用药物，但心理学家们认为，恐同的内化，以及深植内心的自卑，也同样是强大的因素。这也正是冰毒得以趁虚而入的关键。用过冰毒的人认为它可以驱散脆弱感、强化自信，还误以为可用它来和陌生人建立关系（Jacobs, *New York Times*, April 3, 2005）。

《纽约时报》记者费心爬梳同志爱滋历史，也触及了议题的复杂面，但到头来却还是将之简化为一堆文化成见，像是认定男同志情感脆弱、没能力在关系外负起责任。无独有偶，《新闻周刊》也有相同的定论：

洛杉矶同志中心也组成了互助小组，同志们得以在其中学
习如何不靠冰毒处理自尊与亲密关系的问题（Jefferson *et al.*
2005, 38）。

虽然报导表面上对同志的历史困境展露了同情（但愿他们真能体会爱滋阴影下过活的痛苦！），不过整体来说，报导对男同性爱多所批判；它「反恐同」的前提是，那些在爱滋威胁中饱受风霜的人应该在性的表达上行个体责任化。这种思维在早期爱滋报导就已奠下基础，此刻则以「吸食冰毒就是懦弱或走回头路」的说词再度出台。整体而言，这些记者终究还是认定，像这样的责任个别化，到头来仍嫌脆弱，因为只要有合适的毒品出现，所有一切即可抛之脑后。

富争议性的科学及其镇静效果：这可能是真的

战后婴儿潮世代生性多疑，例如他们就对媒体报导「杀人药」的真实性就很存疑：毕竟，连美国总统在「亲身试验」那些药物后不但人没死还出来做见证。柯林顿抽大麻算啥，连布希都盛传吸食古柯硷

成瘾，可说跟Tina走得更近了¹⁰。冰毒的新闻报导似乎要让那个世代的人闭嘴，所以挑了个不同类型的故事来嫁接，也就是爱滋病的变迁动力。「同志＝HIV」的等式再度冒出（唉呀！差点忘了，称「同志病」不妥，应该叫「同志毒品」吧？！），原因是有关新闻报导指出，有位纽约男同志（据称）施用冰毒而染上HIV，感染没多久后免疫力指数就直直落、进而出现爱滋病的临床症状。素以优质爱滋医疗报导出名的记者Lawrence Altman也加入「超级病毒」之说，并起了临门一脚的作用。他以「卫生官员」之口带出那个「同志＝HIV」的等式：

卫生官员长久以来就认为，冰毒的提神效果加上戒心的卸除，都促成了马拉松式性爱，而让 HIV 的散播更加快速（Altman and Santor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2005）。

「超级病毒」传闻爆出不到几周后就被证实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后续的媒体报导删去了新超级致病原的面向，却依然承袭了先前关于吸毒致病的说法。不过，我不打算在这起乌龙事件上着墨。有关这场报导的大崩坏已经有几位知名记者（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写过专文。不过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文章在遣词用字上小心翼翼，它们针对的是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卫生官员如何滥用此特质），而非科学报导本身的匮乏。以下是《纽约时报》的一段文字：

就某层面来说，这起事件所反映的是，科学家及其所属研究机构彼此间有着激烈的竞争，为了的是向外界传达新研究发现、从而邀功，以便获取更多经费来扩展研究……因此，有些研究者就说，在一名 46 岁病患身上发现具抗药性、凶猛病毒株的意义并不大。他们说，这名病患的免疫系统或许早被他的冰毒瘾所瘫痪，另外，这病毒之所以可能迅速导致后天免疫不全症候群之病发，或许有其他的因素，而在尚未深入

¹⁰ 戒酒无名会（Alcoholics Anonymous，简称AA）的成员即便不介意别人知道自己的身分，但还是不会自己揭露，因为他们必须要保护其他人的身分，以免有人从人际关系推敲出来。如想揭示自己会员身分就会打「秘密」信号，是说自己是「比尔的朋友」，此人在1930年代创立了AA。

调查前，不宜向大众拉起警报（Altman and Santor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1, 2005）。

而《洛杉矶日报》的报导则说：

有些爱滋专家现在则说，纽约的「超级病毒」案例就科学上来说既天真又危言耸听，这反倒伤及了未来预防作为上的有效性……然而问题在于，对许多资深的爱滋工作者而言，这些都不是罕见或新奇的状况。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爱滋研究中心的 Douglas Richman 博士说，病患对现有三类爱滋治疗药物产生抗药性是颇为常见的状况。「在一些次级群体中，抗药性病毒进展快速」。Richman 博士过往主导的一项研究揭示了类似纽约案例的普遍抗药性。「男男性行为滥交者，尤其是那些滥用冰毒的，其抗药性比率高得吓人」（Piller, *Los Angeles Times*, June 5, 2005）。

我想点出的是，就连这些评论者也都未能破解用药、性爱与疾病间过于简化的关联。同样地，《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¹¹（France 2005）上所刊登的文章虽然对超级病毒报导做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仍不愿挑战冰毒与HIV感染率间直接被认定有因果关系的既成「事实」。的确，只有一篇出自加拿大的文章曾公开以其标题质疑这两者间关连是否已然确立（Chung, *Toronto Star*, July 7, 2005）。虽然这篇文章出自长期受左派同性恋影响的多伦多爱滋委员会（AIDS Committee of Toronto），但后来这个质疑的立场在其他文章里、也在所谓「爱滋社群」内部被大力抨击¹²，迫使该委员会最后不得不改变

¹¹ 有一篇发表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上的文章（Kai Wright, 2004）是这股「冰毒—性—HIV」连结迷思的例外。Wright检视了HIV实际的感染率，发现虽然施用冰毒和HIV感染都在增加，但是HIV的感染多为非裔美国人，而据我们所知，冰毒使用者则以白种人居多。

¹² 这种批评也曾在2005年波及温哥华。当时的市长Larry Campbell曾在国际上倡议减害、设置合法的安全注射地点，而他所倡导的海洛因维持疗法临床试验也曾被改编成获奖的电视影集《温哥华警探》（*DaVinci's Inquest*, Haddock Entertainment）。他曾公开宣称，温哥华的公卫团队不会因为所谓的「冰毒」流行病而改变原有的警政及卫生政策，并认为温哥华应该持续自己独有的方式，专注于药物治疗选项的扩增、改善无公民权之人的生活状况。Campbell所秉持的信念是，「预防是创发社群的核心，个人和家庭在社群中都能茁壮，而药瘾则被视为健康议题，对使用改变心神状态之物质而

初衷，公开认了冰毒与HIV之间的关联（见Chung, *Toronto Star*, August 18, 2005）。

一旦游戏规则立基于科学事实的认定上，记者在取材上就得借重性爱与用药的专家研究（也就是社会科学）来支撑其报导。可是问题就在于，社会科学的知识基础扩张过程与衡量证据的方式有别于生物医学。社会科学有两种研究取径，即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没有人会期待社会科学可以产出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就生医科学来说也是一样。的确，优良社会科学的特点就是，读者可从一份好的研究中同时读出其普同性及特殊性。是故，比起一份执行不佳、样本数达上万的研究，一份执行得好的小型访谈研究，其成果相对来说「较好」的。进一步来说，使用社会科学来公开讨论「性」（sexuality）与「成瘾」，算是新颖的。金赛博士（Alfred Kinsey）的研究往往被认为太淫秽而难登大雅之堂，批评他的人也多是道学家而非社会科学家，而且整个爱滋政策辩论的历史基本上只证明了它不容许社会科学反身自问。相反地，它成了道貌岸然说教的替代方案，并以这种姿态进入公众辩论。时至2005年，虽然许多记者可轻松辨识什么东西有科学根据，但仍旧有许多记者无法在社会科学堆砌出的「事实」中厘出个所以然。一位专跑爱滋议题的记者，会有一定的能力衡量哪些研究者的话可信、哪些不可置信，哪些「研究发现」在整个科学的研究的游戏里看起来最言之有理，又有哪些研究看来简直「从天而降」、发自不可靠的研究实践。然而，谁才是爱滋社会科学中最值得信赖的研究者？由于「性研究者」本身的模糊定位，同时也被性的污名所染，那些从事都会「性」研究（urban sexualities）的人本身就会遭致怀疑，而这是爱滋医学研究者不会碰到的状况。结果便是，记者往往依据对性和成瘾的俗成理解方式来挑选适合己用的相关研究，为自己编写的故事添加一点证据。虽然社会科学界对于质性与量化的混用方式、该用哪种访谈或统计方式来梳理性爱、药物和HIV之间的关连有着很多的争辩，但是没有一家报社认为这些争辩本身值得报导，而这和早期媒体

造成生活困扰者，应该有适当的因应方式」（Campbell 2005）。当年批评Campbell的人包括了后来取代他当上市长的Sam Sullivan。Sullivan曾发出「冰毒会在这个城市爆发」这种无助于未来发展的警告。

以大篇幅报导HIV发现者间的争战大相迳庭。就冰毒HIV超级病毒的故事来说，科学家们在争辩的是，到底该怎么认定病毒株的突变是良性还是恶性。

就在科学报导充满败笔、新闻界对彼此竞逐的社科研究成果没有一套筛选标准的情况下，市场趁机而入，标明了日后追踪报导的方向，同时，那个2004年自我推销的冰毒故事也替日后的坊间报导定了调，因为它把神经生物学逻辑和社会行为科学逻辑混为一谈¹³。那时，有一份特别的社科研究和那份有争议性的「超级病毒」医学研究互别苗头，开始以高超手法把研究成果包装成「事实」，以此自我推销。因此，一个错误的「事实」（突变的HIV病毒株会和被Tina毒害的身体起交互作用）就这样被另一个「事实」取代，而后者依据薄弱的调查数据做出的分析，根本就禁不起检验：它套用了坊间对冰毒的一般成见，跟超级病毒新闻曾在读者脑海中留下的印象一拍即合。换句话说，一个失去科学公信力的报导故事，就这样黏上另一个不严谨知识系统产出的「真理」。像这样胡乱引用社科资料的作法就如此持

¹³ 参见Urbina and Jones。为了让读者了解「最新」的研究现况是什么样子，很多医学期刊现在都会提供关于研究论文的丰富讯息。这篇文章于2003年9月9号投稿、2003年11月12号确定刊登，被这份线上期刊放在「主要论文」部分，2004年3月1号就在网路上出版了（要是人文类期刊也动作这么快就好了！）。用Nexus-Lexus搜寻医疗业界期刊的结果显示，有九份新闻通讯挑了这篇论文的新闻稿（会知道是因为这九篇的内容都一模一样），这是「新流行病」相关报导的首波震荡。至少有一家主流报纸认为这篇论文「证明」了冰毒和HIV增长的关联，然而但这篇论文到底写了什么呢？其实这篇论文充其量是个粗糙的文献回顾，包括神经生物学、药物治疗、并发症，还有「流行病学」等领域的相关论文。论文的最后部分着实令人咋舌，因为它导览（幸好不长！）的方式是把临床流行病学（其研究的是疾病的表征）与社会流行病学（其研究的是疾病模式的社会「决定因子」）的问题迭做堆。作者引了五个研究（都是在更具知名的期刊上发表的，深黯引用以小博大之术），其中四篇是规模非常小的调查，另外两篇则是属「数据采掘」的习作，其开采对象是份针对梅毒「爆发」感染男性所做的问卷。只有一份研究的样本数超过100，然后另有一份研究显示药物使用和性行为无关。唯一一份像样的研究出自Colfax的研究团队，它认为针头共用和冰毒的使用有关，相关的程度就跟性被视为HIV传染的嫌疑犯一样。有份研究实际上的检视对象是摇头丸的使用，而非冰毒（他们从169的样本数中「挖出」20%坦承有施用冰毒者，数据少到无以支撑Urbina将冰毒等同于性爱的论点）。事实上，有两份重要的质性研究（执行者分别为澳洲国家HIV社会研究中心及由长年投入爱滋研究和运动的Barry Adam博士所带领的多伦多爱滋委员会研究计划）都显示，性爱与药物文化里头的还有其他因素在作用，而这两份研究的开放性访谈人数和前面那份的问卷人数几乎一样多。任何一位主修社会学的大学生都看得出来哪份研究比较「有力」。总之，作为第一份被认为是「冰毒—危险性行为—HIV」连结的「证据」而被引用的「科学」论文，它的地位实在堪。

续下去，到后来根本就无从质疑冰毒与HIV的预设关连。这里贯穿的逻辑即是：男同志特别容易染上毒瘾（对此，右翼人士会说，看吧，这就是失败男子气概的表现，而换成新自由主义的版本就变成，他们都是恐同症的受害者）。男同志一用冰毒就倾向滥交（右翼版本：他们生来就淫乱；新自由主义版本：他们还没学到怎么在异性恋正典单偶制中找到同性恋的版本呢！）。只要病毒再来参一脚（到哪儿都一样，男同志的HIV感染率很高，这大家应该都知道吧？）……瞧，可不是这样吗？！然而事实上，很多同志使用Tina，而且也采取「安全性行为」——像是依照血清感染状态配对找伴（serosorting），或是臆测对方感染状态而策略性地充当1号或0号（positioning）。马拉松性爱常引发超级雄风的意象，不过记者对呼烟常会不举的现实似乎不甚了解，迳自认定烟嗨者比没施用的性伴侣更处于高感染风险（部分知情的记者则会补充说明，同志会去黑市买威而钢，因而加深了同志用药成瘾的成见）。

从超级病毒报导开始站不住脚到完全崩毁的这段期间，有几项研究被当成冰毒与HIV连结的「证据」。因此，70年代以来不断重燃「反毒战争」后，那些引用了药物与疾病关连的文章就延长了冰毒故事的寿命。纵使科学家们对「出现新型、更为凶猛、传染更快的HIV病毒株」这点没达成共识，他们也挡不住冰毒报导的写作方式，因为在早在这故事出现前，同志族群「高速」的生活型态与致病关连早就存在了¹⁴。冰毒跟更为普及的香烟一样对人体有害，但它非但没被降级列为致病共同因素¹⁵，反而维系了它在「性爱—毒品—疾病」史诗中的

¹⁴ 超级病毒故事里的主角据报导曾是个典型的雅痞男同志，在迷上Tina后，过着有如「快车道」般赶趴生活。男同志生活步调高速的概念在爱滋流行早年曾被认为是科学事实，一直到HIV在1985年被指认出来后，持「快车道」理论者（认为男同志性爱、用药、熬夜、营养不良的生活型态导致免疫系统崩坏）才不得不承认有个病毒能摧毁免疫系统。重要的是，早年的「超级病毒」报导因建立在不同的文化预设上而有不一样的面貌。加拿大有个叫Ssenyonga的案例是早年媒体制造「爱滋罪犯」的着名案例，它先入为主地认定黑人男性的暴力和爱滋传染有关，也预设了女性受害者的纯真（参见Miller 2005）。

¹⁵ 几乎人人同意抽烟对每个人都有害（克隆氏症患者反而是吸取尼古丁来获得缓解），特别是对于免疫系统出问题的人（Niarwa et al. 2000）。此外，有抽烟习惯的爱滋感染者，其HIV相关代谢的毛病也比有抽烟习惯的非感染者来得严重。然而，关注同志或爱滋病患者抽烟的健康提倡并不多见。

末日地位。简言之，冰毒的报导记者认定，尽管超级病毒的故事再怎不实，但它仍有可能为真。报导中放些薄弱的社科研究资料，再跟一定得做的「受害者」访谈来个交互参照，故事就可以继续写下去。如果说早先关于「反毒战争」的专题报导只微微遮蔽了对穷人与有色人种的讨伐争战，那么此刻在美国雷厉风行的冰毒战争，就是对都会同志社群进行的伪装攻击，甚至还与男同志共谋。这不是在说冰毒就不是问题，但是和其他药物相比而言，冰毒真的有比较严重吗？决策者会说「对」，因为冰毒特别和性有关（虽然关联并不明确），（因为此处谈的是男同志性爱）就和HIV有所关连，而说到最底，就是跟死亡有关。变态而又讽刺的是，抗爱滋病毒疗法救了很多性命也改善了许多同志的生活，然而这战胜爱滋病毒的故事却在此刻遭到置换，反成了引爆冰毒流行的导火线。

公领域里的社会科学

接下来，我想要检视美国大报中常见的冰毒报导，并针对其涉及科学的修辞提出分析，而这些操作手法对「冰毒造成性戒心减低、增加高风险行为、导致HIV 传染／感染增加」这「事实」的「起源及发展」至关重要¹⁶。前面说过，我们在此所见的这个「事实」，虽然缺乏真正的证据、难逃研究者的质疑，却依然屹立不摇。很多家报社文章都知道在「多重因素参杂作用」的情况下（Richardson and Romney, *LA Times*, January 19, 2005），要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是一件困难的事。尽管如此，大多数的研究（以及报导）所依赖的数据，仍都是单变量关系，顶多是线性回归。也就是说，根本上来说，就关连性而言，我们充其量就只能用已知的事物把它们「当成一回事看」：两件事物是一并发生的。因果即是用社会逻辑加以推断的；在这个案例中，由于HIV是经由性行为传染的（这是个确切的「事实」），而因为药物会让人忽视安全性行为的落实（这不尽然是事实，意即有时是真的，但仅在某些情况下才如此，因而无法一概而论，只能从每个特殊案例来加以证明），所以任何显示冰毒施用与HIV感染率上升的关连，就能

¹⁶ 这里我倚重的当然是Ludwig Fleck的着作。

从中推出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然而这明显就是错的！这样的连结必须建立在以一系列的前提上，而这些具有统计及社会性格的假定，则是透过不同的修辞策略支撑起来的。这是我接下来试图着墨的部分。

社会统计（包含社会流行病学）只有在其所依恃的社会理论没有问题时，才有用处。大多数的记者对他们所仰赖的科学在学界中的真实论辩情形，不是过于天真就是出于无知，并且直接将这个部分的发言权交给公卫官员、爱滋组织单位代表或相关研究者，让他们从（有相关联的）统计证据中做出跳跃式的因果论断。此时，专精于单一领域（像是医药、服务供给或流行病学）的个人，就得以集三领域于一身的专家之姿，在阅报大众前现身。从下面的引文中即可看出，报导只是引用了某份研究，就足以让读者做出「扣连」（比较贴切的说法是「联想」），从而产出从统计资料中无从得出、但却有着因果关系的暗示：

在科学上要将冰毒与病毒扩散之间的关联连结起来，是很困难的，因为这其中有多重因素参杂作用。不过几个大城的研究指出，有愈来愈多 HIV 感染者表明最近有使用冰毒的纪录。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最近有一份以旧金山为基础的研究，指出冰毒与威而钢的使用，与危险性行为的显着增加有所关连。其他研究则显示，男同志使用冰毒被验出 HIV 阳性的机率，比没有使用者多了近三倍（Richardson and Romney 2005）。

第二个主要的修辞策略则是支撑了「冰毒 = 危险性行为 = HIV 传染」的连结。运用专家讲些轶事的报导方式又再度倚赖了科学——但这次用的并非「连结」几个特定的研究，而是专家片面经验得出的「洞见」，就如在下面的例子中，Boswell博士的专业以一种看似客观的外衣，掩盖了他对病患所做的随意观察：

「很明显这种毒品和 HIV 的交集，对于疾病控制而言是首要之务」，Stephen Boswell 博士说道，他是芬威社区健康中心的执行长，该中心是波士顿爱滋治疗的要角。「有成堆的病患跟我说，有用了冰毒才会去干些平常绝不会去干的事（

Smith, *Boston Globe*, April 24, 2005)。

如果有读者对医生、专家和调查人员关于人类复杂行为所做的分析感到怀疑，或就只是相信娱乐性用药是属于道德而非科学领域，没关系，且听另位「专家」的谈法，而他的方式就是将整个冰毒问题牢牢钉在生物医学领域中¹⁷：

虽然甲基安非他命让人解放性的抑制、引燃高风险性行为而让卫生官员感到非常头痛，但专家说他们还掌握了更多证据显示冰毒本身可能会破坏免疫力、促成疾病传染。「冰毒似乎有某些特质让人容易染上 HIV」，Grant Colfax 博士如是说，他是旧金山公卫部爱滋办公室里 HIV 流行病学之生物统计及干预部门的共同主持人，「若我们想探究为何甲基安非他命在 HIV 流行病上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我认为我们就应当要更仔细地去看它是否以某种方式在抑制免疫系统、增加病毒量」（O'Connor,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2, 2005）。

Antonio Urbina 博士在他那篇漏洞百出的文章出版一整年后，又借着超级病毒故事重返舞台。他的立论不是建立在科学上，而是老生常谈，采用的是爱滋的文化想像中最为顽强、也最白目的修辞。二十年前 Paula Treichler 就已经把这修辞批过一番了（Treichler 1988）。正如

17 为何冰毒的生物化学作用在整个冰毒报导中的地位变得愈来愈重要，这应该有两个较为复杂的原因。首先，常被外界视为「反毒战争」远端打手的美国国家药物与酒类研究所（NIDA），把提供药物滥用的科学描述视为己任。由于晚近神经生物学在次学科的斗争中胜出而成科学界新贵，NIDA便有了一套全新的科学武器，让药理与改变身体状态的交互作用过程以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其次，（这特别与冰毒有关），「超级病毒」的报导引发了两个问题，也就是冰毒本身会不会加速HIV的进程（跟其他因素相关的话就会，比如尼古丁，这点是可知的），以及冰毒会不会影响细胞、让HIV感染更为容易。因此研究才转向生物化学寻求答案。

这个问题牵涉到非常有争议性却又复杂的生物医学争论和研究。这些东西如果要用另一种语言让大众了解，几乎无法置外于凶狠病毒入侵的大众想像。粗略来说，因为HIV会「攻击」免疫系统中的特定细胞，事实上，当免疫系统出现反应时，会出现大量的细胞（也就是说，当感染发生时，免疫系统会动起来「力图抵御」）。这种说法曾在早年被用来解释为什么肛交比阴道性交更容易感染。当时的学者认为，如果精液中有病毒，身体就会「攻击」肛门里的精液，所以免疫系统做出的反应，反而制造出更多的细胞给HIV攻击。不幸的是，这种听起来很吸引人的说法缺乏解释（和统计学上的）力道，而「冰毒会加速HIV传染」因沿袭了这个说法，所以也同样欠缺解释力。然而这丝毫未减其被沿用的诱惑力：一个健全的人如何在短时间内因疯狂施用冰毒而变成垂死之人。

她指出的，早年的爱滋报导就如同更早之前的恐同右翼份子（Patton 1993）一般，执迷于肛门有多脆弱，而在「那头」进行的性活动又是多让人「受创」：

Antonio Urbina 博士表示，如果再把冰毒易让黏膜干掉而造成口腔和直肠的擦伤的因素加进来看的话，这样的创伤就可能让个体更易于感染 HIV。Urbina 博士是一篇探讨 HIV 与冰毒论文的第一作者，该文去年刊登于《临床感染病》（*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期刊上（O'Connor 2005）。

最后，为了在情感层次上更加深「冰毒＝危险性行为＝HIV」的连结，记者所采用的另种修辞手法，就是透过「人道温情」故事报导，诉诸强而有力的一般常识。连跑科学线的记者都觉得应该采用滥用冰毒者之亲身经验，好对那些还在怀疑的人做最后的精神喊话：

Devin 是个 38 岁的杂志写手，在他八年的药瘾期间，曾有六次因为脱水及心跳加速到足以致命的情况而被送到急诊室。他连丢了五份工作，在疏于照顾牙齿的情况下，加上冰毒所引发不自觉的磨牙，让四颗牙都烂掉了。「正常的进食、睡眠，还有 HIV 的治疗，这些日常自我照顾通通都没了」，他说，「冰毒会完全压垮你的生活。你变得对一切漠然，只在乎下回何时能嗨」（Jacob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2004）。

正如我先前所说的，媒体试图以一种不带恐同的语调，让我们带着怜悯的心去阅读这些堕落而后复原的故事。我们被要求质问自己：我可以做什么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这个答案，连同那先入为主的怜悯，正是一连串有关于正当性爱举止的种种预设（更可悲的是，这些预设还与风行中的公民运动对齐、企图由同志婚姻达成平权，愈来愈背离同性恋解放的初衷）。如果说这些人道温情故事中所揭露的堕落情节与淫荡杂交连结在一起，那么同性恋的救赎会跟单偶异性恋正典成为最佳拍档也就顺理成章了。大概也不用意外，会以这种修辞来叙述自身经验的人，很多也都是风行美国的十二步戒治疗方案的亲身参

与者¹⁸。这些方案的逻辑正是将个人权力让渡出去以求平安，而媒体的冰毒故事正强力扩散此逻辑。

最后的一点省思

Tina对不同的人而言有不同的意义。就如早年一波又一波的药物风潮，有些人被她骗去，有些人则在会爱上她一阵子后转而另寻新欢。虽说冰毒和有些抗爱滋药物间有药理交互作用，但就目前研究文献所载，几乎没人因此而死。这就意味服用抗爱滋药物的病患很重视自己的健康，他们会避免接触冰毒或是节制施用量，以降低药物交互作用可能带来的伤害。也许我们身边都有朋友因Tina而「迷失」的悲伤故事，很多人终究会从那自圆其说、偏执的空间中返回，也有人一去不回。但这些经验的异质性（对很多人而言这些经验在某节点上具有毁灭性）意味，这种药物的药理跟使用冰毒的社会脉络一样复杂。甚至连美国国家药物与酒类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s and Alcohol）都承认，生物医学只能解释部分的成瘾现象：药物的使用与滥用总有其社会面向。

当然这也涵盖了用药的政治面向。虽说冰毒报导充斥着美国乡镇女性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减肥的故事，但报导叙事主轴仍直指都会同志区为美国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虽然冰毒报导采取的步数安抚了恐同情结，对HIV病毒突变的思维也有一定的抗拒，更在某些情况下愿意拿掉「冰毒＝男同志」的勾连，以便限缩「冰毒＝男同志＝HIV」的危险，不过它的底线仍是：假如同志社群不把Tina给扔了，就甭想有翻身之日。公卫官员会以反毒战争、反爱滋之名进场介入、对那些抗拒新自由主义责任个体化者开战。当然，战争结果会令人失望，因为根本就没有一致的用药方式可以当作标靶攻击，那只会产出林林总总让人身为同志而感到哀伤的理由。

¹⁸ 我不禁想到，这和爱滋早年的状况遥相呼应。1980年代早期（我指的是爱滋流行病宣告出现的一年内），那时滥交被视为「导致」爱滋传染的主要因素，「性爱强迫症」（Sexual Compulsives）十二步戒疗法冒出简直像野火燎原。如果说二十世纪早期的酷儿国度曾被「男同志个个缺德」的说法所伤，那么「男同志社交根本就是错」的这种说法则是深植于HIV感染的因果修辞，其烙印之深可能就这样跟着我们一辈子。

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及其他区域的大城市，都有历史悠久（而现在变得较为公开）的同志聚集地，对四散在异性恋正典广袤大地的酷儿来说，这些地方曾经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世界。如同最近加拿大影集《罪恶城市传奇》（*Legendary Sin Cities*, Paradigm Pictures Corporation for the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2005）所丰富呈现的，虽然性、性别的定义有很多很大的差异，但人类历史中总不乏有群众致力于追求性爱，而这也通常（应说总是）涉及用药。每个城市的「衰败没落」总是被归咎于纵情声色的享乐主义，但详加审视就会知道，这些城市的消逝至少可回溯至国家对种种复杂自由思想的箝制，而这往往涉及了人们对规范情欲生活之道德及和法律的挑战。或许，某巨型冰毒实验室的大爆炸会在一夕间把同志大都会夷为平地，但更可能的故事结局是，这些同志都会的数量和政治影响力会慢慢被磨损掉。以劣质社会科学粉饰的冰毒报导，说穿了就是高举过平静、单偶、不用药同志伴侣生活的「选择权」。在处理任何大都市的冰毒「问题」时，如果没有体认到政治投注（责任个体化的政策和新自由主义式的道德）是如何崩解都会同志生活，那么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世界就会渐渐遭到破坏。

Tina 是个坏女孩没错，但在更大的政治氛围下，她的同党也一样坏。如果同志文化就这样被化约成一个个十二步戒治疗法团体，到最后就没人能对它们进行反击了。

參考資料

-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Boston: Harvard U P.
- . 1988. *Homo Academicus*. Trans. Peter Collier. Stanford: Stanford U P.
- . 1996. *On Television*. Trans. Priscilla Parkhurst Fergus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Campbell, L. 2005. A year to reflect and reactivate our commitment. Column for Four Pillars Coalition newsletter, February.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city.vancouver.bc.ca/fourpillars/newsletter/index.htm>.
- Cohen, S. 1972.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 London: McGibbon & Kee Ltd.
- France, D. 2005. The invention of patient zero. *New York Magazine*, April 22.
- Gilroy, P. 1987. *'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race and nation*. Chicago: U of Chicago P.
- Grant, I., S.J. Semple, and T.L. Patterson. 2002. Motivations associated with methamphetamine use among HIV+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Journal of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22(3), 149-156.
- Hall, S.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Hon, D. 2005. Confronting Crystal Meth. *The Georgia Straight*, November 10.
- Jefferson, D., with K. Breslau, S. Childress, J. Darman, V. Juarez, and K. Williams. 2005. Party, play—and play. *Newsweek*, February 28:38.
- , with A. Campo-Flores, S. Childress, D. Johnson, S. Meadows, A. Murr, C. Skipp, J. Silver-Greenburg and A. Underwood. 2005. America's most dangerous drug. *Newsweek*, August 8:41.
- Miller, J. 2005. African immigrant damnation syndrome: the case of Charles Ssenyonya. *Sexuality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NSRC* 2(2), 31-50.
- Niaura R., W. G. Shadel, K. Morrow, K. Tashima, T. Flanigan and D.B. Abrams. 2000.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nfection, AIDS, and smoking cessation: the time is now.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31, 808-812.
- Patton, C. 1990. *Inventing AIDS*. New York: Routledge.
- . 1993. Tremble, Hetero Swine! In Michael Warner, ed., *Fear of a Queer Planet: Queer politics and social theory*, 143-177.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 1996. *Fatal advice: how safe sex education went wrong*.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 2002. *Globalizing AIDS*.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 . 2005. Outlaw Territory: Criminality, Neighborhoods, and the Edward Savitz Case. *Sexuality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NSRC* 2(2), 63-75.
- Rubin, G. 1984.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Carole S. Vance, ed.,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267-319. Boston an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Smith, S. 2005. Crystal meth threat growing gay's use in N.E. fueling HIV fears. *The*

- Boston Globe*, April 24.
- Treichler, P. 1988. AIDS, Homophobia, and Biomedical Discourse: An epidemic of signification. In Douglas Crimp, ed., AIDS: *Cultural Analysis/Cultural Activism*, 31-37. Cambridge, MA: MIT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October* 43, Winter 1987.
- Urbina, Antonio and Kristina Jones, "Crystal Methamphetamine, Its Analogues, and HIV Infection: Medical and Psychiatric Aspects of a New Epidemic,"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38:890-4, March 2004.
- Wright, K. 2004. AIDS: hiding in plain sight.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42(6), 5.

约嗨

Party and Play¹

Kane Race 着；梁俊文译、黃道明校订

现下全球男同志爱滋防治的公众论述中有一种正规的倾向，那就是以摒弃用药、甚至约炮文化来定位爱滋防治的实现。本文的目的在对这种拒认的倾向提出回应。这种趋势的问题在于，爱滋防治变成了公民的道德服从（而那是酷儿生活往往溢出的），而非将注意力放在实际会传染HIV的特定实践，以及用有创发性的方式来修正这些作为。事实上，非法药物的使用在男同志社群以及社交联系的形构里，早就是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在许多相关的爱滋脉络里，这些社交联系进而形成有效回应爱滋的社群基础。从这个面向来看，前述拒认用药的态度也就恰恰否定了那些根本的文化脉络与实践。爱滋防治如果要有效，就必须关注这些脉络与实践，以及它们所形构的性爱社群。

我们所面临的一项挑战，就是得去生产性文化、实践、关系的相关分析，并透过这些分析去识别、指认、呵护内在于这些文化中的照顾、安全及愉悦之种种可能性。这篇文章将要探究的，就是男同志情欲文化里一整套相对来说新兴的特殊文化实践和活动。这种新文化有赖于新式物质与社会科技的安排，像是无线网路、3G和约炮软体。我把这些装置视为**性交遇的新兴基础建设**。

我想关注的是这些装置设备的物质特殊性，我想指出它们如何以新的方式媒介性交遇，让某些活动、关系及实践成为可能，但也同时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我并不是说，科技环境就全然决定了这些实

¹ 【编按：本文为 Kane Race 教授于2015年6月6日在台北市狐狸野餐的公开学术演讲讲稿及实录】

践，但是，在尚未掌握这些约炮装置的操作性、预设用途、设计特色之前，想要试图理解这个文化的新兴规范、互动模式、人们抱的寄望、乃至一般的活动流程等，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当然，这新的性爱文化源于过往的男同志实践历史，但如果将此刻的约炮文化视为过往钓人文化的最新版本，那么我们就会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社会科技的安排在形塑这种文化轮廓及形式的特殊性。在同志都会区，钓人实践已有长远的历史，但是这个新文化已经长出了新的形式和类别。有东西正在蠢蠢欲动……一个新的文化正在浮现、转变。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性互动与情欲社群在类别和实践层次上正值转变的重要时刻。因此，与之相关的分析与理解绝不可少。

我最关注的一组特别实践在参与者间称为「约嗨」Party and Play（也通称Wired Play、ChemSex），这种「玩」法指的通常是在某个参与者住家中、使用某些药物而进行的性爱。PNP以及其相关的事物，例如：网路、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多P性爱，而因为这涉及了用药和HIV传染的关连，所以皆被爱滋流行病学及行为研究文献视为致病的病态场域。这些文献除了将爱滋传染与物质使用牵连在一块之外，几乎不曾将这些行为理解为一种文化。对参与者来说，「约嗨」是组有意涵的活动与实践，有其组织运作逻辑及相对凝聚性。纵使这些实践与活动本身存在已知的风险，对参与者而言，那仍是愉悦、连结、情色、亲密经验的珍贵来源。对PNP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指出男同志爱滋防治的核心吊诡之处：许多被流行病学家视为病态之处，恰恰是苦心经营的重要社会联系之所在，亦是构成社群关系与照护关系的情感基底。

然而，社会医疗科学并非诋毁男同志药物性爱的唯一论述。PNP在男同志社群以及酷儿批判论述里也大致上是个被轻蔑的对象。Tim Dean在他的著作*Unlimited Intimacy*中，把设于街头或电影情节场景的昨日情怀邂逅式性爱，拿来跟「网路上常见的劣等无套肛交性爱」做对比。在这里，这种网路情欲文化被视为「恼人的亲密私密化」，「公共场所中的社交与性爱」正好与「电脑萤幕前的孤独性爱」形成对比，而后者则是体现了认识他者的「一种纯然工具性」，彷彿街头

上发生的性爱一概平等、无差别对待！另外，2004年纽约一项社群倡导活动，也把过往的社群政治及运动跟这种被认定为孤独、原子化的网路约炮做对照，并用了一个意象来传达某些PNP实践的关键配备所座落的典型社会场景：电脑萤幕、个人页面、烟嗨用的玻璃管等，全都在使用者孤独的居家空间。

现代社会和政治科学中的一个主要概念，就是认为科技物件（technical objects）的兴起应该对社群与社交性（sociability）的崩解负起责任。也就是说，任何关于科技、工具、商品等等的工业物件（industrial objects），都大幅削弱了真实社群所蕴含的社交性以及社群政治，而这种思维在诸多网路约炮的研究和例子里随处可见。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反驳这样的研究倾向，因为我认为我们必须多花点心思去看这空间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必须审视现代科技物件到底如何媒介了社交，而不是只会发出怀旧的怨怼。

就这面向来看，我把PNP视为一更广泛取径下的例子，借以理解网路—性爱—药物情欲文化中的性爱及其社交功能，也就是把性交放在「玩」的框架中来理解。网路上的男同志通常用「玩」这个关键字来安排他们的性爱。「找玩吗？」（Looking to play?）是网路约炮蛮常见的开场用语，而丢出这个问语也起了些作用。首先，它试着探问对方有没有想要在真实世界约炮的意愿，因而揭示了线上参与的表面基础。其次，这问语也标明了性交遇是随兴、好玩、没啥大不了的。第三，这个问题预先排除了其他线上的互动模式，就是会这样问的人不是来哈啦、收讯、随便逛逛的。在一般的认知里，「找玩吗？」相当于网路钓人。但是，「找（玩）」与钓人有几个重要的差异。例如，最显着的差异就是，「找（玩）」是如何发生的、以及这个「约」又是如何被环境、视觉所中介。PNP算是这种较为宽广性爱框架中的一部分。要指明的是，不是所有的线上约炮都是PNP（仅有约15到20%的男同志说他们找的是PNP），然而要是没这个框架或线上装置的话，PNP是不会以现在这种形式出现的。

更进一步来说，「玩」这词汇的经常布署让我们洞悉这个文化的安排以及性在其中的操作。在齐美尔（Georg Simmel）极为精彩的

「社交社会学」里，玩乐形式（play-form）（该怎么玩）是社会形构（social formation）的重要面向。他认为「玩」是种非工具性形式的结社：于此，刺激的交流是指导原则，而个性、一丝不苟的内涵、实质性的目的则是被置换掉，以便维系结社的乐趣。的确，有着工具性目的或得到严肃结果的个人需求或欲望，往往被视为玩乐形式的阻挠。把性爱描述成玩乐，就是将性爱从那种强调私人亲密、相互发展的论调中移除。也就是说，这样的提法指向齐美尔所说的社交性（sociability），凸显了情感结社组装里头的性爱布署。对他来说，「玩」有个重要的社交连结功能，而这也正是为什么他会说，「清楚不过的是，人们不管有无充分理由，都会埋怨社交的肤浅」。

和这个将玩乐视为相互连结机制的观点共鸣的是拉脱尔（Bruno Latour）等人提出的科学的研究取径，拉氏有时将之称为「关连社会学」（associology）。在其专着*Assembling the Social*里，他反对社会科学将「社群」和「社会」（the social）当做诠释框架的普遍倾向，彷彿其法则和属性可以概括解释任何特定状况。相反地，他建议我们去追溯各种异质元素如何与时并进，看待它们是如何以不同的形式及组装而产生关连。对爱滋文化研究来说，这种取径有着特殊的价值：「社群」在爱滋预防上的重要性广被认定，爱滋社会研究和社群教育里也时常援用「社群」这个概念，但它却往往被化约为一种理念或一种固定的形式，继而在后来的转变中受到污损。经由这「关连社会学」的研究取径，以及把「玩」视为连结的关键机制，我们可以追溯当下的性爱社群是透过什么特定的方式组装起来，同时也谨慎看待各种物件、技术、装置在这开展过程中的操演作用力。

接下来，我想提出三个跟近来同志性爱文化的新兴形构有关的特色。他们分别是：1) 先行设定的实践与欲望；2) 共同打造的幻想与性爱忆测；3) 续嗨的形构。以下我依次来谈：

先行设定的实践与欲望

网路约炮的措施让参与者有机会在个人页面上用文字和图片，不一而足地列出特点及想做的实践。在性交遇前能用文字即时聊天而且

相对匿名，这不同于传统男同志性爱环境，像是三温暖或钓人场所，因为以往在性爱发生前并不尽然得有长时间的言语交谈。网路钓人因而是个很特殊的性媒介，因为它让使用者可在线上采取对自己有利的呈现方式，可以选择性地对他们物色的对象释出关于面貌、特征、兴趣等资讯。许多使用者对这个特点非常赏识，也以不同方式加以利用。像是有一次，我访问了一个女跨男的跨性别者，他就认为这个特点对他来说很有用，因为他可以在同意跟对方见面之前，以相较安全的匿名方式，就实践、欲望及可能性，来好好商讨可以怎么玩。这个特点也被爱滋感染者或是非爱滋感染者用来找寻有相同HIV状态的炮友，因为他们有些时候会尝试安排进行安全的无套性爱。我在他处曾讨论过这些措施如何涉及血清状态配对（serosorting）做为一种预防实践的扩散。这样的关连有着诸多的意涵，好坏都有。接下来，我想以2013年我在雪梨网路约炮软体上的对话截图来做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感染状态配对的探试」。有意思的是，和我聊的这个人并不想直接讲他的感染状态，但是他给的讯息表示他其实是想要找无套性爱，而他所做的假定是，如果有人同意要玩无套，那此人必定是感染者，不然的话也明白风险为何。这很典型，显示在告知感染状态时常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含蓄。第二个例子是「遮掩式的告知」。在这里，我向对方表明我是HIV感染者，这对我而言很容易的。在爱滋污名的环境里，能够坦然告知其实是一种特权，这种优势的分配不均，而且也还没成为一种普遍的能力。第三个例子是「感染状态配对失败」。和我交谈的是一对想开性爱趴的情侣，他们问我是否「安全及HIV阴性（safe and neg）」，而当我说我不是的时候，就没下文了。「安全及HIV阴性」这个新语汇是从感染状态配对的文化里冒出来的，而它完全混淆了安全与感染状态的关系。这跟以前谈爱滋防治很不一样，因为以往安全等同于带套的实践。由此来看，那段交谈的终止显示了人们为什么在面临揭露感染状态时会感到迟疑。第四个例子是「病毒量（viral load）作为防治身分的出现」。和我交谈的这个人显示他的偏好实践（无套的1号）而非HIV感染状态。然后我问他的感染状态，他回他「（病毒量）测不到」。这个策略所指的是，跟测

不到的人做爱感染的机会比较低（而这不是没有科学根据）²，希望的是对特定性爱的可能性保持开放，也意在减缓社会对感染者贬抑。接着我问他一个有点蠢的研究问题，「要是我说我HIV阴性，那会怎么样？」，结果他回道：「那你不会等到现在才说」。此处可见的是一种算是已然成形的互动类型。在这个模式里头有着约定成俗的谈论互动方式，用以组织参与者的期待与诠释，让反思或察觉成为可能。

一些受无套实践者欢迎的网站列有「HIV感染状态」栏，在选单上人们可以挑「病毒量测不到」来替自己宣传。这说明了医疗临床资讯已经进入了性爱实践的建筑结构体，并强化了特定低风险实践的基底及与之相关的预设和期待。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揭露自身医疗状态的新兴类别有赖一种能力，也就是以相对匿名但明确的方式，与炮友商讨临床标记的传染力与感染。在这个空间里，炮友们可以使用一种相对匿名但是高度明确的客观标记，来跟其他人讨论感染状态，而线上装置进场安排性事，则别致地提供了这种能力。

性爱忆测

第二个特色其实是从上述衍伸出来的。炮友们在网路上以匿名讯息传递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新的文本（textual）空间，里头不单只是欲求性爱活动的各自表陈，更是双方经对话格式联手打造的情欲幻想及场景，而这可能是约炮的前戏，或无关有没有约成（有些参与者会把这叫做「随便聊」）。这是个重要的进展，因为这种对话格式所构成的空间，在以前不曾出现。我把这类的交流称之为「性爱忆测」（sexual speculation），它们本身构成了一种「玩」的型式，悬浮于纯聊及追求工具性目的（也就是有约到炮）之间的不明空间。对某些参与者来说，那会是挫折感的来源，而这也正是为何常在个人页面上看

2 编按：根据2016年夏季发表的大型研究（PARTENER Study），服用抗爱滋药物而病毒量测不到的感染者完全不具传染力，也就是传染率为0。这历时4年的研究从14个欧洲国家招募了1166对感染状态相异的同性恋及异性恋伴侣。在实验过程中有11人感染，但基因列序检定显示全都不是被他们的伴侣所传染。实验参与者共进行了至少58000回合的无套插入性交，结果完全没人因此感染。

到「我没时间力气陪你闲聊」的直白陈述。但对其他人来说，闲聊本身即构成一种情色实践，有时透过文字、图片、自拍照来活络情欲对话、有着下标点符号般分句的顿扬作用。情欲对话可能涵盖了过往性经验或广泛的性实践讨论，以及同志A片（俗称G片）中的特别场景等等。情欲忆测除了让人们去实验他们自己可能要什么东西、见识性爱的可能性、订立自己「玩」的界限，这样的线上情欲交流还把幻想给物质化，变成各种更具体的欲望、意图，还有机会。当然，它同时也是一种筛选机制，让人们可以挑选、筛选对味的菜。双方在网路上所共筑的幻想往往也形构了后续实际约炮的期待，不过，要是约成碰到面后没有达到那个共筑出来的美好，那么往往会以失望收场。

Adam等人（2011）认为「文字具体化的幻想构成了网友互动的方式，就像双方共同写一出剧的脚本」。他们也提供了一些实例，说明了网友们实际见面之前在线上积极讨论的无套肛交实践，与实际见面进行无套肛交，两者间有关联，即便他们宣称有要带套做的初始意图。此外Adam等人还指出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论点：性欲望、性意图、甚至性身分并非先存于网路交遇之前，而是在事件的开展过程中逐步浮现。这显示了现下性爱基础建设（sexual infrastructure）别致、深具生产性的属性。因为线上媒介既是一个再现的空间也是互动的手段。也就是说，这些约炮软体不仅提供一个可以安排性邂逅的具体管道，也在闲聊、G片和性爱之间生产了新的相邻性（proximities），为幻想与实践搭起了一道桥梁。例如，许多约炮网站就常常附有很显眼的G片网址连结。看G片在这里就成了众网友在寻觅性爱时的一种乐趣。G片情节幻想和实际被安排的性爱互动，两者之间就产生了关联。这种性爱活动安排的指标性意义就在于，性爱组装（sexual assemblage）里蕴含着偶然性及变动性。这个透过各种安排聚合而成的性爱组装，中介并转化了身分以及各种组成元素的本体（ontologies）。这里并非是在提倡一种简化版本的媒介效应，而是希望对这个媒介效应结构所蕴含的生产性及冒出来的因果关系，提出更特定的关注模式。

连续玩／续嗨的形构

第三个跟现下情欲文化有关的特色，通常被称为「玩嗨」（wired play）、「延长干」（extended session, long session）、「不设限」（uninhibited session）、「群交」（group play）。我其实是把这个特色想成是色情片中会出现的「异域」（heterotopia）状态，这种玩法是指任何试图打破一般日常生活循规蹈矩的时间性，建立一种身在「他处」（elsewhere）的感觉。在约炮软体上的个人页面或聊天视窗里，有人会特别指出想找长时间做爱，且通常会找多人连续玩好几个小时或两三天。这种久干的玩法大概就是Hurley和Prestage（2009）所分析的「加强（长）型性爱派对」（intensive sex partying）。我会指出这种玩法的目的，是想把注意力再度放在社会物质的装置（sociomaterial devices）上，因为这种特定派对场景的出现，就是奠基于社交装置的物质基础。如果不谈这个基础，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对这些凭空出现的派对不加以思索。相反地，这些派对并非发生于抽象的空间，而是经由特定的实践、物件、装置和安排，才能得以进行。「冰」（ice，甲基安非他命的俗称）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被使用、打开了特定的性实践空间：「冰」除了增强性的感官，同时也让使用者保持清醒、专注。用者可能固着于特定的活动上，例如长时间看G片打枪或在软体上找菜。另外，「冰」也可以延迟射精，但射了也没差，因为打出来并不一定是约炮场景里最终、最神圣的目标。或者应该说，能够保持专心一致地探询各种情趣的可能、持久恒常地做些什么，反而是比较被看重的。「冰」呈结晶状，放在玻璃管里燃烧呈烟状呼进，有些人则会拿来注射，而GHB（G水）通常是计画再来一炮之前会使用的药物。这延长时间的场子很明显都跟性有关，拿来消磨这些时间的活动包括了纯放松、闲聊、看片子、呼烟、滑手机看软体上的菜、用G水、做爱、在趴主家独自相处或是跟其他人互动寻欢，都有可能。「冰」的用法通常是自己先呼，再跟人有性的互动，这么做能让使用者进入一种心理的情欲模式，卸去日常的拘束，在找菜、开启性爱话题、共筑性爱幻想的时候，可以比较坦然自在一些。如果这些都没起作用——很不幸地，现实往往不如预期，失望、孤单、挫败等等的负面情感通常都会因为药物作用而增强，而让自己变得闷闷不乐。

这些性爱趴可以大致地理解为「玩」的实验模式。那到底是什么被实验了呢？男人与男人之间到底可以在社交环境中做些什么？阳刚气质、男人的肉身、情趣效果通通加总起来，又会是怎样的场景？在这些场景里头一再发生的，通常是真实的性爱接触、讨论看过什么片子、分享性经验、分享亲身经历的故事……等等，都让「实验」发挥功效。若以德勒兹的斯宾诺莎式（Spinozist）行为学说的概念来说，PNP参与者通常是直觉地去回应、实验那些在热切、剧烈的情感及思想活动中产生的多重性及可能性。无论在任何一个特定组装中（跟谁玩、跟怎样类型的人一起、做了什么事情）经验到的乐趣多寡，趴客多会在某些时刻脱离原本所处的状态、开始去做别的事。若以这里通篇在谈的例子来说，PNP参与者的情欲忆测就会再度启动，而这有可能是上约炮软体、开始嘲弄上面某些人、讲他们的八卦，然后大聊过往的经验。另外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可能是，刚刚那样玩了一下觉得还满欢愉的，但后来的场景却有点闷，然后每个人就如同在办公室工作一样，专注于自己的萤幕，着了魔似地在网路上找新的人来加入。不管是哪种情况，享乐被悬置、暂缓了。这不但是个尝鲜的意志，也是个换口味的集体形式。尽管找炮友常常发生，但其实这不会是原子化的或是孤立的活动。能够找对象一起玩这件事情，其实有个是群体的场景，其中炮友们在在显露了想要更多性交流（sexual sociability）的意图。

结论

这篇文章里我大胆指出了一些男同志网路约炮的特色以及性爱模式。约炮既是一种「玩」的型式也是性爱忆测，这让男同志们在约炮现场可以透过其阳刚气质的实践或经验来体验各种身体的情欲可能性。若以「玩」来理解这些约炮实践的话，炮友们之间的交流其实变动很大，有时很好玩、但有时也形式化的收尾，这也是为什么通常炮友不会这么容易成为情侣的缘故。值得一提的是，人们的常态身分与他们实际的性爱实践之间所产生的断裂。正当婚姻和一夫一妻制逐渐独霸同志情欲的公众论述之际，维持炮友网络却比以往更容易、方

便，是进入这个网络的大好时机。人们也可以透过约炮软体的「我的最爱」功能，持续追踪他们约过且不错的对象。也就是说，约炮软体让性爱交流更随性、更即时，而且更有机会重复约，无论他们是陌生人或只是半生不熟的炮友，只要是人正在线上、正在找炮（例如现约）、或就在附近，就有机会。若将这个组装理解为一种亲密情感的整体基底，那么这种亲密同时就有了情趣及社会性的两种面向。这些实践和约炮装置都在在维持且划出了都会男同志之间的相识机会、社交性的某个特定范畴。性，于是优先成为连结和相识的主要机制。但因为网路约炮不用付费，所以容易滋生出各种特定的情感连结，而这包含了多样实验性质的亲密关系。在这脉络下，Michael Warner所称的「陌生人社交性」（stranger sociability）的意义也就不一样了。社交软体所开展的男同志交友、交流、交媾空间，里头各种愉悦经验、情感变动、和手机装置所引发的现场互动情境，都可以让我们掌握这个空间中所组装出来的社会样貌。

男同志健康论述也许会关注我上面所讨论的新兴浮现的性／风险协商话语，尤其是想着如何让参与者们也可以留意这套话语如何运作。但这种读法，其实蕴含一套截然不同的防治教育思维，因为它不仅预设主体有主权、有意图、有理性行为能力，而其预设的主体能动性则意味主体要在各种情境底下都拥有自我决断的能力。以这样的方式去思考主体及其能动，将会忽视临时性的关系和依附（provisional relations and attachments）。进一步来说，想去区分性爱组装里的构成元素好坏，是不可能的，因为若真有个好坏评断，那么这些元素的本体及其所蕴含的健康概念，就只会僵固不变。所以，我的取径就会是去探讨这些元素如何组装起来，无论它所产生的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我们在这个构成的过程里，必须要有警觉、保持关注，因为它可能同时潜在危机及转机。而我把这个取径称做「忆测性的实用主义」（speculative pragmatism）。具备这种取径的性健康教育，才会对物质社会性（socio-material）所连带的关系性和生产性有所敏感。

问答

Rainbowchild：在你所说的无套实践网站上有提到，使用者可以在个人档案介面上勾选不同的感染状态。我好奇在澳洲 BB（无套性爱）或是烟嗨（甲基安非他命性爱）的场景，PNP 这类用药性爱派对的参与者他们关注感染状态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吗？还是这是一个站方的好意，但实际上没有多少人会去沟通感染状态或是在意这些选项？

Kane：我知道的是台湾男同志约烟嗨或 BB 的人并不一定会告知他们的感染状态，而在雪梨，用药性爱场景有其在地性，但也并不是人人都觉得告知感染状态是一件自在的事。我认为我们需要认清的是，告知问题其实跟政治环境有很大的牵连，因为在感染者的生命里本身就有很多污名，有舆论压力、不想被拒绝、甚至是被官方通报的恐惧。在雪梨的脉络里，我注意到在告知时，有些人会用一种半遮掩的方式：「你有在无套（fuck raw）吗？」、「你有在用无套约炮网站吗？」。也就是说，若不是身处于无套文化，你就可能对这些用语完全没概念，而有在上无套约炮网站的人大概都会知道，那里都是感染者。这些符号化的暗语其实有弦外之音，特定族群才会解读这些行话。所以，在台湾的脉络里，若有人要求要约无套性爱，也许我们就会假设那人是感染者、或是他多少知道且愿意承担感染风险。

关于人们是否严肃看待感染状态这件事，我想很难概括而论。有些人会在他的交友档案上面清楚地表明「若你是HIV 阴性请别找我，我不跟 HIV 阴性男同志玩」，他们并不希望自己传染给别人。不过也有些情况是跟约炮软体使用者的当下心情有关，例如当人们正嗨、正爽的时候，也许就不会把他人交友档案看得那么仔细。也就是说，不同的情绪状态会产生不同的使用机制。例如，在某个情境或脉络里，也许有些人会特别在意病毒量，或是根本对感染状态没有意识

。我们除了必须去看见这些脉络是如何体现，也需要去观察人们的实际作为与脑子里对减低风险（risk reduction）的算计能力是否一致。

若去看些交友档案，会发现使用者会循着特定机制去跟别人互动。像是交友档案里面有很多个人化的分类和选项，勾不同的选项就会对不同人产生不同的意义。例如，有些人可能不会介意你抽烟，可是有的就会极度排斥。不过若发现某个人是你的天菜，那么某些分类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们无法以偏概全地限制某些选项的意义。另外，无套交友网站经常会因网友回馈而更新选项，例如感染状态栏位里就会有不同的选择，例如（病毒量）测不到（undetectable），所以这就显示了这个网站的使用者会特别关注感染状态这个面向。然而，手机 APP（像是 Grindr 或是 Scruff）又与桌电不同，可能就没有提供制式选项让人使用。

参与者：我好奇约炮网页或是交友软体上的使用者在描述他们的感染状态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坦诚的现象？另外，使用者上传照片的时候，这些软体有没有审查裸露程度的机制？我自己在用 BeeTalk 就会遇到照片太裸露而被删掉个人档案的问题。

Kane：你其实很难真的知道对方是不是阴性，因为有些人可能从来就没有验过血，而筛检也有空窗期的问题。所以，感染状态配对的情况其实充满了风险，有些人甚至戏称这是在彼此猜测血清状态（sero-guessing）。但对阳性的人来说，他们在感染状态配对的时候相对地面临的风险比较少，因为当他们在进行告知的时后，人们通常不会去怀疑，所以没什么必要去骗人。除了信任的问题外，声称自己阴性未必代表什么，因为这跟你是否时常去验 HIV 有关。假如一个 HIV 阴性者一直以来都仰赖感染状态配对跟人家无套，感染的机会其实会蛮高的。有关照片的尺度问题，桌电的社交网站跟手机软体的审查机制不太一样，像是 Grindr 可能在主要页面上就无法上

传三点全露的照片，但若是私讯的话就没这个限制。

Ray：台湾的话还是有人在使用拓峰网 1069，使用者可以决定是不是要把私照开放给别人看，但像是大头照还是会被审查。

Rainbowchild：台湾的法律有规定，在公开的地方不能放猥亵照，不过偶尔也会有过于严谨的情况。

Rainbowchild：我想接着问，刚刚 Kane 也有讲到 slamming（注射安非他命）的问题。我两年前注意到英国的媒体开始报导 slamming 的普遍情况。我想问澳洲这种情况普遍吗？就我所知，澳洲男同志使用烟的性爱场景也有一段时间了，且比台湾早，我想问问看当地是否有发展出像英国那样的注射使用文化？如果还没发展出那样普遍的趋势，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吗？台湾大概是在 2008 年才真正开始流行呼烟起来，只是没有像英国或澳洲那样的普遍。

Kane：雪梨确实有注射安非他命的现象。我并没有特别观察到烟嗨的人口有上升的趋势。有个数据是 20% 的人在过去六个月有玩药，而其中大概 5% 或是更少有注射安非他命的经验。注射安非他命会特别被关注是因为使用不洁针具跟 C 型肝炎的传染有关。另外从一个民族志的观点来看，注射安非他命的实践者与拳交的场景构联在一起，于是在烟嗨性爱的圈子里就出现有无注射的区隔机制。

由于雪梨有减害的基础建设，注射工具长久以来相对容易取得，且雪梨男同志药物注射派对也已行之有年。喵喵（mephedrone）这种药物在伦敦很普遍，也听说有人用打的，不过雪梨没这类药物，但甲基安非他命在雪梨是很普遍的。在澳洲比较关切的问题是，注射「冰」的成瘾依赖性。不过因为每个地区的性实践文化都有其特殊性，我在这只能做出臆测性的描述。

参与者：我前阵子访谈了一个朋友，他说他三十几年来都没有办法好

好享受性爱，所以他有一次约炮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烟。他发现烟能够让他开始享受性爱，之后就上瘾了。但后来我帮他分析了一下，他其实不是对物质成瘾，而比较像是性爱的成瘾。现在他的状态是，有屌的他都可以约。后来他发现，有些对象并不想跟他无套，于是那些人就声称自己是感染者，以为我那个朋友就会不跟他们玩。也就是说，他们预设了一般人不会跟感染者无套烟嗨的立场。在圈子里面声称自己有爱滋且借由疾病的恐惧去拒绝跟别人无套，不晓得 Race 教授会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Kane：药物使用跟性欲之间有个很有趣的关联。我们听到一些质性研究的说法是，人一嗨就只想做爱。这时，是否该戒掉用药、重新学习及重返一般性爱模式，就成了讨论焦点。在用药情境里，药物跟性爱之间的关系确实密不可分。你的那位访谈对象如此执着于他所欲望的事，某程度上显示在公共讨论空间里，男同志的某些欲望是根本无法想像的。这里有一个比较关键的是，对于这样的人，药物让他们跨越一些禁忌去做他欲求的事情，而平常这些欲望是不被认可的。只有在用药的状况下，才能把这些羁绊都解除掉。在我的专书《酷儿用药政治》的最后一章，我把这种让性爱的模式称之为「例外的性爱」。

至于你关注的另外一个议题，我不太能够明确回应你。不过，我认为当有些非感染者就算想要 BB，感染者本身未必会答应，因为他并不希望传染给别人。我能说的是，在拒绝别人时通常都创意百出找借口！假装自己感染 HIV 这种策略的确有可能发生，人家就是不想跟你做爱啊（众笑）。

参与者 B：在澳洲的脉络里，HIV 感染者是否有被当作同志情欲阶级的斗争工具呢？我这样讲是因为台湾前一阵子有一个国小老师跟其他人发生性行为，后来法律将他定罪。这个案例带给了感染者族群一定的恐慌，然而在我的经验以及接触到的个

案里，有发生过一群感染者彼此相识，发展到最后互相抢男人的状况，然后有人就用法律去恐吓、甚至试图告对方，威胁对方说如果你不跟我抢男人我就不告你。我想知道在澳洲是否有类似的案例，也想问是否有相关法律在限制感染者的性行为？

Kane：澳洲的爱滋入罪相关条例在每州都不太一样。以雪梨所在的新南威尔斯州为例，有条法律就要求感染者必须告知他们的感染状态，但这条法律几乎没有被执行过，而这跟早年的安全性行为教育是有关的，因为你只要把套子戴好，你就不用讲了嘛！所以当时反而是不鼓励揭露感染状态的。但在维多利亚州（墨尔本的所在州）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感染者除了被要求告知感染状态，对蓄意传染也有罚则，同时也有被起诉和重判的案例。刚好在三周前，维多利亚州的爱滋运动者就做了很多努力要撤销告诉，而他们也上诉成功。我认为HIV入罪化的法律对情欲的交涉构成了很多阻碍，也有黑函或是勒索的事件发生。另外，在加拿大是执行爱滋入罪化最不遗余力的国家，近几年起诉的案例也有增加的趋势。也因为通讯科技进步的关系，有人甚至在约炮的时，会把自己告知感染状态的聊天内容储存起来，万一别人蓄意提告的时候，可以做为保护自己的证据。

Ray：一般台湾多是不会拿这个东西去告别人，比较多的状况是在网路散播舆论或是私底下放黑函，说某人是爱滋感染者或是常常呼很多等等。因为若是在用药性爱的情境下，你自己也是用药的那一方。

Ray：在台湾的脉络里，公卫期刊上有精神科医师综合了国外研究指出，任何减害策略对于烟嗨的性行为都是没有效的。也就是说，Kane所描述的那些烟的特质，在台湾的公卫逻辑里是会被建构成更容易传染爱滋的。那位精神科医师并不建议在男同志性爱场景里进行任何的烟嗨减害，而是整个杜绝。如

同 Raibowchild 所说，烟进到男同志社群大概是 2008 年，这跟当时摇头丸跟 K 他命的流行情况不太一样。摇头丸跟 K 他命在那个年代，社群本身比较有长出草根的减害方式，但是烟嗨社群好像还没看见这一个发展，尽管会有口耳相传的减害措施，可是都没有经过太多的确认。不过，我知道民间团体私底下都有做一些访谈或是试着发展能够帮助烟嗨社群的作为。我想问 Race 是怎么看那个精神科医师引国外研究做出的结论。若不同意这个说法，那么也想问澳洲是不是有发展出一些重视愉悦的烟嗨减害方式。

Kane：澳洲的爱滋防治民间组织一向都以减害的取径来帮助社群里的人减少惹上麻烦的机会，例如接受社群用药的既有现象，并提供一些资源，像是干净的针具。尽管如此，「冰」在强大的禁绝论述当中有一种「用一次就立马上瘾」的特殊属性而难以跟成瘾划清界线，所以它的相关减害做法时常遇到一些困境。像我这样谈「冰」减害的人，通常会被视为没有责任感的（笑），因为这些类物质的减害很难与公共论坛接合，所以若要适切地改造使用者的实践其实是越来越困难。

甲基安非他命大概是从 1999 开始在澳洲流行，一直到现在有为数不少的人从以前呼烟到现在，也没像媒体散播的那些牙齿掉光、脸颊下陷的照片那样可怕，但很遗憾的是人们不会关注这个面向，而事实上在一些成瘾叙事里，也未见提出任何数据做为证据。不过，烟的确是一个效用很强大的物质，也越来越多用的人惹上麻烦，这跟男同志使用摇头丸的脉络类似。

我所读过的行科学与流行病相关文献里，爱滋感染跟药物使用并没有关键性的连结。有很多讨论是关于这两者是否有因果关系，因为有些人可能是真的用了太多、但也有些人可能是经过风险算计且愿意承担风险，所以两造间并没有绝对的关联性。有些情境层次的分析通常会以下结论的方式说用烟跟爱滋感染有关。不过，在某些情境里就不是这样的

情况。例如，爱滋感染者用烟会倾向于无套性爱，但若性对象是没有感染 HIV 的，那他们就会协议用保险套。这是那种论断式分析没有看见的面向。

黃道明：这跟 Ray 说的那个精神科医师例子形成了很大的对比。另外，澳洲官方最近推动了全国性的反冰毒运动。（Ray：台湾也一直都有）。

Kane：的确，澳洲掀起了一场反冰毒的道德舆论，长久以来男同志论述本来就容易受道德训诫箝制，现任澳洲总理因为一些特定政治因素而致力打一场反冰毒战争，男同志社群也连带受到波及。

Kane：另外，我想丢出一些有关用烟会卸除戒心（disinhibition）的复杂论辩。我读了很多情境层面的研究，这类研究在观察人们实际在药物性爱的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往往导出「做爱时别用药」的结论。然而，有意思的是，有研究指出，非感染者男同志用烟与否，其实都不会影响他们会戴套。卸除戒心的概念在于，人们在药物效应之下也许会去做一些平常自己无法做但是想做的事情，但欲望本身还是会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地方。例如，人们到底是借由药物把自己弄茫然后实践那些早就潜藏在内心的欲望，还是说在用药的情境底下这些欲望才浮现。如果我们依照典型生理学来看，甲基安非他命的确提升了人的敏感度，但它其实并不会让你失控，特别是在需要做决定的时候，像是要不要戴套、决定做感染状态配对的能力。主流叙事认为，人们一旦用烟就无法理性做出决定、或是丧失了考量风险的能力，其实有很多例子可以用来驳斥烟必定等同无套的说法。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决断能力考量进去，我们的观点就很容易就被生物决定论所简化与支配。

黃道明：我想多讨论一些刚刚提到的冯姓教师案。

参与者：冯姓教师案现在判决已经出来了，之前大家都认为对方要举证给他定罪，因为跟他做爱而感染。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感染者的性对象无论是不是感染者，只要发生性行为，他都会被罚。但在感染者圈子里的说法是，你只要服药到病毒测不到的程度，就不会有传染的风险。

黄道明：关于爱滋入罪有个明确的项目是「传染未遂」，到目前为止台湾绝大多数案例都是以传染未遂去办的。在冯姓教师案里，冯师本身是病毒量测不到的感染者，而检方找来 14 个证人里有 12 位是感染者，结果就出现了新的入罪方式，即「交叉感染未遂」。这罪名很荒谬，因为它认定两位感染者不可能同意进行无套性交，这是因为一方除了有把自己「可能有的」抗药性 HIV 病毒传染给对方的风险，也有可能感染对方「可能有的」的抗药性 HIV 病毒，因此双方既是加害者也是被害者。我早先有跟 Race 教授聊到此事，他认为在国际上，交叉感染入罪在医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可是台湾公卫依然不会认可无套性交，即使双方都同意也不行。这个案子的判决书里，法官还建议检察官去办那些感染者证人。

参与者：这的确非常荒谬。另外在这个案子之前，有个人跟感染者上床然后提告的案子，但最后无法举证，然后该感染者被判无罪。这个案子显示的荒谬之处在于，你只要有上床的证据就可以提告。

Kane：这司法判决对我来说愚蠢至极，以刑法来处理公卫完全没用。在声势渐长的国际爱滋运动中，已经有很多爱滋除罪论者，他们皆努力以公共卫生之名倡议，因为爱滋入罪化的刑责有太多负面的效果，例如人们因为污名的关系而不敢去验血、或是对一些机构提供的服务产生却步。所以，我好奇的是，台湾在地感染者社群内部是否将爱滋入罪化视为有问题的，以及社群如何回应这个法律现况。

参与者 D：我有个律师朋友在跟一些民间团体正在想要如何做回应，

只是详细情况我不是很理解。至于感染者内部，就我观察目前没有听到类似的说法。

黃道明：民间团体确实有在推除罪化，但是就我的观察，民间团体和感染者社群内部的回应层次有点不太一样。Race 教授所好奇的是，有没有从感染者社群做出的具体回应。

Kane：那么感染者没有发声，是代表他们同意爱滋防治条例 21 条吗？

参与者 E：我想是不同意的，但是因为他们没什么能力改变现况或是有管道可以保护自己。

参与者 F：我有一些感染者朋友在约完炮之后都希望有一些感情上的交流，然后以「找到人生伴侣」做为目标。在澳洲，感染者在交友软体上或是轰趴场子里，有没有发生过类似这种少女般的期待呢？

Kane：我觉得找到长久的爱人这个期待还不差啊（众笑）！有在参与这次文化的人都深知，他们大多是要找男朋友的，但有趣的是，就像很多交友档案上的自述写的，他们同时也想要找些乐子！约炮软体通常给人很多失落感跟孤单感，所以很多人会批评说由那衍生出来的性爱文化很肤浅，无法发展出稳定、长期的亲密关系。只是这一直都存在于男同志文化啊，因为无论要在三温暖或是 APP 上找到合适的人都很难啊！我觉得有趣的是，人对于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跟他实际做的事情之间常有一个断裂或分歧。

我的另外一篇论文 "Speculative Pragmatism" 就是试图说明，跟同志的实体世界（如公厕、三温暖）比起来，APP 的框架让使用者在网上与人互动时，能保有无需承诺的性交遇。即便那些软体经营者提供了很多交友类型的选项让人勾选（如找男友、纯交友、找约会），用户自己也会斟酌怎么跟人聊。不过众所皆知，大家用 APP 主要的目的就是约炮嘛！

所以，重点是，在不同的人际关系层面和情境里，人们如何在使用时溢出了这些框架，赋予它新的脉络、甚至打破既有框架。例如，短暂的邂逅欢愉也许就有潜力生产不同的关系形式，这本身就是欲望跟实践的混合体，每次的因缘际会都可能会有不同的变形。

像「NSA」（No Strings Attached，没情感羁绊）这种没有情感牵扯的交友模式，即便前提是不要彼此绑住，但实际上在交往过程中又可能会碰出火花，而有多重的发展可能。正因如此，NSA 模式其实让大家可以放手一搏，创造出不同多样的亲密关系。

参与者 G：可是在床上谈感情很解耶！

参与者 A：那你可能只是预设了很解。

参与者 B：我身边的朋友他们用烟，然后对方要求要 BB。一开始会迟疑，但当下用烟的时候，产生了亲密关系跟情愫，然后彼此都感觉可以进入情侣关系，于是就开始 BB 了，最后因此感染 HIV。我听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但是不晓得是真是假。我想知道有没有方式是至少可以让他们停下来思考？

Kane：你所描述的情况听起来很复杂。一方面，药物中介了这段关系而且产生了热切的情感，另一方面，浪漫亲密关系也随之开展。你朋友听起来像是把无套视为亲密的象征，在烟的作用下，人就更投入特定的情感状态。我其实没有什么解方，只能说无套并不一定只跟亲密关系有关，因为不做保护的性爱所展现的意义其实有很多种。我们也许可以对浪漫爱有一个批判的视角，既然我们能建构一个特定的浪漫场景，那我们也可以有能力对自己的性幻想有一个批判的态度，不要对自己的幻想太有自信！我想这也是某种不让自己冲昏头的保护机制。

黃道明：这谈何容易！（众笑）

Kane：最后我想提一下「承担个人风险」这种说法。有个已经过世的 A 片男演员在 1997 年出了一本自传。他说，为了更亲近某些人，他愿意承担感染得病的风险。无论他是否成功发展出亲密的缔结，但他对自己所冒的这个险是很清楚的；自愿承担风险这一面，我们也应该要看见。

冲突不等于伤害

加拿大 HIV 入罪与焦虑效应

Sarah Schulman 原着，刘以庆翻译，何春蕤校订

我即将出版的新书《冲突不等于伤害：夸大伤害、社区责任与修补之责》（2016秋）主要是想指出，人类各种层次的互动都可能会把不安的感觉和具体的威胁搞混，把自己的内在焦虑当成外加的危险，最终反而升高了冲突而没能解决它。本书检视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族群之间、或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这种动荡能量，它可能导致悲剧，也可能促成和平。如果能有意识的理解这个动能的政治和情感机制，我们便能够面对自己，避免升高冲突，造成不必要的痛苦。

我把「冲突」定义为「权力的角力」，「伤害」则是「权力的施压」。其实，冲突源自「差异」，而人本来就是而且永远都会是有差异的。除了不是来自人祸的自然灾害之外，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所造成的绝大部分痛苦、毁坏、浪费和对人类生命的漠视都是我们「对差异过度反应」的后果。从我们总是拒绝面对问题、处理问题，就可以清楚看见我们其实拒绝改变自我，拒绝承担责任。如何理解冲突，如何回应冲突，以及在面对别人的冲突时如何袖手旁观，都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拥有集体的正义与和平。

我多年努力就是因为很根本的认识到，要化解冲突，还得回到冲突周围的社群。社群背负了关键性的责任，它必须抗拒对差异的过度反应，并提供基于理解和复杂性的其他解决办法。我们需要帮助彼此认识并对抗「过度强调伤害」可能造成的恶果，而不是以强调伤害来作为借口，以正当化集体霸凌、闪躲责任或其他形式的残酷行为。我认为，好好说清楚我们「共同」有责任不要过度强调伤害，并且积极创造其他解决出路，这才比较可能终止不必要的痛苦。我们一起集体找寻解决方法，才能避免陷入那些破坏性的、悲剧性的上纲上

限，而世上有无数无故被惩戒、经历规范性的冲突、以及对抗不义情境的人，他们都需要我们的帮助。很多人会提出各式各样的借口以规避介入不公义的惩戒，然而这种介入非常重要，一旦大家都害怕投身干预行为，冲突的节节高升就难以遏止了。

我们（个人、伴侣、家人、社群、派系、宗教、国家，和人民）经常会假装、或者真心相信、或者高调宣称：冲突「就是」伤害，因此冲突就应该受罚。在这里，「差异」被错误的再现成一种对他人的攻击，我们因而找到正当理由对其残酷回应，而且还可以避开改变自我的责任。只要我们不愿意面对这种「诬告」式的伤害，又非理性的拒绝负责和修补的工作，这就进一步正当化了更多残酷的行为。

以HIV在加拿大被入罪化为例，这个新自由主义社会正在积极说服那些并未感染HIV的公民，说他们其实是被伤害了，结果这些公民过度反应，对感染者施罚，造成不合理的污名、孤立、恐惧、羞辱、处罚、甚至监禁，最终这一切都壮大了国家的权力。这是一个绝佳的例证，展示了「过度强调伤害」如何被呈现为「适度的」「合情合理的」，而群体暴力以残酷和夸大作为回应，把自己伪装成符合规范的、适当的、和「负责任」的。

背景

加拿大长久以来拥有由政府支撑的健保系统，美国则没有。虽说制药工业在加拿大经济当中占有显着份量，但支撑产出药物让每位北美HIV感染者活命的大部分研究领域都在美国。由于美国政府拒绝为HIV感染者负责，要求制药产业作出改变于是变成了平民的责任，美国HIV感染者与加拿大HIV感染者面临的处境和义务毫无疑问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美国比较强大，军事力量也强，而且不断将其文化推广全球，加拿大则拥有世界上最富裕的中产阶级，因此美国最上层的那百分之一或许掌握了强大的全球权力，一般加拿大人的生活还是比美国人更有保障，更为舒适。就算加拿大经历了10年的右翼政府经济紧缩政策，社会福利大规模削减，与美国的水准相比，还算够用，加拿大人自己则觉得社会安全网的削弱太过严峻剧烈。

1981年AIDS以GRID（Gay 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男同性恋相关之免疫系统缺乏）型态出现时，男同性恋性行为在美国还是非法的，直到2003年最高法院才决议推翻鸡奸法律。然而在加拿大，1969年的《综合犯罪法》就已经使21岁以上人口之间的肛交行为成为合法，前提是：不得有超过2人在场。相较之下，美国追随欧陆法传统，以惩罚对待同性恋；加拿大则因为早年把同性恋的「正常」建基于只在两人之间发生的关系，因此可以提供给同性恋一种以道德为本、有控管效果、充满批判意味的个人自由。美国的爱滋组织ACT UP和加拿大的AIDS ACTION NOW同时间成立，两者现今依然存在，也都反对HIV入罪，然而由于两国的脉络如此不同，运动份子采取的回应行动也很不一样。美国的ACT UP一向比较积极，行动也很激烈，常常组织群众高调抗争；加拿大AIDS ACTION NOW的回应则是从近期被推到恶法之下的那些HIV感染者的角度来发声，规划一个名为Think Twice的小型活动，也就是提醒在检举感染者前要三思。

这当然是一很好的理念，我们随时都应该冷静考量这种事情。事实上，2012年开始，加拿大最高法院决议，身上病毒仍可测出的HIV感染者若是没有告知其病情而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就是违法，在一些案例中，就算感染者使用了保险套，没有人受到感染，依然被视为违法。在美国，50州之中有38州设置了各种法条，针对HIV感染者从吐口水到不告知病情等行为，惩罚则包括从罚款到阿肯萨斯州的30年有期徒刑。密苏里州一位黑人大学运动员Michael Johnson最近就因为让2名伴侣感染HIV而被判30年有期徒刑，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美国高等法院认定这个判刑，也没有全国统一执法的标准。加拿大目前则名列全球逮捕和起诉HIV相关事件人数比例最高的前10名国家，这也使得加拿大7万名（包括未被诊断确定的）HIV感染住民暴露在威胁和困惑中。

到2015年春季为止，依AIDS运动的年轻行动者Alex McClelland所言，已有170人被指控，其中半数位于多伦多所在的安大略省。大部分案件牵涉的是男性未告知其女性伴侣，其中78%被定罪，定罪后绝大部分入狱，有些就算其伴侣并未受到感染也被判极长的刑期。2014

年春季已有30位男性因与同性发生性行为而面临同样的指控，由于所有的上诉都失败，运动份子现在尝试与总检察长办公室讨论建立起诉时的规范，但至今还未能达成重大进度。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的AIDS Action NOW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举办提升意识的宣导活动，劝告那些没被感染——也就是没被伤害——但是潜在不爽或焦虑因而想要以报警来报复性伴侣的人。

加拿大 HIV 入罪的种族根源

加拿大力求HIV入罪的努力始于1990年。一名乌干达移民Charles Ssenyonga 因为造成3名女性感染HIV，被多伦多公共健康局要求停止与他人发生性行为，不过他在1993年还未完成起诉前即死亡。199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判决一名白人男性Henry Cuerrier有罪，因为他与两名女性发生了不安全性行为，不过两名女子并未被感染。Cuerrier的定罪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也连带产出一项裁决，认为性行为如果构成「重大风险」，那么不告知HIV感染状况就可被视为是「侵犯」。当然，在这里的「风险」并未被严谨定义。另一重要案例则是被媒体大肆渲染报导的另一名乌干达移民Johnson Aziga，他在1996年被诊断感染HIV，并于2008年被起诉，他承认在未告知的情况下与11名不同女性发生不安全性行为，7名女性受到感染，其中2名死于AIDS。2011年Aziga成为世界上首位因传染他人HIV而被判以谋杀罪名的案例，而且因为他很有可能会再度与他人从事不安全性行为，所以依《危险犯罪者法案》被终身监禁。

根据《加拿大法律与社会科学期刊》的研究，被判刑的异性恋男性有52%为黑人，然而加拿大的感染者中却只有6%是黑人。在一个黑人只占总人口数2.5%的国家中，黑人男性被告的过高比例是非常明显的。

国家政策宁可人民自称「受害」而不愿鼓励人民负责

最后说到的Aziga案例聚焦于惩罚那些具体让伴侣感染HIV的人，但这只是HIV入罪的一个面向而已。法院的判决结果暗示，未受感染

的人不需要负起防范自己感染HIV的法律责任，责任只在已感染HIV的伴侣身上。这与其他把焦虑／冲突等同于伤害的表现完全合拍：法律不认为「未受感染的人从事不安全性行为」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反而只把他们当成受害者。这项诠释与过去30年来全球AIDS预防宣导不断强调未受HIV感染者也有自我保护的责任背道而驰。往年的状况就是认为未受感染的男女应借由坚守「安全性行为」（也就是使用保险套和越来越普遍的预防性投药）来确保不受感染，在这样的概念下，HIV的预防策略主要依靠性伴侣之间的沟通。在HIV入罪后，未受感染者的责任彻底被略过，焦点全部集中到感染者的主动告知或者报警处理上。政府不但没有鼓励爱侣间更坦率的沟通，反而用政府权力取代了鼓励人们学习如何解决问题。可想而知，这些案例的起诉都是以谴责为起点。

加拿大法律学者Glenn Betteridge和Eric Mykhalovsky写过：「向警方投诉时，人们必须确知自己已然经历了某项潜在的『犯罪』不法情事。」这个自我观察是「冲突」和「伤害」的辩论关键。特别是在酷儿的脉络里，未感染者自我认定有责任维持自己不要受到感染，但是同时，由于人总是在互动的社群里认知彼此的经验，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凡人还是可能感染HIV的。然而现在，就如同Betteridge和Mykhalovsky所强调的，加拿大的法院体制却将这种未感染HIV的状态重新描述为「可能的受害者」。一旦未感染者自我保护的责任被移除，就算伴侣带了套，没有任何感染的风险，未感染者也可以仅仅因为伴侣未告知感染者身分，就重新定义自己的经验为「受到了犯罪伤害」。换句话说，即便未尽告知义务并没有对未感染者的HIV状态造成实质的影响，它仍被不公的认定为构成了「伤害」。对于这个在之前很寻常而现在被重新定义入罪的伤害，要如何解决呢？答案很讽刺：虽然是自己决定了进行不安全的性行为，还是要向警方举报性伴侣。

Betteridge和Mykhalovsky继续说到：「个人经验的这种论述建构可能来自某些源头，例如大幅的媒体报导往往创造了耸动的犯罪案例，报导则聚焦于被告的『道德瑕疵』上」。这么一来，就算性行为

有戴套，人们还是可能因为自己的焦虑而报警处理对方，这就是因为「未能告知」已经被有意但没道理的定位为一种反社会的行为。

人类经验的罪犯化

我们能有什么样的替代方案呢？嗯，或许应该把性伴侣视为和我们有「冲突」的人，而不是什么可怕的HIV感染者，而且不要把纯净未受HIV感染者视为受到犯罪伤害的一方，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创造一种解决办法——就是改变我们自己的视角。目前全世界有3千4百万人是HIV感染者，他们每个人都是直接或间接被感染的，如果照加拿大的逻辑，每位带着具有传染力病毒量的感染者，只要在未告知的情况下与他人发生性行为，都要被关入监狱。事实上，很少人能在遇到性和感觉的特别组合时还能完美的选择，一旦人们因焦虑而把责任推给你、怪罪你，你是很难存活的。

当国家以负面态度对付个人而不管妖魔化的来源时，一定会造成痛苦的结局。数字告诉我们，不安全性行为是很普通的经验，普通到我们可以理解不安全性就是有瑕疵的凡人在日常生活中很正常冲突矛盾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知道意外受孕是人类生命中不可否认的常见现象一样，HIV感染亦是如此，但是我们并不会监禁那些使自己的女性性伴侣在不想怀孕的情况下怀孕的人——就算他们可能没戴套也不构成犯行。尽管加拿大拥有「进步」的名声，有着高等教育、艺术资金、和普遍的资源回收，它却决定以惩罚来回应这些很普遍的人类经验。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让朋友报警的

加拿大的这种环境使得AIDS Actions Now只能试图一个一个说服大家在报警前三思。真正的好朋友会坚持人们三思，反省自己也参与在冲突里，而不是立刻报警处理；好朋友会帮助家人和社群成员认知自己的焦虑，设法消弭焦虑，而不是把焦虑发作在他人身上。对加拿大的HIV感染者而言，请求他们进行伦理的考量好像已经成为唯一的策略了，毕竟，一旦被国家赋予权利可以直接惩罚或者威胁以国家之

力惩罚时，人们就再也不用检讨反省自己了。

从来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惩罚是有效的。惩罚、谴责、排挤、威胁和躲避，只会使得世界更糟糕。同样地，有能力惩罚，并不等于你就是对的，我们更常看到的反而是惩罚错了人，或者惩罚者利用权力规避责任。因此，致力于创造可以用国家权力来威胁别人、可以随时报警的新阶级，并不能生产出公平正义，反而可能制造更多的不公平、不正义。老实说，把未受HIV感染的人们打造成可以报警施罚的新权力阶级，只会减损他们协商、明辨、解决问题、沟通和为自己的行为担负起责任的能力。

HIV入罪化预设了社会是未染病的，而感染者是对社会的威胁。HIV入罪化更鼓励未受感染者自认是受害者，而不是在人际关系中平等参与冲突、相互负责、背负情感和责任的人，这样便使得未受感染者更轻易规避沟通，并借由通报国家来惩罚感染者。政府看重焦虑和惩罚，远超过沟通，所以才会致力于区分谁是好的、干净的、正常的、值得国家保护的人，而谁需要被隔离和惩罚——即使没有正当理由，也无法改进情况。我们真的需要三思！

爱滋与海报创作

嘲讽 HIV 入罪化的艺术行动

莎拉·舒蔓原着，黄杰翻译，何春蕤校订

致亲爱的「海报病毒」艺术团体（*Poster/Virus*）：

一个人如果因为拒绝解决自己的焦虑和罪疚而向国家告发爱人，那真是很蒙昧，很丑恶。但是在加拿大做这样的事不但是被本来就支持 HIV 刑事化的政府所鼓励，更被这个霸凌弱小的社会所怂恿。「海报病毒」，你们是一群 HIV 阳性的加拿大年青男女及其朋友所组成艺术团体，你们的国家正是 HIV 刑事化的全球先锋。然而自 2011 年起，你们成功的串连了艺术家和社会运动者以及社区大众（其中有的也是艺术家，有的则不是），并成功的在 7 个城市张贴了数万张海报，也制作了一段影片。你们政府教唆 HIV 阴性的市民打电话告发自己的 HIV 阳性爱人「隐瞒感染身分」（尽管无人被感染而全程使用保险套），你们却依然无惧的公开自己 HIV 阳性身分。活在一个沈溺在优越主义意识形态中、拒绝沟通聆听、拒绝解决问题、只想残暴惩罚异己的社会里，你们周遭充斥着针对 HIV 阳性者的暴行，然而你们却仍然坚持自己的行动。因此，我仰慕你们。

爱慕你们的莎拉 敬上

加拿大的 HIV 刑事化

2012 年，加拿大最高法院认定，HIV 阳性者就算已经使用保险套而无人被感染，也必须按法律要求向性伴侣告知自己是感染者。这个以 9 比零通过的决议违反了多年来把「安全性行为」主要定义为「使用

「保险套」的全球政策和文化共识¹。在爱滋病出现的头几十年，我们是根据人体中T-细胞的含量来判定其健康状况，T-细胞是维持人体免疫力至关重要的白血球，当一个人接近死亡，其T-细胞数量就会暴跌，而当他接受新的药物治疗时，其T-细胞就会再生。然而今天，随着「多重药物治疗」（compound treatments）的盛行，我们转而根据人体内的病毒含量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感染。现在处理HIV的方法就是压制人体病毒含量，而HIV感染者的目标就是达到病毒「无法测到」的程度，意思就是说，病毒含量已经被药物压制到一个没法被侦测出来的水平。虽然「无法测到」仍然需要依赖药物压抑体内病毒含量，可是病毒含量越低，传染力也就越低。实际上，「低病毒含量」已经可以非常有效阻止HIV传染，所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也在2014年1月宣布，低病毒含量的无套性行为不应该再被称为「不安全性行为」，而应该正式改称「无套性行为」²。新的爱滋情势不再关注「阳性」或「阴性」的二分，而关注病毒含量「已被压制」或「未被压制」的判定。

美国由于缺乏完备的健保，只有35%的HIV阳性案例能够成功压制病毒含量到无法测到的水平，其余的个案根本无法得到基本的照顾和治疗³。由于美国政府没能为大多数HIV阳性的国民提供控制病毒含量的方案，它没法像提供全民健保的加拿大一样以病毒含量作为刑事化的判准。美国各州因此其实暗暗进行着对HIV的刑事化，有些地方荒谬到HIV阳性者连吐口水也可能被监禁，但是美国至今尚未设定统一判准，也没有案例上达联邦法院的层次⁴。在加拿大，理论上政府已经可以制定政策要求所有HIV阳性者必须达到病毒含量无法测到，可是，实际上HIV阳性者想要获得医疗照顾还是没那么容易，这是完全

1 "Understanding the Criminal Law in Canada," *Canadian HIV/AIDS Legal Network*, 2012, <http://www.aidslaw.ca/EN/community-kit/documents/Chapter3.1-ENG.pdf>

2 "CDC to stop Using 'Unprotected Sex' for 'Sex without Condoms,'" *Poz Magazine*, February 6, 2014, http://www.poz.com/rssredir/articles/cdc_msm_open_letter_1_25137.shtml

3 Reed Vreeland, "Engagement in US HIV Care: Problem Even Worse Among Blacks, Young People," *AIDSMEDS*, August 3, 2012, http://www.aidsmeds.com/articles/hiv_continuum_retention_1667_22785.shtml

4 "Global Criminalization Sca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Global Network of People Living with HIV*, February 6, 2014, <http://criminalisation.gnpplus.net/node/1324>

没享受过健保的美国人很难想像的⁵。在加拿大，感染者中估计还有25%没接受测试，例如卑诗省的统计结果就和美国差不多，只有一半HIV阳性者在接受治疗⁶，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达到病毒量检测不出的水平，部分原因是因为还有很多人没被测试。针对这种混乱的状况，加拿大艺术团体「海报病毒」就此问世。

加拿大的 HIV 阳性抗争者

我们旨在理解自身的困境。我们要如何挑战爱滋产业的运作逻辑？海报艺术可以带来什么改变？对于爱滋政策，人们到底关心甚么？在当下被身分政治分裂的运动里，我们如何让所有的声音都被听见（而不是只有优势者独占发言台）？

——「海报病毒」博客的管理声明（2013）

「海报病毒」是加拿大年轻HIV阳性者的起义行动，他们针对的正是社会对爱滋议题的无所作为。大家都说爱滋病「危机已经过去」，使得这些年轻人对自己的阳性身体感到羞愧而隐藏自我。现在的感染者对早期HIV阳性世代曾经成功有效使用的策略和战术一无所知，不知道如何真正改变社会，最终逐渐麻痹无力。主体的能动性于是被各种各样的爱滋服务组织所取代，这些组织根本就把HIV阳性主体当成客户而不是运动份子。年青艺术家所面对的掣肘更为严峻，在美国，艺术创作的专业化和艺术市场的商业化使得那些在形式上或政治上展现异议色彩的作品不是被边缘化，就是被地下化，虽然不被限制，但是也不被容忍。同样的作品要是在加拿大就不会被当成威胁，因为那里的资助体系更为复杂，实际上，加拿大可以说是马库色所谓的「压迫式容忍」的社会（Marcusian society of "repressive tolerance"）：异议被限制也被高举在「多元价值」的框架内，去除

⁵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Screening and Testing Guide," *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 January 2013, <http://www.phac-aspc.gc.ca/aids-sida/publication/index-eng.php#stg>

⁶ James Wilton, "Gaps in British Columbia's HIV Treatment Cascade," *CATIE: Canada's Source for HIV and Hepatitis C Information*, February 19, 2014, <http://www.catie.ca/en/catienews/2014-02-19/gaps-british-columbia-s-hiv-treatment-cascade>

了杀伤力，反而巩固了国家体制。要是在美国，那些被市场排斥的艺术家只能靠自己，可是同样的人在加拿大却可以获得为数不少的金钱资助，可以运用政府的基础建设。这种制度当然有利艺术家的生活，也保护加拿大的艺术发展免于美国商业文化全球化的吞噬，更不必受制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可是，在另一方面，过度补助却会滋养出一种「自满文化」（culture of complacency），同侪评选变成朋党为奸，透过镜厅般的彼此模仿映照，使艺术更趋单一化、平庸化。美国艺术家如果想要避开商业制造，就需要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地制作自己的艺术品，加拿大艺术家却常常说他们因为「得不到资助」所以没能完成计划。加拿大艺术团体「爱滋立即行动」（AIDS Action Now）和相连的团体「海报病毒」拒绝政府的一切资助，这也是我爱慕他们的另一个原因。

《只要世上还有监狱，就会有爱滋》（艺术家：Alexis Mitchell）

Alexis Mitchell为「海报病毒」所创作的艺术品并不是一幅海



图一、Alexis Mitchell (1983-)

《只要世上还有监狱，就会有爱滋》
(2013)

报，而是一段模仿政府宣传片的短片，题目是《只要世上还有监狱，就会有爱滋》（*As Long as there are prisons, there will be AIDS*, 2013）（见图一）。在影片中，一名白人年轻男子穿着印有美国国旗的海滩裤，正在用沙堆砌一座堡垒，海浪不断向沙堡涌来，彷彿将要摧毁一切。海浪愈靠近

近，男子就愈慌忙的抓狂堆沙，保护他的帝国，可是崩坏已是定局。堡垒的角楼上迭加了一幅加拿大枫叶的彩虹旗，代表「同性恋国家主义」（homonationalism）、「酷儿爱国主义」（queer patriotism），也代表与惩戒的、不公义的、不公平的国家体制共谋。飘扬的旗帜、阳光美男子、完美的沙滩、清澈的海水——一切看似美好，然而大浪不断涌上，坍塌已无可避免。

创作者在谈及她的作品时，不谈沙滩上的白人男子身体，而是引用社运者兼律师Dean Spade的写作去描述监狱工业复合体（prison-industrial complex）、有色跨性别人士被监禁、以及现在HIV阳性者在加拿大被监禁的危机⁷。在西方酷儿人群中，这些批判越来越普遍，处理的议题包括监狱运动（prison activism）、废监运动（prison abolition）、同性恋爱国主义、酷儿爱国主义、以及对国家体制的认同。可是，这些批判在实践上有何意义？在现实中，酷儿社群逐渐被分化成两个阵营，一边是那些得到国家机器支援的白人、酷儿家庭、公民、顺性别者、以及HIV阴性者；另一边则是那些新的被排斥者，也就是「新酷儿」，包括非公民、某些跨性者、无家者、以及HIV阳性者。然而，旧有的惩戒体制和优越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并未改变，它只是被重新整编：当一个群体新近被纳入体制成为「自己人」，就会有另一个群体变成「他者」。就HIV刑事化而言，关键就是告发：新的自己人就是那些打电话向警察告发其HIV阳性性伴侣的HIV阴性者，而新的被排斥的他者则是那些被国家体制骚扰的HIV阳性性伴侣。新的加拿大「同性恋爱国主义」不但不鼓励人们沟通以解决问题，反而容许各种霸凌手段，包括警方的恐吓、律师的恐吓、刑事起诉、法庭审讯、监禁，甚至一生都被标示为「性犯罪者」。在这种脉络里，面对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经验，社群又该负上甚麽样的责任呢？

2012年加拿大最高法院支持HIV刑事化的决策一出，「爱滋立即行动」和加拿大其他倡议团体第一时间就决定要撰写一份「检举准则」来限制检察官的恶意，要求他们不要把收到的检举办到底。可惜这个行动并未产生多少效用，因此「爱滋立即行动」发起一个「报警前三思」（Think Twice Campaign）计画，尝试说服人们帮助彼此冷静，把话说开，积极寻找另外的出路，而不要透过国家的力量来表达焦虑和罪恶感。「爱滋立即行动」要告诉社群的是：大家都有责任阻止别人报警检举。

⁷ <http://postervirus.tumblr.com/post/68371788887/as-long-as-there-are-prisons-there-will-be-aids>

加拿大人常说自己「不爱冲突」，可是HIV刑事化却揭露了真相：人们其实很享受看到国家机器的大锤惩罚异类。政府制订这些法案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任何反对，这证明了这个社会默然同意了（甚至有点高兴看到）这种残忍的威逼。社会不喜欢的就是负起责任来：对他们而言，躲在警察背后比较容易，要求自己活出「做人」的基本原则，把别人也当个「完整的人」来看待，以便大家和平共处，实在太难了。可是，加拿大的爱滋运动者又是否愿意公开承诺当他们看见有人以报警来威胁伤害自己的爱人而不愿意尝试其他解决方法时运动组织者会介入并阻止这恶行？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在Mitchell的影片中的白色沙滩上，那个忙着筑沙堡的白种男人心里并无任何包含其他弱势在内的忧虑。

《无套性交…人之常情》（艺术家：JJ Levine）

主导异性恋生活的「生殖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现在有一部分也开始主导酷儿社群了。这种意识形态认为，有家之人所做的行为要是换了是无家之人做，意义就很不一样，而由于白人家庭是国家主义和男性（包括酷儿男性）优越主义的基石，国家会不顾一切的巩固它最邪恶的范围。在JJ Levine那幅名为《无套性交…人之常情》（*Barebacking... Everybody Does It*, 2013）（见图二）的海报里，我们看到创作者以指出异性恋的幸福怀孕就是无套性交的结果来展现国家在处理性别、性、以及种族问题时的伪善。Levine在解释其作品时说到：「如果读者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其实海报上的孕妇和准爸爸是由同一个模特儿分身饰演。由于观察者无法从这相片判断模特儿本身的性别，因此也无法决定在谴责男同性恋无套性交行为时应该放过哪种身体免于责难⁸。」唯一确定的是，



图二、JJ Levine (1986 -)
《无套性交…人之常情》(2013)

⁸ JJ Levine, "Barebacking... everyone does it," artist statement, <http://postervirus.tumblr.com/post/68235202296/barebacking-everyone-does-it-jj-levine-the-term>

要放过白人。

或许我们先来看一些有关种族的背景资料。加拿大只有2.5%是黑人，但是HIV阳性者却有6%是黑人男性，要是说到HIV刑事化，52%被起诉的男人是黑人，而且大多数都是移民。1990年，来自乌干达的Charles Ssenyonya在感染了3名女性后被多伦多公共卫生部勒令不可再发生性行为⁹，但是他在起诉完成司法程序之前于1993年逝世。199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宣判白人Henry Cuerrier因为跟两名女子无套性交有罪——纵使该两名女子没受感染¹⁰。2012年最高法院维持原判，认定隐瞒HIV状况下发生性行为构成了「伤害」¹¹。另一被媒体炒作的重要案件涉及另一名乌干达移民Johnson Aziga，他1996年被验出HIV阳性，2008年被起诉，承认曾与11名女子在没有透露自己的感染状况下发生无套性行为，当中7名女子后来受到感染，2名因爱滋病逝世。2011年Aziga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因为传染他人HIV而被判谋杀罪¹²，在加拿大的《危险犯罪法》之下被认定为「非常有可能再进行不安全性行为」，因而被判处无期徒刑。2006年起，在保守的总理Stephen Harper任期内，72,000名移民被刑事关押，非法移民更被剥夺医疗照顾。正如「爱滋立即行动」的创立人Tim McCaskell所说，加拿大政府以「性爱上具侵略性的带病黑人移民」作为修辞想像，用种族歧视来巩固公众对HIV刑事化的支持¹³。

然而，Levine指向的问题比想像中更为复杂。现在世界上大概有三千五百万名HIV阳性者，每一个阳性者都是从他人感染来的。照加拿大的制度，每个感染他人的阳性者、或是进行有套性行为而未公开

⁹ James Miller, "African Immigrant Damnation Syndrome: The Case of Charles Ssenyonya," *Sexuality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National Sexuality Research Center,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2, no. 2 (June 2005): 31-50

¹⁰ Darrell Tan, "The Cuerrier Decision: Public Health an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HIV Serostatus Non-Disclosure," *University of Toronto Medical Journal* 76, no. 3 (May 1999): 170- 73, <http://utmj.org/archive/76-3/NY-Cuerrier.pdf>

¹¹ "Understanding the Criminal Law in Canada," *Canadian HIV/AIDS Legal Network*, 2012, <http://www.aidslaw.ca/EN/community-kit/documents/Chapter3.1-ENG.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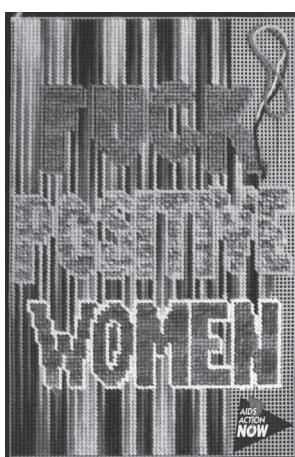
¹² "HIV Killer Ruled Dangerous Offender," *CBC News*, August 2, 2011, <http://www.cbc.ca/news/canada/hiv-killer-ruled-dangerous-offender-1.927621>

¹³ Tim McCaskell,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author, 2014

自己HIV阳性状况的人（纵使无人受感染）都要被关进监牢，要是用全球的规模来想，那就是数百万人，这种惩罚性的意识形态显然是一种文化病态。Levine则建议另外一种观点：为什么不把这个数据理解为HIV感染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经验呢？或许感染HIV就像不小心怀孕罢了。老实说，也许全球各地大部分的孕事都使人私下感到爱恨交加，心怀犹豫，无数女人也都有把自己或伴侣不想要或不会选择要的孩子生下来甚至抚养成人的经验。那我们会把那些跟她们进行「不安全性行为」的男人关进监狱里吗？当然不，我们会安慰她们，让她们知道自己得到社会和法律的接纳。因此，在《无套性交…人之常情》之中，Levine尖锐的显示，社会和国家在处理同一事件上的态度和行动，在遇到白人异性恋者或「家庭」时是何其不一致，这些人不但不会承受牢狱之苦或被标示为性罪犯而毁掉一生，反而会得到赞赏和认同。这种双重标准正是社会压迫的运作逻辑。

《千阳女》（艺术家：Allyson Mitchell 与 Jessica Whitbread）

Jessica Lynn Whitbread是北美和全世界HIV赋权运动中最突出的女性领袖。她住在多伦多，是「爱滋立即行动」成员，同时和爱滋运动者和理论家Alex McClelland同为「海报病毒」的召集人。Whitbread一方面在公众政治场域中活动，和联合国以及一堆司法、政治组织合作，另方面则组织了一个非常私人的、聚集HIV阳性女人的「茶党」，聚会地点从非洲肯亚到纽约布鲁克林区都有。Whitbread广为人知的公开立场就是拒绝向国家举报那个使她感染爱滋而未曾告知其感染者身分的男人。在由加拿大政府执行，由那些拒绝帮助别人「三思」的坏朋友所维持的霸凌刑罚大海中，Whitbread具体而微的体现了什么是和解、协商、和责



图三、Allyson Mitchell 与
Jessica Whitbread
《千阳女》（2011）

任。

《干阳女》（*Fuck Positive Women*, 2013）（见图三）是Whitbread和Allyson Mitchell合作的作品，后者曾和艺术家Deirdre Logue在多伦多共同创立了女性主义艺街画廊（Feminist Art Gallery (FAG)），她同时是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也是在不同艺术形式中创作的艺术家。这海报上的口号把HIV阳性的女人称为「阳女」，就如过往翻转「怪胎」、「娘炮」、「铁T」等侮辱用语一样，赋予HIV阳性女人一个可以拥有、可以愉悦、和可以强烈要求的主体位置。海报在视觉效果上也模仿十字绣的质感，这个选择批评了人们对艺术、工艺和其他家庭艺术形式的「女性」预设，但是在这里，它不是用来传递有关「家」的陈腔滥调，而是表达性的需求。

在HIV刑罚的谜局里，女性的遭遇更是昏暗不明。加拿大大部分HIV阳女都住在贫困而被污名化的区域里¹⁴。加拿大女性人口中有4%是原住民，2%是黑人，可是2007年的HIV阳性女性统计有45%是原住民，有20%是黑人。就染病比例而言，跨性女人的感染比例比任何群体都高¹⁵。虽然HIV阳女的病毒含量通常都比男性低，然而却很难持续压低病毒量，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确定原因为何，不过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控制病毒含量的药物都是以男性身体为实验对象，因此或许对女人没那么有效。McCaskell就认为：「照病毒含量制订的法律对女性更加严苛。比方说，如果我想知道我的病毒含量，只要去看医生就可以了。然而加拿大北部的原着民女性却不一定随时能够有机会验血¹⁶。」

目前共有14位女性因为没有告知性伴侣自己的身体状况而被加拿大政府起诉，其中一名已经被起诉了3次，这种起诉不免引发一些更棘手的问题：到底她们是传染了谁？2006年加拿大成为世界第一个因为孕妇传染HIV给她的孩子而起诉这位孕妇的国家，但是现在随着孕

¹⁴ Eric Mykhalovskiy and Glenn Betteridge, "Who? What? When? And with What Consequences? An Analysis of Criminal Cases of HIV Non-Disclosure in Canada,"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27, no. 1 (April 2012): 31-53

¹⁵ "HIV Among Transgender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ovember 2013, http://www.cdc.gov/hiv/pdf/risk_transgender.pdf

¹⁶ Tim McCaskell,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2014

妇开始服用Truvada新药，怀孕传染HIV的机率渐降¹⁷。至于把HIV传染给男性，加拿大HIV阳性的男性有23%声称自己是被女性感染¹⁸，可是「HIV正义网络」（HIV Justice Network）指出，男人经由插入阴道感染HIV的机率只是2500分之1¹⁹。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巨大差异是统计没法解释的，我们可以推测，至少有些男人一定在说谎以掩盖自己曾进行男男性行为或用药。2007年我们就已知割包皮有助降低（根据男人自称）至少60%的阴道交爱滋传染，这解释了为何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女传男的比率要比北美高出很多²⁰。然而，在加拿大因为隐瞒自己感染者身分而被起诉的女性当中只有两位被控感染他人，两位都是有色女性：泰国移民Suwalee Iamkhong和原住民June Tippeneskum都因被控传染其夫HIV而被起诉，前者被驱逐出境²¹，后者被监禁三年²²。然而，在判决前却没有进行任何演化比较测试（comparative phylogenetic testing）以确认她们体内的HIV与其丈夫体内的吻合。统计数字对女传男的风险支支吾吾，加拿大也没有任何研究资料愿意指出直男是感染HIV的高危群。根据加拿大HIV/AIDS法律网络（HIV/AIDS Legal Network）的说法：「没有任何流行病学证据可以确认性工作者传染HIV给客人的个案经常发生²³。」因此，HIV阳女并不是甚么公共卫生的危机，而是一群需要服务和照顾的女性。HIV阳女实际上是在为一个很难成立的想像的罪行而受罚，Whitbread和Mitchell则透过她们的作

17 "Big Strides in Battle Against Pediatric AIDS," *Health Day News*, December 24, 2013, <http://broadneckrx.net/article.php?id=681382>

18 "Canada HIV and AIDS Statistics," *Avert*, January 2012, <http://www.avert.org/canada-hiv-aids-statistics.htm>

19 "HIV Risk Levels for the Insertive and Receptive Partner in Different Types of Sexual Intercourse," *National AIDS Manual*, <http://www.aidsmap.com/HIV-risk-levels-for-the-insertive-and-receptive-partner-in-different-types-of-sexual-intercourse/page/14434490>

20 "New Data on Male Circumcision and HIV Preven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arch 9, 2007, http://www.who.int/hiv/pub/malecircumcision/research_implications/en

21 Tom Godfrey, "AIDS-Infected Stripper Deported to Thailand," *Toronto Sun*, August 30, 2010, <http://www.torontosun.com/news/torontoandgta/2010/08/30/15189991.html>

22 Rick Garrick, "37 Months for HIV Exposure," *Dibaajimo: Indigenous Reports Portal*, May 12, 2011, http://www.wawataynews.ca/archive/all/2011/5/12/37-months-hiv-exposure_21437

23 "Annual Report," *Canadian HIV/AIDS Legal Network*, 2012-13, <http://www.aidslaw.ca/EN/index.htm>

品，试图勾起与阳女性交的焦虑，以揭露了那种于事无补但是伤害每个人的歇斯底里病。

《新公式：「缄默=性爱」》（艺术家：Jordan Arseneault）

根据我为「ACT UP口述历史计划」（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 Oral History Project，或是「爱滋结盟释放力量」口述历史计划）所做的访谈²⁴，在「黄金时期」那些年代，因为充满痛苦，大量朋友死亡，ACT UP的大部分成员都进行了安全性行为。很多人在离开ACT UP几十年后才长出抗体，而好多位都重复证实，在ACT UP最重要的那几年间，HIV阳性和阴性的人相处融洽，之间并无芥蒂。这种和谐后来垮了，1989年David Wojnarowicz和Phil Zwickler制作了一段短片《恐惧告知》（*Fear of Disclosure*），描述当一个人透露自己是HIV阳性时因为害怕在性上被拒绝而产生的恐惧，探究这种恐惧背后的心理和社会含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经验的公开表达。

从前，保险套除去了告知与否的抉择，然而无套性交的重新流行又把「坦白或假装自己是HIV阴性」的问题带了回来。在这个情况下，「缄默」就同时等于「性爱」也等于「死亡」。可是蒙大娄艺术家Jordan Arseneault说，现在药物已经可以有效压抑病毒含量，「死亡」根本不是问题，但是HIV刑事化强迫阳性者必须告知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论是否使用保险套，不论有没有传染的危机，因此「缄默」就等于「被告发」、「被起诉」、「被监禁」以及「一生被标示为性罪犯」——前题是被抓到。当然「缄默」也等于「逃掉」。

Arseneault在海报里提出的新公式《缄默=性爱》（*Silence=Sex, The New Equation*, 2012）（见图四）不单是说要隐瞒你知道的事（别说真话），更重要的是，它鼓励人们永远不要去挖掘真相（别追问吧）。HIV刑事化不单以举报者的角度鼓动冷酷残暴的文化，它同时也强迫被攻击的人噤声，或是采取更危险的选择——被迫维持对病情的无知。多伦多LGBT中心的跨性社群服务策划人Morgan Page就指出：「人们现在已经知道，不管是否使用保险套或主动透露自己的

²⁴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ACT UP Oral History Project, see www.actuporalhistory.org



图四、Jordan Arseneault (1980 -)，《新公式：缄默 = 性爱》(2012)

每次有人太急于想通事情结果反而造成问题一样，这些人身边总围绕着一群损友、一群坏公仆、一个浸淫在优越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肤浅新自由主义社群。我的海报因此会尝试处理这些加拿大的损友，处理这些鼓励暴行而不鼓励他人自省以追求和平共处的人。我的海报会说：

是朋友就不会让朋友向警察告密。如果你爱他，就帮助他冷静下来、负起责任、两下协商。

注：这篇文章由作者本人提供，原来的标题是 "Dear Poster Virus, This is why you mean so much to me"，出自 *Art AIDS America* 一书（2016 即将出版）。本文作者将于三月初应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之邀来台访问，活动讯息请见 <http://sex.ncu.edu.tw/activities/2016/0305/index.html>

身体状况，只要是HIV阳性就要面对污名，面对在性上被排斥，更可能遭到起诉²⁵。」

最后，如果「海报病毒」邀请我跟他们合作，我的海报又会说些甚么呢？我认为加拿大HIV刑事化问题的核心是它让冷酷残暴成为正常行为，这是一种深刻的病态自恋，来自那些偏好惩罚他人而不愿意实际解决像是焦虑、内疚、对性的矛盾情感、以及责任的人——上述都是人们拒绝展开的议题，国家法律则给了他们一个出路，不需要思考、感受、谈论、理解自己和他人，也就是不必让自己更深刻的活得更像人。就像每

²⁵ Morgan Page,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2014

「感染者運動固然不用去為這恐性文化的修復負責，可是假如我們不扛起這責任的話，實在不知如何能讓人放心談性！」

荷安柏

本書記錄了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過去三年來與國內外學者、運動者、及酷兒公眾一同打造愛滋邊緣公共領域的軌跡。它肯認邊緣的愉悅實踐，直指主流愛滋防治中缺席的慾望；它以歷史中生成的左翼酷兒政治及社群照顧為據，批判愛滋專業化下的知識—權力運作，提出對抗公衛「忌性反毒」婚家道德的解放願景。



9 789860 510379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出版系列
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叢書